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见证民主教育的希望与失败

约瑟夫·费瑟斯通 等著
王晓宇 周常明 译

Witnessing the Hopes and
Failures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Witnessing the Hopes and
Failures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
环境教育的诞生——英国学校课程社会史的个案研究
学校社会学
被压迫者教育学
教育组织行为学
意识形态与课程
课堂管理技巧
跨越边界——文化工作者与教育政治学
知识与控制——教育社会学新探
高等教育与终身学习 (第三版)
优化学校教育——一种价值的观点
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探索
未来的课程
课程统整
校长的课程领导
重建学校的大胆计划——新美国学校设计
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
教育社会学手册
教科书政治学
全面质量教育
高等教育中的潜在课程
教育研究的取径——概念与应用
学习自由的国度——另类理念学校在美国的实践
教育研究的批判民俗志——理论与实务指南
学校和课堂中的改革与抗拒——基础学校联合体的一项人种志考察
分享语言——对话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见证民主教育的希望与失败

沃尔夫冈·布列钦卡 著
艾沃·F·古德森 著
玛丽·杜里-柏拉 著
保罗·弗莱雷 著
罗伯特·G·欧文斯 著
迈克尔·W·阿普尔 著
F·戴维 著
亨利·A·吉罗克斯 著
麦克·F·D·扬 主编
克里斯托弗·K·纳普尔 著
阿瑟·J·克罗普利 著
克里夫·贝克 著
斯蒂芬·鲍尔 著
麦克·扬 著
James A. Beane 著
A. Glatthorn 著
S·斯特林费儿德 等著
迈克尔·阿普尔 著
莫琳·T·哈里楠 主编
M·阿普尔 主编
L·克丽斯蒂安-史密斯 著
Edward Sallis 著
Eric Margolis 主编
潘慧玲 主编
Ronald E. Koetzsch Ph. D. 著
Phil Francis Carspecken 著
唐娜·伊·玛茜 著
帕特里克·杰·麦奎兰 著
拉蒙·弗莱夏 著
约瑟夫·费瑟斯通 等著

ISBN 7-5617-4269-X



9 787561 742693 >

定价：27.00元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见证民主教育的希望与失败

袁振国 谢维和 丛书主编
徐 辉 张斌贤

Witnessing the Hopes and
Failures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约瑟夫·费瑟斯通 等著
王晓宇 周常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证民主教育的希望与失败/(美)费瑟斯通著;王
晓宁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6
ISBN 7-5617-4269-X

I. 见... II. ①费... ②王... III. 民主教育:学校
教育-教育史-美国-现代-文集 IV. G571.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4814 号

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

见证民主教育的希望与失败

著者 约瑟夫·费瑟斯通等

译者 王晓宁等

策划组稿 金勇

责任编辑 吴海红

责任校对 郭绍玲

封面设计 高山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刷者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6 开

印张 16.5

字数 219 千字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印次 2005 年 11 月第一次

印数 6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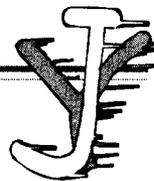
书号 ISBN 7-5617-4269-X /G·2467

定价 27.00 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献给已故的戴维·霍金斯(Hawkins, D.),
献给弗朗西斯·霍金斯(Hawkins, F.),



“一个孩子曾问过，青草
是什么样的？”

// 总 序

总

序

学术交流是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陆续翻译引进了一批批外国教育理论著作,这对促进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理论著作翻译引进的工作有所减弱,在已有的教育理论翻译作品中,也较多集中于单科性作品,综合性较强的作品较少,有也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作品,由于没有系统译介,以讹传讹的也不少。为此,我们筹划了这套影响力教育理论译丛。选题的重点是思想性、综合性较强,学术覆盖面较广,较具原创性的作品;时间上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为主。虽然有些作品翻译难度较大,但我们将不避烦难,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我们希望学者同仁共同关心这一工作的进展,为丛书出谋划策,推荐作品,参与翻译,不断提高这套丛书的质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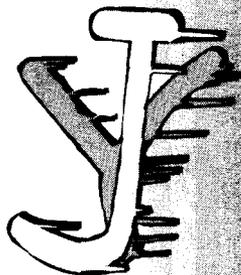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

谢维和(北京师范大学)

徐 群(浙江师范大学)

孙斌贤(北京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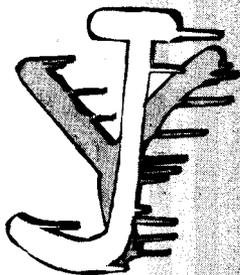


作者中文版序

// 作者中文版序

《见证民主教育的希望与失败》现在就要与中国读者见面了，我感到由衷地高兴；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把该书译成中文出版，谨表谢意。我从事过不同的职业，做过记者、教育史研究者、政治行动主义者、师范教育工作者和诗人。除了诗歌外，我所从事的上述各项工作都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倘若对诗歌感兴趣，读者可以翻阅《布雷斯的海湾》一书，2000年出版）。《见证民主教育的希望与失败》是一本非常个性化的书，集中体现了美国在追求教育民主思想的历程中所进行的各项实践活动和学校教育的改革。有几篇文章是我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做记者时所写的，当时我是《新共和》杂志的编辑。而近期的文章则反映了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从事师范教育工作时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一直担任该校师范教育专业的教授和教研负责人（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师范教育专业在美国通常名列第一）。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我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并为优秀的中国学生上研究生课。本书还有一些文章所谈论的是有关杜威和卢梭的教育思想、城市学校、民权以及我所仰慕的教师们的工作情况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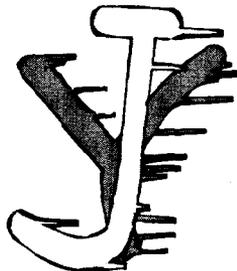
本书出色的编辑是我的女儿莉莎·费瑟斯通和凯特林·费瑟斯通。莉莎现在是《国家》杂志的记者和特约编辑，而凯特林一直是纽约市一所幼儿园的教师。我们三个人都对当今美国的教育和政治的主流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想告诫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的是：当我们为新千年的孩子们创造新的、更加美好的课堂和学校教育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传统上还有很多丰富的、并且证明是对我们



有益的民主思想和实践活动可资借鉴与挖掘。本书中所反映的思想，一方面是进步教育思想的拥护者和民主主义教育者之间激烈的争论；另一方面是传统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倘若要了解激进的保守主义思想，可翻阅黛安娜·拉维齐(Ravitch, D.)的《左翼的支持》一书]。

这个时候由任何一个美国人来宣扬民主实在是一件尴尬的事情。乔治·W·布什试图凭借武力在伊拉克创造民主；而他自己在国内却并不支持民主改革；他的政府对学校教育在创造民主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没有多少兴趣。

同时，这个时候由世界人民为民主教育鼓起勇气高唱赞歌也是一件尴尬的事情。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里，占主导地位的代言人通常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讨论学校教育问题的，他们要求教育要更好地为全球化的经济服务，而民主并不是他们讨论的主题。本书所涉及的思想家和实践者都认识到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他们明白，我们的世界将一直处在危机之中，直到那些贫穷和挨饿的人们的基本生计需求得到满足；他们也明白，西方称霸的旧时代已经结束，各国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经济繁荣的道路是相同的。那种认为世界各地的学校教育将在经济发展和成长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想法是没有错的，学校教育在进一步解放妇女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是，本书所代表的传统思想一直都对狭隘的教育经济观念持批判的态度。它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我本人对学校教育也有这样的期盼。不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经济规划师们以及专家们承认与否，教育民主都应该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美国伟大的激进主义非洲裔教育家杜波依斯(W. E. B. DuBois)一直认为，平衡的民主教育有三个目标：工作、文化和自由。他认为接受教育的不仅是工作者，而且还要有公民和积极分子。当非洲裔美国人的经济情况恶化的时候，而且，常常是由白人种族主义者对此状况加以界定的时候，他更强调平衡的民主教育这一点。杜波依斯发现，民主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真正政治权力的参与以及更为丰富、复杂和完整的教育的参与，而这种教育远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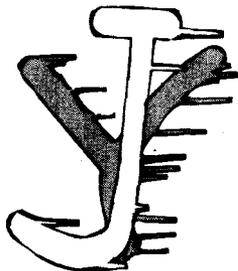


胜过目前就业市场所需的那几种技能方面的教育。杜波依斯像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思想家和教师那样,希望工作者能受到传统上只有那些社会精英和富人才能享有的教育。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者才有能力干好工作,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也才能够成为美好未来的设想者和建设者。这一丰富和复杂的观点,也即学校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为了教育人们以民主的方式参与工作、文化和政治活动的观点,是本书的核心所在。

我所描述的教育民主的观点并非是美国人的发明。美国人并不拥有这些思想,尽管一些美国学校今天提供了一些民主实践的宝贵范例。我在本书中提到了一些[亦参阅迈克·罗斯(Rose, M.)的《可能的生命》,该书是美国各地当前民主实践的一瞥]。民主思想现在已成为有关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学校的明天等话题所展开的世界范围内对话的组成部分。中国在漫长的绵绵不断的民主和教育历史中肯定已在书写自己的篇章。1919年,我书中的一位主人公,即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和教授约翰·杜威访问了中国。他在中国停留的两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中国拥有古老的历史,但在杜威看来,她仍显得那么年轻及富于生机;他热爱中国人民,并为他们期盼着伟大的未来。杜威的女儿简曾写道,中国是继他的祖国之后最接近杜威思想的国家。杜威告诫中国人民不要不加批判地照搬外国的模式,他所预示的中国新文化是一种把古代传统的精髓与中国人在现代生活中所发现的精华结合在一起的文化。他希望,他所代表的民主、进步思想能够在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教育方面发挥作用,而这种教育就是亚伯拉罕·林肯精彩的名言所倡导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我和我的女儿在此共同祝福今天的中国。

约瑟夫·费瑟斯通

2004年8月于密歇根州立大学



序

// 杰伊·费瑟斯通：

一位教育家的教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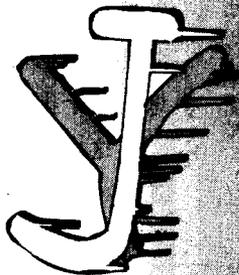
赫伯特·科尔(Kohl, H.)

思考教育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形式。人们对儿童所持的态度、对儿童如何学习以及儿童应该如何融入成年人世界的看法，反映出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假如我们承认教育是门科学，那么，教育就是一门具有特别价值取向的科学。它把仔细观察特定儿童的行为与反应和推测儿童在不同学习情形下可能的表现看得同等重要。有关儿童应该关注什么以及应该如何表现的看法使教育的科学性受到质疑。而所有这些都随着儿童具备了作出选择的能力并开始拒斥成年人对其应该或必须成为什么的固定思维而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对儿童与教育的思考，使人们常常需要梳理自己的童年并反思已经作出或尚未作出的选择，而且还要进行几步大的跳跃式的联想，以便进入那些陌生的文化的、经济的、地理的和精神生活的领域，去设想我们已永远失去的童年时代。最后，人们还需要以恭敬、谦虚的态度看待童年的奇迹，以怀疑的态度审视成年人对儿童未来生活的梦想。约瑟夫·费瑟斯通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丰富内涵的教育思想家。

杰伊，正如他的朋友所称呼的，不是一位知名的演说家，但他的演讲非常认真、非常精彩，总能抓住听众。他毕生坚定不移地致力于进步教育活动，这使他成为一位“教育家的教育家”。偶尔听到他的有关学习与成长和社会公正问题间关系的最新思考时，总会使人感到收益颇多、精神振奋。

浪漫主义诗人威廉斯·华兹华斯(Wordsworth, W.)曾经写道



(1802/1888):

儿童是成人之父；
而我多希望我的日子
一天一天地被自然的虔诚所连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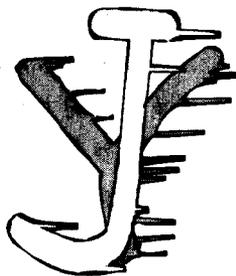
近来,当我和杰伊谈到他的想法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时,想到了这首诗。在此之前,我重新拜读了本书中的一些文章(节),其中,杰伊谈到了如何权衡华兹华斯个人的浪漫主义和约翰·杜威的社会浪漫主义。对杰伊来说,如果儿童是人类之父,随着她或他的成长并开始决定如何与既定的模式融合为一体或拒绝这种模式而成为一个独特的、有所作为和负责任的成年人时,那么,家庭、社区和童年生活则为此提供了素材。

杰伊于1940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市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他的家庭具有典型的二战时期家庭结构的特点,即妇女和年纪大的男子看家,青壮年男子离家去打仗。那时,杰伊的祖父在铁路调车场任工务段线路主任,是惟一留在家里的男人。杰伊是这样描述他的祖父的:

他是一个对许多事情都持怀疑态度的人,只信奉普通劳动者的权利。他一直说,这个世界总是将行得通的想法搞坏,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相互帮助,做一个友善的人。

杰伊是一位忠实的进步主义教育家,十分了解大多数时候人们总会把事情搞糟。人类这种易犯错误的特性、这种冲突性和矛盾性使得我多年来一直关注他的工作。杰伊也是一位怀疑宗教教义的天主教徒。他对进步主义教育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学校该是什么样子的想法源于上述有趣的、来自他祖父的世界观。

这本论文集从杰伊本人童年时期的内疚故事以及其中萌发着的正义感开始。在我看来,这就像是一张褪了色的黑白照片,记述了他



一生的转变时刻。那艘载着他一家的船在日本某个无名码头抛锚靠岸。杰伊，一个只有六岁的小男孩，平生见到了第一个日本人，一个穿着“破烂不堪的日本军服”的男人。这个男人失去了一条腿，正在地上捡烟头。杰伊决定做点什么。他回忆道：“我下到其他人都还在睡觉的船舱，悄悄地在父母的梳妆台里摸找香烟，拿到一盒尚未启封的香烟上了甲板，将它扔向码头。”那位日本老人捡起香烟，抬起头看着杰伊，给他行了个“端端正正的军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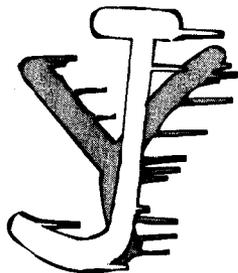
即使还是个年幼的孩子，杰伊也没有作出高高在上的反应。他“从那一刻开始感到，围绕着战争这种难以理解和骇人听闻的现实，无论罪孽和美德之间错综复杂的平衡关系是什么，我的心已开始不平静，开始充满了谎言、仇恨和恐惧”。

近年来，我已学着不信任那些把个人事情看得比仁慈更重要的人——即那种个人的事情再小也重要的自私感觉。因此，这也就是杰伊的一盒香烟的故事之所以有意义的原因。

宾夕法尼亚州的煤矿生活和日本的经历，成了杰伊挥笔倡导如何使课堂服务于民主目的的无声的背景材料，也成了他尚未脱稿的绝妙诗歌的鲜明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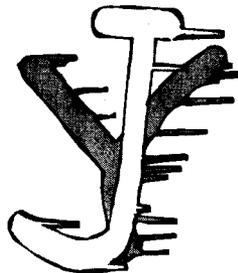
我第一次见到杰伊时，对上述这些情况毫不知情。在我看来，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位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他也曾评论过我为《新共和》杂志撰写的第一部教育方面的书——《36个孩子》。当时，杰伊是《新共和》杂志的一名编辑。他的评论引起了人们对这本书的关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评论中提出了教育和政治的问题。显然，哈佛教育学院的每个人都很尊敬他的才能、他对儿童教育的执着以及他对教育变革所采取的慎重而又非常激进的方式。自我们相识后，我从他的身上所发现的是一种对社会和经济公正所具有的坚定不移的责任，以及为应急措施和简易解决方案所采取的恰当质疑的方法。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反映出杰伊对民主教育的渴望和他所发现的人们正试图使民主贯穿于课堂的那些探索。他到处寻找好的教育，往往在我们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之前就发现了这种教育。他不断反思传统，努力用新的思维方式思考过去。在过去几年里，他写了有关



儿童以及他们是如何思考等方面的书，写了他对年轻生命的尊重，写了他对一个未来所有儿童都会受到尊重和善待的世界的理想。书中文章所反映的这些理想在不少方面仍富有新意，对我们这些认为教育具有培育社会和经济公正潜能的人们来说仍然具有永恒的价值。杰伊最近写的一首诗(2000)，字里行间都反映出他坚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也是他思想缜密和对儿童与学习怀有质朴、强烈的爱的写照。

我努力做一个仁慈的人，就像沼泽地的青草，
无论是海水还是淡水，都默默吸收，
盼望着肌肤上留下一点儿智慧的结晶。



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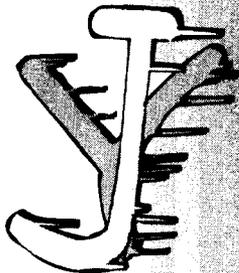
致 谢

谢

写这本书的想法源于赫伯特·科尔——他自己也一直在努力地工作,为促进民主教育、实现儿童心智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还要感谢我的编辑卡罗尔·萨尔茨和教师学院出版社的凯瑟琳·伯纳德。

对其他人的感谢需要在这儿综合一下,否则会占很大的篇幅。我要感谢已故的哈佛大学的佩里·米勒,是他说服了我,说这些想法很重要,民主的浪漫性仍然是当前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是他指出了教育是了解美国文化最深处的两难困境和最强烈渴望的窗口所在。感谢已故的伦敦经济学院的理查德·蒂特马斯,是他将民主与社会服务联系在一起。非常感谢《新共和》杂志的伟大编辑吉尔伯特·哈里森的远见卓识,是他毫无顾忌地宠着我这样的一名年轻记者。感谢哈佛大学历史系在潜移默化中告诫我,勿走传统学术的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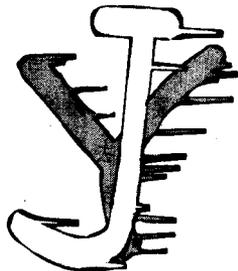
感谢已故的戴维·里斯曼(Driesman, D.),是他指明了大学教育怎样才是大学性质的、充满激情的、吸引大众参与的。感谢已故的托尼·卡莱特(Kallet, T.)、马乔里·马图斯(Martus, M.)、莫里斯·科根(Kogan, M.),还有许多教师和校方主管,是他们帮助我考察、研究英国的学校,还要感谢戴维(David)和罗斯玛丽·阿明顿(Armington, R.)。感谢我一直作为一员的各教师团体和院长组织,是他们告诉我,谈话对于创造和维持一种实践的艺术是多么重要。感谢维托·佩龙尼(Perrone, V.)和北达科他州研究小组的成员们过去几年所给予我的友情和建议。感谢戴维·科恩(Cohen, D.)榜样的力量,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教育问题。感谢我在哈佛



大学的同事所给予的友谊和建议,他们是萨拉·劳伦斯·莱特富特(Lawrence-Lightfoot, S.),考特尼·卡兹登(Cazden, C.)和埃莉诺·达克沃斯(Duckworth, E.)。感谢康芒韦尔思学校的学生们所给予的起立欢呼。感谢特德·赛泽(Sizer, T.),德博拉·迈耶(Meier, D.)给予我的思想动力以及他们把高明的理想主义应用于解决各种问题和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时所树立的榜样魅力。感谢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朱迪·拉尼尔(Lanier, J.),作为师范教育领域富有真知灼见的系主任,他真是难得的人才。向我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第一小组的同事表示感谢和敬意,特别要感谢这些年来上 TE-301 课程的同学,他们从儿童研究走上教学岗位,用他们的活力和想象力为学校教育增添了乐趣。

感谢我的儿子乔迪,他虽然默默无闻地坐在轮椅上,但教给我们的却很多很多;感谢我的小女儿米兰达,她总是不能忍受长时间地讨论师范教育问题,而这个问题却使她年迈的父母兴趣盎然;感谢我的妻子海伦,她也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师,在本书写作的每一个过程中她都与我在一起,经常为我清思解惑;感谢我的两个大女儿凯特林(一名教师)和莉莎(一名记者),她们在本书的材料收集和编辑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并且提供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教育经历,成为我工作中的最佳搭档。

约瑟夫·费瑟斯通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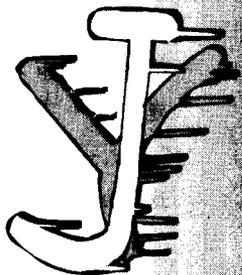
言

// 前 言

本书中关于教育的著述所涉极为广泛,即使我像猫一样有九条命,也远远不能完全涵盖其内容。书中的一些文章是我在做《新共和》杂志的记者和编辑的日子里写的,包括部分关于英国小学的著名系列文章。这些文字在那个传奇的年代,即现在称之为“20世纪60年代”,对当时的教育改革发挥过作用。另一些文章讲述的是20世纪70年代在纽约和波士顿所发生的学校纷争。我深信,这些文章仍会增加我们对这个国家最漫长且最有悲剧色彩的两难处境的理解,增加对这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共和国里,由于种族和阶级差异而给课堂所投下的阴影的理解。还有一些文章描写了教师和课堂。其他的文章则反映了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热心教育的人士所从事的工作,包括童年的作用以及儿童在我们文化中应有的地位(遗憾的是,我删去了一篇刊登在《新共和》杂志上的题为《肯塔基轰炸儿童》的文章,这是我最喜欢的文章的题目)。历史的片段为我们提供了纠正我称之为“遗忘症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里的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的方法。书中最新的几篇文章重点描述了一些好的实践和好的想法。全书最后以一封致初上讲台的青年教师的信结尾。

同时,这些以年代记载的文章记述了过去30多年的动荡时期里,民主教育思想经历的曲折历程。文章的部分章节更有意让读者单独体会这一历程的令人心碎之处,以及它的希望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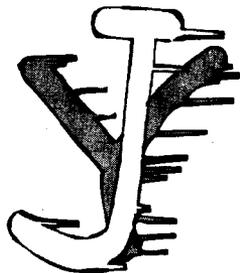
本书中没有一篇文章是专为内行人、专家或学者写的。所有文章旨在通过明快的陈述,真实地反映教和学的复杂乃至神秘的性质,



诸如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类的有争论的话题。多年来，我一直努力想象那个必要的、可能还有点神秘的角色，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般读者”。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丰富和鲜活的话题——或许是任何民主最为重要的话题——无疑它值得人们不断地大书特书，同时进行非凡的交流。

教育的目的和手段不仅在每代人中有争论，而且，任何人们认为符合课堂现实的说法都注定被复杂化并引起纷争。这就是大多数有关教和学的原理不能一两句话就说清楚的原因。并且，这也是简单易懂的道理一再引起纷争，必须严加控制的原因，比如阅读中读音法与整体语言教学法、传统教育与进步教育之间的对立。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 F. S.)曾写道，受过教育的人的标志是具有同时容纳两种相互矛盾思想的能力。由于这种糟糕的美国教育模式像钟摆一样盲目地来回摆动，上述菲茨杰拉德提到的受过教育的人总是最需要的。

作为一个有过与教师一起工作经历的年轻记者，我把这样一些想法带到了早期的写作中。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和我的妻子成了四个可爱的孩子的父母(其中一个严重残疾)，我也在不断地发展着这些思想。身为四个个性截然不同的孩子的父亲，我非常强烈地感到，我们需要一种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能使每个教师得到帮助，以便使教育者们努力在严格要求与人文关怀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从而使各类孩子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本书中有关儿童抚养和家庭教育的文章更极力主张，未来的教育要创设那种不断发展的成年人及儿童社区，使孩子们可以通过交谈、非正式的学习以及正式的课堂等形式来模仿和学习成年人的生活。这些文章认为，如果没有社会其他领域所取得的相关的民主成果，教育在更大范围里的进步便不可能发生，这体现在儿童保育、足够的学前教育机构、全额资助幼儿早期教育计划、所有家庭享受医疗保险、足够的住房、全民就业率、选举以及政治竞选筹款改革、人权和其他迈向非极端不平等社会的措施的各个方面。随着对国家的教育和社会进程的复杂性的认识，诸如“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口号，对我们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如果没有这样的口号，或者仅仅把它局限在教育领域，那么，这个口号只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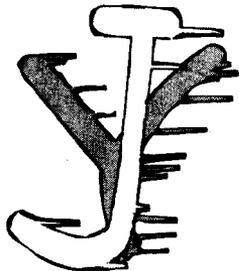
圆滑的政治家给我们所有人开的玩笑。

思想保守者所讲述的那个发生在疯狂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可怕故事正好与自由人士和激进人士讲给他们孙子听的那个同时代的英雄传奇故事相匹配。事实上两者都过于夸张。我感到我不得不把这样的时代描绘为一个错落不齐的大杂烩,即使我曾经历过这样的生活。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些精彩的辩论至今仍使人记忆犹新。在教育领域,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不少人对历史学家戴维·泰亚克(Tyack, D., 1974)称之为的“一个最好的制度”(美国城市教育历史)、有组织的公共官僚机构体制,以及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第一次大战期间编集成典并标准化了的职业、常规和方法等提出了挑战。不论是好是坏,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国内出现了许许多多地、一波接一波地针对“一个最好的制度”所进行的反思活动。

我非常认同那种将民主与儿童心智两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来反对“一个最好的制度”的思想观点。我相信本书中所有的篇章也都反映了这一信念——即良好的教育制度可以帮助所有的儿童,特别是贫穷的儿童,在这个世界上无拘无束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好的教学就是发现那些使所有儿童都能很好地运用他们才智的方法的一项活动。

我为能够真实地描述教学活动和教师、真实地评论教师撰写的著作而感到特别地自豪。除了古典的风格外,教师写作的风格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般大众来说还是新颖的,如 19 世纪俄国小说家利奥·托尔斯泰所讲述的他自己试图教育农家孩子的短文;又如我曾想在《新共和》这本杂志上留出版面描写课堂生活,即在这本距离白宫和国会山仅几个街区之遥的评论杂志里表现出教师的意见以及孩子们的心声。我也为其中几篇促进了孩子们的写作水平的文章感到骄傲。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课程改革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写作课,这也是美国整个初等和中等课程 3R^①中最不受重视的课程。学校对大多数的孩子没有规定写作要求。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

① reading, writing and arithmetic 读、写、算。——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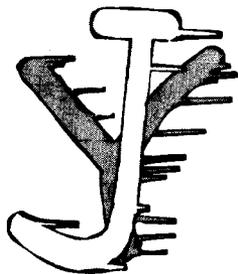


代,写作课在美国中小学各级课程中是非常普遍的。今天,与促使我们滋生怀旧之情的以往任何时候相比,更多的学龄儿童在学校里学习各种不同的写作方法。赫伯特·科尔就把写作作为学生学习的中心任务,这理应获得国会山赠予的一座雕像或至少获得一枚勋章,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对他们的成就表示了敬意。

书中还收录了有关德博拉·迈耶的工作的文章,这可以被视为当前某些最可靠保障的代表。她过去在纽约市立(公立)中学所做的努力以及她现在在波士顿米圣·希尔(公立)小学的实践活动是我们的楷模。随着目前教育活动逐步走上轨道,她的努力值得我们铭记在心。她的工作还提示我们,既可以认真地评价,也可以强调基层的教育社区以及地方的决策作用。测试就像体检,若把它当成了医学解剖,就曲解了其意义。

本书有关德博拉·迈耶以及其他教师如埃尔温·理查森(Richardson, E.)、维维安·佩利(Paley, V.)和赫伯特·科尔等工作的章节,还有几年来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类似的工作都表明,课堂可以是,而且应该是开发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移民以及穷人和劳动阶级的孩子们智力的场所。民主的教学过去就有,现在也还在一些地方进行着,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在格里德洛克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Gridlock)里,当前学校的“保守派”与“进步派”的争论已像日本的歌舞伎一样风格化、仪式化了。如果双方的辩论者愿意把思维放得更开阔一些,以普通者的眼光考虑一下儿童的教育地位,考虑在文化和家庭中、在其他的情景中、在体育运动中、在艺术和课后活动中,以及在学校里开发儿童心智和年轻人想象力的新的空间,情况可能看上去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可能对有关教育方式的狭隘的争论重视得不够,而对这方面的看法,教师、家长和改革者们可能,并且肯定会永远不一致,即使是基督复活。对教师来说,读音法是如此,古典名著教学和诊断技能也是如此。但是——阅读不仅作为一套小的组合技能而且是一项复杂的智力成就——这种文化自身的形成过程,有赖于儿童在一名优秀教师的指导下对有价值的课文作出反应时如饥似渴地求知并运用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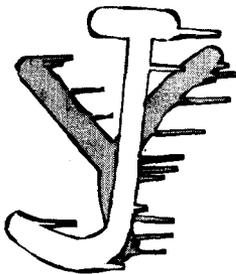


合思维的能力。在这里,激情和想象力的缺乏真的会产生危害,这正是学校和家长可能会学习奥普拉·温弗里与哈里·波特那些具有非凡读写能力的大师级教师的原因所在。

保守派、自由派和激进派可能在另一个常被忽视的焦点方面组成同盟军,即优质的教师教育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忠实的保守者像黛安娜·拉维齐和老的民主派如我本人之间可能会达成共识:无论是需用脑力的进步主义,还是任何保守派所期望的严谨教学,如果没有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师资队伍,都不可能在公立学校扎根。我这样说是有特殊感受的,我和我的同事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一直从事一项不错的学校教师教育项目,我本人负责管理该项目的一个课题小组。这是一个多边项目——在本书的结尾我将列举一个有关该项目和课题的小例子。我教的一门课程是三年制的,参加该课程的学生将是未来的教师,他们按照要求需对一名儿童进行长达15周的辅导和研究。在包括儿童文学和其他方面的众多阅读课和项目活动中,这些实习教师必须花一定时间和这个孩子在一起,并且学会如何与孩子谈话。他们要学会(不是自然技能)如何细心地关注孩子的思维,如何去引导思维,如何创造和寻找让孩子萌生想法的领域——如几乎每个儿童都呆过的秘密花园和树上的小屋,这些正是在课堂上的教师经常忽视的。这些学习和研究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而且富有教育意义。

维维安·佩利由于精确地研究了儿童的思维和读写课程、孩子们的故事,以及她对教室内每日上演的种种场面的意识,而成为了一个英雄。对于我们许多学生来说,我希望,和孩子打成一片是通往终身幸福的通行证。他们会逐渐开始理解为什么佩利坚持简·奥斯丁是教室生活的极好的向导。而教师,还有儿童的智力快乐,就是我想表达的主要信息。教师需要一种方法,能不断地更新儿童开始做的每一件事情,要有一种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所有哲学起源的好奇感——他们需要一种实际的方法使教学永葆浪漫。

该文集中最后一篇文章是一封致青年教师的信。这位教师我称她为乔西,是根据杜波依斯写的《黑人兄弟的灵魂》一书中的一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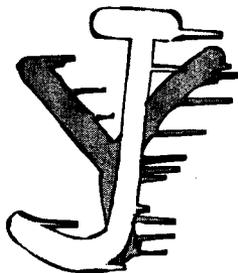


不起的、具有悲剧色彩的学生们的名字命名的。杜波依斯在小说中把自己刻画成为一个在农村非洲裔美国人的学校工作的教师——他既教书，又反过来接受教育。杜波依斯对这种双向交流的理解成了他全书的核心——也是本书的核心。他的主人公乔西英年早逝，没能完成她受教育的梦想。她代表着所有被我们的制度逐渐荒废的年轻生命。而我的乔西则代表着一代年轻教师，他们愿意作出努力，以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美好，也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这最后一篇文章也道出了我终究仍能对教育保持乐观的部分原因。由于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了解到如乔西一般的年轻教师们已经展开翅膀，准备为亚伯拉罕·林肯未尽的民主事业增添新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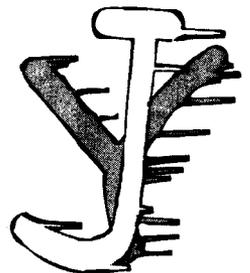
乔西和她的年轻同事们没必要为了取悦我而根据我为民主、进步教育开的处方开展工作。他们将找到自己的道路，一种比今天各自为战的状况更加团结的协同合作（我希望）。而我也相信，本书中关于教育和儿童的思想将有助于为年轻的教师和家长们建立一个更适合成年人和儿童交流重要思想的理想的课堂，并且，在这个课堂里，教育能为个别的儿童及其差异性提供教育的空间，甚至给予赞美。

这样的立场在目前饱受鞭挞的教育氛围里听起来有些过于温和及情绪化，但是，它内在的现实意义却点明了一切优秀学校所必然共有的复杂性——即学校是一个融道德、智力、审美、学术为一体的场所。我的朋友路易莎·克鲁扎科斯塔和锡德·马西在纽约市的里弗依斯特学校任教，这所学校是纽约教育系统中众多规模较小但声誉很好的进步主义公立学校之一。朋友们告诉我他们学校的教师和孩子是怎样看待9·11恐怖袭击带来的后果的。在里弗依斯特学校，孩子们、教师以及家长们习惯于共同讨论重要的事情，因此，虽然9·11恐怖袭击不是课程上的内容，但是，他们能够一起了解并讨论这次恐怖袭击。将这所学校与纽约市的其他学校相比，后者中的教师和学生从来不曾真正交流过，即在这些学校里，有思想的谈话不是学习团体的标志和目标。让我们一起行



动吧，把学校建成一个不仅仅是阅读和写作以及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还是一个可以使成年人和孩子们一起共同面对某些难以名状的事件的地方。这样的学校不仅是对生活的最好准备，而且是对生命本身的最好准备。

约瑟夫·费瑟斯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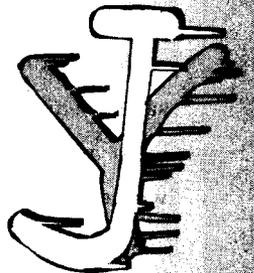


// *Afterward to the Chinese Edition*

I am happy this book will now get a Chinese audience, and grateful that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has honored it with a translation. I have had a number of careers: journalist, historian of education, activist, teacher educator, and poet. All sides of my work except the poetry are well represented in this volume. [For a collection of poems, readers can go to **Brace's Cove** (New Issues Poetry, 2000)]. This is a very personal book that represents a lifetime of activism and school reform in pursuit of the idea of democracy in education. Some essays I wrote as a journalis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hen I was an editor of **the New Republic** magazine. The most recent essays reflect my work in teacher education at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where I have long been a professor and faculty leader of on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MSU'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is commonly ranked number one in the US.) Here at MSU I meet many Chinese friends and teach superb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This volume also has essays on such topics as John Dewey and Rousseau, urban schools, Civil Rights, and portraits of teachers whose work and writing I admire.

The capable editors of this book are my daughters, Liza Featherstone, a journalist who is a contributing editor to **the Nation** ma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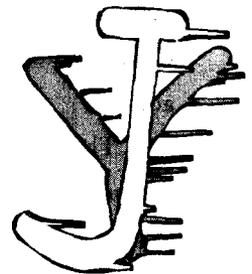
Afterward to the Chinese Edition



azine, and Caitlin Featherstone, who has been a teacher at a pre-school in New York City. All three of us are critical of mainstream US education and politics today; we wanted to remind audiences in the US (an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there is a rich tradition of democratic thought and practice that can prove useful to us as we create new and better classrooms and schools for the children of a new millennium. The ideas in this book are part of a lively debate in the US between progressives and democrats, on one side, and traditionalists and conservatives on the other. (For one critical conservative view, see Diane Ravitch's book, **Left B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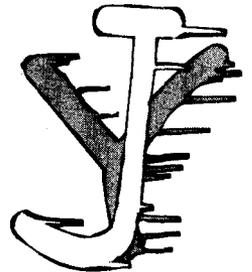
This is an awkward moment for any citizen of the US to be preaching democracy.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has attempted to create democracy by force in Iraq; he is no friend of democratic reform at home; his administration has shown little interest in the role schools might play in creating democracy.

It may be an awkward moment, too, for any citizen of the world to dare sing the praises of democratic schooling. The dominant voices in most countries now usually speak of schools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ge education to become a better servant of the globalizing economy. Democracy is not talked about very much. The thinkers and practitioners represented in this volume would each recognize the emergency today; they would understand that our world will remain in crisis until the basic economic needs of the poor and hungry are met. They would also understand that the old era of Western empire and dominance is over, that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all nations is essential; and that no nation's path to economic sufficiency will be the same. Everywhere, it is safe to say, schools will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Their role in furth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 is already widely understood. But the tradition this book



speaks for has always been critical of narrow economic conceptions of education. It demands more from schools, and so do I. Democracy in education should be a far more pressing issue than the economists and planners and the experts at the World Bank would like to admit. The great US radical, the African-American educator, W. E. B. DuBois always insisted that the three goals of a balanced democratic education are "work, culture, and liberty." He wanted to educate not just workers, but citizens and activists. He urged this at a time whe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African-Americans was desperate, and often defined by white racism. DuBois saw that democr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would require real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power and an education much more rich and complex and complete than an education in the few skills demanded by the current job market. DuBois, like so many of the thinkers and teachers described in this book, wanted to give workers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e elites and the rich traditionally receive. Rightly schooled, workers would be prepared to work well and capably, but also to act as complete men and women, able to become imaginers and shapers of a better future. This rich, complex vision-which schools exist to teach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in work, culture, and politics-is at the heart of this bo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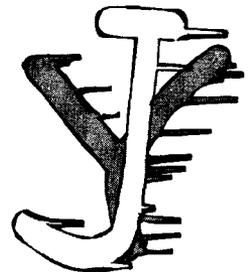
The democratic vision of education I describe is not a US invention. Americans do not own these ideas, though some US schools today offer valuable examples of democratic practice. I write about a few in this book. (See also Mike Rose's **Possible Lives**, for a snapshot of current democratic practice around the US.) Democratic ideas are now part of a worldwide dialogue on our children and the future of our schools. China is surely already writing its own chapters in the long, continuing story of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In 1919, another hero of my book, the great US philos-



opher and teacher, John Dewey, visited China. He was so impressed he stayed for two years. With all its ancient history, China looked young and fresh to Dewey; he loved the people, and he prophesied a great future for them. His daughter, Jane, wrote that China was the country nearest Dewey's heart after his own. Dewey warned the Chinese not to copy foreign models uncritically; he foresaw a new culture in China that integrated the best of the old traditions with what the Chinese found best in modernity; he hoped that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ideas he stood for would be able to play a role in shaping a distinctive and democratic Chinese education that would be, in Abraham Lincoln's famous, wonderful word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My daughters and I share that wish for China today.

Joseph Featherston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August 2004



目 录

目 录

总序 / 1

作者中文版序 / 1

杰伊·费瑟斯通：一位教育家的教育家 / 1

致谢 / 1

前言 / 1

第一部分 童年 / 1

我的正义战争——一盒香烟的故事 / 3

卢梭与现代性 / 10

家事 / 23

美国教育 / 37

五个重要的思想 / 44

第二部分 学校与社会 / 51

奥圣山生机勃勃，还有，好啦…… /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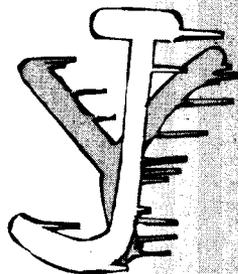
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 / 56

开校车送这些无权无势的儿童上学 / 65

重新审视约翰·杜威 / 79

民主主义的前景 / 97

民主主义与教育 / 103



第三部分 教师与课堂 / 109

英国的小学革命：儿童的学校——英国的教室里正在发生什么？ / 111

教儿童思考 / 121

学习的实验 / 132

开放学校 II：给时尚降温 / 139

穷人孩子的课堂 / 147

给教师上课：一份乌托邦式的课程说明 / 157

教书的真谛 / 163

接触更多的生活 / 167

生动的课堂 /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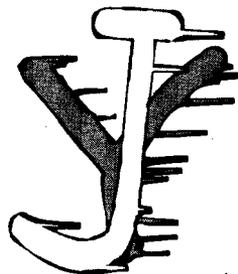
维维恩·佩利 / 183

致青年教师的信 / 190

参考文献 / 201

索引 / 206

译者后记 /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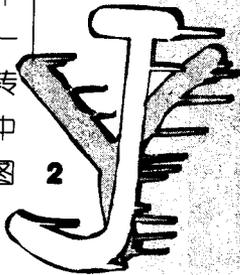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童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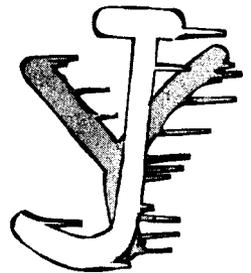
我们之所以把这部分文章放在最前面,是因为这些文章为后面的那些与学校和课堂关系更直接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框架。透过一个实践者和进步教育拥护者的眼睛,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进步教育的实践过程,了解费瑟斯通在观察教室里的孩子们时看见了谁以及他想让孩子们学习什么。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费瑟斯通在工作中已跨越了知识和文化的历史以及教育的历史。在本章辑录的文章中,费瑟斯通探讨了有关儿童教育的思想。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汲取了以传统为基础的约翰·杜威的进步教育思想以及美国和英国等其他浪漫主义者和教育家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了将学习看作是一个严肃而又充满欢乐的事业的课堂教学。

本部分的核心在于对儿童和家庭的关注——从历史的和社会的角度关注儿童和家庭,并关注儿童及家庭工作者们对某个社区和教育工作者所进行的反思。本部分还包括费瑟斯通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撰写的长篇文章的节选。《家事》一篇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上,讨论了很宽泛的问题,如我们思考家庭的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家庭里都有谁以及他们都需要什么,并且还提到我们抚养孩子方式的变化(想象中的变化)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启示等。《卢梭与现代性》一文探讨了教育里现代性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并且概述了我们该如何效仿理想主义者去争取获得一个完整的人性、完整的童年以及关心和塑造儿童和家庭的画面。《美国教育》一文则详细地论述了探究童年历程的过程,探讨了青春期的孩子以及把儿童转变为成年人的教育该是怎样的等问题。文章写的是康芒韦尔思学校的高中学生,这是一所私立学校,费瑟斯通曾任该校的校长。文章讲述了学校试图



教给学生们的内容。费瑟斯通引用了马克·吐温讲述自己在密西西比河上学习做船舶领航员的经历,为的是追忆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在条件艰苦的时代如何学习并发展的过程。文章首先进入费瑟斯通对于童年的回忆,从中传达出了什么对儿童教育是最为重要的认识——即什么样的战役值得一为和什么样的同盟军值得与之共同作战等。



我的正义战争

——一盒香烟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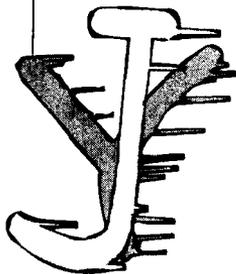
1994年夏天

那天,我在想该怎么做洋葱汤,我想到了那次乘船驶往横滨前我在西雅图喝的那碗洋葱汤。那是我第一次喝洋葱汤,一片法式面包,加蘸一些化开的格鲁耶尔干乳酪。时间是1946年末,那年我六岁半。西雅图的这家餐馆虽然又暗又热,但挺特别。我们是早晨驶往日本的,父亲当时在美国占领军里做一名民事律师。这碗好喝的汤让我忘记了对父亲的陌生感,忘记了离开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市和我亲爱的祖父和婶母分开时的痛苦。战争期间,父亲一直在太平洋战区工作,我几乎不认得他了。

我们一行四人,我,我母亲,哥哥和刚出生的小妹妹。我们是横跨美洲大陆后踏上这次远离故土的旅行的。冬天横跨太平洋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们遇上了台风,大家都晕船了。更糟糕的是太平洋是战区,我们搭乘的这艘灰色战舰仍旧配备着武器。在被战争的传言所震慑的童年里,我最担心遇到日本人。虽然我们受到保护,并且也一直很幸运,但我始终都在担心,每天夜里都会梦见这种事情。

当男人离家去打仗时,许多家庭和我们家一样,重新组合成一种合作社。我们家的合作社是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偶尔会来一位从商船上回家的堂兄弟,再就是我的祖父。祖父戴着一顶铁路工人的帽子,配一个精致的烟嘴,很像FDR^①的帽子。他很喜欢宠物和孩子,他会宽慰我们生病的松树会痊愈的,告诫我们要对我们的宠物猫科勒丝好好

① FDR,指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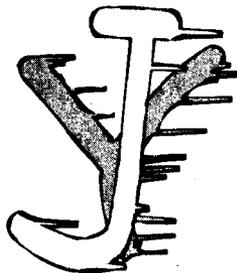


讲话。他是一个对许多事情都持怀疑态度的人，只信奉普通劳动者的权利。他一直说，这个世界总是将行得通的想法搞坏，所以，每个人都应该相互帮助，做一个友善的人。

我注意到，他把对其他成年人的友善看成是一条很难做到的精神戒律。对在他手下做事的铁路调车场工务段的工人和住在南富兰克林大街家里的人来说，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在家庭合作社里，在家里所有的顶梁柱穿着军装离家上前线的情况下，他并不是一个独裁者，反倒更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一个现存制度的反叛者。在他长期为让宠物猫留在家里的壁橱里生崽的斗争中，我帮过他。这是我所从事的许多失败事业中的第一次，而对他来说只不过又是一次例行的惨败。4
一次，当我母亲愤怒地把我们英雄的宠物猫科勒丝撵走时，它纵身一跳上了汽车库的屋顶，使邻居家的狗全都望而却步。祖父寻遍了整个城市才找到它，把它驮着带回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我母亲和这只猫从此相互怒视，成了死敌。

让我母亲与祖父以及这个家庭合作社的嗜好不停地打交道是一件苦差事。我和哥哥被安排在一个带角的、宽敞的、有如部落般的空间里，我们可以伴着我们的狗和探险游戏一起成长。我第一天去幼儿园，当天下午回家后就坚持说我被幼儿园除名了。姑姑玛丽让我呆在家中过了大半年，这是一种不大可能从父母那儿听到的决定。我们住在萨斯奎哈纳河畔一个安全舒适的街区，那里的人们都知道宾·罗斯比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当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去世时，每个人都明白这个国家蒙受了重大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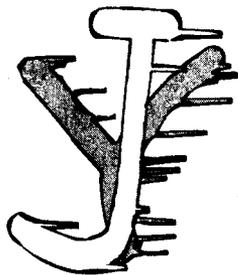
战争就是看不见的可怕的萨斯奎哈纳河泛滥的翻版，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它给我们的心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有失踪人员的消息，当然经常也有活着的人员的消息。实际上，我们家参战的人都平安回来了。回来的人打了一场人们称之为幸运的战斗。每天，我的祖父都把他熟读过的四种报纸上刊登的军事地图和前线进展情况翻给我看。甚至在我识字之前，我总是到广场上的报刊亭去查阅，看看报纸上有没有博多尼字体的标题，这意味着战争的消息：或许有伤亡，或许有家人、邻居的名字在阵亡名单上。



每个星期六早晨,哥哥和我都要进城去看日场电影,里面除了放映像《特里和海盗》等系列片外,总有战争纪录片。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看过描写二战时期的喜剧小说,即人们现在还在收集和兜售的那种小说。然而,那种黑暗的、过度渲染的、灾难性的色彩仍能将我带回到过去。小说中,日本士兵在作家的笔下都穿着耀眼的黄军装,镶着难看的黑边,长着狼一般的牙齿,戴的眼镜镜片像可口可乐瓶底那么厚,把他们那双可怕的昆虫眼睛放大了。他们杀戮儿童,虐待妇女,嘴巴里叽里咕噜说些“哎呀,一万个紫色的恶魔!”之类的话。而勇敢的美国士兵则横扫着丛林里散兵坑中的日本士兵。我父亲一直在新几内亚服役,离日本兵不远,他在那儿还得了疟疾。我猜想日本兵曾试图杀了他——他曾经写到:有人发现一个日本兵狙击手想用喷火器把他消灭在洞里。现在,我就要和比凶残的臭虫好不到哪里去的人生活在一起了。

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想,该怎样做我的第一顿圣餐以及学会忏悔自己的罪孽。我不能告诉任何人,甚至我的姑姑玛丽。她的罪孽就是在我们的蓝色巴尔的摩教义问答专栏里也 5 难以解决的,专栏里似乎更加关注的是一些令人困惑的、涉及性或合理的权威不恭敬的罪孽。在被天主教喋喋不休的说教熏陶的时间和地方,没有一个修女或牧师或经文曾提供给我们一条忠告,告诉我们如何在战争面前完好无损。说到痛苦,他们会说“为上帝而献身吧”,而这句是什么意思呢?我遇到的重要问题是,有时我必须扮演一个日本人或德国人,我当时不是很清楚这种区别。我自问我的困惑是否源于一些人所指出的为某种罪孽之源的软弱和迷惑。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弱小的但同时也是制度上的不公正所带来的结果。我的朋友艾伦和我是我们街区孩子中年龄最小的。这些年来,我们都是在自家后院的两棵樱花树下玩打仗的游戏,然而每次玩之前的约定都非常清楚:小的常常扮演德国人或日本人,否则大孩子是不肯玩的。我本来也有选择的机会,但是,当时我觉得自己没有这种机会。这样,我只好跟着一起玩,冒着丧失灵魂的危险。

我敢肯定,耶稣本人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复杂的事情。尽管我猜想,对于耶稣来说,成为人会使他产生一种耻辱和背叛的感觉。“日本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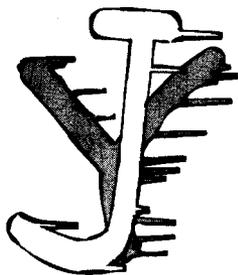


是我们对日本人的别称。它所传达的恐惧多于德国人。有意思的是，尽管我母亲的一家在政治上属于左派，且强烈反对法西斯，但是，我们这些孩子却很少把德国人看成纳粹。在游戏中，你扮演的是德国人，而不是纳粹。我想，和德国人比起来，我们更恨日本人。因为德国人长得像我们——毕竟，我哥哥有一个最好的名叫弗里齐的（德国）朋友——而我们眼里的日本人就没那么有人性。我们在游戏场上有一个简单的信条，那就是日本人发起了战争。我们从战争的晴雨表上得到这一观点，我们的脑海里不停地翻腾着混乱的规则。那个年代要仁慈点儿很不容易。

因此，战争期间，我都是在与敌人的战斗游戏中度过的，总是输，有时哭，有时因子弹、刺刀、炸弹、手榴弹以及喷火器而受伤，甚至奄奄一息，脑袋里时常萦绕着喜剧中描写的日本虫的画面；孩子们对于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恐惧的理解，由于头脑中不断地被真实的以及想象的暴力所强化而使这种印象更加深刻。我们这些孩子自己上演着战争的游戏，照着战争的情形试着进行演示，并且，或许也理解其中的某些内涵。但是，战争是一个燃烧的星球，甚至连这种模仿也会被烧掉。

欧洲胜利日那天，姑姑和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去了城里。我们走进最近的一座教堂，里面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德国人的集会。唱诗班用德语演唱着感谢和平到来的歌曲，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然而，对于那些被派去与日本皇家军队作战的人来说，战争仍然没有结束，我们的军队还在勇往直前地继续战斗，每天都有更多的年轻生命倒在樱花树下。当某天幸运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才能休假，才可以和罗宾汉的人一道逃避历史的噩梦。

随着我们的船慢慢靠近日本，我越来越感到恐惧害怕。我们的船是在晚上停靠在横滨码头的。每个人都进入了梦乡。我第一个起床，在黎明中走上甲板。晨雾刚刚散去，你可以辨别出新造的码头和被美国人在大规模空袭中炸毁的码头，还有我们为之兴奋不已的大量的数不清的炸弹和燃烧弹以及燃烧后的河流。这种情形在祖父给我读报纸时都讲过，而在我们家后院的游戏中，碰到这种情况，我，以及和我一起扮演日本虫的伙伴早就死了。我和哥哥在恐惧中望着被炸弹摧毁的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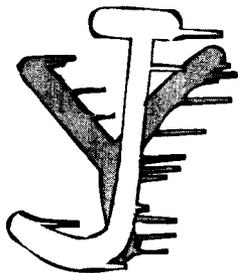
筑和横滨的街区，那里所有的猫和狗在饥饿的时候都被人吃光了。我那在战争中被祖父熏陶过的大脑甚至从码头的状况就开始想到，横滨这座城市已被奇特的炙热风暴扭曲了。

我可以闻到土地和几棵松树的气味、闻到海滨城市的气息，还有外国垃圾的味道。在晨雾中，码头上有一个男人弓着腰找着什么。他在地面上捡烟头，身上挎着一个很大的卡其布袋子。他只有一条腿，靠拐杖支撑着身体，身上穿着破烂不堪的日本军服。他是我在喜剧或报纸以外看到的第一个日本人。我下到其他人都还在睡觉的船舱，悄悄地在父母的梳妆台里摸找香烟，拿到一盒尚未启封的香烟上了甲板，将它扔向码头。起初，这个日本士兵没有注意到这盒“吉祥如意”(Lucky Strikes)牌的香烟。后来，他看到了，眼睛盯着烟，流露出惊喜。他抬头看着我，注视着我的目光，笑了；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行了个端端正正的军礼。在我短暂的生命中，我第一次感到了震撼。我相信，生命在那一刻有许多东西是确定的：那个日本士兵鼻子上架着的一副金属框架眼镜，头上戴着的一顶几经磨损的帽子，叼着的一个烟嘴，以及一张饥饿苍老的脸，他看上去非常像我的祖父。

我感到自己似乎开始反抗某种巨大的强制性的压力，竭力想使自己不受影响。我感到从那一刻开始，无论围绕着这场难以理解的可怕的战争所出现的罪孽与道德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平衡是什么，我的心已经乱了，充满了谎言、仇恨和恐惧。

面对失败者，我是一个胜利者。我讨厌自己成为毁了他一条腿的一方，讨厌眼前的轰炸场面，讨厌成为一个德国人或“日本佬”，讨厌自己扮演一个“日本佬”，更讨厌人们用仇恨的眼光看待其他人种并称其为臭虫。我害怕，也讨厌德国人和被称为臭虫的人，最讨厌“日本佬”。我讨厌他们的失败，也讨厌我们的胜利，以至于我感到了深深的迷惑。我不知道该如何推翻过去的观点，或者如何找到冲出去的出口，除了一点，那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能使这种情况感觉稍好一点。

看着这位日本老人(几年后可能和我现在这么老)，我开始审视自己。我的心被原子弹带来的风暴式的大火所吞噬，整个世界都被撕裂了。这是一场非军事的战争，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它都在我们的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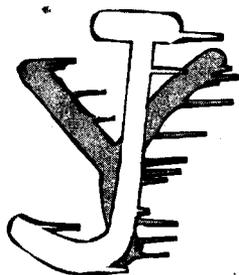
深处发生了。我试图弥补它所带来的伤痛,以便适应这种错位、恐惧和逃避的感觉,开始一种全新的现实生活,即我渴望某种普通人的环境。

战争是朝着我们发出刺耳的声音的历史扩音器,淹没了我们的思想,控制着我们,使我们已有的经验失去了方向。战争也是敌人。在抵御有关战争的潮水般的言辞和形象的过程中,战争发挥了奇特的作用;可悲的是,我现在是一个移民了,离开了我可爱的家乡,不得不在一个毫无根基的地方,建立我们的临时家园——一如我们乘坐的灰色轮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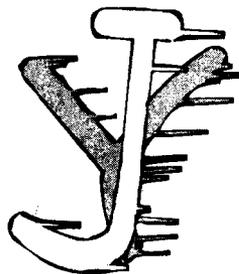
祖父和姑姑的形象时刻在我心中,没有人能把他们抹去。我永远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威尔克斯巴里市人,然而,即便是作为一名日本的新的征服者,从那一刻起,我也不再相信事物只有一个方面。

最终,我要——似乎非常简单——不带任何仇恨和压力地去面对世界。甚至一个小男孩都能明白,1946年是摆脱某种坚硬和陈旧的“壳”的时候了。而在1994年,还有多少这样的“壳”应该被摆脱掉呵!看不到这一点,要比那些我和哥哥到了日本后不久在一所非常著名的大的学校里一起玩耍的盲童们还要瞎,这所学校位于一座可俯看横滨的山上。现在,这些日本人成了我们的邻居。他们给了我们一条小狗,名叫达斯蒂,小狗的母亲是学校的一只导盲犬。当地的一些孩子天生眼睛就瞎了,还有一些孩子的眼睛是被美国发射的燃烧弹给弄瞎的。我们在晚上玩捉迷藏的游戏,这些盲童熟知地形,都藏在很高的竹林里,我们的脸被萤火虫放射出的冷光映成了亮绿色。我们都是些孩子,就像同一个笼子里的蟋蟀一般一起玩耍。

我认为自己是十分幸运了——成长的过程一帆风顺。靠偶然的机遇,或者说是战争,使我感受到了某个富有想象力的时刻:我从黑暗的镜子中浮了出来,而这面镜子是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里被迫去看的镜子。难怪站在船的甲板上,在这漂浮的、朝着前方驶去的船上,我感到自己的心柔软了一些儿。我想了解在我个人微不足道的痛苦中,我的童年勇气的源泉是什么。我尝到在爱的氛围里、在好奇的示范和严厉的老祖母的教诲下表达不同意见的滋味。尽管我是一个叛逆的天主教徒,我乐意向你忏悔:我是一个不使用暴力的小偷,正像我心目中的英雄罗宾汉一样,代表的是仁慈。



我也很欣赏这位日本兵。他和我反叛的祖父肯定是同一类的人。他的军礼不仅仅是嘲笑的暗示，同时挤出的是对一个在殖民地军舰大炮下扮演临时角色的年幼的陌生人的尊重，甚至是喜爱。坦率地讲，我想，用今天的眼光看，他肯定会笑的。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糟糕的战争中，我们站在同一立场上并肩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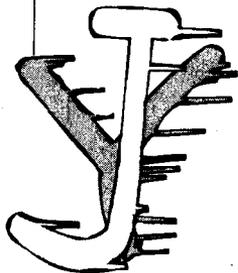


卢梭与现代性

1978年夏天

那些对思想在历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应该采取两个步骤来纠正他们的错误。一是阅读让-雅克·卢梭写的关于人性和教育的伟大的启蒙著作《爱弥儿》(1762/1933);二是他们应该周游世界,看一看各类家庭和学校是如何对待儿童的。从洛杉矶到达累斯拉姆,家长和教师们都在追求一种儿童教育的“自然”模式,这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追求,如同现代化本身。卢梭制定了有关家庭、教育、政治以及现在仍在进行的现代化的长篇对话术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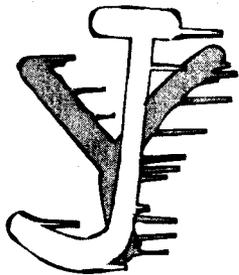
约翰·洛克对人性崭新的、激进的描述以及他的革命性主张——即经验而非传统才是伟大的教师这一观点,标志着这场对话的开始。这是一场在现代派的人与反现代派的人之间、理性启蒙与我们称之为的“浪漫主义”之间、“低俗”浪漫主义者与“高雅”浪漫主义者之间展开的辩论,有关家庭、儿童和教育成为辩论的中心。然而,辩论成了卢梭与洛克和笛卡儿意见相左的真正对话。洛克是一个最完美的现代派的人。他声称,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理性的。卢梭也是一个现代派的人。他接受洛克提出的三个前提,并把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上,但是,他明白每个前提可能和怎样向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在他对启蒙运动的理想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提出警告后,卢梭使自己成为第一个伟大的反现代派的知识分子,成为主张要求新政体、新文化和新的儿童抚养模式以便抵消现代化偏激因素的第一人。因此,卢梭和洛克之间的对话显露出一股社会力量和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思想的某种真相。我用这个词是想指明现代的三大转变:科学和



工业领域的巨大转变、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转变以及政体的巨大转变。

社会历史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强调,家庭的角色已由生产的经济个体转变成消费、娱乐和儿童教育的个体。父母—儿童的契约也由以经济为主转变为以感情为主。与这些变化紧密相连的是一些机构的出现,其目的是有意识地抑制传统机构的崩溃。学校就是这些机构对现代性负责的组成部分。9 在一些著名人士如贺拉斯·曼(Mann, H.)看来,学校代表着使进步趋于合理化;学校还被看作是一种平衡的力量,抑制毫无控制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而其中关键的不平衡被认为是对传统生活结构的破坏或至少是削弱了传统的生活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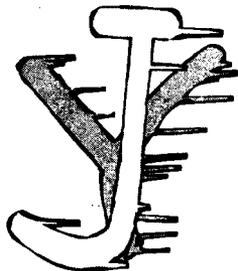
我们的争论历时并不长久。自从菲利彼·埃里斯(Aries, P., 1962)的著作《童年的世纪》发表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关于童年的观点——即我们关于青少年、青年甚至关于老年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时间和文化的限制。而在西方,儿童过去常常被认为或多或少是成年人的雏形,世界各地的人们一直把童年看成是一段独特的时间,具有特别的需求。作为某种有关儿童、儿童心理以及儿童学习发展方式的思潮,关于儿童的对话受到越来越多的儿童机构的影响。这些机构,尽管有不少缺点,却标志着过去 200 多年间西方儿童地位所发生的显著的变化。我们今天的文化更加重视儿童,为他们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留出了更多的空间,对他们的学习投入了比过去更多的关注。但无论怎样,我不是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化氛围。许多儿童缺乏财政和情感上的支持,社会上还有儿童在挨饿、在被摧残、感到厌烦、不开心或受到毒品的危害以及被人操纵利用。而我们为儿童安排的集体生活的质量,总体来说是不高的——所有这些都对儿童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我们没有多少资本为自己沾沾自喜。但是,与我们过去常常备受责备的悲惨处境相比,今天的社会更加以儿童为中心。大量的善于思考的家长和专业人士很理解儿童,而儿童自身也已经从被作为边缘化的和被盘剥的人转变成为某种文化的主角。当然,其所处的地位还不是十分完美。



卢梭和洛克

卢梭是现代化的伟大的说教者(卫道士)。他从道德、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来领会现代化。在所有这三个领域里,他是一名心理学家,所采用的基本的心理学方法既有优点,也有缺点;而其中现代派的心理学是卢梭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它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关于道德的自然观,另一种是有关人的发展可能性的陈述。道德的自然观在卢梭关于现代性的分离、异化和内在冷漠等特点的著名论断中就已描述过,也是上述两项内容中较著名的部分。卢梭在把现代人描述成与自然和健康的社会生活分开的同时,曾论述过他的自然观问题。卢梭的自然观指出了交往失败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一个健康的人需要社会的支持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而现代人两者都缺乏。在这个人为的不公平的文明世界里,我们的社会本性隐匿并且扭曲了内在的自然的自我。卢梭把他的批判建构在寻求一种公共的、体面的规范基础之上,使个人的自我和公共的自我能够相互联系,以消除对虚伪和谎言的需求。卢梭的理想是一种单一的、完整无缺的存在,既可以受到充满爱心的家庭的支持,又可以受到国家政体的支持。对一个完整、一致的自我的主要威胁来自于想象本身的飘忽不定、千变万化和不平等性以及社会的复杂性和劳动分工等。这就是“进步”引起争议的原因所在。卢梭赞赏劳动分工带来明显的优势,但是,他也看到了,社会在分工的同时相互依存,并且,其内部本身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他把复杂的社会生活比喻成一次宴会,认为,世界各地的工人们为此辛苦劳作,而富人却能够饱餐一顿。他把所有现存社会内未开化的人隐喻为野蛮的、缺乏反思精神的食肉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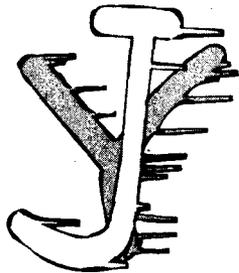
卢梭的这种自然的社会心理学源于发展的心理学——一种人的发展的可能性和反洛克的“自然”生长观的准则。卢梭与约翰·洛克和笛卡儿心理学观点的有保留的不同是,他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即努力把西方人从一种现代性的可怕后果中解救出来。这种现代性具有17世纪科学带来的双重性,它把世界分割成精神和物质对立的两个世



界,并认为最基本的内在现实世界是物质的。卢梭借鉴了洛克的心理学,但是,他试图把精神和肉体、心灵和头脑结合起来,以取得统一的、毫无隔阂的感觉意识。卢梭对精神本质的指责是有决定性作用的,而在这一点上,各种现代派的力量产生出某种反现代的意识:“我们自己仅仅是我们自身的最小的部分。”在调和精神与肉体、心灵与头脑这两对相互矛盾的领域方面,《爱弥儿》是一次最伟大和最全面的尝试,获得了我所称道的思维和情感的最浪漫的调和,是一种反现代的和浪漫的心理学的。该心理学是追求后来所谓的新教育、新儿童、新男性以及最终的新女性的理论基础。

教育是了解现代化和对其作出反应的特别令人着迷的窗口。因为,一旦传统文化开始现代化的进程,这常常也是公共政策所要清楚表述的首要问题,那么,年轻一代的文化遗产就成了一件高度意识化的事情。在制定教育政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每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化,在其变为有意识和有计划的议定之事时的矛盾性,因为,在早期它们根本是无意识的思想和策略。它有时就如同把本能的事变成有意识的和后天的事情一样。正规的教育是现代化引起的震动的征兆。我们目前教育制度的建设者和理性的诠释者们认为,它们遇到了巨大的危机,传统的由家庭将文化传授给儿童的模式开始崩溃,今后,抚养和教育儿童将更多地成为社会的责任。卢梭的新教育和他对新的有教育意义和治疗作用的个人家庭的乌托邦式的看法,都以各种形式探索了这一活动基本的相互矛盾的轮廓,即靠思维和技能去设计儿童抚养、教育和学习的“自然”模式。

正如埃里斯所说,童年本身在西方至少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事物,而且总的来说,传统上对儿童占主导地位的描述反映了基督教涉及原罪的教义。然而,也有一股观点明确而非主流的思潮借《新约全书》和犹太传统来强调儿童的天真无邪。耶稣说,要想进入天堂,我们必须成为像孩子那样的人。在基督教传统中不少人物都指出了童年对人一生的特别的重要意义。从广义上讲,对童年的两种基督教式的回答反映了基督教内部圣·奥古斯丁的信徒与奥古斯丁最大的对手贝拉基的追随者之间激烈的紧张关系。奥古斯丁的信徒强调罪孽和邪恶是人性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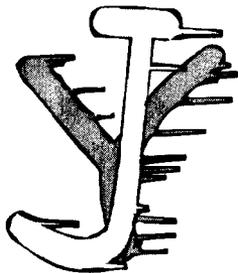


质；而贝拉基的信徒则坚持人性具有完美和自由的潜能。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中，这两种观点已引发了各种不同行为的课程，各种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政策的观点。为了消除人们的罪孽，在他们迷途时给予引导，奥古斯丁想要一个在地球上完全由上帝主宰的城市国家。他像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宗教法庭庭长》一样，主张首要的一点是，迷途中的人们需要奇迹、神秘的力量和权威。而贝拉基的信徒相信人的美德、理性以及自由选择的能力，他所要摒弃的是一个具有各种选择的城市，而不是什么上帝的城市之国。在启蒙运动时期，像卢梭这样的著名人士是基督教的反叛者，但他们在反叛的过程中也借用了基督教的传统。埃里斯没有看到基督教传统的各个不同派系慢慢渗透到他所认为的17和18世纪兴起的对儿童的兴趣之中的情形。

洛克被认为是主张高度压抑的儿童教育方式，即内向主导方式——戴维·里斯曼的术语——的倡导者。而卢梭则代表了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两人都想根除传统的儿童教育方式，都试图设想一种新的、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现代家庭致力于消费、娱乐以及主要是教育儿童的活动。两人对父亲们和母亲们提出了清晰的忠告。当然，他们也针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上层的少部分人谈了自己对儿童教育的看法。

12

约翰·洛克关于早期教育的思想也吸收了这类相互对立的有关童年的各种思潮。尽管他有关儿童教育的著述是以其做家庭教师时的经历为依据的，但由于洛克是一位杰出的精神和政治学方面的哲学家，因此，他有关儿童教育的著述读起来就像是哲学和政治学论著中推断出来的一样。所有关于洛克儿童教育思想的内容都表明了旧的家长式教育体制的瓦解。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中，儿童教育通常是不受人关注的事情。洛克向这样的传统观提出了挑战；向那些被这个世界所公认的常规思想、神圣的权威观念（包括王权和父权思想）、政教不分的政体以及希望上天堂、害怕下地狱等等的清规戒律提出了挑战；也向那些不承认新权威的思想观念提出了挑战。应该肯定地说，洛克的反叛是极为温和的。在许多方面，最使洛克感到震惊的是陈旧的封建式儿童教育中各自为政的和松散的状态，这就正如他最痛恨家长式权威的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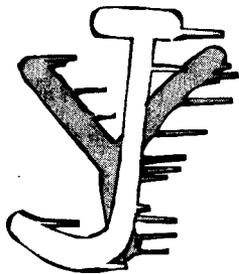


性的和武断的特点一样。洛克对家中奶娘及家仆们的邋遢和懒散的反感态度反映出一种新的家庭道德的理想,即家庭应该是一所专用学校,而不仅仅是一群人的居所;并且它的作用是深切地关心儿童,使其健康成长,而不是想当然地、随心所欲地抚养儿童。洛克认为,必须将儿童同成人世界里不遵守纪律的因素分开,而且,必须塑造儿童的性格。洛克的儿童教育观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注重在创建儿童某种社会性格过程中的实践活动。这种方式是反传统的,且本质上还是压制性的。

洛克关于权威的观点和他特有的儿童教育的方法,反映了他新颖的人性观,即认为儿童出生时大脑是一片空白,也即“白板说”。我们不是对洛克思想的影响感兴趣,因为这种影响总是很难估量的;我们感兴趣的是,在长期的有关儿童与现代性问题的争议中,洛克对某些一般问题所表明看法。洛克本人对宗教十分虔诚。然而,他却完全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儿童,认为,儿童所犯的违反礼节习俗的过失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即使是这样,他所提倡的儿童观却把儿童看作是有明显缺陷的和低等的生物。洛克式的儿童是一个未成年的大人,需要理性的父母和教师予以经常的关注以促使其合理地发育成长。毋庸讳言,成年人对此的基本态度还是受到压抑的。洛克的理论是17、18和19世纪儿童教育思想发展的组成部分,这些思想带来的是近乎完美的维多利亚式的性别角色的分工,尤其体现在美国在儿童教育、教学以及文化方面表现出的女性化倾向。然而,很明显,用洛克的话来说,他也寻求扩大父亲的作用,这样,童年可以说是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洛克提倡父亲应当扮演一种新的角色,即一种中产阶级式的父权制的角色,父权绝对对应是一种理性的权威。他还预测了19世纪中产阶级家庭的样式,而弗洛伊德则用俄狄浦斯情结的神话对此进行了诠释。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重要的不是俄狄浦斯情结直接的性别角色看上去多么有趣,而是洛克在这里提到了权力和权威的一般问题;他描述了一种儿童教育的模式,把内化的父亲看得十分重要。洛克主要关心的是把正确的良心移植到儿童身上并且发展儿童健全的社会性格。

卢梭反驳了洛克的观点,他提出一套涉及童年和人的精神的可选择性的命题,从而制定了今天仍在争论不休的专门的术语,如关于持续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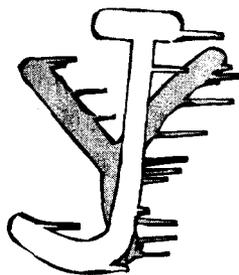


的环境观与智力观(或有时称之为先天论)各自优点的争论,也即外在的发展与内在的发展之争。洛克的心理学倾向于刻板的环境论;而笛卡儿的思想则倾向于笃信认知的遗传结构因素。卢梭是作为洛克最大的先天论反对者的面目出现的,他忠实于笛卡儿,强调精神的自由和理性的力量,强调世界秩序是通过社会分层来实现的。然而,卢梭又是洛克著作的严苛而仔细的读者,他利用洛克的经验主义挑战笛卡儿理性观点的单调、抽象和认知上的乏味。他也追求情感和具体的内容,为此,就像所有浪漫主义者为了验证经验而从洛克那儿窃取某些思想以推翻洛克世界观中的唯科学主义一样,卢梭几乎阅读了英国17和18世纪的所有心理学著作。事实上,卢梭的早期儿童心理学把当时盛行的洛克的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与笛卡儿心理学的认知能力和抽象能力的发展主义者的描述结合起来,尤其是在他早期的描述中更是如此。除了是一个先天论者外,卢梭还是一个交往主义者,是让·皮亚杰和约翰·杜威自然心理学的真正思想源泉之一。

对于纯粹的人类冲动的根本态度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洛克想要把儿童从古老的礼教、束缚和虚伪中解放出来,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对人的本性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他努力地想把自由、理性和平等作为人的社会特性来塑造人类,以便使其能够适应社会生活。如同他的众多浪漫主义的追随者一样,卢梭相信,有生命的本能要比社会约定的麻木的指令更加令人满意。

然而,在卢梭的理论背后始终都存在着深奥的先天论。并且渐渐地,其发展的模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就是爱弥儿与他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或许,卢梭的独到之处就在于此,即从发展的角度着重强调儿童自身成长的前进内驱力,以及儿童内在逐渐显现的生命力的动力作用。这就是卢梭认为的“自然”,也是为什么他和他的追随者们相信,关于冲动存在着某种原始的、甚至是神圣的东西。冲动是成长的源泉,是自我更新的本源——也即腐朽和颓废的文明与自然本身最后的联系。卢梭的浪漫主义的宗教是生命,原始的冲动是它的圣礼。

意识对卢梭来说是一个好东西;然而,对于其他激进浪漫派诗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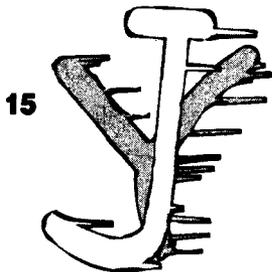


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卢梭想遏制想象带来的各种欲望,抵御过去及未来有可能使人们脱离现实经验的种种诱惑。他的两个教育目标——成长和内心平静——是新教育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推动力。从精神上解释,这种矛盾体现在具有丰富内涵的自然与欲望能够安身的自然之间。

尽管这些理想在卢梭的思想里是并存的,那种对现代人将会迷失方向并且颓废的担心还是常常成为主导因素,斯多葛派战胜了激进的浪漫派。最终,卢梭对现代人最重要的要求是静心。这就是从华兹华斯、济慈到杜威这些忠实的浪漫主义者所欣赏的那种成长和意识并不是卢梭理论的基石的原因,也是卢梭从根本上是一个反现代派的人的原因。最终,基督教的反叛者与奥古斯丁而非贝拉基站在一起。卢梭为老百姓追求和平是因为他对人性感到绝望。究其原因可以说,卢梭内心深处是一个十足的极权主义者。如同《宗教法庭庭长》和他的 20 世纪的后继者,他出于对人类软弱性的同情而禁不住又把人类变成了奴隶。

卢梭与洛克、伏尔泰和孔多塞等人关于启蒙运动的争论反映在社会进步、社会变革、家庭、儿童、儿童抚养和学校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浩瀚的文献中。这是现代化两大对立神话的争论,即“长期革命”与“迷惘的社会”。“长期革命”是西方科学、进步和道德提高的神话——是伴着世俗理性音乐进行的“长征”。而“迷惘的社会”则是伟大的抗辩声明——是被现代化摧毁的亲情、信仰和情感等家族网的挽歌。

学校教育是争论的内容之一;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家庭也是争论的内容。学校教育和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家庭的出现预示着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迷失的领域,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赢得成果的证据。对于那些为旧秩序而悲叹的人们来说,小家庭(由夫妻与子女组成)是较富裕阶层的可怜的遗留残迹,或是一种可怕的新奇事物;但对于“长期革命”的支持者来说,近几十年来出现的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则是财富增长、休闲娱乐、大众消费水平以及儿童看护水平变化的标志。“长期革命”的支持者们指出,婴儿死亡率和儿童出生率都在下降,健康、住房、卫生和娱乐水平则在提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儿童都集中在被我们称之为公立的、按年龄分班的高度理性化的机构里,也即我们所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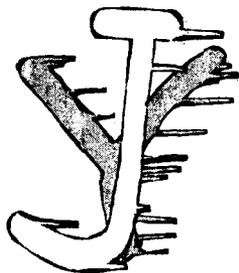
学校里,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制度下丧失理性的典型标志——是理性社会无法接受差异、死亡、年老、信仰或神秘事物的性向特征。

因此,从卢梭以来,如果不对现代性的弊端与优势进行某种分类阐述,要探讨有关儿童和家庭的教育是不可能的。卢梭有一种直觉,即他感到家庭的含义在18世纪发生了变化,男人、女人和儿童将在相互关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卢梭根本不算是一个妇女解放主义者——《爱弥儿》一书中的新娘苏菲就是一个糟透了的拙劣的榜样,她期待着成为当时被称之为真正女人的崇拜对象。而卢梭有关新的理想家庭的思想显然还是家长式的。但是,不难看出,在卢梭主张摧毁权威以及他认为寻求平等和自由应该在许多不同领域被每个人共享的前提下,上述含义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同样有着深刻的意义。

教育和现代性主题中最具思想内涵的当然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即我们所说的新教育思想。从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到约翰·杜威,他们的思想都试图以浓重的虚幻方式把理性时代的遗产与不切实际的幻想结合在一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是针对家庭和儿童抚养的现代性含义的,而不仅仅是有关学校教育的现代性含义。追求新教育是学校寻求浓厚浪漫主义综合体的老一套表达方式,即寻求的是能提供大脑和心灵、科学和情感、权威和自由、文明和自然,具体和抽象等相互影响的学习环境,能够在自我诉求和社会诉求之间形成一种动态平衡的学习环境。卢梭的家庭乌托邦思想借助统一文化和统一意识以及进步观念的名义反击针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反现代性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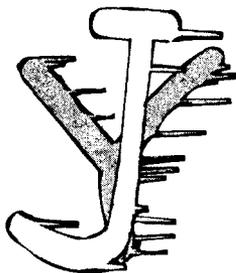
卢梭有关童年的发现是西方对儿童认识变迁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把童年时代作为反对现代整体的和统一的世界观的重要阶段——即培养儿童健康的想象力的重要时期。

对于童年的这种兴趣是浪漫主义者对独特个性感兴趣的内容的组成部分。正如布莱克所说,发展共性无疑是培养白痴。人类是理解力的创造者,并且,人类为其自身的不断更新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条件,特别是当布莱克和华兹华斯追随卢梭的观点,坚持认为,人类自身的更新源于童年时期的经验的时候,这一点就显得尤其重要。卢梭率先提出的浪漫主义情感的崇拜、高尚的野蛮人和儿童的天性提升了自我主义、



怀旧情怀、感伤主义以及其他逃避现实的形式；而当我们想到上述种种浪漫主义情怀所表现出的优柔寡断的一面时，我们抨击它便是合理的。毫无疑问，正如卢梭为这种浪漫的儿童天性所深深惋惜，或者如狄更斯般深陷于这类陈词老调中一样，这种逃避发生在最激进的浪漫主义者的思想中。然而，像狄更斯一样，卢梭也能够成为一个激进浪漫主义的反现代派者，他强调对文化的体验是个体自发的生命力——也即儿童的好奇心是人类充分体验生命活力之想象能力的标志。浪漫主义既有闪光之处，也有其致命的弱点，而卢梭对虚幻的知识传统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生命的宗教信仰。哈罗德·布卢姆称它是没落的、然而能够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传统。说它是没落的，是因为其预言家们最终注定要面临最后的极限——死亡，而说它能够自我完善、自我更新，是因为这种反对早期浪漫主义者所谓的生命中的死亡在每一代人的生活中每天都会重复发生。浪漫主义在今天仍然是英裔美国人的，也是许多欧洲人的基本的文化模式。我们希望能超越它——我们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首先必须体验它，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这种文化的强势与虚妄。

卢梭关于自然和儿童的观点成为反驳洛克、本瑟姆(Bentham)和葛雷硬[Gradgrind, 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代》(*Hard Times*)中的人物，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憎恨儿童的资本家]世界观的重要内容。这一反驳从基本的反现代派和发展的角度看待人性，强调的是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自由。鉴于其所有的理论基础均源自个人主义、个人成长和个人发展的浪漫主义信条，卢梭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唯物论的信条以及理性的利己之心在于死亡哲学的终结。以生死之争的形式进行社会批判是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精髓，其中针对于现代性问题出现了一些最激烈的和感人的批判文章，当然，还有大量的空洞言辞。在这种反现代派的传统中，儿童的形象反映了自主性、冷漠、友爱和好奇心的价值，同时，也反映出每个人使理解力和处世方式成为其本身经验的能力。正如彼得·科维尼(Coveney, P.)以及托尼·坦纳(Tanner, T.)曾提示我们的那样，从伟大的浪漫主义思想开始，有关儿童的文学主要是批判工业资本主义、为人性而辩护以及从生命的宗教角度批判工业



化生活。因此,它可以称之为宗教文学——即所有的浪漫主义都是一种杀伤性的宗教——但是,一般而言,它是我们这个人类的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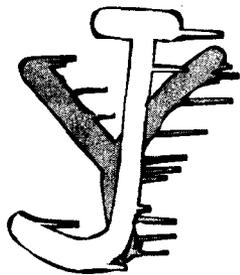
谈到儿童,浪漫主义真是一个大杂烩: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来看,它表现出的是对逻辑分析的敌视、对形式的鄙视、对智慧的怀疑以及勉为其难地为现代社会与生活本身制订的一个复杂的“资产负债表”。它的弱点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想象力和非普遍有效的色彩,也即是说,当我们将“浪漫主义”一词作为反对的含义来使用时所体现出的含义。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方式和传统的优势是它对于正直、好奇、谦虚以及人类发展的深刻理解。正如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儿童的形象不仅代表着感情用事和耽于幻想、逃避现实,而且还代表着旺盛的生命意志——如哈克·芬面对奴隶制敢于讲真话的勇气以及对待逃亡奴隶吉姆的正直立场等。

17

《爱弥儿》一书的教育作用有时候是开启生活的窗口,而在某些时候,它显然又是对生活的逃避:是一首淳朴快乐的田园牧歌、一种处于困境和感伤境况的田园生活;是对于那种浸满遗憾与怜悯生活的逃避和同情;也是卢梭对于人类以及他本人无尽的屈尊俯就的无比的自怜。甚至,在卢梭的思潮中最坚强的人,当他们追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有时也陷入主观、怀旧和遗憾中。这是我们在阅读狄更斯的作品时经常发出的感慨,也是体现出他们最不同寻常的地方。从爱弥儿到J·M·巴里的彼德·潘,就是一条从充满活力、引人瞩目的浪漫主义到结束这种充满活力运动的里程。

在这一思想流派中,那些大人物对理性的垄断地位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的反叛精神大多是低调的,但是,在布莱克派的笔下,这种反叛富有融合和整合的精神力量,由此去发展并发现人的协调性以及如同华兹华斯所说的欢乐深处的力量,以便寻找到他所称之为的通往天赋能力隐秘之处的秘密途径。对于这一流派中的最资深人士(譬如卢梭)来说,使用童年的概念并非否认了成年人的存在,而是希望在人类不断更新的过程中寻找到其基本的延续性。这些伟大的浪漫派作家通过对儿童好奇心的生动描绘,论述了人类生命以及其形成想象力的可能性。

这一巨大的双重性反映了在激进的浪漫主义者中所显现的意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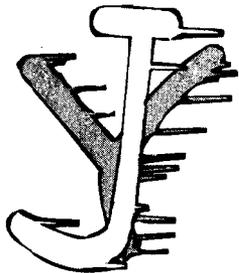
歧。卢梭把爱弥儿的童年描述为某种发展的动态过程；同时，也将爱弥儿的童年生活描绘为某种和谐的、枯燥无味的田园风光。

前者表达的是逃避那种现在仍然是许多反现代派核心观点的生活。后者则抓住了与真正生活衔接的精神实质，这种精神实质是对现代性最深刻批判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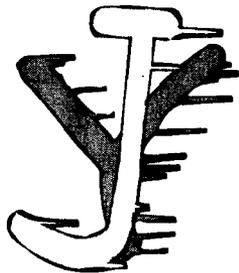
正如理查德·蔡斯(Chase R., 1957)曾经主张的，过去几年，有太多偏激的浪漫主义者在对立领域里的演绎推理已表现出虚假的征候。他始终认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才子们已经尽其所能地探索了对立领域里不同观点的张力和辩证逻辑关系。我想把蔡斯的论点扩展运用到浪漫主义的社会思想、心理学和教育学当中。卢梭在心理学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不是从J·M·巴里那里引用现成的田园风光，而是指出了成长是冲突的某种辩证的结果：即在爱弥儿与自然之间以及爱弥儿与他的家庭教师之间的冲突。爱是儿童生活的核心内容，但是，儿童发展的关键则是冲突。卢梭的田园牧歌以及随后的像福禄培尔在19世纪写的有关儿童和谐发展理想的文章，都显示出在这一思想流派中某些最深刻的弱点。没有哪个人的童年会是一首真正的田园牧歌。

18

今天，继承卢梭观点消极面的人们是那些感伤主义者以及时髦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他们完全接受了弗洛伊德对发展的负面描述——即他对宗教传统罪孽的饱受折磨的灵魂的世俗看法——并把这种描述转换成一种简单的想法，也就是说，儿童只要没有任何束缚就能快乐。自由对于儿童的发展是必要的，然而，冲突、悲伤以及痛苦对于儿童的发展而言可能更为必需。成年人对于儿童的成长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没有人可以让一个孩子完全不经历任何的挫折就成长起来，因为，这种挫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是固有的。爱的真谛就是一个体验失落、了解仇恨和愤怒以及学会悲伤的过程。没有哪个组织机构能够达到卢梭和他的追随者们希望的家庭和教育能够完成的所有目的。感伤主义不仅仅是传统的表层含义，它也指出了一些极为愚蠢的错误想法。然而，乌托邦主义积极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寻求的是在西方盛行的现代化模式所具有的可选择性。卢梭流派的思想家们还提出了批判性的问题。为维护乌托邦思想，马丁·布贝尔(1949)曾指



出,社会传统还没有达到对人性和人的潜能的全面理解。这一点我完全赞同。在寻求现代派和反现代派的平衡过程中,卢梭派乌托邦社会的空想家们竭力想获得对人本身、对人的潜能以及对人的需求的更加全面的了解。激进的浪漫主义者如约翰·杜威就主张,大脑和心灵是可以传递的,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的对立主张是可以传递的,科学和情感也是可以传递的。总之,上述这些乌托邦社会的空想家们使我们丢弃了一切有关进步或困惑的记述。卢梭民主思想的继承人要求我们作出批判的选择并采取行动,而不是让历史来支配人类的命运。可能在某些时候,卢梭民主思想者们对诸如家庭和学校这样的机构所采取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却提出了这样一些本质的问题:人的发展的可能的潜质、生与死的含义和目的,以及宗教的推动力在世俗世界里可能采取的形式等等。



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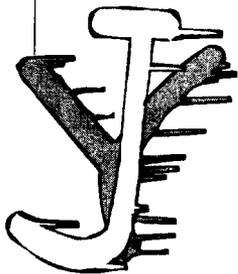
1979年2月

19

近几年,家庭作为某个非常特别的话题而重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以及学术文章和公共政策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这充分说明了历史的间歇性和延续性。这种现象已引起人们广泛的政治兴趣,并开启了一扇展示奇特年代和波动的民族情绪的窗口。在这样一个时期里,许多人发现,即使政治领域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也很难理解极端保守势力与激进的想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这种激进想法还远未从讲求理智的舞台上消失。对各类组织根本性质的质询仍在继续,我们认为,尽管是以更为清醒和节制的形式来展开的,这种质询依然作为“60年代特征”而成为对峙年代被过分渲染的一个方面,其中,家庭常常被当作质询的焦点。

关于那个动乱年代的回忆录、小说和学术研究已经相继出现——作者们走上前台,带着某种尴尬的稚嫩:“写回忆录你是不是太年轻了?”人们总在想。从表面上看,当前与近来一段时间所形成的对比的确是十分突出的。一段以示威、游行以及激烈的事件纠纷为标志的社会动荡年代之后,接着就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时代,人们把注意力转向自己、家庭以及逃避现实的各种安慰:如怀旧、科学幻想、美食以及慢跑等。下面,我并不想诋毁那个疯狂迷惘的20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传奇,但是,我却一定要抨击近来那种认为一切都改变了的观念。

这种预言人们将越来越关注家庭教育话题的观念可能反映了某种世俗的宗教危机。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家庭主义和儿童教育几乎等于宗教价值,这一点对于那些目睹所有其他的崇拜对象开始崩溃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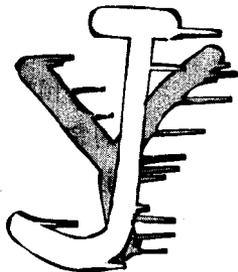
来说或许更是如此。以前,人们认为,家庭生活和家庭的爱无所不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信念现在开始动摇了。人们对家庭的安全有一种担忧,这也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怀疑,怀疑甲壳虫乐队的说法错了——爱可能并不是你所需要的一切。

在学校里和家庭里,学者、记者以及老百姓们都在讨论,家庭是开始四分五裂还是生机勃勃或和睦温馨的问题。家庭开始解体的迹象与有关数据相吻合,说明家庭为了适应变化仅仅是在形式和功能上发生了改变。我们大多数人是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方向的一般本能的感觉出发,从我们自己和朋友的生活角度以及从我们亲眼看到的一切来讨论这些问题的。以家庭为话题所遇到的困难之一是,在讨论中,每个人都觉得有必要维护某些特殊的选择。我们了解到有些家庭正在走下坡路或处于严重的困境中;有一些家庭兴旺发达,甚至连某些相关的统计数据都显示出两种不同的答案。

20

我怀疑,从历史舞台的角度看,使许多人感到困惑的不是因为婚姻、家庭和儿童教育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激动,而是因为以前许多想当然的事情现在转变为某些有意识地去选择的事情。婚姻是双方自愿的,因此,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要不要孩子的决定也是双方自己选择的。我们经常忘记这一点,即自愿原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许多人选择结婚、养孩子;另一方面,许多人又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家庭内部的分工。

有两种情况仍然是很清楚的。第一种情况是,家庭以某种形式继续充当着儿童教育的首要部门。尽管离婚率在上升,98%的美国儿童仍处在某种形式的家庭环境中。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所占的比例比过去要高,但是,这种家庭的稳定性被我们毫无限度地夸大了。怀旧是我们清醒地思考家庭教育问题的大敌。19世纪由于死亡、分离以及工业化经济的震动所导致的家庭瓦解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而通过衡量我们现在的混乱以及迁移所获得的过去家庭相对稳定的印象可能也是虚假的。1880年,57%的人口居住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居住在一些不知名的大城市里。今天,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生活在小城镇和郊区,尽管有各种实实在在的不便,但是,街坊邻居和社区都能容易地



建立起和睦的关系。第二种情况是,在家庭和工作中,性别角色更趋平等的分工对于扩大男女潜能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会不断地面临社会交往中的复杂性。妇女在传统中的角色变化说明,男人和女人在日常工作、儿童教育和娱乐休闲这三个重要领域的常规关系发生了变化。家庭,无论是好是坏,仍然是儿童学习性别角色的重要学校。如果两性能获得更大的角色变化的范围,那么,变化也必须是从家庭内部开始。因此,家庭的未来是与妇女未来解放的希望和男人从传统男性角色的镣铐中解脱出来的希望,两者紧密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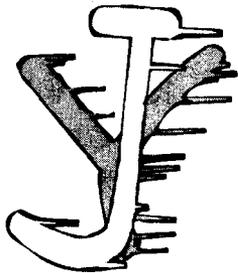
对于传统家庭生活的怀旧描写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很久以来,我们民族对进步和积极向上的信念都暗含着某种深深的忧虑,担心失控的经济和技术变化会给传统的方方面面带来影响。这种担忧常常以怀旧的和典型的保守的精神状态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对未

21

来积极的憧憬与对失去的过去怀旧般的遗憾之间有着非常强的联系。积极向上是对未来的某种憧憬;怀旧是时间倒流的一种相同的情愫;两者都避免论及现在的生活。

家庭作为怀旧和历史画面的最重要的内容总是与某些有关家庭生活的狭隘的和说教的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人种是以盎格鲁撒克逊裔的白人新教徒为主,而在家庭模式、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上则是以传统为主的。美国家庭已归入了一种模式:妈妈,爸爸,姐姐和弟弟——在一张快照上冲着你咧嘴笑。这种模式似乎也要瓦解了,虽然现在还难以想象我们会以什么来取代它。

尽管我们透过媒体的生动描绘去寻找有关家庭的更加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们还需不断地与某些传统信条谨慎斡旋。一个事实是我们人口中的儿童比例在减少。面对这样的事实所应采取的正确立场也是当前有关家庭问题争论的一部分。许多有关家庭问题的对话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人口生育高峰结束了。当年,组成我们人口快速增长的这些人现在都已成年。他们也是当前人们对儿童教育和家庭产生浓厚兴趣的一个原因。这些在生育高峰时出生的儿童接受的教育都很高,且大多能说会道,从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市场,为诸如抚育和教育儿童等各类问题著书立说。并且,随着时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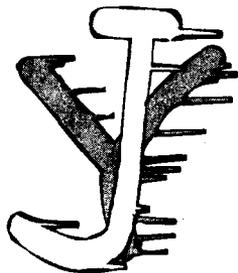


推移,更多的问题如成人发展、离婚问题、中年危机、老龄化以及死亡等都会成为研究的论题。从纯数字来看,这部分人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有可能将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是在充满期望的环境中长大的,经历了人权和反战运动此起彼伏的洗礼,对学校 and 权威持怀疑的态度。在这批人故去之前,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作为接近这个年龄段初期出生的人——我生于 1940 年——我是以一种特别揶揄的心情期待着我的朋友们行进在 2000^{注1}年不可避免的极端的老人化运动中。但同时,有关成年人的问题也必须加以引导和研究,而这又给 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到时已长大成人的那批孩子提出了特殊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家庭和家庭义务的讨论现在能引起如此强烈共鸣的原因。

美国人或许一直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从而忽视了我们的学校及其历史的两难境地所具有的古老和稳定的特性。我们希望保持年轻,这一点至今未变。然而,年轻的动因——希望和未来的群体——却一度迷失在中国人所称之为的天命里。人们再也不像过去那样通过揭露社会对儿童和青年人关心不够,从而轻易地对这个社会进行深刻地批判。现在的成年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作为过去青年反叛运动的产物,必须走出来为自己说话。人们认识到,现在的年轻人其伪善的一面越来越少,而为自己辩护的心理越来越强。大众电影把儿童描写成被恶魔和魔力所左右的调皮鬼。最高法院,我们国家仲裁的象征,审理的英格拉哈姆对赖特一案令人极为震惊,该案涉及对初中生实施体罚。

22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的看法是浪漫主义的和左倾的。即使没有任何答案,人们都试图将个人与历史相联系去寻求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必要的、变化多端的关联,哪怕最终两者都没有得到任何答案。但现存的只有一种看法,一种对政治和历史关系问题的态度,而非令人信服的分析,或者至少不是一付政治行动的清醒剂。人到中年,我注意到我的朋友们越来越对自己的家谱感兴趣。我们总是不太愿意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我们自己和我们父辈的生活;我们从书中了解过去,但是不知为何,我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一幅包含 19 世纪爱尔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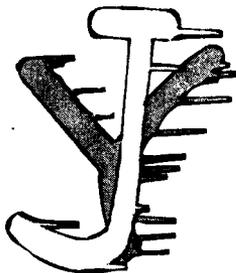


农工、犹太人村落里的农民、文艺复兴时期的红衣主教、17 世纪的清教徒、非洲的勇士以及伦敦的机械师等生活相同的壮丽历史画卷中的一部分。我们为未来的生活而奋斗,但更珍视现在的生活。部分原因是年龄的问题——年轻人具有逃避历史和承担家庭生活重任的双重责任。这常常意味着我们得将自己与过去、与家庭割裂开来,这是种短暂的分离,并不像当时认为的那样是永远的隔离。

家庭所描述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延续性和暂时分离很容易在下述政策争论中看到。家庭作为某种重要的信条出现在抨击社会公共机构和各种职业团体的行动中,成为浪漫主义反对现代职业化社会的延续体。在众多的领域,一项接着一项的非制度化行动成为一种时尚,而伴随着这种时尚通常会出现某种盲目的争论,认为改变我们所面临的这种机制可以是家庭存在的某种方式。这种重新对家庭产生兴趣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已从根本上对肯尼迪—约翰逊改革时期的国内政策完全丧失信心。上述这种态度有左右两方面的原因:批评家们站在两种立场上都把政府、官僚机构和职业看作对立面,而把家庭看作是中央集权国家权力膨胀的牺牲品。对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期提出的“公用事业”政策的极度失望是当前解读 20 世纪 60 年代传奇的最普遍的方式;但是这种醒悟本身还是借助于 60 年代的各种主题。在社会学上,科尔曼(1966)和克里斯托弗·詹克斯(1972)关于教育的论著已成为新的领军人物。这些修正主义教育社会学家认为,学校无论是在提高学术成就还是在促进社会迁徙方面所做的都比想象的要少,而且,家庭背景是预测年轻人未来的最重要的衡量因素(应该指出的是,完全忽略那些不能精确衡量的事物的倾向会对这项工作造成相当大的危害)。人们对家庭的兴趣说明了人们对教育失去了信心,而这又反过来反映了人们对政治和政府失去了信心。

在 60 年代,我们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一个半世纪的公共教育机构的改革在各种服务机构中遗留下来重重的问题,而这些机构是我们的文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两难境地作出的反应。修正主义学者们开始研究学校、医院、精神病院、监狱和少年法庭过去与现在的工作机制,探询这些公共机构的弊病。随着这些公共机构信誉的日渐衰落,家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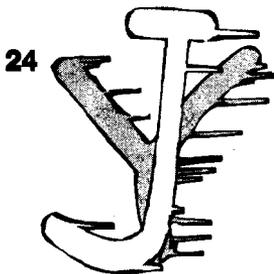
23



声誉日渐鹊起。这里还有一些有趣的例子。在60年代中期,备受争议的莫伊尼汉报告(1965)强调黑人家庭中存在的问题并推测了奴隶制的遗留问题,为政府制定的资助这些家庭的政策而辩护。莫伊尼汉报告就70年代和80年代那种将贫困家庭充分就业的诉求报告同有关治疗和教化的论点搅和在一起的做法提出了忠告。该报告在把家庭卫生和充分就业问题相混淆的过程中,重复着有关公共政策的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即强调贫穷家庭的特殊问题始终贯穿在老一套的、形式化的以及高度说教式的大众言论中。但是,报告也强调了对这些家庭应给予直接的帮助。

在60年代的动乱以及对这些动乱的应对策略中,出现了两个鲜明的主题。这两个主题都表达了家庭需要得到支持的理念。第一个主题强调收入和工作对于家庭的需要。尽管在流行的平民主义者的语言以及修正主义者对职业、官僚机构和任何政府行为的不信任中常常表露出上述相关主题,但我们并不需要否定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期提出的“公用事业”的政策。社会评论家如克里斯托弗·拉希(Lasch, C.)把职业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并不是孤军奋战。有关收入多少的争论只能说明社会公用事业自身不能克服的极端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社会公用事业要求平等地发挥其合理的作用。这也是我的论点。现存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两极分化在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时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剥夺和扭曲。社会公用事业从教育到医疗出现的主要体制困境源于不平等这个大环境以及社会服务在其中运作的市场力量的作用。贯穿在所有报告中的第二个也是次要的主题,是模糊的然而却是60年代所特有的,即所谓对“参与”的要求。各个服务行业的客户和顾客越来越强烈地批评了对一个半世纪以来职业化所带来的后果,他们要求能从专业人士那里取得一部分职位和管理权。皇家英才制度和毫无挑战性的平庸的行业专家队伍的时代渐渐地不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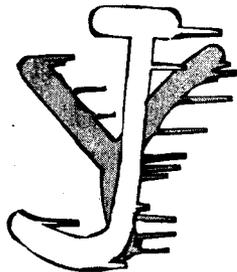
因此,60年代浪漫主义和反现代派对行业的攻击仍然是当前局势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立场为抨击社会阶层所有职业行为对公民个人生活的干预提供了强有力的炮弹,并产生了反对中央集权制意识形态的无政府主义的左派和保守主义右派同盟军。或者这一立场也



可以诠释为我们所建立的社会公用事业本身是社会的福祉,但是,它们无法在这样一个极端的平等的社会里依照健康的方式运作。可以肯定,这一观点的寓意是要求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来重新分配收入,只有这样,那些没有能力购买并享受社会公用事业的人们才可以获得并享受生活服务。

我完全赞同人们这种对收入和工作的需求,然而,强调收入和重新分配的重要性、肯定家庭生计和充分就业的必要性是一码事;因考虑到儿童和家庭及生活服务的需要而逐步陷入到当前那种认为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糟糕的失败主义的认识则是另一码事。实际上这是众多财务报告书所起的作用。有鉴于此,我觉察到,在那些还没有完全放弃自由主义的人当中,非常普遍地存在着某种受到打击和惊吓的自由主义的幽灵。当前对贫民家庭的关注反映了盛行的平民主义者对价值、特权和不平等的怀疑,反映了60年代修正主义者对行业以及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期提出的“公用事业”政策批判的延续,并且还反映了一种新的保守主义的观点和对传统价值观以及反现代派信念的呼吁。在许多领域受到责难的自由主义吸取了瞬间历史的教训。因此,它怀疑各种方案、专家、官僚机构和专业人士,倾向于避过上述机构或人员以寻找政策,就像林登·约翰逊的《向贫穷宣战》一书曾尝试的那样,试图绕过州和市政府的机构直接同贫民接触。这种新观点的优势在于,它认识到不平等是问题的焦点,而要想在国家的议程上解决贫民家庭问题的一个重要的长期任务就是必须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但是,这一优势总是与某种相互纠结在一起的弱点相形相伴。

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缺点还在于,它是基于个人主义和经济生活观的基础之上的,认为贫民家庭需要钱,因而,收入需要重新进行分配。而这就是问题的全部要旨所在。实质上,新自由主义仍然依赖于市场的模式,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增加家庭的收入使这些较为贫穷的个人恢复竞争力。这样做是好的,但是其基本程式仍然是个人主义的。新的自由主义表达了对人的关爱;然而,究其根本它仍然是查尔斯·狄更斯(1854)小说中葛雷硬世界观的翻版,认为只有个人利益才能将整个社会拢在一起。新葛雷硬主义反映了经济学家们在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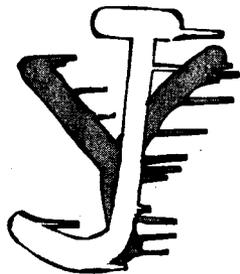


政策讨论中的主导地位,这是一种令人好奇的现象,因为,实际上,传统的经济学已经承认,它无法解决通货膨胀或就业的问题。这一基本的经济观点显示出它在古典自由主义方面的根基,即通过不断努力来恢复正在消失的市场机制,并尽力避免任何一种通过要求人们共同工作来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已经习惯于右翼的葛雷硬主义,现在我们又左翼的阵营里听到了这种声音。今天的葛雷硬主义是基于1960年代的一种观点,即认为金钱被用来以昂贵的、无用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而这些方式主要是对专业人士有利——正如人们常说的,本想去喂麻雀的,却喂了马。

25

众所周知,专业人士在一个多民族的和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中进行服务分配,他们所扮演的时而令人费解、时而邪恶、更经常的是悲剧性的角色是一回事;而认为我们可以降低和消除现有的服务机构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对官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疑虑是有相当大的依据的。一条宝贵的和永恒的真理是,绝大多数组织主要的推动力是自视过高。职业化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针对外行的阴谋。迄今为止,修正主义者已经发出一些听起来有益的忠告。职业服务的观点并没有像过去的劳动阶级心中的兄弟情谊和共和价值观那样更加具有正当性,甚至也没有早期基督教博爱和慈善的理想那样具有正当性。不幸的是,这四个美好的理想中没有一个在我们的公众生活中具有很深的根基。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人们拆除了不合理的职业和官僚机构,却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填补这个空缺。

与当前的新葛雷硬主义相比,一种更为革命、更为友善、人数众多或文明的社会观点似乎更能在一般意义上从两面为现行政策提供两种帮助,而这两方面往往容易为人所忽视。一方面是许多人实际上确实需要帮助;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应该能为人们相互帮助提供各种条件。照目前的情况看,需要帮助的情况使人们经历了质疑意识形态、阶级和种族歧视以及官僚和专业人士的权威的过程;然而,应该看到,这种需要仍然是非常真实的。这里肯尼思·凯尼森(1978)比克里斯托弗·拉希(1977)更胜一筹;孩子众多的贫民家庭的确常常是孤独无助并陷入困境的,他们需要帮助。这一情况所带来的挑战就是营造各种环境,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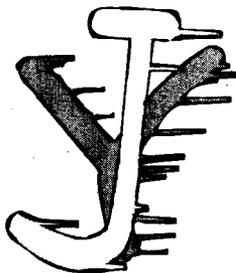
诸如此类的贫民家庭提供更多的选择,以使他们能够获得各式帮助。救助应当是提高家庭生活水平,而不是削弱它。

我们需要同时在两个不同的政治层面展开斗争。从国家层面,我们需要平等联盟用以维护对共同特权势力的民主管理。而平等发展的主要舞台必须是国家政府,因为它本身具有管理那些代表公司众多私人管理机构的潜力。然而,与此同时,许多地方机构由于缺乏公民的参与而萎缩了。因此,从地方层面看,我们需要重新唤起人们的自愿参与意识以及多元主义意识。60年代人们拼命寻求的参政意识仍在继续,尤其是在对行业的连续不断的抨击方面更是如此。

26

现在要做的是建立相关的联盟和机构。因为,一个更为友善的社会取决于每个人的同情心和努力程度。葛雷硬派和它的所有同盟军,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处于孤立的和自给自足的状态中。那些拥护新观念的人们对老的社会公用事业策略的弱点和错误相当警觉。他们对家庭所寄予的平民主义的信仰令人关注,他们对国家所持的怀疑态度也不是毫无根据;然而,实际上,他们赞同这样一种社会规则,即那些能保证某些人以失败者而终结的规则。社会的市场模式在国际跨国公司的时代已经是一种怀旧的且与时代不协调的事物。出于某种反对中央集权主义的立场,人们支持这些庞大的跨国公司制订的游戏规则,这是不言而喻的。葛雷硬派的观点忽略了许多我们大家的命运相互关联的方面,因为准确地讲,葛雷硬派的观点的目的只是确定每个人(男人和女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还留在某个孤岛上,至于他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关联则不在其关注的范围之内。

不用说,持右倾观点的人没有几个愿意承认我们的制度可以产生集体影响,并且承认要改变这一制度需要集体的行动和承担集体责任;而奇怪的是,持左倾观点的人则更少愿意承认这一点。当前的社会政策使人们从根本上失去了对社会的同情心。经济学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精神律法,但是,它对人的情感来说却并非有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学家提出自己的观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且,这也日趋成为商人、律师和经济学家们所固有的口头禅。但奇怪的是,近来,这样的观点在持左倾观点的人们言语中也出现了,他们当中有太多的人似乎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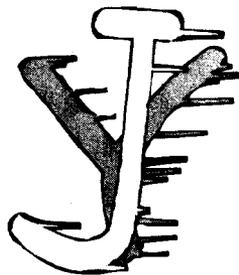


时都准备否定集体的或公共安排的任何事情,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将我们置于一个单一的充满竞争的世界。

从分析角度看,当前有关政策的争论常常缺乏任何意义上的集体影响,譬如,个人所决定的事是如何产生系统的影响。从哲学和精神层面上讲,今天人们关于政策的争论完全忽视了人的情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同情心是同国民生产总值一样真实的东西。从策略上讲,葛雷硬派的自由和极端主义继承人却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我们在这些思想前沿所取得的任何成果都将是我们的共同行动的结果——是政治上的同盟军协同作战的结果。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只有两次这样联盟的例子:工人阶级工会运动和人权同盟组织。当前,收入和公用事业策略之间准确而具有深刻影响的差异性成了学术文章最好的分析内容和材料。在实际政治中,从公用事业和重新分配的领域取得的成果通常源自同一个出处。

我们还必须学会至少在两个层面上生存下去的方法。一个层面是有关公正、平等和民主社会的基本观念,这可能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层面。我们需要自己的乌托邦社会,因为,没有这样的社会,我们甚至不知道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另一个层面是近期的战术目标,其本身值得我们去赢取,也值得我们为之而奋斗,因为,为达到这些目标所做的努力能够增强集体影响。我们现在还没有面临那些有关是否强调“收入”而非“服务”策略的高层次的政治决定。谈论起来真是太荒唐可笑了,好像我们是社会资本虚拟的经纪人,在决定投资收入而非公用事业本身,实际上,真正的政治问题是我们需要提出什么样的近期目标才能在穷人、少数民族、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以及专业人士中建立起联盟。这里,收入与公用事业策略之间明确的区别已被进一步打破,因为,我们主要的目标是在一系列领域里采取共同的行动。葛雷硬派不仅仅在道义上反应迟钝,以为可以使政策成为某个有个人倾向的个体或有个人倾向的家庭。而且,它忘记了服务和收入的获得是通过何种手段发生的——即通过各种集体行动的形式来获得的。

令人感到沮丧的是,在拉希和凯尼森的论著中有关当前倾向家庭的标志是其内在的只关心个人生活的态度。可以肯定,他们两人都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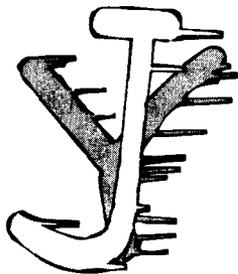


吁采取公众行为：凯尼森主张收入的重新分配，而拉希则以更为决绝的方式提出振兴基层的民主。然而，两者对公众参与和公共领域都没有太大的信心，这一点令人担忧。因为，如果没有公众参与，没有把思想与正在进行的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思想本身注定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有关黑人家庭的莫伊尼汉报告应该继续作为使人敬畏的对思想与政治关系的警告。该报告试图通过割断思想与社会运动而发挥作用，使报告本身成为一个以往在另一个环境中被威廉·詹姆斯称之为“充满恶意的理智主义”的典型而生动的例子。报告虽然试图为一个案子而声援贫穷家庭，但是，却又陷入了剖析假定的黑人家庭的问题之中，完全忘记了报告应该传递的主要信息。有谁能想到莫伊尼汉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就业和扶助贫民家庭问题呢？

与莫伊尼汉报告相似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当前人们对于家庭问题的忧虑。除非这种忧虑同众多领域的公众行为相联系，否则，这就意味着某个新时代的到来——某个基本上是从个人和心理角度解决我们共同面临问题的新时代，某个空洞的根治和精神化的时代。家庭主义时代在维持心理时代方面遇到很大困难。

我所提倡的就是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都不喜欢听的。自由主义所追求并希望改革的是，在更为极端的目标之间有一种前后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尽管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化解极端暴力，自由主义同盟中极端观念的提出成为可能。约翰逊时代国内的自由主义改革是一个大杂烩，然而我们却与之相处得非常融洽。虽然60年代的传奇在今天仍然很流行，但是，要维持各种方案的特色，譬如那些主张重新分配，主张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或鼓励集体行动的方案，并不总是很容易成功的。约翰逊时代的国内改革部分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但更多的则是通过由各种联盟团体发起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的。那些反对我们的社会作进一步变革的人们现在指出，这些方案表明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需要进一步的极端行为。这是美国改革历史上最为典型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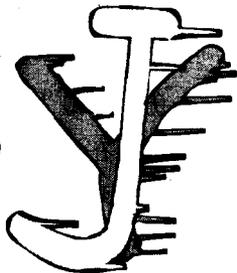
在过去15年里，我们社会所发生的真正变化源自于被称为高高在上的政策体系以外的领域。这些变化是各种社会运动的结果；近几年



的一个悲剧是这些运动在总体上趋于分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变化发生方式的看法已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开始对服务以及收入方式的“选择”展开争论,好像群众运动的方式根本不存在;好像进步的劳动工会并不是社会服务和收入重新分配的重要的支持者;好像在各种纷繁的中产阶级运动中并没有出现什么政治的潜在力量。在我们的争论中,似乎我们所谈的事物的核心是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目前,悲剧传统的进步联盟团体陷入极端的混乱之中。现行的行政当局原则上是赞同全就业和家庭救助活动的,但是它的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却是一团糟,很难看出这些政策的偏向性。口头承认我们需要共同的联盟是很容易的,但是,事实却是,此刻把持着发言权的是“葛雷硬”们。在目前这个家庭主义时代遭遇到的最大危险有某种非常明显的倾向,那就是人们开始回到以个人的、非政治的手段解决公众的政治问题的时代。家庭可能成为争取新的和更加大众化社会的斗争的重要象征,但是,由于时代艰难,这些问题的政治因素被严重混淆了。人们追求更多的平等是正确的,然而,在动荡不安和高失业率的情况下,这些基本的诉求听起来可能就很空洞,使人灰心丧气。甚至人们宁愿取得一些小小的胜利,也比根本没有任何胜利好;这些小小的胜利带来的某种潜在价值,可能要比任何具体的方案都重要。我们需要小小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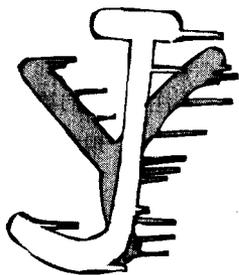
家庭就是这样一个人捉摸不透的象征物。对于人生的某个不确定的年代,家庭的形式是最完美的。它似乎可以同时由某个既体面又傻乎乎的总统来统治。根植于家庭的这种两面性使之成为一个永久性的话题。从《汉塞儿与格雷特儿》到《战争与和平》这些最伟大的小说,都倾向于演绎一些家庭题材的故事,而大众亦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从中寻找着自己的影子。然而,公众对家庭问题的看法似乎又从来没有认同过这一主题所包含的浓重的诗意。在这里,我并不仅仅指当家庭在兴盛或困境中时,孩子们的欢笑声或同舟共济的精神;或者,就像我们在城市公园一块破玻璃上经常遇到的鸟儿一样,那些美丽的捉摸不定的美丽仙女悄然闪现在我们平凡的家庭生活之中。除了家庭所带来的上述的基本快乐外,在这儿,我还指家庭的困境,即家庭本身为



了突破自己强加的以及外在的障碍挣扎着求助的哀怨；指过去的错误所带来的沉重悲哀；指囿于男女角色所产生的压抑哀鸣；也指童年的过错所带来的噩梦般的回忆等等。这些诗句充满了愤怒、仇恨、恐惧和失落，是叙述了过去的诗句，更是几代人的轮回的诗句。我们会随着自己的衰老在悲喜之中围绕我们的孩子们编织着这些诗歌，并把这个世界留给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后代。公众以及政治有关家庭问题的讨论，由于缺乏上述这种丰富及复杂的内容，因此，听起来总是抽象、虚伪和浅薄。

委员会的报告、立法以及政策文件的内容都如此匮乏以至于很难知道从何入手开始讨论家庭的问题。我们需要这样的诗歌，理由很实在，因为它记录了家庭的悲欢离合。抓住诗歌的灵魂，我们就能找到方法摆脱我们长久以来对别人的生活视而不见的毛病。当我们再遇到因阶级、种族、性别、年龄所产生的巨大差异以及所有其他过去和当代横亘在人类之间的鸿沟时，我们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克服这些差异和逾越鸿沟的一条经验就是家庭。威廉·詹姆斯曾说过，虽然弄清楚人与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的问题很重要，但是，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家庭问题搞清这一点。对于那些像我一样渴望拥有更加民主和平等社会的人来说，家庭问题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总是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家庭是怎样在抵御公共政策、干涉他人行为和某些优秀作品中充当角色的，家庭问题也成为改革者努力消除人类疑虑的一部分。如果你想试图终止一场家庭纠纷，可能的结果是你自己也被卷了进去。不管高兴与否，任何一个特定家庭的具体的故事总会从专家所织就的网中遗漏出来，专家所设定的故事内容不能包罗万象。在查看家庭时，我们一次又一次被人们所拥有的那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所震撼，即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行事规则来做取舍。

上述种种首先是祈求同情，然后是谦恭。给家庭更多的支持并不能马上结束孩子和父母的痛苦。再慷慨的有关家庭问题的政策也只是起到了任何公众行为所能起到的作用。它有助于父母和孩子们以更多的自尊和较少的不必要的痛苦迎接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悲剧。这不是什么太平盛世，但是家庭生活也不是什么太平盛世之类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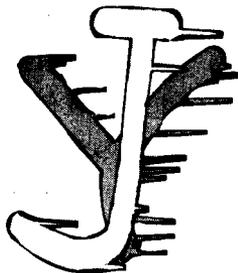
关于家庭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它涉及我们在今后几年应该寻求什么样的有关家庭问题的学术研究。我前面已提到过不少关于家庭的话题具有政治效应的原因,但是这种效应不仅表现在政治方面。没有几个课题会承载着这么一付神话的重担。关于家庭方面的学术研究,这些日子以来不仅在精神上是反传统信仰和修正主义的,而且,还是极具个人主义的色彩。60年代长大的儿童认为,家庭作为学术性课题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是,它明确地提出了该课题的主观性和客观性问题。人们不能像谈论果蝇那样讨论家庭问题。的确,目前有关家庭研究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研究的方式倾向于过多表达个人的意见。或许,所有的学术成就都是以自传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里,学者们应该是既要观察其本人的家庭情况,又要观察自己的家庭与所研究的家庭情况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家庭的最有趣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趋向于浪漫主义。它反对客观的常规惯例,然而,正如所有浪漫主义学术成就所必须面对的那样,它的正确性受到质疑。在这里,同在其他方面一样,60年代受到困扰的灵魂仍在行走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30

我们的对话现在开始显现出与尤金·奥尼尔(1956)伟大的家庭剧目《漫漫长夜路迢迢》里最后一幕的相似之处。在渐渐昏暗的光线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夜色越来越浓重,而家庭聊天依旧继续。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妹们在诉说着:不是为了听懂,而是为了理解;相互爱着,但又相互仇视和伤害着对方;纠缠着又在顺应着,就像没有抛好而缠在一起的钓鱼线,是一群没有受到伤害但又总在受伤的人。奥尼尔笔下的人物就像我们一样,也在谈论家庭的问题,为的是阐述他们对生活本身的态度。

注释

注1 我们非常遗憾地注意到,现在已是2002年,而“极端的老人运动还没有出现”。但是我们肯定还在期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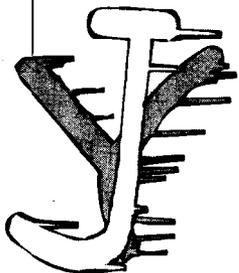
美国教育

1982年1月

31

我想谈一下形成某种完整教育的几个因素。在我看来,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较强意识和较完善的自我。我想指出的是,健康的教育是存在着重要的矛盾体。例如,记忆与观察。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有意识的人涉及一个循环,即记忆和观察的循环。要观察事物,就需要记忆;而为了记忆,则需要观察。从理论的角度讲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人们却一直在循着这样的规律运作:他们先观察,然后记忆,接着再观察。观察与记忆可能是我们把一切事物称之为自我的根源,二者之间达到某种平衡是十分重要的。某些人,甚至某些文化,受过去的影响太深而难以看清现在。另一方面,我们了解到,人们,以及各种文化,已习惯于被眼前耀眼的一切所吸引,从而丧失了对过去的记忆。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80)在《笑忘录》中把现代说成是“喷枪时代”。人们把自己不想要的那部分画面给忘掉了,这是20世纪一种简便的遗忘症形式。昆德拉描述了一张捷克人民共和国创始人的著名画像。一位助手把自己的呢帽借给首相的情景被抢拍下来。几年后,这位助手被清洗,他也就自然地被从这张著名的照片上抹了去。新冲出的照片被发往各地的学校和公共机构,但是照片上的首相仍然戴着这位失踪助手的呢帽。这不仅是极权社会才有的现象:在我上十一年级的美国历史课时,我把美国说成是“遗忘症合众国”。每一代美国人在发现存在着贫穷和不平等时似乎都很惊奇,即使这些现象早在19世纪30年代初就是这个合众国固定的特征。而受未来影响太深的某些人和某些文化同样也难以面对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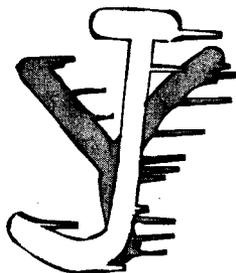


显而易见,在任何健康的生活中,现在应该与将来和过去保持平衡:他们之间的平衡应该像悬挂在绳索上的风铃,在我们摇动它时可以相互矫正,达到平衡。现在,在里根总统为政的美国,大多数贫穷的儿童已经失去了“未来是实实在在的”这样的感觉。年轻人的离谱的失业率成了我们最大的教育问题,因为这样的高失业率使得年轻的生命失去了对未来的必要的认识。一个记忆中的过去,一个看得见的现在和一个憧憬中的未来需要有某种平衡将其连在一起,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保持的平衡。你可能会说,把三者按照适当的比例排列在一起是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

32

另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学会放飞你的理想并使之与现实结合。美国古典教育的传统认为,教育是一个训练想象力的过程。这是我们的文豪爱默生和惠特曼看待生活和学习任务的方式。沃尔特·惠特曼是我们的首位发展心理学家:或许是该让他从密室中走出来的时候了。他有一个公式,是从爱默生那儿贩来的。公式是这样的:我加非我等于真我。人的发展不仅仅是外力的影响——那样会使人变成一个机器,这正是B·F·斯金纳以及行为主义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发展也不是源于内在的成熟,而是独立于现实。这是充满活力、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惠特曼和许多意志坚定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相信,自我的真正含义就是真我源于自我与自然和其他人的交往。真我是一个有意识的人,一种获得自由和训练的想象力。它是这种发展的辩证的结果。教育,依照美国传统的看待生活的方式,源于想象力与现实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这种思想认为,教育是发现某种特定的浪漫的故事和某种特定的科学,观察二者之间的相互交融结合,成为相同生活的充满想象力节奏的一部分。因而,人们追求的是真实的浪漫故事和实实在在的科学。真实的浪漫故事是某种产生神话的力量,当想象力与现实结合在一起时,这首自我更新的诗便产生了。真实的浪漫故事使得想象力充满活力,近似于科学本身。实在的科学在规范的情况下遇到我与非我而产生,并且如索罗所说,要有勇气面对现实并将其公诸于世。我所谈论的真实浪漫故事是与多愁善感和自我陶醉的浪漫主义相对立的,所谈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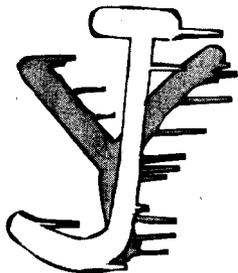


的实在科学则是与那种把所有的存在归为无生命物质的定律的伪科学相对立的。我认为,实际上,真实浪漫故事和实在科学中的教育会使你在现实中感到无拘无束。但如果“在现实中无拘无束”听起来有一种惬意和舒服的感觉,就像“瞌睡”牌草药茶广告画上那只酣睡熊的模样,则并非我的本意,尽管在寒冷的世界里保持温暖是极为重要的。在石器时代或者就是现在用石块垒起一间房子绝对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这样一个人们都试图寻找家园的世界里,最令人感到恐惧的是这个世界本质上的不确定性。当你真正认清这一点,那你可能才开始明白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建立家园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我们所创造的一切没有一样可以永存。睡眠、爱情以及生命本身,所有的一切都会消逝。但是我们所创造的艺术,人类的艺术是可以永存的,某种艺术可能比另一种艺术持续的时间更长久。就像船员必须不停地重建船只驶向不定的大海一样,我们也不停地在这个世界上建设和重建我们的家园。这种船只建造的过程以及家园建设的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

33

我认为,在我所追寻的以传统美国的方式对成长和学习过程作最佳描述的当属马克·吐温(1883)的小说《在密西西比河上》。这本小说讲述的是河道上一个主领航员的故事。吐温是一个在密西西比河岸边长大的年轻人。他把追求真理与寻求活力结合起来,坚持认为,想象力只有面对现实才是最具活力的,而这正是这位积极向上的人面对密西西比河的各种实际状况时所想到的。观察与记忆是面对这种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忆在每个阶段都发挥着作用。通过观察和记忆,人们就会了解河流上的每一个河口、沙洲、浅滩和暗桩。在人们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又必须忘记它们去了解新的情况,因为巨大的河流总是在不断改变着它的河道。人们绝不能停止对河流的认识,人们总是在不断地了解它。尽管关于河流的基本情况是不确定的,但是吐温知道了解比不了解好,某种临时的、一直在变化的知识可能会挽救人们的生命。

这或许是吐温必须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一种关于不确定性的教训。当吐温发现自己的知识在学习中正在逐渐过时,他会陷入绝望。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也像所有的学生一样,他对事物根本上的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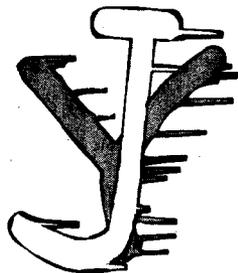
的极致反应就是绝望。或许知道了并不是件好事。如果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是重要的了。如果没有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或者没有一个正确的打印,或者,甚至没有阅读课文的方法,那么,把无知与知识加以区别还有什么意义呢?吐温的观点表明,即使所有的知识都是临时的,并且还没有过时,不断了解变化着的河流的领航员要比无知者安全得多。越安全,就越充满活力,思路也就更清晰。吐温认为,虽然知识是暂时的,但是它可以引导我们在不断变化着的和奔腾向前的现实中不迷失方向。知识是在变化着的,不是固定的,是一种人们可以创造、再创造的事物,在这个再创造的过程中,人的自我再一次获得新生。

人们所需要的不是把所有的航道图都记下来,而是需要更多的基本知识去绘制和重新绘制航道图。人们需要学习如何绘制航道图,因为人们总是需要新的航道图。然而,绘制新的航道图不仅仅是收集资料。河道领航员从事的工作人命关天:他拯救的是生命。吐温认为,了解与自我保护、自我更新密切相关。河道领航员使河两岸那些沉睡的小镇充满生机,他们把自己比喻为当代的奥菲士,他们按响的汽笛声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开始新的生活。在吐温的描述中,知识与自我更新以及我们同内外死亡的抗争有关联。他指出,更新是与存在的对立面结合的产物:即我与非我,自我与自然,自我与社会结合的产物。他不愿意看到科学与艺术(或诗歌)成为竞争对手或成为对立面,也许准确地说,这是因为吐温相信,想象力是在与现实不断的接触过程中丰富、发展起来的。河流与自我的辩证关系即主观和客观的相互作用创造了真我,并使得自我变得更加真实和清醒。

34

显而易见,我们传统中强调的科学和浪漫的结合意味着我们不光是要了解头脑的问题,即了解记忆、勇气、创造力以及潜意识的问题。我们传统中强调的科学和浪漫的结合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就是这种了解需要勇气,要根据自己的知识采取行动并且负起责任。创造力是通过勇敢而坚定地面对处于当今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的现实而发扬光大的。它涉及古老的心理学所称之为的心灵和头脑的结合。

吐温的老师是比克斯比先生。他告诉吐温:“如果密西西比河危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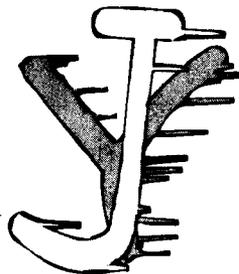


你的生命,我就教你这条河的知识。”毫无疑问,比克斯比先生认为他可以教给吐温或更确切地说可以告诉他河流方面的知识。我们现在学校里的幸运学生都可以找到一个教师或学生做他们的比克斯比先生。甚至平庸的领航员如普通的教师也可以成为你的老师。

吐温站在中年人的有利角度去描写他的青年时代,发现处于蒸汽船年代的美国代表着一个保持文化平衡的时代。这是一个反差巨大的对立面之间的平衡,但同时也是村落、人类与蒸汽技术之间适当的比例的关系。小说《在密西西比河上》精彩的前半部是以蒸汽锅炉爆炸夺去吐温兄弟生命,并使吐温在23岁时头发变白而结束的。显然,吐温以社会和集体的方式思考着一个仍然是自由和开放时代的发展之路。他指出了社会对于人能够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现实中是何等重要这一事实。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建造自己的家园,使用的大部分机器设备就如同我们的知识一样都是集体创造的。吐温说,领航员们建立了自己的协会,即我们今天所称之为的工会组织,这就意味着是大家聚在一起共享有关河流的知识。他们建立起一个信息箱系统,箱内装着有关变化着的河流状况的信息,这样,船只之间可以相互告知各自的有关变化着的河流信息。知识从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或确定的,而是在不断地变化着,是人们集体的创造和再创造,是一个共同的发明创造。

吐温后来开始对美国社会以及未来感到悲观失望。回忆自己穿着领航员制服的骄傲样子,他感到非常惬意:作为自由人中的一个,大家如兄弟般平等相待,无拘无束。他赞颂心灵与现实的融合,赞颂技艺的重要性,即索尔斯坦·凡勃伦(1914)所说的“工艺的直觉”。领航员的工作,是吐温对创造的精神所打的比喻,是与他所称之的“富有时代”格格不入的。在一个虚假的现实中,领航员的工作代表着真正的价值。在书的结尾有一场大型蒸汽船的比赛,船员们清除了所有的装饰物,甚至把值钱的货物也处理掉了,为的是做一些清洁的和一流的事情,让船上有一些变化,产生某种美感。在生活以及教育中,有关技艺、创造力和自由的理想结合展现在吐温下面这段描述中:“金箔般的,温柔的,钻石胸针般的领航工作。”这种结合也在吐温最喜欢用的“明快的”一词中表现出来。除此之外,社会中领航员所代表的明快的精神,常常由于庸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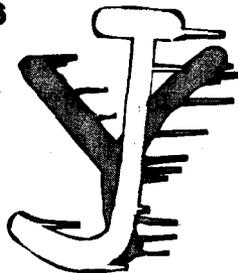


俗的现实主义以及毫无价值的实用主义而丧失殆尽。在赞扬领航员的技艺观和审美观时,吐温也谈到了自己作为作家的发展历程,叙述了自己成为“领航员”的经历:通过这样的叙述,说明了他自己是如何掌握第二门艺术——写作的经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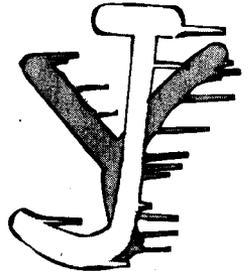
吐温的自我描述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把领航员放在某种处于平和的状态下,即艺术之神奥菲士与技术之神普罗米修斯达到某种平衡时来进行考察的:蒸汽船以其自身的规模与成为领航工作的人类艺术代表着这一完美的和谐。

我们重视吐温对自己教育过程的描述是因为它透射出了深奥的个性,并且显示出一个自由的人学着在河上自由自在的生活的方式。那时,在美国,边疆的白人男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的人。吐温曾写到过某种我们永远不想失去的美国人发展的潜能。然而,正如吐温在书的后半部中指出的,事过境迁,过去的都已过去。如何在不同时代保持真正的个性是我们今天的挑战之一。也正像吐温所在的领航员协会所表明的那样,真正的个性问题实际上是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最终,吐温意识到,促进和培养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就要彻底消除那种受到里根总统和其政治盟友支持的过时的、消极的个人主义的时尚。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人一样,吐温最终陷入了对往事的怀旧和感伤之中,更加猛烈地抨击和鞭挞他的那个年代。他也惧怕未来,他的小说《亚瑟王宫里的美国人》(1889)讲述了现代技术的想象力是如何斩断它与自然以及人类同情之间的纽带,并且,发动一场噩梦般的战争,用现代化的武器摧毁这样的纽带来挽救一个“落后”民族心灵的。

我们的时代将是一个比吐温所处的 19 世纪的美国更为强调集体化和协同性的时代。某种集体主义的形式在这个核时代、在我们这个日益遭受经济紧缩和饥饿的星球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时代是一种民主的、为我们传统所重视的个性留有空间的集体主义时代,或者,还是另外一种极权式的集体主义时代?可以肯定,我们的时代需要某种社会形式,一种能够对吐温和惠特曼所赞许的个人旺盛的生命力寄予尊重的社会。当吐温向我们展示出他们从与老领航员比克斯比先生的关系中诞生的更加有意识的和创造力的自我时,当他指出熟练领航员至



高无上的个性是通过广泛地共同培养才能产生时,吐温已经把握住了非常重要的内容。真正的个性不是万宝路广告中的那种自私的只顾自身利益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性源于人类共同的契约和纽带。我们所倡导的自我观在鼎盛时期是一个社会中生命集合体的产物。如果我是对的,那么,现在,在 1982 年的密西西比河上学会自由自在地航行,就能够学会在像康芒韦尔思学校那样的社会中使自己无拘无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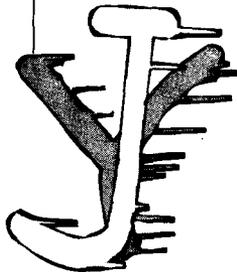
五个重要的思想

2002年

37

“进步”教育思想的时尚来去匆匆,但是认真关注孩子们的童年、他们的个性、焦虑、需求以及心灵的观点,我认为,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世界范围内的民主革命首先是以家庭实践和父母对孩子的抚育,以及课堂和教学的内容来接触并了解儿童生活的。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一书中的皮埃尔虽然能够把从卢梭那里学到的所有时髦的、激进的思想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但是,当他看到妻子娜达莎有条不紊地开始养育孩子的时候,还是感到很震惊。在过去的200多年时间里,世界上许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很多家庭已开始进行更为平等的家庭实践活动,这标志着家庭向倾听儿童呼声的重要转变。孩子们以及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声音在更多的成人心里显得越来越重要。我没有否认在许多地方不少儿童过得很悲惨,甚至境遇更加恶化:童工、娃娃兵、饥饿待毙的儿童、被遗弃和虐待的儿童——这样的报告很多,令人沮丧。然而,正如阿马泰亚·森(Sen A., 2001)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在世界范围内,也越来越多地报道着在许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是和妇女们一道(他们的命运总是联系在一起)逐渐被作为拥有权利的人而得到社会的新的认识的。如果世界上有更多的学校能自由地仿效世界各地其他家庭的做法,那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有五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使得民主教育和家庭教育实践充满了活力,因为,这一教育实践已跨越了过去的200年。思想一,儿童(像成年人一样)是社会人。儿童可以,并且确实能够自己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有很多东西,儿童都是从同一个教育社区中的成年人和其他儿童之间



的相互信任的关系中学到的。这是儿童发展的一个方面,往往被今天的美国教育政策给忽视了,尽管这方面是大多数家庭和许多学校教师日常实践的基础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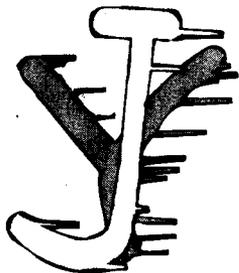
思想二,儿童是惊人的“自然”学习者。童年是最重要的知识建构阶段,主要是探索价值意义和积累信息。例如,学龄前,所有社会阶层的儿童(每天)都会学到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词汇,其速度远远快于在学校学习的速度。明智的家长和教师明白,儿童一开始上学,就带来了许多知识、复杂的想法和如何学习的方法。这就是那些能为主动学习和参与提供众多机会的教学方法受到青睐,而死记硬背和蒙田几个世纪前所得到的“在儿童耳中轰鸣”的教学风格遭到冷遇的原因。当然,还有很多儿童不知道的东西,包括整个世界——各种文明、字母、事实、读音法和数字等,这些就是教学和丰富的课程应该承担的领域。但是,所有健康的教学是建立在儿童入校时所拥有的强大知识建构能力的基础上的,并且,应用他们个人的知识、优势和热情作为儿童接受更为严格的学校课程学习的桥梁。

38

思想三,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性不仅是一种不可否认的现实,而且,还是一套重要的、说明如何最佳抚养和教育儿童的线索,就像聪明的家长明白,姐姐和弟弟是不一样的,必要时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去发展儿童的特殊兴趣和热情,开发更为共同的课程目标。倾听每个孩子的呼声是教学以及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

思想四,关于成年人在儿童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判断力以及权威问题。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教师和父母都在不停地调整各种平衡,即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儿童和课程之间的平衡、工作和玩耍之间的平衡、需要和责任之间的平衡。这些都是些具体而现实的问题,需要教师和家长作出经常性的、具体的和适应性的判断。总会有新的和持续不断的平衡得以维持,你可以朝任何一个方向走得很远(杜威反复而徒劳地告诫我们,要在儿童和课程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思想五,源于上述四种思想,是某种对19世纪传统学校的深刻的反思。这类学校基于旧的工厂体制模式形成,学校从来也没有给学生提供充分的在家庭和社区中使用过的“自然”的和“非正式”的教学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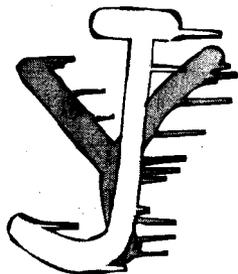
上述这五种思想是针对我们今天的学校机制所提出的不同的、民主性的反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思想发挥影响作用的话,我相信我们就会在教育改革中取得更大的进步。尤其是,这些思想能够帮助我们应对时代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家庭的多样化,特别是移民的多样化;人们对一流的儿童看护设施环境的需求;使每个儿童都能获得完整的知识和健全的理智教育的愿望。

前两种思想是我们所有人必须面对的,然而令人尴尬的是这些思想不再是我们今天教育政策的重点。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是城市和郊区学校面临前所未有的移民和家庭多样化的时代。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政策主题是,努力使对教师和学校课堂的官僚管理标准化并更加严格。假如今天,我们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能够

39

采纳 19 世纪 30 年代本杰明·富兰克林中学的校长、意大利移民伦纳德·科维洛的观点,我们就会为当今的各类家庭提供好得多的服务(佩龙尼,1998)。科维洛认识到了学校应作为一个民主社会来运行的必要性,他欢迎家庭的参与,并且,尽量利用这种家庭的多样化,他想方设法地去接触家庭,针对每个儿童设计个性化的教学,帮助学校建立成人、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网络。对科维洛而言,教学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当前,另外一个重大的家庭或学校的问题是关于儿童抚育工作,以及儿童在家庭以外的如学校、日间托儿所、课外训练计划及类似的正规机构的活动情况。这一问题涉及各个社会阶层的家庭的发展,在我看来似乎应是另外一个原因,即把所有教育看成是一个更加个性化的和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将它作为对年轻人进行社会的和学术的训练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我们应该把学校建成一个儿童得以全面发展的、对其学术和智力提高有帮助的生活环境,而不是推崇那些越来越没有人情味的、被考试驱使着的和相当官僚的学校;应该把对话和戏剧表演作为和谐的和人性化的学校日常生活内容的一部分,所有家庭都能从中受益。然而现实情况正相反,今天的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学校的管理者实际上正强迫幼儿园成为更为僵化的和管得过死的地方。童年就像我们的森林和沼泽地一样岌岌可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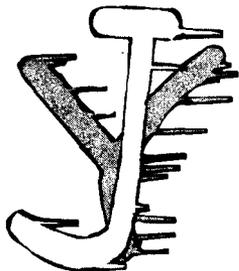
最后的挑战是,社会逐渐意识到我们需要教育所有的儿童,让他们拥有完整的知识和健全的理智。今天的美国人对良好教育的内容莫衷一是,正如多少年以来他们就希望为此达成某种一致一样。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一致认为,对工作、公民资格、甚至(或许)诸如抚育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要求已经变得越来越抽象和复杂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和教育文凭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例如,现在,人们的良好愿望是,大多数在校学生将来某个时候能接受某种高等教育。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好显得越来越重要。如果你属于劳动阶级或有色人种或家境贫寒,那么,在校成绩差则尤其是灾难性的。我们都有责任帮助学校成为使大多数儿童(不仅仅是少数)比过去知道和了解得更多的地方。

今天更多的学校不是去想办法为学生提供很多与学习相关的机会,让他们掌握完整的知识和健全的理智,而是迫于压力进一步把学习标准化,实际上是简单化,推崇旧的工厂式的千篇一律的课程。这种情况在那些接受工人阶级的子女、贫穷的儿童和有色人种的孩子的学校更显得如此,这使人感到非常不安。过去20年美国社会的极端不平等严重地反映在当前学校的做法中:我们一方面极力将提供给穷人和工人阶级子弟的教育标准化和简单化,而另一方面对富人的孩子,则是使他们的学习更加个性化,提出更高的智力要求。在我们建造的《勇敢的新世界》里,一些儿童获得的是简单的廉价课程(K-Mart),^①而有些则开始在昂贵的私立学校里用钱去买健全而丰富的理性教育。

40

关于这一点,我要说,我刚刚总结出的有关家庭和教育实践的重要思想还是有很多内涵的。复合学习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不是简单地给出对与错的答案,实际上,它要求学生生活在一段处于模棱两可、迷惑不清和不确定状态的时间里。至少学校所有科目中一部分课程应该有意识地开发和拓展人在无知状态下工作的重要的能力,它是一切真正开始认真思考的标志。征服无知最好的方法是和其他学生一道,通

^① K-mart 是指美国销售廉价商品的连锁店,服务对象是购买廉价商品的顾客。——译者注



过大量的对话及脚手架式的教学^①,并在有思想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的指导下来完成学习。然而,无知必须要征服,否则你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自信、自由、正直和完整的人。如果没有能力去理清真相的含义、论点以及诠释,甚至某种为什么任何结论总是暂时的,有待进一步的证明的认识,你就难以欣赏一首优美的诗,或者进一步理解南北战争产生的原因,或者难以明了地球变暖的原因和政治动态。当学生能够深入而长久地探究他们自己选择的课题和科目时,学校所有科目中至少有一部分课程应该得到学生某种程度的积极响应和思想上的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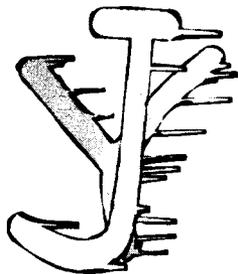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重要的是今天家庭里和学校里的成年人能够重视儿童以及他们的思想和想象力,而不是夸大儿童的天赋,极热情地谈论他们步履蹒跚的进步。我们应在更大范围内为他们在家庭、课堂和其他环境中表达思想和心声留出文化的空间,让他们成为一个见习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创造者、问题的解决者和公民。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以新的目光欣赏儿童的智力和想象力是否能反映在我们学校的每天的日常生活之中。我必须说我们还是

有担忧的理由的。

我无法想象在一些学校和学区里正在采取取消课间休息、削减购买实践类教科书和开展艺术与音乐活动的预算、试图控制和记录教师业绩改革等做法,而上述种种做法正是 20 世纪英国作家奥威尔笔下公立学校中孩子们的黑暗未来的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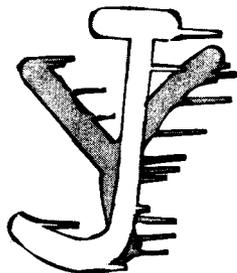
对儿童思想、创新和创造力的发现是过去 200 年人类伟大的知识成就。世界各地的父母和教师基于这一发现开展着实践活动,使学习变得更加愉快和实在,使孩子们的童年成为一段从事艺术、理性和尝试更丰富和美好生活的见习期。忽视这一绝妙的历史性的发现,即我们的儿童会思考和联想,并且这一脑力工作可能是儿童自身健康发展的

41



^① 脚手架式的教学(scaffolding)是指在学生开始理解复杂的教材和内容之前先给他们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在他们大脑里形成一个理解较为复杂的事物的平台,犹如建筑施工中的脚手架。——译者注

最重要的动力,是对儿童精神的犯罪和儿童智力的极大浪费。我相信,创造性地且良好地使用自己的大脑所带来的愉快和乐趣是世界各地儿童内在的自然权利之一。美如同食物、水和爱一样是儿童生活所必需的。儿童的玩耍不仅是一种娱乐,而且是所有人类文化的一种早期的娱乐,一种化装表演,包括我们称之为的“高级”文化。如果以“标准”的名义使我们的学校从一个儿童可以探索、开玩笑、追求热情、歌唱他们的生活以及提出绝妙思想的地方偏离,那将是莫大的讽刺,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因为这种抱负对于儿童和他们的生活而言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部分

学校与社会

43

费瑟斯通关于课堂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他的关于政治和社会的思想中。20世纪60年代他便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他的政治传统是比较保守的,属于那种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但是他钟爱于民主并且认真看待美国关于民主的承诺。他“坚决支持医治美国民主的弊病是更民主的说法”,这一点在本部分的文章中已经充分得到了表明。这种民主既是经济上的民主,也是公民的民主,一种因素缺了另一种因素是不可能存在的。费瑟斯通的民主既是诗人眼中的民主,也是政治思想家眼中的民主,既有约翰·济慈心目中的民主,也有杜威向往的民主,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伟人”的地方的民主。

尽管费瑟斯通的文章内容大多数都是有关学校教育的,但是,他认识到,他的有关学校教育的观点不是仅仅通过学校改革就能得以实现的。的确,没有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学校改革甚至连改革学校都不可能,这正如费瑟斯通在他1969年写的文章《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一文所指出的那样。本部分中一些文章反映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社区管理所展开的政治斗争。作为《新共和》的撰稿人,费瑟斯通报道了发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奥圣山—布朗斯维尔区震动全国的一场战斗(有关这场争论的深度报道我们节录在《奥圣山生机勃勃,还有,好啦……》这篇文章中)。几年后,他在有关法院裁决在波士顿废除学校隔离的后果的文章中探讨了类似的问题。在波士顿,出于种族偏见和希望他们的孩子就近上学,白人居住区强烈抵制用公共汽车把儿童从白人区送往黑人区就读或相反,将孩子们从黑人区送往白人区就读。在这些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简要报道中,费瑟斯通努力消除种族、阶级和不平等对学校产生的影响。他也思考了改善学校与服务的社区之间关系的迫切性,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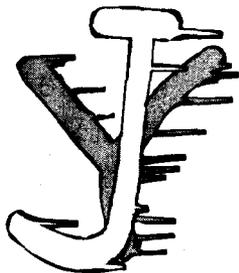


“学校不能继续成为充满疑虑和敌视的居民区里的殖民地兵营”。

这些政治忧患的结果是与课堂分不开的。费瑟斯通坚持认为，美国教育处于两难的境地，最紧迫的不是课堂缺乏宽松友好的气氛，而是我们是否能够建立更为平等和多民族的社会。30多年后，当我们面对有关考试、特许学校、教育券^①以及公立学校私有化的政治辩论时，费瑟斯通的观察依然显得真实可靠，并且，他最新发表的文章继续探讨了为“所有人的孩子”开办更好的学校的理想。

对于费瑟斯通而言，教育应该是为儿童成为民主社会的公民而做的准备。他最近撰文写道，在不牺牲某些规定标准的前提下，教育应该是孩子们的某种“自由的见习期”。尽管费瑟斯通非常痛苦地意识到学校在这一领域里的失败，但他仍然非常关注为什么还是有一些学校能成功地为穷人的孩子提供教育服务。1995年，在他撰写的有关德博拉·迈耶东中央公园中学的文章（《民主的前景》）中看到，那里的教师和儿童拥有“我们很多人所缺乏的一种尊重的机制”。

^① 教育券是指美国联邦政府及州政府给穷人家庭直接的教育资助，让他们能接受教育。这种做法取代了以往给公立学校的资助，因为，这些学校的运作方式是以市场导向的私立学校为模式的，其结果是争夺生源而忽视了贫穷家庭的教育权利。——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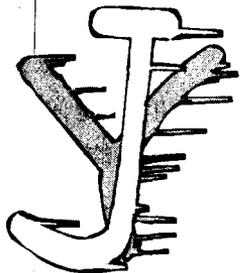
奥圣山生机勃勃,还有, 好啦……

1969年3月29日

在冬春两季的不同时间,我造访了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奥圣山一布朗斯维尔示范区的学校。经过一年的动荡,我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对这样一次活动的意义作出判断。下面仅仅是对这些学校的一些看法和对它们今后何去何从的一些思考。 45

创办一所好学校所遇到的问题之一是,易于总结出的以及能够描述有关儿童是如何学习的可靠资料太少,这里所说的儿童不仅仅是指家庭贫穷的儿童,处于贫苦境地和社会底层的儿童,还是指所有的儿童。例如,有关儿童实际上是如何学习阅读的我们了解得就非常少。有一些很好的证据表明,读音法基础好对很多儿童都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在一些读音法受到重视的课堂上,敏感的教师不久发现很多儿童还需要其他的东西,不少人痴迷于那些对他们的阅读有帮助的知识。一个理想的“课程”是那些能够提供许多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的课程,而这实际上就是第144所公立学校的教师试图开设的课程,尽管这里的学生像大多数奥圣山一布朗斯维尔示范区学校的学生一样仍然在使用BRL-Sullivan的程序化教科书(其主要也是惟一的优点是儿童可以自学完成,使教师有时间进行个别教学)。

我们所了解到的有关好学校的一些情况都是司空见惯的老生常谈,例如一般来说这些学校都有一个好校长。当然,成功的校长也绝非相同,他们在执行纪律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没有一个模式适合培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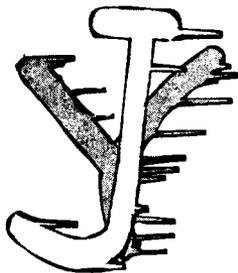
校长所需的一切能力,但是,很明显,纽约市的官衔名单以及特别审查对寻找优秀的校长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校长的任命至今仍是分权斗争中的关键的问题,而且,事实确实是这样。奥圣山指导委员会经过一系列的法庭斗争终于被允许任命那些资格符合国家资质标准或相同标准的人为“示范校长”。在我看来,委员会的任命是一流的,即使是许多反对者也会承认这一点。

那些在教育贫民区儿童方面取得成功的学校和教师正以不同的方式做着不同的事情——他们所提供的“教学模式”或“课程”不是那种可以在常规情况下任何人模仿得了的。这说明,“这些教学模式”不一定就是我们应该寻找的模式。最近,大量的研究表明,教师对儿童的态度很重要(而管理层对教师的态度也很重要)。这一点丝毫不会令人感到惊奇。

那么奥圣山一布朗斯维尔示范区学校的教师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很多教师没有受过培训,当然他们都是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个秋季学期才来,主要是出于社会责任感或毕业论文的需要,还有的就是想在教学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很难对各个班级的情况给出一个总体的印象,因为学校太大,有 1000 多名学生,而且即使在常规学校中各种教学都是在同时进行的。

奥圣山一布朗斯维尔示范区的学校乱哄哄的班级非常少——在一些学校,这样的乱班一个都没有——但这样的班级也确实存在着。在一个班上,孩子们在打架,教师实际上是喊着让我离开的。而在隔壁班上,同样一个没有经验的男教师却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班上平静得鸦雀无声。走过几个教室,看到一个班上的孩子们组成一个奇特松散的可以走动的阅读小组,一位可爱的黑人女士和他们在一起,在教室里走动,准备接待来访者。这看上去是临时组织的,但是阅读似乎一直在进行着,而且孩子们都学得很开心。一名助手认真地在帮助一个遇到问题的小女孩,做了很长时间。而在另一个学校,有两个年轻人,是研究生,就是你很想在教学中见到的、聪明上进、喜欢在上课前和孩子们开玩笑的那种教师。他们居高临下地管着这些四年级的小学生。上课铃一响,整个情形全变了。一名教师正襟站在教室前面,生气地喊着向越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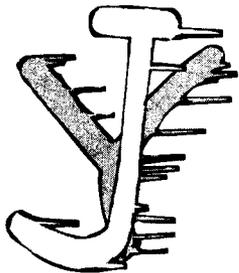


来越不安分的学生们提一些单调的拼读表上的简单问题,而另一个教师则在教室里巡视,制止学生中不断发出的讲话声和争吵声。课一结束,每个人都轻松起来,又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简直是不可思议:两个高大的男人和16个四年级的学生,而这就是他们教学的方式。但是,我深信,他们会成为很好的教师的。

另一个学校有五个幼儿园班,班上有很多的书和拼读游戏,不少孩子在看书。这些教室的情形鲜明地提醒着你,大多数的教室显得多么空荡呵!尽管我看到一间可爱的教室里挂满了孩子们的画,而一位年轻的黑人教师在自己的教室里摆了一件漂亮的非洲工艺品,然而,大多数教师需要更多的教学材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很难说得清好的教学是怎样的:大多数优秀教师喜欢孩子,关心他们的学习,提出要求,制定标准以及善于针对个别爱动脑筋的学生。他们比其他人更主动地去利用机会,如某人说的话,一个新的爱好,以及在多数孩子忙碌的时刻去教些什么等等。目前,在奥圣山的优秀教师并不多,但是,不少人似乎学得很快,甚至当他们遇到纪律问题时也是如此。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这些教师过于依赖拼读法朗读课文和程序化的教材。这些方法单调乏味,远远不能满足教授阅读的需要。然而,孩子们喜欢这些方法。这听起来似乎不合情理:孩子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速度完成所有的工作,且自己学习,大多数人都能顺利填写他们喜欢的练习。收获在于你要成为教材的专家而没必要去读什么有价值的书籍。那里的许多教师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已开始教室里放满读物和有价值的书籍,校方也采取一些措施鼓励教师写一些可以听写的故事等等。对我而言,这类材料对新入门的教师们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材料在某种程度上使新教师们摆脱了正规教学带来的负担,使他们更容易与个别学生和学生小组打交道。这些教材是迈向更为自由的课堂的第一步。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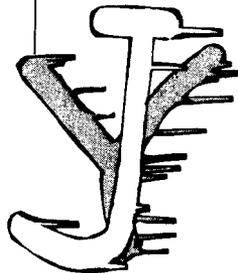
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

1969年8月30日

48

尽管纽约市出现了骚乱,不少城市开始小心翼翼地进行某种形式的权力下放至地方管理。忧心忡忡的执政者们还在尽力解读纽约灾难带来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教训:很明显,任何权力下放的计划必须包括来自城市所有重要政治力量的代表。计划应该只有一个,而不是多个计划。对教师权利的保障必须明确。如果权力下放之前有任何的实验性的试点,如纽约的示范区,就有必要尽可能准的代表各方面的权力和权威部门。这样的实验必须有政治基础,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成为避雷针,引来麻烦,给那些反对改革的人轻易提供破坏的口舌,并将基本的问题暴露于危险之下。在纽约市示范区的经历所产生的反响犹如丧钟一般,使我们得出了一条实实在在的教训:任何实验区都应该包括一些白人居住的地区,或许还要包括贫穷的和中下层的白人。必须让白人父母们相信,他们也可以通过非职业性的参与学校改革得到利益。在纽约市没有做到这一点是一个严重的失误,例如没有把西岸上游种族混合居住区——贞德区作为一个示范区。

但是,当该说的都说尽了,却依旧没有一套避免陷入推进社区管理的运动所带来的内在困境的策略时,我们就必须权衡上述这些因素并考虑其他策略上的问题,而像鲤鱼一样蛰伏在学校争辩表面下的是一些模糊的问题,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从部分中产阶级的新共产主义思想中引发出了某些需用脑子解决的问题以及对城市官僚机构的专业化提出的新挑战。由少数变革引出了政治的问题。学校危机所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所有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每个问题本身就很复杂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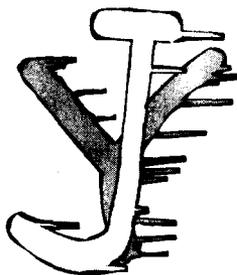


棘手,结果支持者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同时关注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对我而言,在这种情形下,只有理论家和卫道士才能带着个人的想法去看待所发生的这一切。两个至今还没有准确定义的问题构成了权力下放过程中,讨论理智背景内容的一部分。首先,对需要更多地方管理诉求的广泛同情仍然只是一种情绪。其次,对各行各业职业垄断的批判尚未反映在几次声音微弱的反叛之中。但是,这两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最终,拥护社区管理和职业改革的人员可能不仅仅包括受压迫的城市少数民族。

虽然种族问题和为穷人办事机构的瓦解引发了要求进行社区管理的运动,但运动也借力于民众非常普遍的感受。人们对城市运作方式的不满一直困扰着我们的社会长达20年之久。正如内森·格莱泽(1969)所说,社区管理的方案先于黑人革命,而这一方案是由中产阶级的理论家如保罗·珀西瓦尔·古德曼和简·雅各布^{注1}等人起草的。该方案也不是几个崇尚无政府主义的白人知识分子所特别感兴趣的事情。在从城市迁往郊区的过程中,许多人除了其他事情外,还选择牺牲城市生活的某些便利以换得一种优化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他们可以对政府施加某种影响并且可以接触权威部门,或至少可以针对某些问题,诸如他们的孩子可以成长的教育环境等作出选择。很明显,还有不少其他的原因促使中产阶级外迁,而想躲开新的黑人移民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所有区域中,郊区代表着美国生活依照大规模的民族单位组合的程度:他们如连锁店般的、相似的建筑风格提醒着我们,在区域、甚至国际经济中我们所拥有的地方管理的程度总是有限的。但是,即使承认所有这些事实,我仍然认为内森·格莱泽是对的:郊区发展的一个方面就是中产阶级越来越不满于城市公用事业设施,不信任庞大的城市官僚机构以及厌恶被别人所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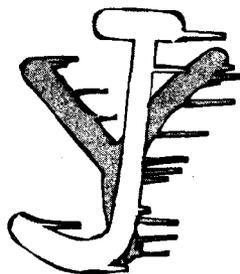
这种对当代无权无势状况的明显不满还可以反映在所有先进技术社会的一部分人中。不满使保守者和激进者团结起来,就像我曾与之对话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的一名女成员和一些约翰·伯奇分子^①,他

^① 约翰·伯奇协会是美国一极右政治组织,成立于1958年。——译者注



们曾联合起来反对南波士顿的市区重建项目。这一不满更是由于多数民主国家对他们国内种族和文化多样性的接纳所经常表现出的无能而火上浇油,这种无能在诸如英国、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国家引发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分离(和常常发生的反叛)运动浪潮。在美国,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黑人民族主义的崛起上,但是一种带有不满的、鼓吹共产主义社会的类似的情绪蔓延在白人中产阶级中,成为反对市区改造、高速公路建设以及反弹道导弹基地建设的思想根源;它也是校园骚乱的部分原因。尤金·麦卡锡、乔治·华莱士以及罗伯特·肯尼迪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弹拨这类不满情绪,使之成为理查德·古德温(1969)所称之为的公众抱怨的根源。目前,它还只是一种情绪;其本身尚没有能够形成任何一种组织形式。那些拥有这类情绪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没有达到目的,其主要原因是他们一直不愿意应对这样的问题,即地方管理人员必须了解这样的事实:这是一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国家,多数人组织成为各种阶层、官僚机构和工会的成员。人们所要求的是一种保罗和珀西瓦尔·古德曼在《共同相处的社会》一文中提出的智力进取心,一种试图弄清楚我们现代城市生活真正选择的尝试。然而,我们现在得到的仅仅是重申了备受困惑的中产阶级对承诺、参与和个人表现的政治的暗淡追求。而且,这些对城市秩序的不满以及要求更多的参与和呼吁地方管理等情况蔓延范围亦很广:尽管中产阶级的智力因素与少数派变革的智力因素不同,但是,这些因素是城市管理机构受到攻击并渐渐失去其合法性的原因。

这种情绪体现在目前对官僚机构和职业机构进行攻击的运动中。在一个极易引起争端的新环境下,支持社区管理学校的人们重新提出了对美国传统教育产生震动的问题——是让百姓管理学校,还是让专业人士来管理学校。这可能发出一个信号,即人们的思维正慢慢开始一次重要的改变,不仅黑人是这样,白人中产阶级也是这样。过去,激进分子和改革者们习惯地认为,品德必须是专业人士的事,因为他们的标准通常比他们客户的标准更进步、更普遍。说起来,我们都知道,南方的地方管理带有狭隘的和固执的风气。这是一个传统,今天仍然是这样。然而,近几年,它的力量已被削弱,因为,很显然,大量从事医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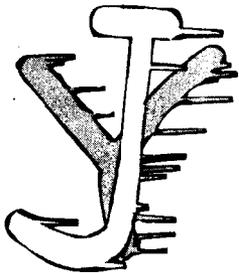


和其他领域,包括教育的专业人士正努力地在合理的公众审视和公共责任的角度下保护自己的既有利益。在许多情况下,专业人士在过时的以及对自我有利的文凭和证书制度的后面躲风避雨。由学校引起的抗议浪潮使这些问题的普遍意义更加模糊。例如,在奥尔巴尼市召开的有关学校权力下放的立法会议期间,医院所引发的争议不在少数,尤其是哈莱姆医院,就提出过相同的问题。医院和学校都辜负了穷人,而缺乏资金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两种情况中,专业人士在维护自己的管理权威以及将公众拒之门外方面都有自然的切身利益的因素,尽管有迹象表明,一些愤怒的医生可能最终会冲破传统加入到社区管理的运动中去。

显而易见,对过去几年发展起来的社会结构进行改革是远远滞后了,尽管,现在对此展开一场理性的辩论的时机可能并不恰当。目前,富裕家庭的许多孩子现在讲起话来似乎是拒绝一切职业标准。一些教师、医生、律师以及其他行业的人们都在非常认真地对新的职业化加以界定,即为客户提供服务,而不是为职业提供服务。迄今,他们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51

难以忍受的学校和近乎崩溃的卫生机构使人们更加关注城市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而不是中产阶级对参与的渴求。但是,当关注到更具体的方面时,人们发现,许多抗争的呼声都是一样的,给专业人士构成的挑战也不相同。而种族问题当然是一个较大的例外。一种新的黑人社区意识在萌动,我们正在见证某个野心勃勃的想法,试图把黑人社区组织成一股政治力量,围绕像学校社区管理的问题进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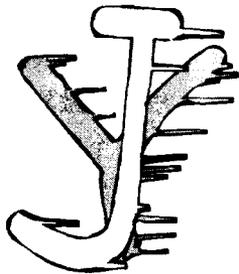
要了解所有这些纷乱的情况并非易事。撇开中产阶级不谈,黑人革命的许许多多的言论都难以掩盖其深深的绝望。政治常常成了富有煽动性的举止而非方案。对于所有正在进行的组织活动而言,城市里的黑人作为政治力量仍然是非常弱小的。老问题没变(唱针卡在了老纹路里):人们不去投票,社区的领袖被分裂且很贪婪,没有几个组织能够跨越激烈的宗派主义。作为政治的现实,应该牢记,黑人的权利仍然是一个口号。在黑人居住区的真正权利与以往一样,只是偶尔对白人进入黑人居住区的某种否决权。只有牢记这一点才是明智的。



然而,还是有某种变化的迹象,特别是在各个社区制定的向贫穷开战的行动计划之后。在许多方面,这些行动计划都是失败的,所引发的只是在穷人当中为没有肉的骨头所进行的长期的毫无意义的争吵。在大规模失业以及缺少收入的情况下,为参与而进行激烈的抗争似乎就显得得不偿失了。但是,那些参与扶贫计划的老战士们得到了组织能力的训练,他们在整个毫无意义的扶贫过程中坚持认为,除了缺乏资金外,那些为黑人服务的机构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正如那些竭力攻击计划的人所指控的那样,社区行动计划并没有带来必要的革新,这些计划没有像情绪化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改变穷人对自己无权无势状况的看法。或许,该计划只是在黑人居住区树立了一个重要的范例:即使有能成功帮助穷人的计划,如果没有穷人代表的积极参与也是无法管理好的。学校也不例外。

在对社区行动计划充满好奇和矛盾的评价过程中,丹尼尔·莫伊尼汉(1969)指出,主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少数民族为在城市政治的斗争中获得更多的权利创立了新的黑人领导权。由于被歧视以及被剥夺了就业机会,住在市中心的没有技术的黑人工人比早期移民更加依赖于公共机构。同时,公务员改革以及城市机构的专业化和提升,使得过去那些传统的少数民族政治核心组织失去了可以通过资助获得多种工作的机会。正如莫伊尼汉所指出的那样,从某种意义上讲,扶贫计划一直是坦慕尼协会式的计划——一种政治见习期的计划。很多推动纽约社区管理学校的力量来自那些通过各种向贫穷宣战的社区行动计划给官僚机构制造麻烦的人的支持,他们专门从事举行会议、写提案和操作油印机等活动。没有理由为这类政治发展的进程涂脂抹粉或夸大这一进程。哈莱姆拥有所有最古老政治的一切弊病:欺骗与腐败。事实上还不能充满信心地说,新的黑人领袖们会在老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学校的安危已经转移到这些新的黑人领袖和另一个新的组织,黑人专业人士的手中,这些人雄心勃勃,迫切希望改革学校教育。

在这个联盟中,存在着不同的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对某些人而言,学校教育问题是次要的,他们关注的仅仅是组织一个社区;而对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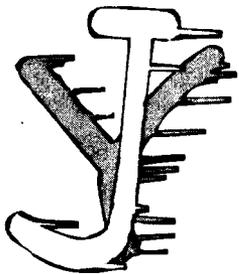


一些人而言,对那些大多数的专业人士,即如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对那些最有思想、最积极的家长而言,改革学校才是主要的任务。

如果这些黑人社区的新生力量取得成功,他们最终将会在社会中拥有一个立足之地,一个越来越趋向于英才管理,并且积极致力于以更客观的标准来提高人们的专业能力,以便获得更好的工作的社会。或许,他们将与社会总的改革连在一起,旨在放宽僵硬的职业结构标准,使申请工作者的条件基于个人的能力表现,而不仅仅是文凭。目前,这一点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早先与官僚机构打交道的组织的经验使人联想到某种观察问题的视角:一旦你完全投入工作,就会有某种难以逃避黑人专业人士注意力的考虑,而当黑人专业人士开始界定社区管理机构的作用时,就有了保护的屏障。因为,他们已开始对他们在社区控制的机构里的角色加以界定。把黑人社区组织起来的运动带来了只有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但是眼下看来这一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黑人组织者的言论掩盖了一个基本的目标,即许多人认为,与一个迄今把黑人排斥在外的社会联合起来的方法就是建立某个组织。然而,无论这一想法是否保守,这种策略揭露出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尽管美国生活有各种各样的粉饰,但是,它是在种族和族群之间相互竞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族群认同与否仍然反映在投票的格局和生活方式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实,而不单单是从过去传下来的。必须指出的是,早期的组织还没有想到要打破旧的机构,而这是黑人想做的事情。他们想做的更为普遍的事情是在社会的边缘创立自己的组织,诸如政治核心组织、犯罪黑帮以及天主教堂等这类主要组织。

53

在我们可以触及的范围内再没有其他的权力层次:黑人没有资金,并且在大多数城市里他们不占多数。他们有两个处于劣势的人所拥有的永恒的武器:对普遍价值的追求——平等和公正。美国人说,这种追求永远存在,并且,会带来动乱的危险。第一种武器——平等已产生了一些成效,但是,不太可能将这些成效一直保持下去;而第二种武器——公正的功能正处在消亡的危险边缘。因此,处于劣势的人们必须组织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以种族为线而组织起来的努力将会使他们与白人同盟军割裂开。许多人承认有风险存在:如果没有全国范



围的大规模的就业、没有收入和住房计划,社区管理终究将是脱离实际的东西。在纽约一个示范区的管理者想到了这一点并且承认:“我们之所以拿学校开刀,那是因为其他方面都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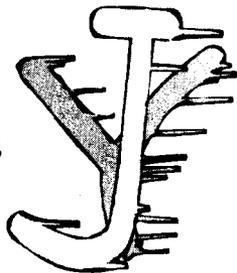
这些问题的讨论迟早又要回到全国政治联盟的道路上,而对于这样的联盟好像眼下还没有可行的计划。权力下放的危机部分是对这场政治失败的反映。其合法性也只能通过权力的再分配而得以恢复。纽约市及其他地区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任何权力的再分配必须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民族之间以及种族的底线。

黑人居住区争取社区管理权的背后隐含着关于 1969 年的美国一个严峻的现实:各种组织追求自身利益而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

对学校社区管理权的追求带来的是严重的纠纷,许多针对这场纠纷的批评在理论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仅仅通过在某个无序的社区里举行选举能取得多少成就总是会有一个明显的限度。社区管理并不意味着会为公共教育带来更多的资金,而一个实实在在的危险是,它发出的信息却是白人进一步撤消了对黑人组织的支持。社区管理增加了偏激的白人和黑人激进分子之间冲突的风险。就像在纽约那样,它能挑起白人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强烈抵制情绪。而且,我们必须始终要牢记的是,社区管理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在教学或学习方面带来任何变革。

然而最终,上述异议还是偏离了主题。学校教育体系开始变得支离破碎土崩瓦解。而权威如果出现危机,就必须用政治加以解决。反对社区管理运动的人士曾正确地指出,社区管理运动是对秩序的一种威胁,因为它使许多现有的机构名声扫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支持社区管理运动的人士并不代表黑人居住区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场革命。尽管我们应该牢记的是,大多数工会包括美国纽约教师联合会,过去一直是在法律的边缘运作,而和平通常是在各个严密组织知道自己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达成妥协而无法相互摧毁时才会到来。

反对社区管理的人士一直不愿承认到底有多少权力已从黑人居住区的公共机构中被削弱。他们也没有能力提出任何政治的或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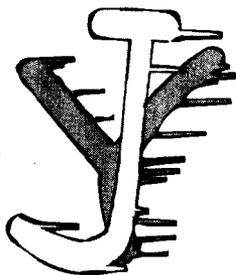


的解决方案。

各类平静的生活终究会回到校园和其他社区公共机构里。但是这些平静的稳定性有多少是另一个问题。少一点官僚主义将是一种进步,而更多的家长的参与和地方的问责也是一种进步。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改革一定会提高学生的学习。追求社区管理的运动是一个政治现象。它一直是教育争论的焦点,因为,眼下似乎尚未找到使学校朝何方发展的方式,除非先解决了眼下的政治困境才行。从教育角度而言,它不是一种方案,而仅仅是对被认为是失败了种族融合和义务教育的反应。实际上,像基督教一样,几乎没有人以理智的方式尝试过种族融合(一个有名的例外是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在像纽约这样的地方,其失败的原因是政治方面的,尽管没有多少人希望如此。义务教育也是同样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进行过这种让黑人和穷人孩子的学校好于中产阶级孩子的学校的这般昂贵的尝试。这也一直是个政治问题,因为没有多少人愿花这种钱(只有一个原因,即人们宁愿花在工作上和收入计划上)。不久的将来,承诺要在一个像纽约这样的城市里的大多数地区实现学校教育的种族融合或充分的义务教育是不现实的。

在讨论教育问题的整个过程中,除了从那些支持社区管理的人就家长参与的问题提出一些误导的言论外,有关学校教育的话题一直谈论得很少。然而,在我们的城市中,一些很有前途的学校,规模上虽小,但足以使家长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一些规模小的私人资助的社区学校和临街店面的经验证实了那些较好的幼儿园和幼儿早期教育计划中所发现的事实:除了考虑政治的因素外,家长参与幼儿学校的管理具有强有力的基础,因为,家长做的和说的在幼儿生命中的意义比一个教师所做的一切都重要得多。

一些生活在黑人居住区的颇有思想的人说,这些私人开办的学校虽然目前靠卖绳子和口香糖为生,但总有一天我们所了解的公共教育将会在我们的城市里消亡,因为它没有能力解决它自己所处的困境。参与社区管理运动的那些失望的活动分子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在公共教育方面的努力,尽管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开发公共资金的来源以资助私立的社区学校。在今后几年里,可能会有一些实验,尝试用公共奖学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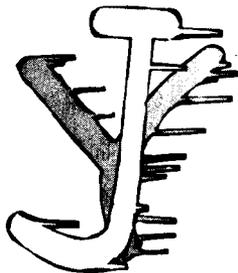
的形式来资助一些感兴趣的家长开办他们自己的学校。就像权力下放和社区管理一样,这将作为一付特效药被卖掉,以确保能够医治人类所患的种种弊病。而且,某种怀疑的态度也是合乎逻辑的:穷人在自由市场的怜悯下并没有过上传说中的好日子。看一眼那些带有欺骗性的学校就足以让每个人感到自由企业的局限性,而这些学校本该教黑人社区居民计算机编程课程的。而且,这场危机可能把我们推向那种带有欺骗性的学校,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改变我们对教育的一些历史性的看法。正如戴维·科恩^{注2}所言,州可以逐渐被看作是学校的管理者,而不是一个实际运作学校的机构。在纽约权力下放之争议的整个过程中,这一观念一直若有若无地出现着:所有不同的社区管理建议都策略地承担起州教育机构的新责任,即把教育事物作为公民的自由加以管理,对固执的教学行为进行调整,坚持有关标准,根据平等的原则负责州和联邦援助的分配工作。

还有很多教育实验有待去完成,而在目前的危机中会出现一些多样化的比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要好的学校。然而,在整个混乱的过程中突出的教训之一就是学校必须反映社会。学校政治上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表明,学校是永远不能单独解决这场危机的。最后,我们体会到,学校将不可能为社会秩序的其他方面而随意地捡拾无用的东西。

注释

注1 简·雅各布是城市、社区以及经济道德方面的作家和思想家。她1961年写的书《美国伟大城市的生与死》认为,大多数城市的规划破坏了人们的邻里情谊,滋生了人们心理的情感荒芜。此书不仅对城市规划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新兴的新左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注2 戴维·科恩是费瑟斯通的老朋友和同事,主要研究教育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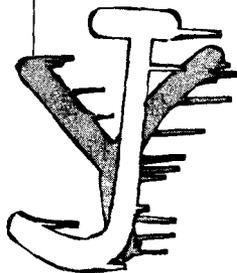
开校车送这些无权无势的儿童上学

1976年1月

56

在1976年的波士顿,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那个被认为是美国南方处于两难境地的种族问题的时代早已消亡,并且一去不复返。目前美国的问题是全国性的,而不仅仅是南方才有的。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两州,反抗最为激烈的黑人居住地带各个县的学校已经废除了种族分离,但此时的波士顿却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理想破灭的时代使人们对虚伪很敏感,而在波士顿反抗种族隔离运动中的象征主义的做法并没有逃过许多观察家的眼睛。马萨诸塞州以自由和进步出名,在许多方面它当之无愧。参议员布鲁克是自1881年以来第一个成为美国参议院议员的黑人,并且,最近马萨诸塞州从总体上来讲,又向世界展现了一些新的黑人领袖面孔。然而,近几年来,马萨诸塞州的许多自由主义都是以抽象的、形式化的和象征性的方式出现的。有迹象表明,近几年的进步承诺将被打破,预算问题成倍增加。在州议会外,示威者抗议社会各公用机构削减开支。州长和立法机关还把人们从福利名册上划掉,以削减医疗开支。排着长长队伍的失业者们站在州政府的办公门前抗议。所有这一切表明,选择激进的平民主义道路的诱因非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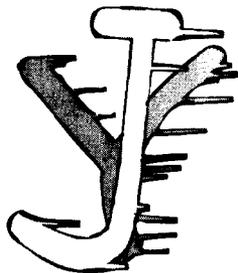
波士顿还作为一个文明的城市而出名。参观者把它看作一个陈列室,或许博物馆更好一点儿,那里有很多关于美国生活、教育和文化的理想。一些波士顿200周年纪念日的参观者可能把它看作是废奴主义



者的家园,因为,人们可以准确地道出加里森在这里冒着杀头的风险宣传废除奴隶制的场景。暴徒们向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吐口水是因为他支持派校车接送外区学童的立场,而这一事实很难与波士顿的理想以及它的过去相吻合,或者,就为这件事情也很难与肯尼迪家族和波士顿爱尔兰人之间传奇的爱情故事相匹配。然而,就在波士顿,那天有人用燃烧弹烧了肯尼迪的老家——约翰·F·肯尼迪出生的地方,在房子外的人行道上还爬行着“玩具熊公共汽车”。废除种族隔离在开明的精英和拥护平等主义变革的人们之间造成了分裂。派校车接送外区学童的举措并不能开创一个国家的新纪元,因为这是一个虚假的激进的平民主义的新纪元,它的象征就是亚拉巴马州州长华莱士的矛盾做法:一方面,为迎合大众的呼声而派校车接送外区学童;一方面又为亚拉巴马州制定了使公司更加富有的方案。

57

废除种族隔离的问题已经变得极为复杂。通过法律授权的南方“吉姆·克罗”双轨制的工作现在几乎已经完成。在南方,废除种族隔离在一些地方进展得很顺利,而在另一些地方却很糟糕。南方的一些体制正变成种族关系的模式,与正在北方发生的许多情况形成可耻的反差。另一些体制则通过解雇所有的黑人教师而废除了双轨制。事实证明,把“吉姆·克罗”法律延伸到北方是很困难的。长久以来,律师们纠缠在合法的种族隔离与事实上的种族隔离的区别上。旧的南方的种族隔离是法律和政策上的问题,而北方式的种族隔离则是外在力量的结果,如房地产市场等等,因此超越了涉及学校的法律补救办法的权限。类似的想法还在蔓延。然而,到了1970年,人权律师开始说服初等联邦法院更具体地关注南方城市以外的种族隔离的情况。那种在合法的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限的想法实际上是经不起事实考验的。在南方城市以外的许多地方,黑人原告的代理律师能够证明,大量的种族隔离都是学校董事会和学校官员所采取的行动的结果。一个又一个的案例证词说明了相同的情况。当局官员在完全的黑人居住区建起学校,而当黑人搬到新的居住区时则改变学校所辖区的界限以维持这种隔离,或制定出琳达·布朗几年前在托皮卡遇到的老把戏——派校车把黑人学童接送(“强迫性的接送”)到很远的黑人学校就



读,而不是附近的白人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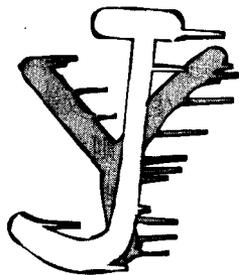
事实再次证明,正是当局官员们的这种行为,而不是黑人对极端的社会变革的渴望促使谨慎的比较保守的联邦法官裁定,全国范围内的大量的北方式的种族隔离违反了宪法赋予黑人学童的权利。这正是发生在帕萨迪纳、丹佛、巴尔的摩、底特律、路易斯维尔、波士顿等许多城市的一波接一波的法庭裁决背后的缘由。而问题是法庭能够提出什么样的补救办法,因为没有补救办法的权利是不存在的。

这里,废除种族隔离还遇到了几个很大的困难。尽管我们常常难以证明是学校官员们的行为造成了北方式的种族隔离,但是,显而易见,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官方的因素在起作用:分区制、住房歧视现象、房地产经纪入、抵押贷款、银行的保险和贷款政策等等。甚至即使权力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官方性质的,这些机构也是在不同的政府层面上运作,涉及多方面的管辖范围。学校经常被卷进去,然而,许多北方式的种族隔离的因素确实在学校之外。如果法律的补救办法仅仅包括学校,那这种补救的范围就划得太小了,但是,目前要把这样的范围扩大尚没有先例。

58

其他的困难源于那些黑人人口占大多数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里,黑人原告在法庭上追求的是结束带有歧视性质的学生分级政策。宪法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就其他废除种族隔离制的广为关注的目标而言,如逐步种族融合,更好的种族平衡,或者获得丰富的教育资源等,要想达到,对于那些以黑人学生为大多数的学校来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而对于那些仍然急于追求这些广受关注的目标的人而言,法律的补救办法似乎倾向于通过大都市把城里和郊区的学校联系在一起的方案。然而,在1974年,由尼克松总统任命组成的美国最高法院似乎曾提到,初级联邦法院不能超出范围到郊区学校来寻求法律的补救办法,即使原告能够证明郊区学校卷入了种族隔离事件。现在还不清楚判决真正意味着什么或者它最终的效力,但已有不少城郊废除种族隔离的案例仍在审理过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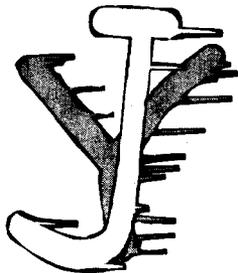
最高法院的判决阻挡不了城市里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律运动。对于那些主要关心结束这种带有歧视性质的分级政策的黑人而言,这一目



标并不一定是一种种族平衡。对他们而言,讨论郊区和城区方案偏离了主题。但对于那些依然认为种族平衡是值得向往的并且在教育上是有益的人们而言,包括白人和黑人,最高法院的裁决给发生在学校里大多数是黑人学生的城市,诸如底特律和华盛顿废除种族隔离的斗争瞬间增添了一种特别的徒劳气氛。裁决还给城市里的白人和黑人非常清楚地展示了我们整个城市范围内所存在的日益增长的根本性不公正。我们整个城市的法律部分一直是作为特权的藩篱在运作的,但是,对穷人和有色人种的隔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实际上,最高法院的态度已经表明,郊区的种族隔离问题可以单独处理。黑人和白人对于废除种族隔离的思维转变也使这一问题笼罩在阴影之中。作为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废除种族隔离依然受到广大黑人的支持。然而,许多人反对派车跨校区接送孩子入校(特别是到带有敌意的居民区),并且,许多人不赞同法庭所指的种族平衡,即使这种平衡似乎是执行起来最简单的法律补救措施。还有许多人坚持认为,这绝不是什么种族问题。但是,结束歧视给黑人学生获得同样的最好教育的机会是学校教育体制必须提供的。由此,总的来说,黑人学校和黑人学生班级都是不错的(但总有一种带有某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观点,认为黑人学生只有坐在白人学生旁边才能学好)。有一些人是彻头彻尾的隔离主义分子。另外,甚至隔离主义分子也注意到这样的策略性的问题:黑人学童在有白人学生的教室里会有更好的机会获得全面的教育课程,而白人学童可以说是该学校体制良好意愿的人质。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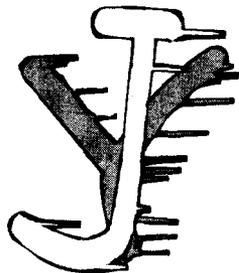
种族平衡作为一个完整的问题是模糊不清的,而这种模糊不清不仅仅在公众的脑海里存在,可以想象法院在每个案件里都坚持某种固定的种族平衡。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正好相反,联邦法官在讨论废除种族隔离的人口统计方面一般都故意维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作出的裁决常常包含着某种平衡,但是,其具体的内容则是模糊的。黑人观察家们对此的看法也是五花八门。一些人主要关注消除带有歧视性的学生分级政策,认为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导致黑人学校的主要原因。另一些人则主张某种种族平衡,或许因为这些平衡是内在需要的,也或许因为这些平衡可以有助于保障黑人学童获得更好的教育。在以黑人学童



为主的城市里,这第二种观点已发展成赞同大都市教育的观点。虽然上述两种观点很不相同,也非常矛盾,但是,在国家有关废除种族隔离的争论中却很少公开讨论过。一部分原因是许多黑人和人权律师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巨大的矛盾心态,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的观点可能基于自身独特的区域环境。大城市的解决办法可能在一些地方是好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却行不通。这并不是惟一的一个要制定全国范围的政策、但自身却是产生新问题的领域。

黑人有关民族主义和普遍论的对话已经过时和被歪曲。它总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且,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产生的分离主义和社区管理运动以来,各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纽约市对社区管理的要求主要源于学校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失败和以大城市居住区废除种族隔离为政策所显示的毫无意义的状况。这一想法也反映了平民民主管理对毫无反应、混乱和冷漠的学校官僚机构已完全失去作用。废除种族隔离在城市里黑人占少数的大居民区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且民主管理学校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许多人相信在赌场上以纽约市为社区管理所展开的悲剧式的、并且最终毫无意义的竞争形式是不值得的。今天的社区管理不再是为绝望的意识形态拼争的呐喊,因为,这一问题现在已转向诸如纽瓦克、底特律、亚特兰大和加里等黑人占大多数的城市。现在,这是一件务实的事情,符合美国传统种族政治的某些模式。黑人市长、黑人学校董事会以及可能的黑人政治机构的出现其意义是重大的。犹如在南方获得的选举胜利一样,它使得在历史上被遗弃的群体获得了比以往能取得更多政治权利的机会。至少,一些老的种族主义幽灵已经安息了:大多数黑人学校董事会可以作出有能力的决定,而黑人市长正如全黑人学校能够开展教学一样,也能行使好管理施政权。

不出所料,黑人在所有这些领域政治力量的崛起已引起一连串的针对城市管理的改革建议。黑人对这些建议是持怀疑态度的,并且将名正言顺地拒绝放弃他们所赢得的影响和政治权利,尽管他们可能欢迎针对于某些特殊公用事业提出的建议,如学校和城市服务(许多先行的城市计划回顾了早期美国人在移民占据城市后,试图把权力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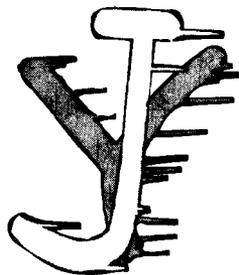


升到州一级)。

然而,这些务实的社区管理形式与早期的意识形态的要求相比不再是什么灵丹妙药。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说的是,社区管理就是黑人以哈莱姆的所有权来换取白人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所有权。这个笑话并没有什么非常好笑的地方,而在底特律,这个笑话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笑之处。像底特律、纽瓦克和加里这样的城市,准确地讲,并不是资源多得不得了。这些城市衰败得厉害,对有关隔离而平等这个古老的容易产生误导的话题提出了新的令人郁闷的不同看法。在美国,隔离从来就不会是平等的,而且永远不会平等。

很明显,在那些黑人占大多数或接近大多数的城市里,追求政治权利在许多方面是与追求学校的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相左的。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全民的社会,问题还不是那么重要。然而,遗憾的是,政策的制定是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是全国的政治,同样也是广泛的地方政治。人们很难理解这一点,而且,也很难理解底特律的情况与波士顿的情况是大相径庭的,即使是现在,以黑人为多数的底特律所发生的一切有助于形成波士顿的政治气候时(波士顿的黑人为明显少数),情况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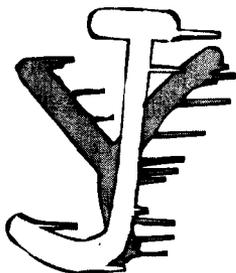
仍有一种迫切的要求,期望少数民族与白人联合起来构成平等主义和多数主义联盟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一联盟根本不存在。许多黑人和白人仍然认为学校废除种族隔离是迈向真正的社会联合的一步,但是,民权运动在政治上处于支离破碎的状况,这既是其成功的牺牲品,也是其未能将要求转换为广泛的经济公正计划的牺牲品。历史上某个相当长的时期,随着这些事物的发展,是某个极富创造性的国民的重要时刻将下层劳动阶级对各种传统和新颖的风尚的抗议与中产阶级改革传统的行动融合在一起,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变革。法国作家查尔斯·佩古(1910/1958)曾说,一切事物始于神秘主义,终结于政治。而美国版的佩古格言也需要重新诠释,即一切事物始于神秘主义,终结于联邦法庭。法律专业人士最终建立起攻击北方废除种族隔离的稳固框架,黑人支持废除种族隔离的力度在削弱,白人反对的压力在增加。神秘主义已经蒸发了——“你是指望律师把你们拴在一起吗?”沃尔



特·惠特曼(1860)问道。这使得心欲融合的黑人和白人讲起话来更加低调、务实和策略。学校教育很重要,但是它代替不了可以获得权力的工作或政治权力。废除种族隔离是对的,但是它不太可能迅速造就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造就众多殉教者并带来巨大变革的福音主义亦未能持续长久。在波士顿,父母和孩子们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他们的不满也是直截了当的,种族平衡仍然有可能达到。而黑人政治权力的选择并不是惟一的,甚至在波士顿,废除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就怀疑这样做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否值得。法庭所采纳的方案似乎对于执法和补救被践踏的权利都是最可行的方案,然而,在一些地方,这些方案的效果则适得其反,并且可能加速中产阶级从城市中逃离的速度。

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项联邦废除种族隔离的法令被法庭撤销或废除,然而,反对派车跨学区接送学童的人们深信他们能赢,而“永远不”一词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他们深信这点,因为,地方领袖当局曾向他们保证过,而且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也以含蓄的方式向他们保证过。理查德·尼克松针对废除种族隔离发出过清晰的退却的信号,福特总统也是这样。政府就这一问题发出的讲话是含糊不清的,而联邦人权的执法力度近乎处于停顿状态(去年发生在波士顿的暴力事件有理由让联邦官员相信,今年联邦政府必须强力介入)。

“派车跨学区接送学童”以及“邻里学校”只是口号。美国超过40%的儿童乘着毫无争议的校车上学。如果再增加其他种类的公共交通,这个数字要超过65%。派车跨学区接送学童这种事在波士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法院裁决之前的日子里,波士顿学校系统派车送学龄儿童上学的数量比今天还多(当然,那个时候在校的人数比现在要多)。借助有凝聚力的街区所办的“邻里学校”一段时间里即使在波士顿也是个例外而非通行的做法。在波士顿,地域意识非常强。然而,这些口号下隐含着许多真正的不满。如果有机会,家长们肯定愿意孩子上附近的学校。人们对居住区看得很重。在19世纪的波士顿,斯蒂芬·塞斯特罗姆(1964)指出,劳动阶级和穷人是搬家最频繁的人。上层人士是那些本地的、不喜欢挪动的人,只有劳动阶级才不得不经常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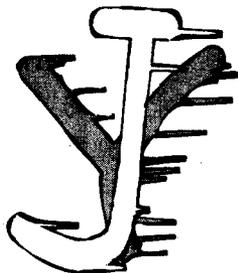


迁。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即过去比现在要稳定得多的原因。如果是这样,这还不是惟一的例子:我们有选择性的回忆一直是通过特权阶层的眼镜折射出来的。然而,自从大萧条以来,劳动阶级搬家的频率减少了,搬家最勤的美国人则发展为中产阶级和最穷的人。如今,波士顿的抗争表现在某些搬家最勤群体的价值观和那些居住地最稳定群体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上。除了种族冲突外,还有大都市的专业人士和当地居民之间的文化与阶级之争,也是邻里认同和本地价值观认同之间的文化和阶级之争。这更加深了当地人对专业人士、法庭、律师以及媒体的不满。

62

如果支持废除种族隔离的人们能够为劳动阶级指出某些在其他领域亦可获得的好处,则废除种族隔离就并非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佛罗里达州州长鲁宾·艾斯丘和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使我们想起那类可能会拖延我们所需之联盟的领袖人物,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们所经历的政治时代的悲剧之一,是受压迫最深的群体所获得的关注和同情比那些受到压迫但被较少宣传的人要多。经济萧条对波士顿的劳动阶级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而眼前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又不时地提醒着波士顿,社会对他们近几年的问题关注得很少。这使得白人工人很容易受到假平民主义者的伤害。地方上的假平民主义者挥舞着沾满血迹的记载着过去种族承诺的衬衫,示意派车跨学区接送学童的行为可以休矣。而政府的假平民主义者则怀抱着更多关于当前的怨恨,在选民面前高喊着派车跨学区接送学童以及保护平民财产权利的口号,却没有为任何劳动大众做一丁点的事情。有一点始终萦绕着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动荡的时代,那就是,政治没有将人们的不满和渴望按照普遍的和民主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们学校改革的传统倾向于精英教育。过去,在当地学校层面上的民主常常意味着阻挠学校改革的精英教育模式。例如,在进步教育时代,纽约市的反对进步的人们试图重新确立学校教育,使之成为一个彻底的等级制度。尽管对中产阶级孩子有利的按成绩分班政策和其他政策已开始实施,上述情况还是得到了制止。普通老百姓不时地对精英教育计划说“不”。这部分说明了学校继续存在的合法性。然而,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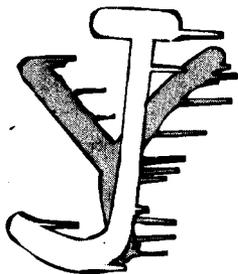


们却无法在如何使孩子进行积极有效的教育方面有所作为。有些改革者在完善的训练和良好的教学方面有着极好的想法,但是,在实践中,其改革的方式却往往很难赢得教师的信任,更不要说家长了。这一直是美国教育中的弊端之一。废除种族隔离符合老的改革模式,其宗旨是帮助黑人,这个在波士顿学校教育的历史上就被剥夺入学机会的群体。改革是由黑人发起的,但是进行改革的整个方式却重复着旧的精英教育的模式。今天,在我们的城市里,有时看上去似乎我们又捡起了过去南方种植园主和黑人联合起来反对贫穷白人的北方式的做法,即除了对社会精英有利外,对其他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处。公立学校的平等承诺再一次被不平等的现实所淹没。

63

事实是,查尔斯敦和南波士顿的居民们一直在反对精英社会的规划者,他们甚至组织游行,打着美国国旗去维护社区和邻里以及爱国的和宗教的民族主义,这使得上述居民们今天能获得更多的尊重 and 关注,可能比他们五年或十年前的情况好多了。国家的教育普及的理想与实际民族、种族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反差使社会进入某种在普遍主义阶段和宗族主义阶段之间摇摆的历史时期。国家的普遍理想经常成为美国土生居民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定义的面具;这就是他们双方陷入周期性的争吵的原因。宗族主义阶段经常是对美国人不能一致认同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正面反应。然而,合法的种族自豪感、民族主义和自尊,以及宗族主义之间的界限是不容易划分的。我们永远不会完全清楚,愤怒的宗族群体对一个接一个的虚伪的精英群体滥用他们的权力是否会真正表示抗议,而区分这一点很重要。人们同样会对过去流行一时的有关美国的狭隘定义表示愤怒,并且仍然会感到已出现的共同的文化成分是值得保存和保护的。我想到了为局外人间歇性地提供杠杆的政治传统;想到了权利的表达方式;……想到了如今在波士顿如此不堪一击的法律;想到了都市的多元文化;……想到了近几年来进步运动未能把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期望变成权利的普遍表达方式的失败。

加里蒂法官没有给种族平衡设置一个公式。像许多其他联邦法官一样,他选择了使平衡问题处于模棱两可状态的补救方法。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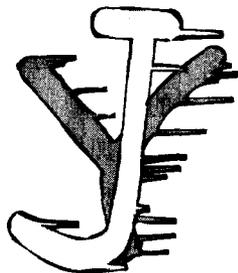


一个事实却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波士顿的体制实际上是双轨教育体制,它拥有两套政策,一套是针对白人儿童的,另一套是针对黑人儿童的。

无论废除种族隔离是否是白人外迁的主要原因,学校教育肯定是一个因素。重新采取种族隔离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期望。如果人们由于黑色皮肤的缘故被送进种族隔离学校,那么,他们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应予修正。然而,没有人可以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住在以白人为主的都市里。

社会学家在废除种族隔离的历史过程中扮演着奇妙的角色。社会科学影响着政策制定,也反映了该问题的政治的变迁。对废除种族隔离制影响的研究一直是模棱两可的,因为,人们很少能够准确地说清楚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目标复杂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教育本身通常反映各种目标。但是,它却使研究变得很困难。没有人说过废除种族隔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黑人获得更高的考试分数、种族和睦、种族态度发生变化、政策上朝黑人更加倾斜,还是简单地纠正种族歧视的倾向。布朗的决定源于黑人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著名的研究以及种族隔离伤害黑人儿童身心的后果。这在广义上讲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进一步的研究逐渐集中在考试成绩低的问题上。一种想法是废除种族隔离本身能够提高黑人儿童的考试成绩,然而,有关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教育可以消除考试成绩差异的证据是零星的。一些观察家在看到废除种族隔离并不能自动带来平等时,提出必须对教育平等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以此来解释结果的平等。目前还不清楚的是,除了开展大规模的修正计划外如何在教育中做到这一点。正如评论家们所说,修正教育从来没有失败过,事实上,补偿教育有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要在成绩上真正有所收获还需要大量的拨款,而当许多城市财政濒临破产边缘之际,这样的拨款常常是没有着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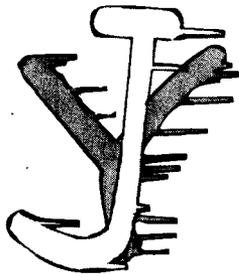
近来,学术界对平等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强调改革学校并不能替代根本的社会变革。这是需要记住的要点,尤其是在废除种族隔离问题上出现模棱两可的观点时。如果是发展的眼光看待学校,那么这种



理解就是有益的；如果在没有提供任何真正选择途径就否定教育改革的情形下，那么这种理解就是有害的。或许在变化着的不牢靠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上解决学校废除种族隔离问题永远都是不稳妥的。美国公众还没有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科学既乖僻刁钻，又深奥难测。涉及废除种族隔离的所有因素一直是一个法律问题，即权利匡正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即给予我们社会弱势群体更多的获得教育资源的方式的问题。对于许多人而言，它过去是，并将继续是一个道德问题。

同样可以预测到，对废除种族隔离问题的讨论将涉及我们国家生活中所有的创伤和不足之处，而惟独没有真正关注教育课题。今天，波士顿的儿童正在学习有关法律、种族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重要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并没有完全列入他们的课程计划中。然而，较为成功的废除种族隔离的事例是很多的，事实上，大量的实用的教育知识唾手可得。有见识的人说在废除隔离的学校里如果要避免出现新的种族隔离，那么，非白人学童的数量或许不应超过 40% [然而，这一数字绝对不应是一个标志。戴维·里斯曼^{注1}和其他人长久以来对在新的废除种族隔离制的公共机构中象征性的少数派（包括妇女）所付出的精神代价发出过警告]。如果派车送学童去上学的学校事实上比他们原来上的学校要差，那么，很自然地，废除种族隔离似乎就成了一个可悲的笑话。派车送学童去上学的学校应该离他们的家要近些，这样学童的家长就能参与学校的事务。一些地方，像丹佛以及波士顿也表明了利用城市里的黑人和白人咨询团体是多么重要，这样的团体设置对学校而言更为重要（20 世纪 70 年代似乎无法逃避参与学校管理的需求，而这种想法我们至今还没有搞清楚）。组织特别的班级决不能成为收容少数民族儿童的垃圾箱。一些地方的学校已远远超越了废除种族隔离本身，他们结束了带有歧视性的分班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开始进行种族融合，让黑人和白人学生相互认识、了解。真正的种族融合必须在教室里发生，而不是在学校教育的层面上发生。它意味着要认真关注诸如推选拉拉队领袖和组织橄榄球队等决定性的废除隔离的象征活动，还意味着寻找其他方式取代那种在我们的学校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全面按成

65



绩分班的做法。在个别科目如数学和英语上按照能力分班,本质上并没有什么错。而对于种族融合所带来的问题(以及我要说的一般教育带来的问题)都是由按成绩分班造成的。这种体制把大量的学生降低到去学习次等级的课程计划的地步,而前提是,他们将去面对次等级的生活目标。种族融合开始于低年级的学校就更有希望,它需要各种族间的人员配置和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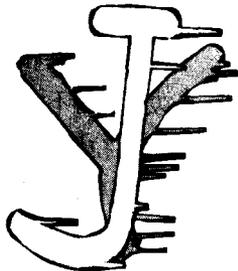
很多学校已实现了废除种族隔离制;在一些学校,种族融合在进行中。一些学校仍然是种族分离,并且,有些学校再一次实行了种族隔离。整个废除种族隔离问题遇到的真正的难题之一是,它成了引起争议的国家政策的事件,然而,学校和学校之间,甚至班级与班级之间许多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地理位置以及人口构成使得当前的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修正办法在一些地方变得毫无意义,而在另一些地方却是恰如其分。这使得近几年来我们对学校改革和社会政策的所有讨论充满了复杂性。然而,我们不断地表达着奇特的、片面的理性主义语言^①,一种非此即彼、忽略美国生活混乱状况的语言。而且,这不仅仅是我们对社会风景多样化的现象过于简单化的缘故。例如,我们对于废除种族隔离与修正教育两者之间进行的辩论好像表明他们之间互不隶属,而实际上许多学校对两者都需要。近几年,我们对学校改革与社会其他形式的变革之间进行辩论,我们自己好像是作战室里的总设计师,伟大的计算机^②为我们在两者之间提供了明确的选择。而在实际当中,既没有作战室,也没有总设计师,更没有巨型计算机。我们的选择远远不明确。通过现实的政治较量,在事实上似乎完全有可能的是,学校改革和社会变革如果全面开始实施,二者必将是重叠的。可悲的是,我们的观点仍然未把政治因素考虑进去。

66

在今天的波士顿,零星的改革和变革在一些学校内发生了。城里

① 盯着一种证据或论点的肤浅经验主义,例如,认为计算机读出的分数才是评价学生阅读水平的惟一有效的方法。——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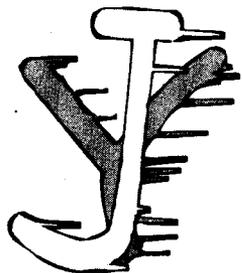
② 用来讽刺许多表面似乎是唯理论的现行政策和想法,例同①。——译者注



的许多人不喜欢眼前发生的一切,但他们却努力地保持着生活的平静,做好本职工作。在一些以爱尔兰裔教师为主的学校里和以爱尔兰裔为主的警察队伍中,许多人同情反对派车接送学童跨学区上学的抗议者,但是,他们还是按照法律办事。教师和家长们所表现出的勇气胜于任何人,惟独学生除外。人们总是要求他们不要辜负理想和信念,但是在城里却没有几个人愿意这样做。一想到这样一个是非之地,圣·保罗一句绝望的话浮现在我们心头:“在这里,城市难以维持下去。”圣·保罗(希伯来书,13:14)照例有点夸张。波士顿还在继续发展。学校在运作,好像在很多方面好于城里的许多其他公共机构。

废除种族隔离的问题既模棱两可,又颇具象征意义。这些问题很重要,是因为我们依靠象征生活着,但是,一贯的这样的象征会使人心变得冷酷无情。虽然在波士顿废除种族隔离的学校里出现了一些好的和完全正常的事情,但是整个情形还是令人遗憾的。法律成了达官贵人的尤物,他们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那些把废除种族隔离限制在条件恶化的市中心地带而让城市郊区依然固我的社会工程计划是对民主智慧的侮辱。废除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呼声还不够强。那些为维护自身居住区和孩子的利益而反对派车接送学童跨学区上学的人们不承认这个问题是种族问题,也不承认黑人儿童的宪法权利。除了不公正外,虚伪对人的伤害最深。南波士顿的人们对称他们为偏执狂和种族主义者的乡村自由民感到愤怒是正当的,而那些认为黑人儿童的合法权利可以被忽视仅仅是因为涉及郊区更大的补救措施根本不存在的想法是错误的。那些认为自己真正的不满、价值观和情感重于别人的合法权利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这些事情无论怎么说都不嫌多,无论讲多少遍都是不够的。在目前形势下存在的危险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老的波士顿学校委员会和其他政客们所造成的结果,这些人靠鼓励抗拒法律做出这等好事。暴力的威胁已经司空见惯以至于使我们忘记了对民主的威胁是什么。这个国家太多的人不得不希望别人的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他们的事业。这种结果给人一种坏的感觉,即暴力是正常的事情。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的确一直是这样的。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困扰的想法。那些参加建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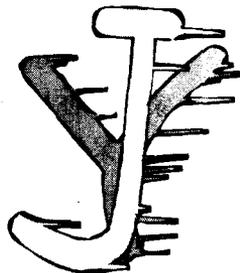


200周年纪念活动并想品味一下历史的人们,应该停下来感受一下波士顿的空气。而纪念碑、散发香气的工艺品、翻新的建筑以及戴着粉末状假发的政治家的陶瓷肖像不会带来真正的历史感受。历史的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受到惊吓的人们带着不同的想法进行选择,不是选择对的反对错的,而是,他们所期望的是少一点邪恶,并且想知道所期望的结果是什么。

67

注释

注1 费瑟斯通在本章中提到的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以其著作《孤独的人群》最为有名,这是他1950年对美国中产阶级发展变化研究的成果。



重新审视约翰·杜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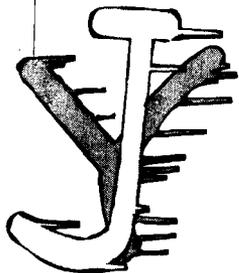
1972年

68

约翰·杜威在世的时间很长,从1859年到1952年。他的一些最著名的著作是在大多数人已退休的年龄时写成的。在他漫长的生涯中贯穿最持久的一条主线就是建立起所有经验的统一体,将被哲学二元论割裂开的某种独立思维和独特的思维方式重新统一起来。寻求文学与生活之间、思想与行动之间、身体与心灵之间以及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延续性伴随着他经历了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即至19世纪90年代早期,杜威是一位哲学唯心主义者。他遵循英国的黑格尔派,把知识定义为某种参与活动,追求将头脑与所认识的事物联系起来。黑格尔对杜威意义重大,这是因为黑格尔允诺解决二元论及其他矛盾问题,即某种将生活看成是整体和一致的观点。甚至在他放弃黑格尔主义之后,杜威在人的心智的社会含义方面,在自由是理性自我实现的思想方面,在逻辑和道德是进化的现象并随时光变化的观点等方面都永远受惠于黑格尔。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是杜威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他把自已基本的哲学观点集合在一起的阶段——他称之为工具主义——并且详细阐述了研究逻辑、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和社会思想的实用方法。杜威仿效查尔斯·达尔文,试图将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活动整合成自然和自然过程的模式:认为大脑是生物进化的工具,而黑格尔辩证法的术语成了人类与其环境在不断地控制与调整的循环中相互作用的生物创造体。间接地,达尔文为杜威提供了哲学本身是一种进化批判主义的思想,是根据新的环境对旧思想的持续的批判。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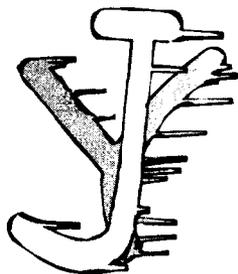


索尔斯坦·凡勃伦^{注1}和卡尔·马克思一样,杜威对活着的人心里所承受的过时思想的沉重负担尤其敏感。

杜威把新教某些传统的价值观,对经验的尊重以及将智慧用于道德的信念与科学和民主的理想融合在一起。像左派黑格尔的其他信徒一样,杜威强调行动的范畴是哲学关注的重点——将自己的观点发展成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的实践。杜威认为,思想的作用在于指导行动,相信某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于遵照执行,对于内容和真理的检验都是实验性质的。他提醒美国的上流社会防止那种脱离真实经验进行毫无意义的幻想的愚蠢行为——即威廉·詹姆斯(1909/1977)所说的“恶性的理智主义”——同样,他也提醒特迪·罗斯福的崇拜者们警惕没有理性引导的所有危险的行动。他主张伦理学是一门知识,并且提出了某种逻辑。这种逻辑试图终结他所见到的在文化中将科学与道德分离的有关“流言蜚语”。同威廉·詹姆斯一道,杜威为一门新的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并且制定出了新的教育哲学的大纲。

这时的杜威与众不同,是一个普罗修斯似的多面手。他极大地丰富了美国人的思想,在许多领域的众多问题上留下了自己决定性的烙印。然而,在他的社会思想中也不断出现一些缺陷,而这些缺陷值得人们深思,这是因为,它们指出了杜威时代许多人的观念中所存在的一般弱点,这些人是指那些在1880年和1920年之间伴随着理性时代走过来的进步教育的追随者们。

威廉·詹姆斯和杜威是美国社会思想中对立的两极——威廉·詹姆斯站在高度的浪漫主义角度强调个人经验的重要性,而杜威则从个性角度强调了一切经验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两人都倾向于大谈“适应(调整)”(adjustment)一词,该词从实用主义的核心隐喻中分化出来,意即达尔文的生物对其环境的调整或适应。将该生物学上的隐喻用于社会生活,它一方面有误导作用,另一方面又有模棱两可之嫌。说它误导是因为它描绘的是一幅与自然进行联合斗争的场景,如建造桥梁或防止传染病。许多社会情景缺乏共同的天敌所提供的目标的统一性:社会“问题”是一些人剥削另外一些人的问题。像许多进步教育的追随者那样,杜威不断用专业的和技术的术语去界定社会问题,这样做



回避了对权利、阶级和种族等关键问题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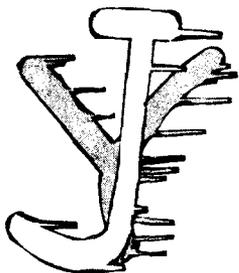
“适应(调整)”一词的歧义在于杜威用它指代两个几乎对立的事情。一是指对社会环境的被动适应,二是指对环境的把握和管理。在杜威的教育著作中,他有时谈到工人需要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这种观点听起来有走极端的味道,但是撇开有意识了解不谈,它还有鲜明的润滑资本主义“人性关系”的味道——通过请纺织工人开设有关纺织工业历史的讲座结束纺织厂发生的劳工纠纷。在其人生的后期,杜威谈到了社会适应性问题。后来发现,他所指的是复兴地方民主和工人对行业的管理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像他说的那样。“调整”一词的歧义在美国这样的情景下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强化了杜威以及其他进步教育追随者把社会改革看成是使外来移民融入一个歧视他们的社会的倾向。

70

许多进步教育知识分子看到了一种新的集体主义从他们时代的主要历史经验和美国生活工业化中产生。一些人是企业的集体主义者,他们梦想着国家由开明的实业巨头统治。另一些人,如索尔斯坦·凡勃伦,则梦想着技术专家制国,国家由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精英们、科学家和工程师统治。与技术官僚直言不讳地谈论杰出人物统治论不同,杜威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不过他受到索尔斯坦·凡勃伦的巨大影响,和凡勃伦一样对美国工业空想社会主义潜在能力产生了盲目的敬畏。杜威相信,现代技术提倡在大众中拥有一种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实业心理状态,像凡勃伦那样,他把所有的充满希望的道德、人性、科学品德统统带到他所描述的工业秩序之中。杜威认为,合作的工业联盟将要取代资本主义。

也许从长远看,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爵士^{注2}所嘲笑的那样,杜威和凡勃伦都是预言家;也许先进工业秩序的规则将推动我们朝着智慧指导下的社会前进。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进步教育的追随者,像工业发展的最新理论家一样,大大低估了公司秩序的力量和利润对美国生活的控制能力。他们希望,形成社会政策的标准应该是人的需求和整个社会的福祉;他们确信,历史正迅速地将这些希望转变为现实。

和进步教育追随者一样,杜威认为,政府和科学应独立于政治来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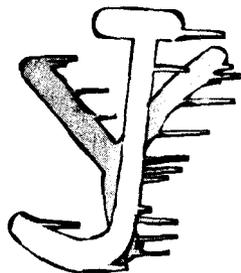


作。他对政治深恶痛绝,但也同进步教育追随者一样,杜威的观点也有弱点,即他希望用技术的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并且徒劳地期望公共机构能做政治才能做的工作。这种希望也反映在杜威的教育思想中,例如,尽管他是学校社会教育和社会性质的卓越的导师,但是,他也是一个典型的进步教育的改革家,期望学校能够解决公正和平等的基本问题。

在他有关伦理和教育的著作中,尤其是在《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一书的第七章中也有很重要的例外,具有进步教育思想的杜威把价值观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认为社会正朝着良好目标前进的基础上,他自己开始苦思冥想实现目标的实用手段和技能。他虽然批判美国人的生活,但正如刘易斯·芒福德(1926)所指责的那样,事实上,杜威对美国生活的许多方面是保持沉默的。在他心里,杜威认为自己是一个平民主义激进派,但是从外表看,他倒更像一个社会工程师,到处宣扬调整 and 适应生活的观点。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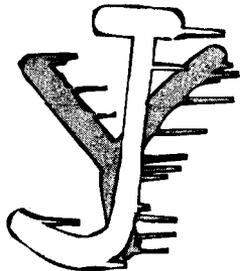
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在进步教育的改革中缺乏关键的政治判断。有一件事是发生在早期印第安纳州加里公立学校的奇特事例。杜威和伦道夫·伯恩(1916)当时是《新共和》杂志的文化和教育评论员,他们对后来逐渐出名的“加里计划”给予了赞扬,该计划是加里的教育主管所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思想。杜威和伯恩喜欢这些改革,因为,改革使学校充满活力;改革举例说明了经济和效率的科学原则——这些原则在进步教育的追随者们听起来都是神圣的字眼。然而,改革并没有为“科学管理”对于大多数教育者实际意味着什么做好准备:在实践中,“加里计划”的要点在于加倍地使用学校设施,让课堂里的学生增加一倍,制定循环式的活动和教室使用日程表等。总之,在教育者看来,该计划总体上是一个为商业和官僚价值观服务的行政手段,是与任何正规教育的标准完全相抵触的。当该计划引入纽约市的学校时,杜威有机会看到了在官僚机构的操纵下,在改革创业以及种族和阶级纷争氛围中该计划实施的经典事例,美国人将此称之为教育创新。纽约市的改革市长和五花八门的改革同盟军力推的这项计划正好与犹太居住区儿童家长们的愿望相对立——他们认为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劳动阶级的教育是一个阴谋;并且,这也与教师和校长的愿望相对立,改革者从来就没有征



求过他们的意见。整个纽约市到处都在发生骚乱——布朗斯维尔的一万多名家长和儿童上街游行,愤怒的选民们在1917年的选举中把改革者赶下了台。杜威慢慢认识到,学校改革如果没有教师和家长的支持是注定要走向独断专行和反动的。改革者们声称自己代表着大众,但实际上,肯定是首先代表着他们自己的利益集团。这并不是无意识地质疑他们思想的信用,而是的确有必要去分析一下其阶级和种族的偏见。

杜威同样对战争作为改革的武器未作任何批判。他担心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主张,战争的力量可以使美国人团结,教育人们如何合作,创造新的文化以取代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所以,有一段时间,他是战争的鼓吹者,把战争作为智慧应用的暴力,批判和平主义者,如他的朋友简·亚当斯^{注3}的多愁善感。杜威为战争辩护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他的机会主义思想,他对战争发动者的认同以及他放弃了冷静思考的责任。《新共和》杂志的大多数职员赞同杜威这一疯狂的现实主义思想以及他切合实际的和追求效率的愿望,实际上,他们政治思想的现实性甚至远远胜于杜威,他们把自己荒唐的国家和国际复兴的梦想寄托在像伍德罗·威尔逊和疯狂的毫斯^{注4}上校这些靠不住的出类拔萃的人物身上。杜威对战争的热情是短暂的,这主要是源于他对领袖人物的习惯性的质疑态度及对战胜压抑民众自由的现象日渐警觉。最终,他犯了《新共和》杂志大多数职员所犯的同样错误:他让自己敏锐的判断力和普通的正统观屈从于假设的历史发展方向。伦道夫·伯恩就战争问题对杜威的有名的批判可以解释为伯恩对实用主义所作的告别书。我认为,伯恩(1917)所指出的问题正是杜威后来所认同的:即实用主义(工具主义)价值观只是整个哲学的一部分;没有任何远见、没有一套明确的价值观、没有掌握政治的精髓,实用主义可以被利用来为任何目的服务。伯恩承认,11个战前的改革者,包括他本人,一直没有对美国的生活作出足够的评判。那些在亨利·詹姆斯时期被称之为战前“愚人天堂”里长大的人们曾想象,他们个人的空想乌托邦正在靠着原本受到质疑的和邪恶的手段而一步步实现。杜威最后认识到,他个人的理想与战争的目的之间没有什么可能的联系,于是他的基本理念发生了变化。这是杜威思想发展

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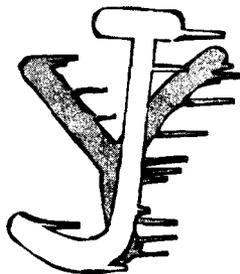


的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20年代,并持续他整个的后半生。在这段时期里,杜威比以前更为明显地活跃,发表了大量的带有争辩性的报道,以及两部名著,《经验与自然》(1925)和《艺术即经验》(1933)。他把研究重点从科学技术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领域转移到科学技术所服务的人类价值观,并且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美国生活的批判。

从一个进步教育思想的社会工程师转变成为一名空想的社会批判者,杜威开始怀疑进步运动,而且,逐渐明白了过去的好日子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工业秩序所带来的不祥之兆是什么。莫顿·怀特(White, M., 1972)曾指出,杜威之前的美国哲学过去认为自身的任务是调解人类经验相对立的领域;美国浪漫主义哲学家,如爱默生,以独特的方式为道德、情感和美学辩白,反对机械论和唯理论的科学。在进步教育阶段,杜威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反叛者,他以新的科学视野反对这些古典、浪漫的美国传统观念。在晚年,杜威对爱默生和美国哲学的传统观点的反叛表现在目的上,但还是明显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和爱默生的色彩,即从人类志向的角度让哲学成为经验批判的哲学。晚年的杜威试图平和地挽救美国的浪漫主义志向,他重新开启了对包含科学内容在内的现代的和经验主义基础的最深的感悟之门。 73

晚年的杜威继续强调科学方法是获得知识的惟一途径。他从未放弃对科学作为所有智慧求知方式的仰慕。他一直希望科学的精神应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然而,现在,在杜威科学的抽象发现与人类内在丰富的“导致重大满足”的艺术价值观之间、在对话和共同的经验之间划出了一条越来越鲜明的分界线。过去,他的主要前提是科学和工业进步的思想,而这一点是模糊的;现在,他对工业社会中心的感悟是,工业社会使人变成了机器。然而,杜威仍然认为,工业秩序可以带来美好的生活,他仍然相信合作与计划,他还主张由工人来管理工业,恢复地方公共参与的空间和面对面的社区交往活动^①等等。

《艺术即经验》是晚年杜威经过锤炼的浪漫主义思想的最好体现,



^① 杜威担心,美国的民主正失去公众参与和理解的能力,因此他希望,小的社会机构,如学校要为民主辩论和参与提供公共空间。——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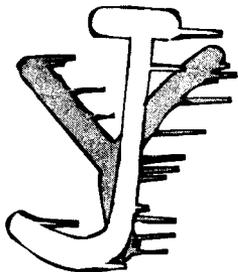
其深奥的审美核心在于：优秀的艺术是已完成的经验和处于最完整状态的生活范式。艺术是对想象的可能性的探索，因而最终，这种探索如果是间接性的，它就是批判性的和道德性的探索。《艺术即经验》揭示了杜威有关健康社会的标准，使得杜威借整体文化理想的名义将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预言和伟大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从塞缪尔·科尔里奇、马修·阿诺德到文学评论家弗朗西斯·雷蒙德、奎因·多萝西·利维斯^{注5}和 T·S·艾略特，这些人大体上都是传统主义和精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而与之对应的，还有少数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像约翰·拉斯金^{注6}、威廉·莫里斯^{注7}、R·H·托尼^{注8}、杜威以及我们时代的雷蒙德·威廉斯^{注9}等人。

在撰写《艺术即经验》的过程中，实际上，杜威重新开启了一场始于乔治·桑塔亚那^{注10}、亨利·詹姆斯、亨利·亚当斯时代的重要辩论。这些人从美学的角度批判美国人的生活，把艺术看作外来移民、强盗资本家、扒手、老板、庸人的避难场所和毫无控制的技术发展的结果。19世纪90年代的杜威不喜欢唯美主义者对科学的蔑视，不喜欢他们逃避现实的态度、精英统治论以及他们对创造民主文化的可能性或客观需要性的否定。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仍然不喜欢这些，但是，却准备承认唯美主义者对美国人生活中盛行的各种势力进行批判的势头。这一点加深了他对错误东西批判的掌握与领会。

在《艺术即经验》一书中有一些有趣的冲突。冲突的缘由之一是杜威对大众文化的看法。他认为，文化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美学的但也是道德的东西，是面对贪婪、庸俗和无知的教育社会保护和延续其优秀价值观的力量。杜威致力于人文艺术事业，但是，他也认识到，许多最优秀的以及最差的现代艺术和文学都是由那些其价值观为非人文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的艺术家们所创造的。杜威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健康文化的理想与20世纪艺术的深刻异化相妥协。

在书中，还有另外一个冲突。《艺术即经验》一书作为一本美学的著作，其判断的标准是晦涩的、有节制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该书的整个主题都是渴求严格的理智标准。这充分反映了每一位美国民主主义者所处的文化困境。他们渴望有一个进行艺术、理智和道德判断的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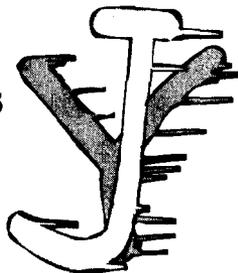


基础。总而言之,美国的民主和平民主义的传统倾向于否定以任何共同的价值观来安排美国人的生活。这种倾向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些求助于任何标准的人们通常就是那些精英主义者;我们的历史充满了精英们试图将大众排挤出去的肮脏企图。因此,杜威的智慧先导——贺拉斯·曼^{注11}主张,民主社会的公民要求诸如学校这样的社会机构要有道德准则,因为,民主对人性的要求比对政府的其他形式的要求更多。

就理论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观点。然而,鉴于美国社会实际的阶级和种族的现实情况,对社会和道德准则的祈求成了出于社会优势地位群体反对外来移民和下层阶级手中的政治武器。近来历史学家们在解剖美国的改革中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们可以以更为有意义的和严格的观点从总体上观察改革者的动机,揭开那些众多的在传统改革的行列中常常是精英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温和人物的面纱,我们这些致力于民主事业的人们应该承认,美国所盛行的某些传统也还有很多是我们所需要的,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准备。一些改革者所代表的理想,是拥有一个胜于所有个人美德的公共美德,并拥有一种认为美国人的生活应该按照价值观来安排的信念。无论过去曾被怎样地推崇,现在却在美国人的生活中遗憾地消失了。杜威正尝试着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把美国平民主义的传统观念与对共同道德、智慧和文化标准的关注融合在一起。最终,杜威逐渐意识到大多数进步教育改革者所失去的东西,即他们失去了美国多元文化中的永久活力,也即是它反对任何一个群体给美国人所下的定义。杜威越来越倾向于地方民主和多元化的传统。然而,他也明白这些传统的复兴如果没有对普遍价值观和共同分享标准的承诺将具有相反的作用。标准不是由传统或宗教机构传下来的。在当今世界中,除了理性的、民主的思想和评价过程外,没有什么合法的权利之源——这是杜威一直称之为“理智方法”的社会所共同追求的,尽管有模糊和误导的作用。

今天,我们重读杜威的著作肯定还有不少问题。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他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就像花生酱,味道单调呆板,一成不变。威廉·詹姆斯斥之为令人憎恶的东西(霍夫施塔特,1963),而赫梅斯^{注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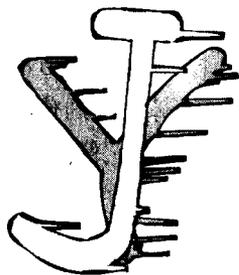
75



曾经为读《经验与自然》一书的兴奋和难度所吸引,把它描述为是“只有上帝神志不清但又非常想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时才会说的话”。像他的许多同代人一样,杜威对傲慢的情感和细腻的创作有些厌恶,某种程度上,他的个人风格就是对风格本身的反叛。他故意以搞不懂“不相关的”(irrelevant)和“不相干的”(irrelevancy)事情之间的区别来忽视优美的写作风格,他为此从中受益。像爱默生那样,杜威最善于演讲,但是,即使在他最精彩的演讲中也缺乏控制和规则。情感在错误的时刻从干裂的缝隙中流露出来。就文章的活力、混杂的格式、对知识的热爱、单调乏味的文风,尤其是文章的探索性来论,他的文章隐含着某种穷尽所有与经验相关的内容的愿望,而《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就与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T.)^{注13}的杂乱无章和未完成的小说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

另外,一种风格可以告诉你一个人的思路是否清晰。而杜威并不总是希望思考得很清楚。他想消除哲学、常识和优秀的风格的依据来规范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重新整合人的身心,整合自我与社会以及真理与道德的关系间的各种差别。杜威对偶像崇拜有一种极端的新教般的惧怕,对用词和比喻的毫无顾忌的盲从有一种恐惧感,而对实际经验的变化着的不稳定的美丽现实却没有这种感觉。杜威尽其所能地去试图记载经验的自然历史,勾画出我们在与其他人接触和交流的实际过程中所作出的逻辑判断和道德决定。这一努力使他进入了艺术的境界,这也是为什么《艺术即人生》一书对于了解杜威是如此重要的原因。这本书也是认识他理想的向导,更是人们理解杜威的众多著作充满不完善以及挫折感的关键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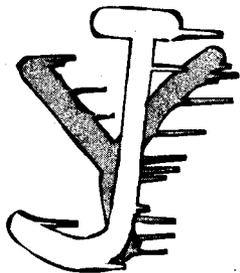
上述描写生活经验的自然历史以及在愉快中思考历史和评价历史的愿望,源于杜威苏格拉底式的主张,即知识与品德是同一的。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经常对事实与价值观感到困惑。而这一观念也是他与已故的持形而上学观点的威廉·詹姆斯如出一辙的地方,即任何健康的品德观都是对我们实际生物的和社會性质的反映,而这些性质是需要接受实证考察的。他们认为,在实际生活中,真理与道德是相互交织的,这种观念及对这种观念的领悟是实用主义遗产值得保护的内容之一。



在教育思想和实践领域,杜威的遗产仍然使我们受益匪浅,对我们争取更好教育的努力有持久的影响力。尽管他的进步教育理想开始失势,并且历史证明了他在有关学校教育的更大的宏观问题方面起到了误导的作用,但是,他仍然是领悟课堂学习以及教育等微观领域的非凡的源泉。有思想的教育家们站在朴素的实证主义角度,不断地重新认同杜威的努力,重新确立科学与情感的高度浪漫主义的综合体。尽管我们肯定从未像杜威和他的同代人那样离这个目标那么近,但是,进步教育的头号智者所追求的科学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仍然是我们今天追求的目标。一开始,杜威试图与美国浪漫主义的过去一刀两断,但是后来,他又试图与之妥协。在我们源远流长的浪漫主义文化中,每一代人都以不同的思想方式进行着相同的战斗。浪漫主义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正如平民主义的问题是他的社会思想的核心一样。两者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问题。

76

在具体的和有机的事情方面,各种各样的浪漫主义是与抽象的和机械的事情相对立的。然而,浪漫主义又有低级和高级之分。在教育和其他领域,低级的浪漫主义传统上是主张心胜于头脑的,宣扬非理性的和直觉的观念,而害怕科学的和理性的观念。这种观点和情绪或许在今天尤其能够大行其道。而另一方面,高级浪漫主义重新寻求某种修正的中立立场,即在冷冰冰的分析归纳与散漫而狂热的惟浪漫主义自我之间寻求某种中立的立场。高级浪漫主义欢迎科学与理性在其适当的领域内发挥作用。浪漫主义真正的敌人不是理性,而是惟科学主义——即各种片面的、狭隘的思维方式,否认想象力的内在动力以及意志自由,荒谬地宣称对人类的存在作出了完整的描述等。因此,高级浪漫主义追求的是一种调和的观点,认为理性在进行想象的过程中强化了感情。这是实用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浪漫主义的目标,即使没有人在性情上比杜威更缺乏浪漫主义的了。最终,由于杜威完全致力于应用科学的方法,他一直努力地继承爱默生的衣钵,在科学的抽象化与具体经验的价值之间进行调和。《艺术即经验》一书是某种超越浪漫主义过去、保持最佳洞察力的尝试。浪漫主义复杂而未竟的计划意味着承认科学标准和手段的有效性,并且使艺术和人类共同经验的内在的“能



产生痛快发泄”的价值合法化。杜威宏伟的教育综合化任务并没有能完成,他的教育观点由于是其中年时期的产物而受到影响。《艺术即经验》一书含有其所有著作中最丰富的教育内涵,然而,教育却没有列在书的索引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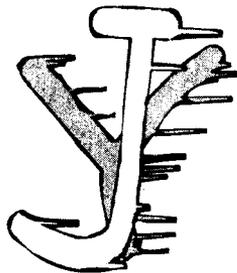
杜威试图把人类放在科学世界的框架内进行考察,揭示科学应该起到使人类自然化和使科学人性化的目的。对杜威而言,艺术的活动所提供的几个重要的暗示旨在说明,科学与情感的融合可以是相似的。艺术和科学对杜威而言是两个深奥的知识领域,它所呼唤的是规则、标准和判断力。然而,每个事物都包含着各种不同的含义。科学涉及的是那种对真理进行抽象宣示的内容,或者是杜威最终所称之为的“获得保证的主张”;艺术讲的则是具体的内容。科学勾画了世界,而艺术则描述了在世界的绿色之中穿行该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77

关于科学和教育还有一种观点,由哲学家戴维·霍金斯(1974)在他的近作《已知的观念》一书中提出来。霍金斯长久以来就对幼儿教育感兴趣,并且,也同意杜威的一些观点。他认为,科学的实践,如发现的实际、过程综合能力、猜想以及分析能力的组合等,是与艺术密切相关的,而非科学的实际成果。事实上,科学的结果是靠抽象的符号和论证的普遍法则来加以表述的;而且,把科学作为具体的事业进行追求涉及手、眼和直觉的相互作用,而这是与艺术中的创造性劳动同等重要的。当人们认为科学与直觉及具体事物完全不同时,并且认为艺术源于思想时,教育忽略了科学与艺术的真正的精华所在。

杜威意识到,过去认为科学是一种分析,而艺术是一种综合的观点具有误导性的简单化倾向,就如同笛卡儿把心灵描述成人体机器内孤独的灵魂一样,是毫无正确性可言的。杜威也不认为科学与艺术必须处于冲突之中,尽管他已经非常痛苦地意识到在四分五裂的美国文化中科学与艺术这两个领域的广泛性。艺术和科学对杜威而言是人类想象力超越经验的同一节奏中两个不同的节拍。在科学和艺术两者中,我们踏着这种节拍逐步了解世界。

正如霍金斯指出的那样,杜威极为准确地发现,在某种科学工作中,以及在经过良好组织的课堂里,积极地对儿童进行探索和研究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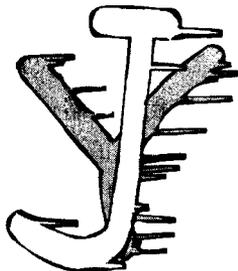


有着某种相同之处。任何在这类情形下观察科学和艺术的人们都会认识到,全身心参与的品质是主要的。在科学、艺术和其他学科中,良好的学习有一些共同的因素,那就是精力充沛、全神贯注和参与。在儿童大脑和学习材料之间的互动揭示了瞬间的高级浪漫主义目标,即理性地强化儿童的想象力。

78

像杜威一样,霍金斯督促今天的教师要透过已知的经过整理的科学知识的表面去探究那些很少人参与的科学的内在本质。杜威带着人类学的恐惧去看某种人们所不了解的科学的文化景象,其物质基础受到科学的广泛影响。这一问题自从杜威开始探讨以来,这些年变得越发严重。科学已经成了我们这个社会中一股巨大的且常常是有害的力量。尽管科学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但同时,它也参与了我们的战争,毁坏了我们的环境,给我们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科学最为清晰的一面。我们大多数人缺乏洞察力,没有很好地认识到科学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它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众所周知,专业技术只能为少数精英获得某种生活和思维方式,这一事实让今天的霍金斯感到非常沮丧,如同多少年前杜威感到的沮丧一样。人们关注的问题部分是政治层面的。如果知识是力量,而且确实如此,那么,少数精英对科学的控制对我们所有人来讲就是一个威胁。然而,抛开政治不谈,对于那些生活在某种文化背景中却对自己的物质和智力基础一无所知的人们而言,这种文化背景是可耻的;就像那些歪曲科学技术的抑郁的受害者们诅咒妖魔丢掉神瓶一样,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着下一个灾难的到来。杜威对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把科学理想化为艺术家个人的技术,这是与我们称之为大科学的高度政治化组织的行政工作原理不一致的。进步教育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料到科学潜在的噩梦般的后果。然而,杜威的同代人却明确地指出,科学本身很少被作为增进知识、解放思想的方式来加以追求。就像教育本身而言,科学过多地被用来为太多的靠不住的门外汉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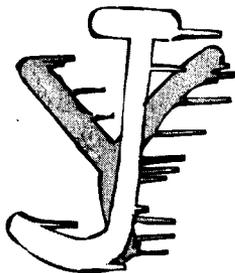
杜威从来没有把他后来对具体价值观的重视转到对科学系统的阐述上。正如霍金斯所指出的那样,他似乎对科学的实践一无所知,从而易于强调科学方法而忽略所有的重要方法所必须依赖的实际内容。他



知道,但有时会忘记提及科学所带来的内在快乐。尽管今天我们发现杜威认识科学和艺术的成果是形成我们自己教育思想的最基本的前提,但是,杜威个人似乎也有让人烦恼的时刻。我们大多数人或许欣赏不了他在各个领域中获得和谐和平衡所表现出的在语调上、态度上和修辞上的惬意。我们对杜威社会想象能力近乎无知的程度,以及他未能意识到学校牵扯到诸如权力、社会阶级以及种族等问题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回到他的观点上:我们也在朝着某种能够反映高级浪漫主义对理性和人类社会价值进行融合的教育的方向而努力。我们在寻找某种可以调和理性、情感以及想象力的方式,寻找一种教育。在这种教育中,儿童教育在游戏中开始并逐步进入训练阶段,从而鼓励儿童既学会对具体经验的尊重,又学会积极掌握科学世界里各种符号以及抽象理论。

杜威的承诺所表现出来的乌托邦式的复杂性,意味着他的每一代读者可以从中选择一套不同的理论重点。最近的进步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并不赞同杜威的把学校作为社会、民主和道德团体来关注的观点。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个缺憾。我们忽略了学习的社会因素,这方面的原因是很多的;令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仍然感到担心的是,传统进步教育思想不断地被归结为某种对一致性与群体性进行理性阐释的方式。近来,许多步杜威思想后尘的上佳论著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高级浪漫主义的综合性;二是让儿童沿着众多个性发展的道路进行积极探索而获得的知识挑战。两者仅是一种渴望,而非什么成果。

任何代表杜威理想中部分宏伟计划的人必须以某种谦逊但又坚韧的口吻表达他们的观点,即带着人们曾称之为失去影响力的语气表达自己的观点。坦率地讲,在人们对这类学校的期盼中,我们必须忍受比进步教育运动的支持者们所感到的或表现出的更多的痛苦。这种痛苦部分反映了美国对学校教育所一直缺乏的两种必要的认识。我们同进步教育运动的支持者们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愿意承认学校教育只是儿童生活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主要的内容。我们仍然在代表学校提出大量的要求,而这些要求的范围使得我们犯了观念上的第二个错误,使我们在习惯上忽略了教育机构中更小的日常的可能性。最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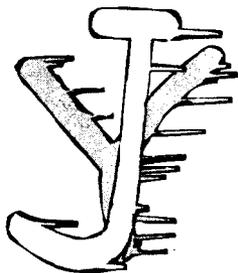
使杜威慢慢脱离其宏伟的进步教育思想的乌托邦的东西就是他固执地把注意力放在教师和儿童生活当前时刻的重要性上,放在课堂里日常的生活质量上。

杜威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友善而又犀利的第二轮新教育的评论家,但是,他对第一阶段的进步教育发生转向深感失望,而且,他也本可以对许多新近的论述加以批判。新教育那种对低级和非理性的浪漫主义表现出的反应迟钝、反理智主义、对合法的成人权威信心的丧失以及新教育者极为错误地认为新教育思想使得所有的传统实践和标准失效的观点等都曾使杜威对此显得很不耐烦。然而,近来的一些正在顺利进行着的工作表明了进步教育理论的优势所在。以儿童为中心的进步教育思想支持者如杜威相信,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儿童学会思考。在没有对技能学习的重要性打折扣的前提下,他们指出了在游戏中主动学习的重要性,并且表明,在实际工作中,教育的有效性表现在使儿童从游戏过渡到更为专业的作业。他们认为,对老师来讲,儿童现在的生活应该是和他们未来的生活同等重要的;学校——按照某种合理的、被滥用的表达方式——即生活,也是生活的准备。

以儿童为中心的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们也希望学校拥有社会的功能。他们想让学校成为成人与儿童民主合作的团体。他们反对美国教育历史上哪怕是一丁点的因循守旧的东西,反对其一味追求高目标而忽略日常的训练,反对寻求将某种最佳的体系强加给教师和学生的做法。他们强调儿童的多样性,强调这样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事实,即童年是智力构建的一个阶段。

在不少像杜威这样的著名人物所撰写的论著中,隐含着某种不同的、以基本的经济观点看待教育作用的东西。杜威反对主流的进步思想教育家以及戴维·泰亚克(1974)所称之为的行政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他们忙于按照公司和经营管理的方法重新组合学校,认为,学校应是依据学生未来工作进行分类的筛子。自杜威时代以来,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在美国教育中一直是鲜明的少数人的观点,总的来说,它在低级学校教育中的影响力大于在高年级。

新教育思想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总是时隐时现,这部分是因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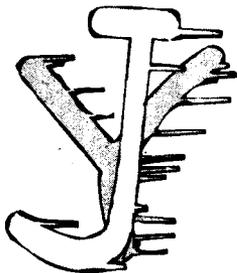


们的文化是一种趋附时尚的文化,很少是以积累的方式在过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然而,新教育思想的不断再现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每一代人都以新的方法重新审视杜威复杂的教育遗产。杜威进步教育思想对科学本身的信念并不比对我们的我们有那么大的触动。我们对杜威的随着知识的增加生活的痛苦就会减少的假设表示怀疑。这是因为,首先,社会科学的智慧似乎并非具有明显的积累特征,杜威显然低估了在将实验科学应用于人的过程中所牵扯到的实际的和道德的问题。他犯了一个典型的进步教育思想的错误,即忽略了所有公共机构包括科学的政治特性。我赞同杜威关于科学理想有效性的观点。除了科学我们还能依靠其他什么作出判断呢?人们广泛地认为,可以求助于证据、逻辑以及通过公开地接受批评和辩论的过程来进行合理的质询。但是,这种理想仅仅是断断续续地被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机构所代表着。这一点我们看得要比杜威时代的人清楚得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见证了科学的理性主义被用来为邪恶的、甚至疯狂的政治目的服务。在惊恐中逃离理性主义以及避开滥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过程中,用杜威的思想提醒我们自己是有益的,即科学应该是人性化的、自由的追求,是通往自由解放的道路。

在社会思想方面,我们倾向于晚年的杜威而不是早年的进步教育社会工程师的杜威。虽然杜威忽略公共机构的政治是错误的——像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常常忘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官僚机构——但是他关于建立公共机构的必要性的认识是正确的。由于我们对官僚机构的危险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因此,我们想根据晚年杜威的唯意志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精神塑造我们的公共机构。超越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留给我们的思想境界将包括创造以人为本的公共机构以及真正为客户服务的职业。

让政治联盟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因为没有政治的参与,任何改革的企图将重现进步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缺乏政治的参与,进步教育思想最终仅仅是自由专业人士和改革者的意识形态。曾经有一段时间,杜威看上去像一个由专业人士、经理和专家组成的新官僚体系的理想代言人。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注14}超越杰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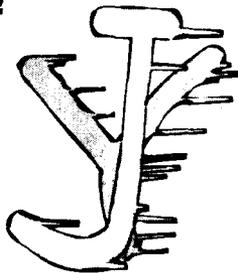


里米·本瑟姆^{注15}的功利主义孤独而凄凉的思想那样,杜威跨越了进步教育观苍白的管理科学信念。像米尔一样,杜威将以他的把自由思想发展到与初始自由思想截然不同的某种思想的边缘的方式而被人们永远铭记。

杜威的哲学观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却反映了一个永恒的观念——代达罗斯的观念。代达罗斯是一名传奇的希腊工匠,是他建造了克里特国王的迷宫,设计了奇妙的金银珠宝,掌握了飞行的奥秘。代达罗斯就是这样的工匠^①:他相信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并且,他鄙视迷信、英雄崇拜以及任何的非理性的东西。他集工匠、建筑师和艺术家之大成而熠熠生辉。代达罗斯的性格既具有某些实际的优势,又有许多理论上的弱点,其观念不赞同沉思冥想,不相信政治,并经常对自然诉诸暴力,同时害怕过去。而杜威则从来没有征服过他内心对过去的恐惧感,这或许是在杜威所有的论著中都笼罩着如此多的旧哲学问题的阴影,以及他的心理学中有关内在生活的内容如此贫乏的原因所在。杜威从来没有审视一下他个人的历史,也从来没有理解美国的过去——在杜威的实验小学里讲授的美国历史只是技术合作方面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暴力和压迫的编年史——这些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杜威的基本观点永远不是悲剧性质的,而是喜剧性质的,是基于普通社会经验的可调和的潜能。他的观点不断地深化并且逐步认识到他以往所忽略的领域。《经验与自然》一书在精神上远远不同于杜威早期工具主义的技术帝国。它带着某种严苛的观点认为,人类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就如同身在鲸鱼腹中的乔纳。结果,杜威的工具世界为众多的大厦留有許多空间,包括苦思冥想、痛苦和死亡等。在政治方面,在杜威不再相信技术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并且拉动社会杠杆带来空想社会主义之后,他强调的是基层的变化以及各种政治联盟推动一个五彩缤纷的国家的必要性。他努力以各种方式在工人、专业人士和大众之间建立起联盟,其范围从积极支持民主和高度政治化的工会运动,到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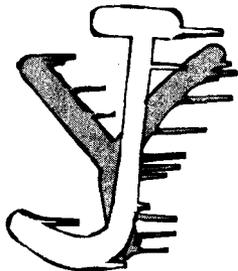
^① 杜威认为,思维是一种创造,是把人所想到的与人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方法。——译者注

消费者和家长团体以及其他各方。该联盟从不采用同一种手段,从不发掘单一的社会拯救资源。他是一位期盼从未发生过零星革命的越来越孤独的哲学家。杜威从没有对实现一个民主合作的美国的可能性失望过。杜威整个晚年的观点、他所关注问题的渐进的性质、其实用价值的稳定性及平和宽容构成了他的思想的极度的模糊性质。杜威在他后来的自传草稿的结尾中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依然像现在这样在荒原上漫游了 40 年,这并非是一个痛苦的命运——除非人们能使自己相信,荒原终究是期望中的乐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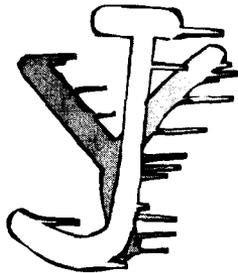
乔治·奥威尔(1940)曾称亨利·米勒为“僵尸中的惠特曼”。他是指在 20 世纪糟糕的生活素材中探究并歌颂浪漫主义的情感有多难。杜威一直努力要成为一个精力充沛的、官僚主义的和刚刚发生过的异常战争中的爱默生。

注释

- 注 1 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理论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是资本主义口才最好的评论家之一。
- 注 2 费瑟斯通这里指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著名的笑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要死的。”
- 注 3 简·亚当斯是进步教育运动时期最著名的社会改革家之一。这里指她参与了和平运动并致力于国际主义事业。作为妇女和平党的前驱,后来成为妇女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国际联盟的积极分子,她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此,她于 1931 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 注 4 爱德华·M·豪斯上校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主要顾问。
- 注 5 弗朗西斯·雷蒙德和奎尼·多萝西·利维斯,文学评论家。
- 注 6 约翰·拉斯金,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艺术评论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
- 注 7 诗人、翻译家、出版商、装饰艺术家威廉·莫里斯也是 19 世纪 80 年代英国最直言不讳的社会主义者。
- 注 8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托尼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从事有关教育、经济学以及政治方面的论述。



- 注 9 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极端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 注 10 乔治·桑塔亚那,哲学家,诗人和小说家。
- 注 11 贺拉斯·曼,马萨诸塞州第一任教育委员会秘书,是美国 19 世纪竭力主张公立教育和以公立教育为更民主社会基础的思想的倡导者。
- 注 12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在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工作 20 年,在美国最高法院 30 年,于 1932 年退休。
- 注 13 西奥多·德莱塞,杜威的同代人,以撰写自然主义小说闻名,最著名的作品有《嘉丽妹妹》(1900)和《美国的悲剧》(1925)。
- 注 14 19 世纪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一位神童,读了少年时代本瑟姆的作品后认为,“所有以往的道德家都被取代了”。但是后来,他认识到本瑟姆的功利主义既有道德的局限性,又有理智的局限性。
- 注 15 19 世纪早期的哲学家杰里米·本瑟姆以其著名的功利主义理论或“为最大多数人而谋的最大利益”而闻名。



民主主义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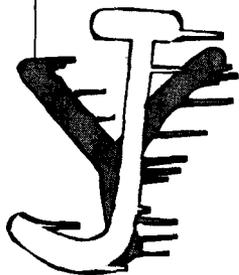
1995年6月19日

位于东哈莱姆河的东中央公园中学的九、十年的学生正在上演《麦克佩斯》的片段。德博拉·迈耶是该校的校长和创始人，他写道，“他们知道观众席的笑声来自于同他们一道工作的同事，而不是来自于反对者”。后来，学校一位深受爱戴的朋友过世了。迈耶说，“我们停下来仔细回顾她的一生……我们能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教师更有爱心……而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机制和工作作风，使得我们能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关爱”。

84

这所非凡的中学是由三所公立小学和一所中学组成的，主要面向贫穷家庭的孩子。过去几年来，这几所学校形成了一个彼此尊重的团体。但是，仅仅提及这一点会有感情用事之嫌。有两个例子与迈耶（1995）的著作《思想的力量》的书名相关，这也就是这两个例子非常重要的原因。《思想的力量》一书讲的是有关理智的用途、有意培养身心习惯的方法以及读书写字的能力等。某种延续下来的观点认为，理智的价值不能与诸如同情和关爱等品质相分离。另外一个隐含的假设是，认为大脑的生命力——涉及脑力工作中的思维和做事的习惯——需要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师和孩子可以轮流扮演说话者、思想者、艺术家、科学家和积极参与者的角色。脑力工作也是社会工作。学校需要伙伴来做这项工作，即使这样的伙伴是想象中的。进入“高级”学术文化氛围中的穷孩子比我们任何人都更需要这样的伙伴。

学校上演的《麦克佩斯》以及纪念仪式反映了那种要让某种价值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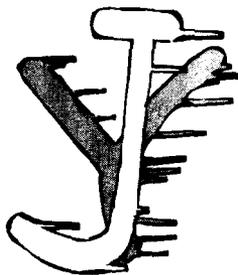


公共场合下凸显出来的努力,即让学校作为观众来实现这些价值。来访者不久就会认识到孩子的表演不仅是为他们自己,也是为教师。待到毕业时则是为聚在这里作为特殊见证人的外来者而表演。其他学校的许多教师也认同这种尊重与理性的价值观,但是,在他们教书的地方却常常缺乏这样的公共机构,以使这样的习惯能像大礼堂里的喧哗和恶作剧那样成为平常的事。

《思想的力量》一书一方面是创造这种尊重机制的记忆过程;另一方面则总结了在其他地方创办相似的学校应当遵循的几条基本原则。这是一个向时代挑战的民主主义教育和公立教育的宣言。上演《麦克佩斯》以及回顾一个朋友的一生会涉及尊重和富于想象的移情作用。迈耶认为,如果人们对上述这种融合提出健康及理智的怀疑,并且,使之成为日常的课堂习惯,那么就开始获得了某种为参与民主而设计的课程。

民主主义教育应该是教育所有的人去当家作主。迄今为止,大多数民主政体所做的真正雄心勃勃的事情只是为了精英阶层的孩子。处于中产阶级的人们,特别是穷人接受的只是精英教育的残羹剩饭或更差的东西。迈耶讽刺了在政治和教育中出现的极为强大的被扭曲了的怀旧力量。她明确地指出,在教育方面的好日子对超过一半的人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当中穷人的孩子尤其深受其害。迈耶在过去20年里的工作是对变革思想富于想象力的新的佐证:一切孩子生来平等,并且,许多从高中毕业的孩子所拥有的智力是历史上通常为少数人保留的智力。而且,学校的工作表明,渴望拥有奇思妙想(依照埃莉诺·达克沃斯非凡的术语)的教育并不是以牺牲读、写、算三种基本技能为代价所获得的难得的成就,而是某种使这三种基本技能充满活力的方法。

这方面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因为,现在美国整个社会所接受的教育就是不要对穷人和有色人种(“城内”)的孩子抱太大的希望。在美国国会工作的人员正忙着巩固剩下的“安全网”和“安全梯”。不能指望让一个穷人的孩子来判断《哈姆雷特》是否比《麦克佩斯》更喜欢发表理性的观点。在大众普遍感到绝望的年代,没有多少人准备倾听这样的观点,即公立学校是开发所有儿童特殊潜能的合适载体。东中央公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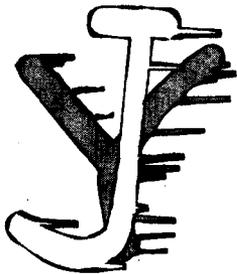
学的例子表明,每一代人都需要不断更新的宣言——现在的问题不是民主主义的和真正的公立教育是否可能,而是正如迈耶所言,我们是否真正需要它。

迈耶有关重新思考美国中学起源的观点发人深思,这一观点源于这样一所中学,它的学生一半是非洲裔美国人,三分之一是拉丁美洲裔,还有10%是白人。在这所中学中,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可以享受免费午餐,还有20%的学生生理有缺陷。而正是在这所有50%的学生不能完成中学学业的城市里,东中央公园中学却把超过80%的学生送入大学,他们在那里完成学业并拿到了学位。

公共机构总是由历史发展而来。教师、家长、孩子以及今天的改革者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才是大厦建设的基础。原东中央公园小学的大部分教师以及东中央公园中学的创始人——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拉丁美洲人——都是进步政治和教育运动,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开放教育和人权运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有许多人还植根于早期民主主义教育的进步政治和传统。一些人是莉莲·韦伯市立学院研究中心的学生。另一些人像迈耶一样,是早期儿童教育的行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进步思想和实践的传统。

迈耶和她的助手们从20世纪60年代的折中主义和具创造性的潮流中形成了某种头脑坚强、富于耐力以及善于交流的观念。迈耶和她的同盟者对被称之为开放教育的个人主义中心感到不安。他们批判了进步教育理论反理智的一面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伤感言论,声称,如果让儿童自己去动手做事情,那么,他们就会像鲜花一样开得美丽动人。迈耶和她的同盟者相信,成年人应该给孩子教一些有意义的和必要的事情。迈耶早期就对测试和评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试图寻求合适的办法替代以前那些决定儿童命运的常见的量化方法。从强烈的政治愿望出发,迈耶和她的同事们是坚定的公立学校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通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实践,他们将目光清晰地聚焦于美国教育中的重大问题上。这当然不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什么“中等阶层”的问题,而是贫苦孩子的生命力问题。在人权运动衰落后,这些训练有素的人们仍在坚持着,就像现在的许多人一样,不断地在这个体系中寻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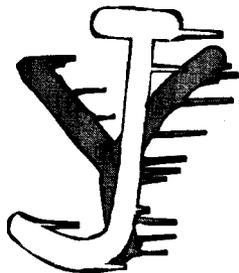
找着自身的缺陷。这位满头白发的坚持者吸引其年轻的同行们关注这样一种观点——即教师可以是一位艺术家、知识分子和为贫穷儿童争取权益的倡导者。

鉴于进步教育在幼儿教育阶段所拥有的丰富而成功的历史经验，在纽约市创办一些优秀的小学校或许不费吹灰之力。而东中央公园小学则为纽约市第四区可选学校清单上增加了可圈可点的选项。但真正令人惊喜的是，它为城里的孩子创办了全新的以进步教育观念为基础的中学。除了得自于其灵感的实践外，迈耶的中学理念也是对进步教育思想的重大贡献。一个让人惊叹的思想仍然震撼着她的听众：中学应该一方面把幼儿园的最佳特征与学前教育的传统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与研究生阶段的精英教育结合起来。迈耶认为，幼儿园和研究生院是鼓励学生拥有思想、追求个人志趣的地方，具备任何深入教育的基本特征。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是，迈耶对成人教师组织重要性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与以儿童为中心的理论应对的是糟糕陈旧的进步教育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教师可以单独承担挑战性的教学——这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事情。迈耶看到对儿童学习的支持关键取决于对教师进行持续教育。这一想法源于她早期的思考：“我决定去思考如何创造最佳的条件，以使教学和以前一样让我感兴趣，同时思考如何能提供在以往的公立教育中失去的良好的教学氛围。”

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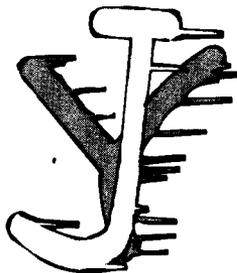
在正常的纽约市中学预算标准和有关大城市的一揽子规定标准的范围内，东中央公园中学的贡献的确使人耳目一新。现在，每位教师负责的学生不超过40名，和许多中学教师每天监管150名学生形成鲜明的对比。课程表出人意料地简单：总共两节课，一节是两个小时的人文学科，一节是两个小时数学或科学。教学小组可以确定在这些跨学科的课程表中应该教些什么内容。学校有一套严密的咨询系统和一个留有充裕时间进行计划、咨询以及会议的日程表，包括吃午餐的合理时间，以便支持学校开展引人思考的谈话。起初的入学条件是，当孩子被录取时，家长必须走访学校。这一做法仍在实行，只是现在的录取是以抽签的方式进行的。



东中央公园中学在测试和评分方面开创性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方法,特别是提出了一个详尽的训练方法,要求学生毕业时提供他们在不同的知识领域的作品。如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学校针对评价的严格态度表明,讲求实际的进步教育理论强调学生和教师的实际表现以及实际的读写能力,轻视评价中学学习标准的学术方法。从性质上来说,学校的态度也凸显了一条重要原则:价值是评价一词的核心。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改革者一道,学校的改革者们积极推进对标准中学课程进行全面的重新思考。东中央公园中学的学生必须了解很多知识——而在毕业时所展示的作品是最终展示他们所获知识的方式——但是学校更关心的是帮助教师形成一套经验,使学生能够获得某些思维和行为的习惯。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东中央公园中学在针对思维习惯的基本分类来帮助教师和社区重新思考课程的目的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东中央公园中学各门课的教师希望学生拥有询问观点的习惯:谁说了什么?从什么角度?他们想让学生针对事实来提问,譬如,你是怎么知道的?就有关原因和结果提问,如,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彼此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提出假设,如,假如……会怎么样?看待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法是什么?等等。东中央公园中学的第五个思维习惯是美国中等教育中最被忽视的,即提问的习惯,如,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要在意呢?为什么这点值得了解呢?[要了解所有这些情况以及更多的实际做法,可以租借弗雷德里克·怀斯曼拍摄的为时三个小时(是,三个小时)的有关东中央公园中学的精彩影片,中学第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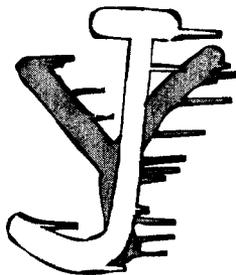
东中央公园中学已经成为教育改革运动最具影响力的标志之一。88
该项运动旨在对学校制度和教育的重新思考,达到使儿童用好大脑的目的。东中央公园中学是西奥多·赛泽的重点学校协会的早期会员,并且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该协会在推广美国中学的知识挑战和进步教育形象方面曾取得很大的成功。它对小规模学校的优势给予了强烈支持。德博拉·迈耶最近从东中央公园中学的校长位置上下来,开始主持一个新的尝试,即创建一个在纽约市系统内的包含50个或更多的小的公立中学的网络系统。其总的思路是迈耶所写书的思路以及从改革



运动中发展而来的思路：有意识地创办一些规模小的品牌中学；学校有自主权，包括聘用、教学和学习的重要决定权；在日常工作中，划出许多时间构建各种关系以及对经验进行反思；创建一种相互尊重的文化氛围和结构，在各个领域培养提问的习惯和专业责任感，形成一套良好的思维习惯。只有在最需要的时刻，那些有权威的想法才能深入人心。

对创办这样的学校我没有十全十美的评判方案，只有从怀斯曼精彩的影片中获得的两个印象。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满脸困惑的孩子看着作文题目无处着手，而一名教师正努力帮助孩子弄懂题目的意思。这个孩子在困惑中嘟囔地说着些什么，疲惫的教师在一旁坚持着，似乎就这样过去了几百年。慢慢地在痛苦中，教师和观众似乎开始看到胜利的曙光。这篇作文或许是关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如何在文艺复兴时期生活的，但是，按照孩子极端、狂热和狭隘的观念，该怎样理解哥伦布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呢？尽管不可思议，一个想法开始在孩子的心里慢慢形成，这就是教学，即教学工作就体现在所有的枯燥乏味或光彩夺目中。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一切儿童拥有的伟大思想之所在。

我从怀斯曼精彩的影片中获得的第二个印象是，东中央公园中学的教职员工对标准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指导儿童去达到现实世界的标准，如跳班英语测验考试。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儿童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以便使经验变得有意义。双方的确拥有杜威和杜波依斯以及几代被人忘记了的教师们所追求的广义的真理。然而，更重要的是，东中央公园中学教师间的相互争论拥有我们大多数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人所缺乏的东西：尊重的构建。



民主主义与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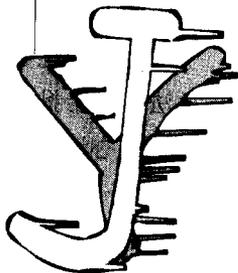
2002年6月

89

亚伯拉罕·林肯在其伟大的民主主义入门一文《葛底斯堡演说》中,创造了为平等和自由而努力奋斗的美国历史的现代神话。他把美国作为创造民有、民治和民享政府的实验之地。而这一思想反映在教育上的结果,就是创办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教育。这种文化的最终目的是萌生一个迄今尚不存在的,甚至在古代的雅典,那个奴隶制的、认为妇女是下等人的国家也不存在的民主文化的理想。沃尔特·惠特曼和约翰·杜威以及许多代像我的祖母——一个在宾夕法尼亚煤矿做小学校长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那样的学校教师都在梦想着这种为了一切孩子的文化。如同政府和政治的关系一样,这种民主文化的精髓在于积极地参与。要培养独立的思想家和具有强烈自由意识的公民,就需要儿童在思想上积极参与所有的课程。虽然,我们距离这个目标依然遥远——这一事实使人感到有些难过——但是,这并不令人感到特别惊讶。

与现代民主一样,公立教育是一项新的发明,也是一种实验——它的存在只有几代人的时光。在我们目前对公立学校的失望中,我们忘记了这项实验还是很新的这一事实。在世界各地,充满希望的女童们第一次跨进了教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的是,一个至今仍把教育的注意力放在特权阶层的世界,现在依然缺乏某种良好的教育体制模式,或许这种良好的教育体制模式就是指导所有的孩子为完全参与生活而做准备。

今天,那些以丰富的传统的美国价值观看待学校教育的人们可能



和我一样,主张要以高中毕业和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作为每个孩子的奋斗目标——这是一种过时的、普通教育中传统精英思想的现代民主主义的翻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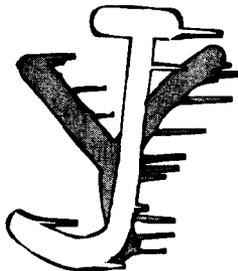
我相信,这种更新的、更加复杂和人性化的教学和学习的观点,事实上非常适合我们这个经济快速变化的、由一个独立的多元文化和多种族世界带来挑战的信息时代。狭隘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念——其目的仅仅在于获得知识,或者,举个例子,仅仅是为了获得特定工作而参加培训——从表面上看,更为有效,更适合于成批培养,而且,更能迅速地以计算机评判考试的方式加以测量。但是,这种教育观念并不能使

90

我们建立起某种体系,以使大多数学生能够为成为工人、国家的或世界的公民以及成为文化本身的参与者而做好充分的准备。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一位民主人士,非美国民主党党员)和一个对儿童心智感兴趣的支持进步教育思想的人,我乐意与那些现代的、有思想的保守派,如E·D·赫希和黛安娜·拉维齐结为联盟,支持关于公立教育目的这一较为传统的美国观点,反对那种关于学校的社团性的和消费性的观念,即把学校仅仅当作是使学生获得基本工作技能或接受职前培训的场所。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培养善于思考的、有知识的公民应是学校教育的真正目的。其基本的要素,则是下一代人必须继续完成林肯所称之为的一项伟大的民主主义的实验。当然,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某个更为宽泛和自由的教育观念,可以使学生在任何情况下,为迎接不断变化着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但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学校教育在培养未来公民以及政治、文化和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过程中的合理作用。

尽管在面临反对团体和外行势力的对抗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在广泛、自由和民主的目标下结成联盟,但是,赫希和拉维齐却与他们所认为的上个世纪教育的“进步人士”所追求的低级目标有不同的认识。读他们的论著会对那些以进步教育人士自居的人产生非常悲观的看法。赫希批判了“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对儿童中心论的浪漫崇拜,该中心论降低了学生获得拥有基本文化内容(1987)的充实课程的可能性——而这曾是赫希在许多学校推广的有关此类课程的有趣观念。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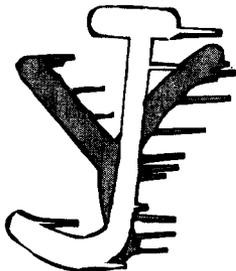
希充分地说明了所有学校科目中知识与大胆思考之间的关系——你的确需要了解许多东西以便理智地思考南北战争——但是,赫希错误地以为许多从杜威到西奥多·赛泽的“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对这一问题没有太多的兴趣。关于思考南北战争或其他话题,赫希缺乏对儿童心智的好奇心——对于他是否对教会儿童思考感兴趣这一问题还一点都不清楚。或许,思考是留给研究生院的学生来做的。儿童并不能给赫希的教育相互作用的观念带来太多的实证,尽管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对民主坚定的承诺,但是,他经常设法使自己听起来更像是一个现代的冷漠的学校改革者,为在黑板上写完一长串单词而剥夺了学生们课间休息的时间。

拉维齐的《左翼的支持》(2000)一文讲述的是美国教育争辩的历史。查看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左翼和“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并不是你所认为的那样(我仍然认为)一直倡导教育平等,而是提倡系统的教育不平等。非但不相信工会、人权以及为平等主义改革发起的妇女运动,拉维齐反而声称自己一直反对进步的人为民主和教育平等战斗。拉维齐独特的努力的确发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反对进步的人,这些人

91

在为所有人争取学术式的教育而战斗——这些人是我认为的那种反对进步的人。然而,拉维齐把注意力集中在非常单纯的(几乎是黑格尔的)思想史上的观念则完全忽视了许多强大的社会力量,包括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阶级制度,这些力量对美国中学的影响肯定远远大于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一小撮左翼教授们施加的影响。在拉维齐宏伟的历史画卷中,我可能找不到我的祖母或像她那样的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她是对的。那些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可能成为反对知识分子的人,他们蔑视自由学习和自由学习的价值——早在上个世纪初,许多人赞同遍布美国各地的活动,即在成绩分组的中学里为二流的学生开设二流的课程(尽管今天不少反对进步的人经常是反对不搞成绩分组建议的人)。拉维齐讽刺左翼的旧式的平庸,即毫无幽默感的“进步教育运动”的学校,在那里孩子们学的是当地的道路系统,而不是有关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或玛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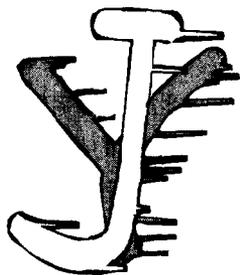
拉维齐尤其是在看待 20 世纪 60 年代时表现出近乎责骂的态度,



她认为,在这一时期一帮野蛮人好像劫掠了罗马,之后,留下的是冒着黑烟的教育废墟。之后,在著书批判所有有关“进步教育运动”内容结束的时候,拉维齐做了一个 180°的大转弯,恰恰是这一点却被反对进步主义的评论家们忽视了。拉维齐在论著结束的时候高度赞扬了一部分“知识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例如西奥多·赛泽和德博拉·迈耶。拉维齐诚恳地承认,这两个人确为课堂教学设立了严格的人性化的且需动脑筋的目标,并与现实中的教师和孩子一道对这些目标设想进行实践。虽然拉维齐没有说明,但是她的许多研究成果应归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充实的课程、学前教育、人权以及其他运动(请原谅我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像拉维齐和我本人一样,这些“知识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长久以来就主张,所有的孩子都应当接受某种民主形式的文科教育,学校应该是所有儿童很好使用大脑的地方。拉维齐写道:“我自己的孩子是在纽约市长大的,在那里他们上了一所私立进步教育学校,学校在学业上是非常严格的,而在教学方法上又是非常大胆的。”她谈到那里的教师“虚构了一些可以激发学生思维和想象力的课题。如果我能挥舞魔杖,这正是我想为所有儿童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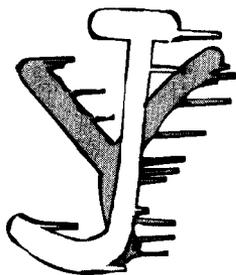
因此,为什么要为我们所有的儿童提供这样美妙的课堂教育呢?拉维齐的回答既简洁又独特:“理智进步教育思想是否能够在特定的学校环境下发展尚不确定。在世纪之交,一所典型的公立学校是被官方严格控制的,开设了许多不连贯的非事先计划的课程,缺乏知识的连贯性。理智进步教育思想在 20 世纪末的一些私立学校或规模较小的公共行业的非传统和特许学校里盛行。”我在这个问题上花了 30 多年的时间来研究,现在不得不赞同拉维齐的观点——针对所有儿童的文科教育的进步教育思想是否将在实际工作中成为“典型的公立学校”的规范尚不确定。另一方面,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放弃长期的历史抗争呢?从短期看,拉维齐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她似乎赞同当前这种把注意力集中在由上而下的标准和严格的高风险测试方面的学校教育的改革方式。而从长远看,她又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因为她好像认为公立学校永远不会像她孩子上的私立学校那样好。把她的绝望情绪看成是当前这个国家教育心态状况的象征公平吗?如果官僚体制和规模如同

92



拉维齐说的那么有害,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有影响的反对进步人士所推进的旨在使所有学校朝更为官僚和照本宣科式教学方向努力的行为就是一个错误。或许我们需要一个广泛的包括教师和公众在内的同盟对诸如充满想象力的教学以及规模越来越小的学校这样一些危险的趋势给予更多的关注。许多家长和学生赞同我的观点,那就是,在拥有高标准的同时,不去进行我们目前为之努力的标准化应该是可行的。

另一方面,我是一个短期的悲观主义者,担心的是当前各种各样的学校改革所带来的非预期的后果。但是从长远来看,我又是一个对民主主义和教育更为乐观的人。再次引用约翰·杜威(1907)的话肯定是最为合适的:“最好和最聪明的家长,想为他的孩子得到的一定是社会想为所有孩子得到的东西。”民主主义的任务就是说服家长和选民为培养完整的儿童至少接受某种折中的智慧形式,一种平衡的教育。





第三部分

教师与课堂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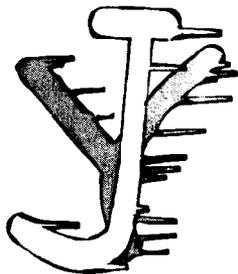
费瑟斯通有关教师与课堂的论述包括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英国小学课堂教育,时间跨越 30 年。费瑟斯通关于英国学校的论述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发行量很大,《新共和》杂志就再版发行了 10 万册。费瑟斯通带我们领略了赫伯特·科尔在哈莱姆的文学课堂以及弗朗西斯·霍金斯对聋哑学生幼儿园课堂的观察。他所描述的一些课堂与其说是地理位置上的,不如说是概念上的,这正如在他的《海伦和教师》一文中所描述的那个紧张、不安、然而又是极为忙碌的课堂状况,这个课堂集安妮·沙利文和海伦·凯勒的生活为一体。最近,费瑟斯通将“生动的课堂”界定为是某个教师和学生提出的涉及学习是什么这一紧迫而又经常性问题的地方。

费瑟斯通一直促使他的读者去认识这些教师和学生的聪明才智,对这些人的描述以及评论是其观点的核心所在。正是通过这种记者的口吻,我们发现,在梦幻的甚至是浪漫的实践者与实用主义实践者之间存在着某种有意义的紧张关系。对英国小学教育的描述加上一个详细的开支清单以及“温迪屋”的详情介绍,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本“入门”手册,而且,这个国家某些奇妙的教室正是那些读他系列文章的教师们梦寐以求想要教书的地方。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也发现了这位历史学家在阐述教学和学习的特定环境和条件时所表达出的愿望。例如,在谈到安妮·沙利文时,费瑟斯通写道:“她把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学、复兴的浪漫主义以及社会改革融合在一起,表明了她那一代人及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随后,通过将珍妮特·阿米登课堂中的“快乐”与被葛雷硬先生所主导的成千上万的学校环境进行对比,(葛雷硬是



费瑟斯通小说中的主要对手,被狄更斯命名为一个不喜欢儿童只崇拜“实物,实物,还是实物”的冷酷无情的教育家兼工厂主),费瑟斯通将我们带进了这个棘手的、矫揉造作的戏剧世界,轻轻推动课堂这个戏剧舞台,并准确而清晰地将其照亮。

最后,尽管费瑟斯通声称“任何企图描述精彩课堂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尝试都将不会成功”,但是,他对努力中的教师和学生的描述对我们理解教学的内涵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正如他在1997年给《生动的课堂》一书的前言中所写到的,“把这句话钉在墙上:快乐是关键”。



英国的小学革命： 儿童的学校

——英国的教室里正在 发生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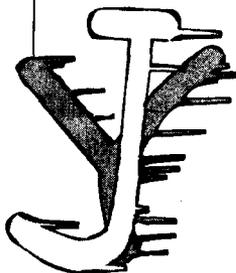
1967年8月19日

完整的一天

最近,我和夫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走访了英国一些小学的班级,并同师生们进行了交谈。朋友告诉我们发生在英国教室里的一些美妙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几乎还没有为我们所发现的事情做好心理准备。近几十年,英国的初等教育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革命,涉及如下一些方面:儿童是学习的新方法、课堂组织、课程以及教师地位等。我们考察了当地一些好的教育部门如布里斯托尔、诺丁汉、莱斯特郡以及牛津郡管辖下的学校,另外还考察了几个在伦敦这样的城市里为移民居住区服务的学校。

接下来,我将尽可能具体地讲述学校里的班级是如何运作的、教室是如何布置的、里面都摆些什么东西、教师和学生如何度过每一天以及稍微详细地描述孩子是如何学习阅读的等等(举一个正在进行的学习类型的例子)。我知道美国的教师,特别是优秀的教师,对大多数有关教育的演讲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所听到的演讲很少与实际课堂运作有关。我希望我的演讲能尽可能地具体一些。这些英国的课堂教育对美国教育究竟有多少相关性的确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我会把它放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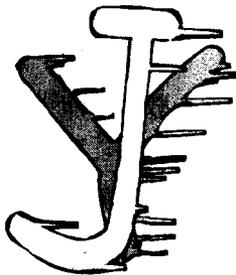
在稍后回答。

英国的小学分为“幼儿”学校和“小”学校。英国的幼儿学校接受 5 到 7 岁的儿童入学,而在一些地方为 8 岁。在幼儿学校,孩子们学习读书、写字和识数。小学校接受 7、8 岁到 11 岁的孩子入学,之后他们继续上中学。幼儿学校和小学校有时在一个楼里上课,一些地方当局,如牛津郡,则规定把这两类学校归为一个学校,如同美国的初级小学。

韦斯特菲尔德的幼儿学校如同成千上万个美国建筑一样,是一个一层的平房建筑,坐落在莱斯特郡某个劳动阶级房屋的地皮上。如果你去得早,你会发现教室里已经来了不少孩子。他们有的读书、写字,有的在画画、演奏,有的在照料宠物。教师慢慢走进教室,并且和学生们一起做功课。除了某个宗教集会日外(法律规定的),你很难说清楚学校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上课的,因为,整个班级没有什么有组织的活动。迷惑不解的参观者看到几个做数学或阅读作业的小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孩子们自己做自己的事。他们来回走动,毫无约束地讲话。教师有时坐在桌子旁边,而孩子们都拥向她不停地提问题,在更多的情况下,教师则在教室里来回走动,指导学生的作业,听孩子朗读,向他们提问题,给他们提示单词,与他们交谈,并不时督促他们。

学校过道的大小和美国学校里的过道差不多,里面到处都是忙碌的孩子,还有孩子们的图画展,以及一家杂货店。孩子们可以用代金券在那里买东西,从而学会数数。过道里还有画架、展示贝壳和植物标本的桌子、敲钉子和木板用的工作台以及装满积木块的大木箱。

教室的门朝着游戏场敞开,游戏场的使用频率也很高。一群孩子跪在草地上用秒表记录着乌龟爬行的速度。他们想绘制一张人与其他宠物的运动速度相对比的图。旁边是几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他们正在完成一个复杂的高高的积木塔,孩子们每加上去一块积木都会兴奋地数着“23、24”。还有一个男孩正在独自把各种粉末和在一起做颜料,画架上铺了一张很大的白纸,纸上已画了重重的几笔。男孩在画一幅独特的建筑,看上去不太吉祥,建筑好像主要是由黑色百叶窗组成的,每个百叶窗镶着深红色的窗户。“这是我弟弟入住的医院。”他说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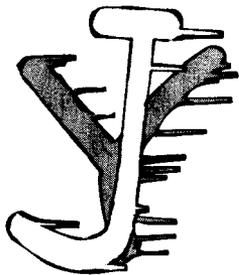
来访者拉到班级藏书角,拿出一本图画书,上面讲的都是医院什么的。他虽然还读不懂(他只有5岁),但是,他说要读懂它。他确实在这么做,他已经弄明白一些单词的意思了,书上的一些单词确实有些难。看得出来,他一直在研究这本书,因为,他非常想知道有关医院的知识。在过道的另一端是为全校设置的更为安静的藏书角。那里有两个男孩在大声朗读,读得好一些的那个男孩正在很勉强地给那个读得磕磕巴巴、速度稍慢的男孩纠正错误,后者看上去很感激的样子。

教室里比较嘈杂,声音比许多美国教师或校长所能容忍的要大,因为,孩子们可以自由讲话。有时教师不得不让他们安静一些。由于一些班级的学生人数多达40人,教室显得很挤,常发生一些事故。如,颜料泼了出来,桶里的水溢了出来,免不了受到批评。通常,都是孩子们自己拖地板,然后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来访者们被孩子们自由写作的成果,无论是其数量和题材,还是行文的流利程度弄得眼花缭乱,难以置信:有故事,有寓意复杂、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由诗,还有准确的“数学”实验报告。最后,站在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身后,来访者发现了这样几句话:“今天,我们这儿有几位来自美国的客人……”

97

不一会儿,你会从眼前眼花缭乱的作品中清醒过来,开始做更明确的观察。教室里的布置都有鲜明的特色。美国的教师逐渐认识到灵活的教室的意义,而即使在美国的那些好的小学里,这通常也只是意味着活动的桌椅而已。而在眼前的这些班级里,没有个人的课桌和固定的地方。在教室的周围(大小与一个美国普通学校里的教室差不多)摆放着从事各种活动用的各类桌子,活动包括美术、水沙游戏和数数作业(数数桌子上标着各种数字的线条,也就是一些按顺序标着数字的纸条,孩子们可以学习数数并进行数学推理。例如,珠子、纽扣和可数数的小东西;各种秤砣和秤;固体和液体量器等。学习基本数学概念的各种仪器,一些是自制的,还有一些是定做的。最好的商业教具都是人们熟悉的:如奎茨奈棒,迪恩斯多基点教具,斯特恩棒以及特质或逻辑积木等。韦斯特菲尔德幼儿学校对这类教具重视的程度远远胜于正规的算术课)。



游戏房和木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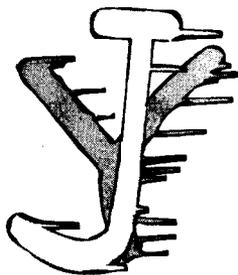
每个班级都有一个藏书凹室,被一个隔断房间隔开,隔断还被用作开放的图书书架。一些藏书角的地上铺了一块地毯,放着一把舒适的老式椅子。每个教室都有一个“温迪屋”,即游戏角,里面摆着各种过家家用的玩偶和家具。通常,教室里还有一个化装角,里面挂着各种旧的成人衣服。小孩子喜爱温迪屋和化装角,但是,你也会发现大一点儿的孩子也使用这些地方。一些班级还有木偶剧场,用自制的木偶上演一些即兴的表演,临时舞台是把一张课桌的腿颠倒过来摆在另一张桌子上搭成的。小孩子们经常表演舞蹈戏剧,伴随着动作和喃喃细语。

孩子们的一天是如何在这样的教室里度过的逐渐明朗化了。在许多幼儿学校和小学里,对一天活动日程的选择完全由教师决定,而教师则反过来把选择权留给孩子们。许多学校的幼儿班级,其课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甚至分不清什么是学习,什么是玩耍。按照这些思路管理的学校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叫法,可以叫“自由的一天”、“完整的课程”或者“完整的一天”等。其实叫什么几乎不重要了。

在一个以“自由的一天”为名运作的学校里,教师通常是以列出各种可以开展的活动来开始一天的活动的。按照教师所说的,这样的上课方式需要大量丰富的材料,但是,最好的材料是自制的。不管怎样,每件东西不一定需要准备 30 到 40 套,因为,大多数的活动只限一部分学生。有个教室里的牌子提示道:“温迪屋里只能有六个孩子一起玩耍。”地面的规则是,游戏结束后孩子们必须清扫地面,并且不能打扰别人。

一个孩子对自己喜欢的活动可能玩一天,也可能玩不了一天。许多教师承认,如果每个孩子每天不读点书或写点什么,他们会感到紧张。而其他教师原则上承诺让孩子们自由选择。在实践中,许多教师认为,在需要时会给孩子们布置一些功课。这种方式和其他做事的方式一样,教师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和学生的性格来调整做事风格的。但是,学生真正进行选择,并且真正有目的地做功课的程度还

98



是令人吃惊的。

孩子们如何学习阅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这样的教室里,甚至是更大的教室里进行个别学习和教学的范例。阅读并不比别的课程受到特别的重视,而我把它单独拎出来则完全是为了作为例证来加以说明,尽管将英国的班级和美国的班级进行对比是非常生动但又令人沮丧的。在美国的学校里,阅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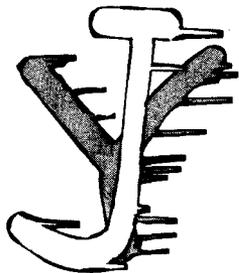
首先,很难说孩子们是怎样学习阅读的,因为各科目没有单独分开。答案渐渐开始明朗,并使这些过去一直认为教师是教育之主导的美国来访者们感到惊奇:孩子们是通过相互学习来学会阅读的。孩子们在能够阅读之前在藏书角呆了许久,翻弄着书,看着图画,尽量去找他们知道的单词。当教师听其他孩子朗读时,他们边听边观察。经常可以看到不读书的孩子看着读书的孩子,然后开始模仿他们,就像猴子相互间的模仿一样。没有人取笑他们拙劣的模仿,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

英国在两三个地方部门管辖的几所学校里采用了他们称之为“家庭”或“垂直”分组法,这种方法进一步发扬了“儿童教儿童”的思想。在这些学校里,每个班级都是全校学生相互交叉的一部分,各个年龄层的孩子混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入学早期似乎相当成功,新来的孩子易于融入到班级中,稍大一点的孩子帮助小一点的孩子消除不良习惯,开始阅读入门。尽管大一些的孩子有时可能还会有孩子气,但他们也能从这样的课堂环境中受益,从他们扮演教师角色的过程中受益。教师们说,家庭组合需要更小的班级,因为,这种组合要求严密的监督以使小孩子的重要性得到保证,也使大一点的孩子仍能受到挑战。使用这种方法的教师应承诺其所提供的方法的灵活性。

这些学校的教师使用一系列的阅读图解、可视性阅读和读音法等阅读方法,无论什么方法对孩子似乎都很有效。

丰富的图书资料

在越来越多的较好的幼儿学校里,已经取消了教科书和教学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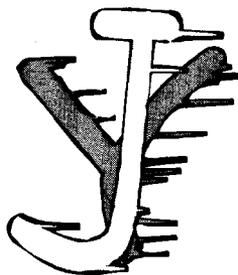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书。学校不再把有限的资金花在购买每套 40 本的教材上,而是购买了各种成套的系列阅读丛书和许许多多单行本的书,阅读难度各个层次的都有。由教师来安排课堂里的藏书角,这样他们就可以指导不同能力的学生选择不同程度的书。但是,在大多数班级里,孩子们可以想读什么就读什么。作为某种限制,严谨的教师一般要求学生靠自己读完一套阶梯系列阅读丛书,至于阅读哪一本并不重要。

无论孩子采取何种方式开始学习阅读,都会同时涉及学习写作,并且,有一些孩子在阅读之前就开始写作了。还有一种试图消除口头语、书面语和印刷文字之间的心理障碍的方法。孩子一入学,就会得到一本大的、没有线格的笔记本。这是让他自由写作的本子。他可以把自己想到的内容都写在里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用蜡笔或铅笔在本子里画一张画,并和教师一道讨论这幅画,向教师口述这幅画的名字,如“这是我爸爸”则是教师后来替他写的。孩子把这幅画的名字抄在图画的下边。通过这种方式,孩子开始学习他听写下来的单词和短语,记住它们的外观和发音,直到稍加帮助就可以写下来。他的笔记本常常是他自己第一本阅读材料。

孩子还会得到一本更小的笔记本,实际上是他的个人小词典,里面是他输入的学到的单词。“我学到一个新单词”,一个 5 岁的孩子对来访者夸耀地说。孩子们总是跑到教师那儿询问自己碰到的单词,因为他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东西要写。好教师不会轻易将答案告诉他们,而是要让他们自己琢磨一阵儿:孩子们必须要猜出第一个字母并弄清单词的意思,然后才能掌握它。因此,孩子们是在非正规的情况下掌握读音技能的,尽管一些教师确实采用可视性的阅读卡片和一些正规的读音法练习。渐渐地,随着孩子积累了一定的阅读和写作词汇,他就会达到一个流利的阶段,而且,你会发现一个 6 岁的孩子可以写故事和自由诗,还会向包括其他孩子和教师在内的听众汇报其在课堂上所做的事情。

通常,教师要等到孩子写出像样的东西的时候才去注意其写作的准确性或简洁程度。经过一段时间,教师就会在教学中引入句法和拼写知识,但并不作为单独的课程或单为此目的而开设课程。上述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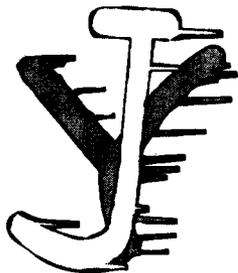
句法和拼写知识只有在想使你说的话更为有效时才使用。在孩子们根据这些方法决定写作内容后,要让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写作的内容,而不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上面,如标点符号、拼写以及句法等。在一所好的学校里,这些内容是通过采用生动的方法和教师清楚的表达,使孩子听懂并传授给他们的。甚至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对孩子的其他功课吹毛求疵的教师也能学会尊重孩子自由写作的内容,并且,能认真地看待这些内容。这种对孩子的自我选择内容的重视在那些使各类教师与孩子共同学习的学校里出现了儿童文学繁荣的景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写作风格上有所发展,说书的人和诗人就不一定和那些在数学方面能写出非常优美和文雅文字的人一样。孩子们的作文、所讲的故事逐渐成为一些学校中部分正规课程的教学内容。

我所关注的是阅读,当然孩子们也把他们的不少时间花在其他的活动上,而且,在我们所参观的学校里,教师可能对我单独挑选一门学科的做法感到不快。最好的教师往往认为,艺术才是主要的。布里斯托尔地区西米尔学校的校长深信,如果艺术好,其他课程都会好。的确,在西米尔学校,其他课程都很好。在那里我们观看了孩子们上演的一场伴着乐曲自编的优美的诗歌和歌曲演唱会。

但是,我的目的不是展示孩子们的阅读能力,而是介绍教师们已经改变了的角色。正规的课堂教学——教师站在课堂前面,对着全班的学生讲课,或者甚至一个一年级的班级分成若干个阅读小组,而教师一个个听他们朗读,并且还要尽全力维持课堂秩序——已经从许多幼儿学校和不少小学校消失了。这种教学方式消失的原因,一是由于它把某种单一的教学模式强加给全体孩子,从而迫使学校按成绩分班或按能力分班,并因此忽视了儿童相互教育的能力;二是因为在许多普通学校里,其他的方法效果可能更好。接受过正规训练的普通教师在亲眼看到使用这些方法的结果并未一团糟的时候,就会喜欢这样的角色。

非正规意味着艰苦的工作

上述这些方法对教师而言,意味着投入更多的工作。尽管在非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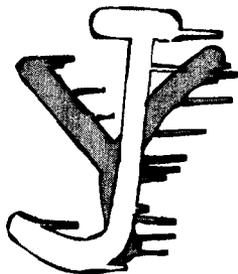
规的状态下,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教师并不一定知道孩子们在忙些什么,但重要的是教师应当详细、准确地记录孩子们所学的内容。孩子们也可以自己记录:在一些学校,孩子有自己个人的书架,上面收藏着他们自己的作文本、实验报告和数学作业、读过的书以及他们和教师约定的检查朗读的日期。如果美国的家长看到这些孩子作业的一些详细内容,包括艺术作业的范本,那么,他们会非常有把握地认为,这个报告卡片是一个骗局。

101

当班级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孩子们都是独自做事的时候,纪律便不会成为一个太大的问题。当然,还不能因此取消纪律,但是,它的重要性会变得不那么凸显。我们也了解到,这些孩子的有目的自律使得英国的中年人与美国人一样感到惊奇。这是近年来发展的成果,而绝非是某种幸运。为了组织这样的班级,并且提供丰富的教材,教师们投入了大量的辛勤劳动,给予了很大的关心。教师在这样做时发现,他们可以在白天为那些需要的孩子腾出一些时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注意力连续五分钟都放在一个孩子身上,对这个孩子来说,这样做要比整天看着这么多孩子的脸意义大得多。”一位在一所东伦敦港区学校的教师如是说。还有一些教师说,当孩子们在活动的时候,教师可以看着他们并向他们提问题:这样就更有可能弄明白孩子们真正理解的是什么。

我们所观察到的并非是统计实例。我们走访的不同社区一些好学校的做法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但是,有理由让人相信这些做法再也不是出人意料的某个独一无二的情况。我们所考察的学校大多数都是以普通教师居多的学校,这些做法不是单个的由想法古怪的人或天才所做的实验。作为政府咨询机构的普洛登委员会 1967 年发表了一份内容广泛的、在美国人看来是非常极端的报告。报告指出,英国 23000 个小学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已经受到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深刻影响,另外三分之一在这些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影响下开始跃跃欲试,而剩下的三分之一则仍然沿用着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英国学校以及目前的美国学校正规的教育思路组织教学。

这种变化在幼儿学校随处可见,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在小学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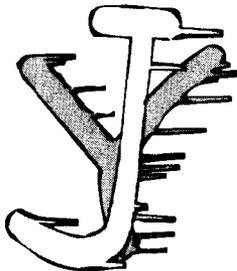


开始越来越普遍。在一些地方,小学校正在幼儿学校提出的自由主题的基础上进行惊人的变革尝试。但是从总体来看,小学校的变化还是比较慢的,缺乏自信,并且面临着更多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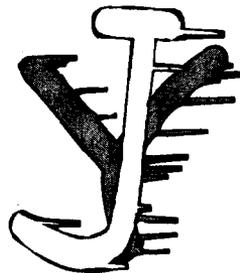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许多正规的学校,或许按照传统的思路运作其效率要高得多。当然,也不好这样武断地说。例如,一般而言,在传统的考试成绩方面,英国传统正规班级的学生要比更自由班级的学生好一些(这项调查是由普洛登报告提供的)。成绩区别最大的是机械的算术,区别最小的是阅读。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也有理由对这些情况不予理会,因为,有证据表明这种差别在高年级里会消失。正规学校教儿童参加常规的考试,这是他们的职能,如果他们的所有努力没有带来什么结果,那倒是让人感到惊讶了。再看看在较为自由的缺乏考试训练的学校里的情况,其学生的成绩在我看来似乎是高得足以令人称道了。很明显,在非正规学校开设的数学课,注重的是数学的关系,而在这些关系中思维的过程要比掌握算术技能重要得多;它所开设的英语课,自由写作要比句法和其他内容重要得多。这些都使非正规学校的学生在学业考试中处于劣势,或许,出卷人是第一个承认这一事实的人。英国和美国急需新型的考试形式。我个人的强烈印象是,在一些很容易界定且可能不难测试的领域里,例如写作的能力,或者对做过的数学的理解能力,我发现,在我所考察过的学校里,包括犹太人(黑人)居住区学校的孩子,其成绩要远远领先于英国那些好的正规学校的孩子。

在这些学校里,教师本身以及他们的思想比教师们所重复的外在活动要重要得多。例如,某个组织形式的变化——自由的一天或重新安排课堂空间,两者不可能有太大的区别,除非教师真正做好了准备并且深信,在内容丰富的环境里幼儿可以自己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的选择就是他们自己的需求。但是,当你看到学校的教师确实相信孩子,你就不难分享普洛登报告中倡导的在学校低年级实行非正规的个别学习的激情了。幼儿学校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因为,在几年前,还没有人过多地想过为什么孩子应该在5岁就可以上学的问题。随着幼儿园和学校最初几年的融合,孩子们在读书写

102



字和数数方面的时间延长了。如果这种学习模式是个别学习模式,如果教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不是妨碍学生的学习或试图控制所有的活动,那么,这种方式就是极为有效的。许多困扰正规学校一年级班级的困难就会消失,孩子们就不会远离学习,也不会因为自由散漫而被戴上问题孩子的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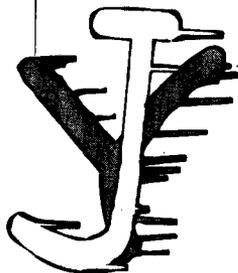
教儿童思考

1967年9月9日

在英国,那些对社会不满的人,在争辩中有时会以美国为例,认为这是一个处处充满民主、一切都十分有效的梦幻般的国家。我这样说的目的不是为了慰藉大西洋这边灰心丧气的教育工作者而创造另外一个相同的毫无意义的神话。我所讲述的英国的好学校没有什么乌托邦式的东西。这里的教师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看,报酬是过低的(工资一周才40英镑)。教职工的人员变动频率高得吓人,而且,学校得到的用于购买设备和图书的经费少得可怜。在英国各地,教书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不景气的行业,而且,一直都是一个不好做的行业。在这样一个既不景气又困难重重、教师每天超负荷工作、日程被排满的行业里,相当多的英国小学教师能按部就班、实实在在地推进个别学习,让儿童在学习的初级阶段按照自己的步伐行进,以自我发展的方式组织课堂教学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这种做法的说明案例,我记述了孩子们是如何学习阅读和写作的,以及孩子们被引导学习数学时所采用的周密方法。在前面我已经指出,这些方法按照相对可以测量的形式证明是成功的。虽然,这些方法不能保证把差的教师或不喜欢孩子的人变成好的教师,但是,比起正规的方法,这些方法更适合幼儿的天性,更适合在小学开设的课程种类,还可以激励许多普通的教师,使他们发现采用这样的方法会使自己更快乐,且不必花费大量的时间维持课堂秩序。这些方法假设,孩子们会对成人的善待作出反应,并且,在各种选择是真实的以及能向孩子们提供各种丰富材料的前提下,孩子们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训练并主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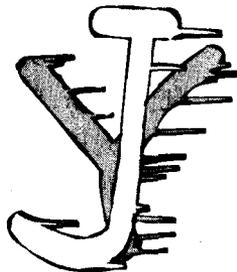


动地学习。正如普洛登报告所承认的那样,这些假设并非对所有的孩子(一些孩子可能总是能从正规的教学中获得更多的收益)都是真实的或对每个孩子一直是真实的。但是,普洛登报告本身就证明了英国目前的日益坚定的信念:这些假设可以为这个国家所有的学校提供一个实践的平台。

那么,英国的这一实践平台也可以成为美国学校的实践平台吗?至少可以这么说,按照这些思路创造美国学校的任务将是艰巨的。在这里,不是把机构和文化障碍讲述一遍就可以使美国的教育发生变革。但是,我确实希望看到,就我所讲述的这些英国学校的情况,有谁能提出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来。在改革中,如同其他事情,一定要有首要的任务,而第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有清晰的观察力。

104

美国人对于这些学校感到困惑的一件事是纪律问题。他们可能承认,英国的好学校这方面比美国学校做得好,但是,他们不太愿意承认的首先是,因为孩子们获得了在经过精选的各类课堂活动中进行自我选择的自由,并且,可以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相互交谈。如果他们是教师,他们会对这样的话题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知道,在美国的许多学校里维持课堂纪律该有多难。如果一个班是作为一个教学单元来教,并且,假设每个孩子都应该认真听教师讲课,那么良好的纪律便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班级分成若干个朗读小组,则纪律更为重要,这一点每个一年级的教师都很清楚。学习快的孩子会显得不耐烦、焦躁不安,学习慢一些的孩子虽然也能照着做但讨厌这样的煎熬。任何一个在这种状况下能够维持纪律的教师都有一定的才能,无论这样的才能是否有用。托尼·卡莱特是一个有远见的美国人,他曾在莱斯特郡做过顾问。他写到,在他曾经实习过的一个很好的但又是很正规的美国学校里维持班上的纪律有多困难。他回忆说,一些孩子能够很好地遵守纪律,但是,其他的孩子,特别是“有问题”的孩子认为纪律太严,容许他们做的事情太少,因此,“他们的问题部分是因为管理造成的,而不是用管理来减少他们的问题”。和英国的班级相处一段时间后,他对这个问题有了不同的感受,但是,如果他一直都在美国学校里教书,就“好像的确是如果要完成一件事,每次都必须进行一次严格的管理才行”。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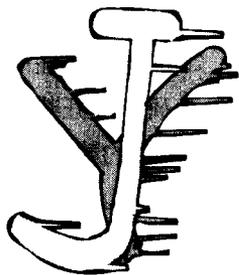


的这一观点是许多美国教师都能理解的。

一些看过英国课堂里的孩子独自勤奋学习场面的美国教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英国的儿童是否本质上有别于美国的儿童。的确，英国的成年人不同于美国的成年人，而且，两者在民族的性格上可能也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到非正规学校访问的中年英国人经常和他们同龄的美国人作出相同的怀疑的反应；他们很难给英国的孩子以很有主动性和责任感的评价，因此，很难知道该如何理性地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教学的美国教师，经常是成功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势单力薄，而其采用的方法则与英国优秀的小学教师采用的方法相似。由赫伯特·科尔撰写的即将出版的一本新书记述了一个在哈莱姆按照较为自由的方式管理的六年级班——书名是《36个孩子》。该书包括了一些孩子们通过自由写作的方式写出的特别有难度的范文。一个来自英国较好的学校的教师在美国的一个大城市给一个犹太人(黑人)居住区学校的8到11岁孩子的班级上示范课。临行之前，他从美国同事那里确定，美国的孩子不同于英国的孩子，就像白天和黑夜不同一样。然而，据他的报告说，这里的孩子对精心布置的让学生可以进行活动选择的课堂的反应和英国的孩子完全一样。起初，孩子们不太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开始孩子们小心翼翼，之后，孩子们冲向教室的每个角落，尽快尝试每一项活动，好像怕时间从他们身边逃离一样。然后，他们“很快静下心来更深层次地学习和探讨他们的环境，充满了好奇心和激情”。教师注意到，前两周没有一个孩子做书面英语或数学作业，而当他问孩子们为什么时，孩子们回答说他们讨厌这些课程。最终他让班上越来越多的孩子对自由写作发生了兴趣，但是，他没能让他们对数学感兴趣。

另外一个人听到的反对这种教育的更为严肃的观点是，这种教育不能为孩子做好生活的准备。在我看来，普洛登报告对此问题的回答似乎是非常合理的：为生活做的最好的准备是让孩子过一个完整的孩子般的生活。有时这种担心是以家长质疑的合理形式提出来的：这些非正规的方法会不会对学生以后转到按正规方式管理的学校造成不利影响呢？这个问题在英国非常普遍，尤其是当孩子从好的幼儿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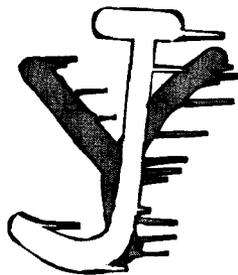
105



转到传统的小学校或从非正规的小学转到严格正统的中学时。我参加过一个非常不错的幼儿学校家长会,与会家长显然被学校的教育方法完全征服,反而担心他们的孩子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会变成什么样。学校的校长说——他的话是对的——这些孩子实际上在小学校里也表现得非常好。对这些孩子,大人们只有一点可以不断地抱怨,即这些孩子不能很好地更长时间地静静坐在那儿。总体来说,无论他们今后上哪个学校,培养其写作,并且能真正地理解数学——且不要说他们能独立学习——对孩子们的今后是非常有利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好学校的校长认为,孩子们的适应能力比家长们想象的要强——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所带来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这样一个事实表明,大多数校长同意普洛登报告中建议的孩子们应到采用非正规方法的幼儿学校上一年的提法。大多数校长会认为,再多上一年,孩子们就能克服他们剩下的阅读问题,而此时转学会更容易一些。

关于这些方法,美国人提出的另一个紧迫的问题虽有些古怪,但却是历史性的。据说,这样的班级在美国教育的进步运动时期就曾尝试过,并且,发现了其缺陷。这是我们从历史汲取教训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应牢牢记住的教训之一。由于没有什么能像我们对近代历史的认识那样变化莫测,因此,这种认识尚值得推敲。进步教育,如同思想和政治领域的进步运动,是由众多的且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想法构成的。进步教育产生的背景使美国中等学校功能发生巨大的转变,从为精英做准备的教育公共机构转变成为大众升学做准备的公共教育机构。正如在20世纪50年代,当进步教育的现代印象深深铭记在大众心里的时候,许多中等学校开始转变成为大众升学做准备的公共教育机构。进步教育试图让所有美国人都能接受中等教育,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近乎一半的中等学校学生升入大学学习。

作为一次运动,进步教育反映了人们对用科学来影响社会所给予的新的关注——在学校里,进步教育指的是对教育心理学、测试以及对研究的狂热追求。另一个因素是进步运动对社会改革给予的特别关注:约翰·杜威徒劳地希望学校在某种程度上能成为持续改造社会的中心。如果有联系的话,另一个突出的想法是强调儿童的个人成长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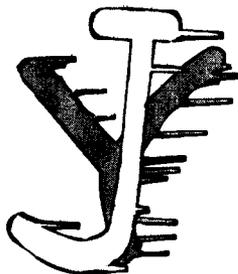
发展。这最后一点特别反映在二三十年代为数不少的美国中学的教育实践中。无论是好是坏,这些学校更愿意透过意识形态来看待儿童。他们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压抑是邪恶的东西,并且,一些人把儿童理想化为艺术家历史性地反抗中产阶级社会的参与者。那些最好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私立学校把他们的许多教学实践建立在儿童会通过游戏逐渐认识世界的理念上。他们试图让儿童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他们打破了科目之间的界限,经常把周围的社会以及社会的生活作为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他们工作的合理一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儿童的解放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在一些学校,教师和学生整天忙于探究儿童行为准则的效用,这种探究是在放弃成人权威的前提下进行的。不足为怪的是,成人权威的放弃带来的并不总是自由:在实践中,让儿童从成人的权威下解放出来,可能意味着将他们置于同伴的霸道之下;消除“外在”的规则,可能意味着建立起难以理解的、不被承认的规则,而这样的规则只能是无情的,甚至更为糟糕的,是含糊不清且武断专横的。

他们从未尝试过

很难找到更多的证据证明,强调个人成长的私立学校所进行的课堂实践是否已推广到大部分的公立学校。私立的进步主义学校强调合作以及团体适应,这一点得到了公立学校的认同,但是,它们所站的角度不一样:进行适应性和“美国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扮演的是美国学校传统教育的角色,调教令人反感的不能融洽相处的人,确保移民和下层的人不制造麻烦。公立的进步教育运动是很保守的,这主要反映在学校的行政改革中,即让学校的管理更加符合弗雷德里克·泰勒和其信徒所倡导的科学管理的原则(这种观点谈得更多的是一段被曲解的时期,即认为学校应作为企业进行管理的观点胜于认为学校应作为模范的公民社区进行管理的观点,尽管社会科学、公民学以及其他约翰·杜威的许多支离破碎的梦想,无论是好是坏,的确已进入学校课程)。

因而,除极个别有名的例子外,大多数的美国公立学校从来就没有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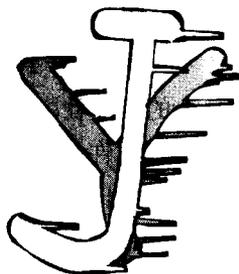


尝试过我们所称之为的进步教育。实践中的进步教育的目的是让所有人都有受到中等教育的机会,或取得更多教育的机会,尤其是在中学开设更多的各种有关适应生活方面的课程。进步教育更加强调课外活动,主张将学生依据其能力分组,强调测试,做一些“设计作业”。这无疑是在让学生从教科书中解脱出来,因而受到学生的欢迎。进步教育还对教科书本身多少做了一些重大的改动,并经常根据商业界的一些不太恰当的典型例子对学校的管理进行改革。

教育是个人成长这个观念究竟有多少渗透到公立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言辞的层面上。罗伯特和海伦·梅里尔·林德在他们1925年所进行的著名研究“米德尔敦”(芒西,印第安纳)的报告中对课堂是这样描述的:“一排排整齐的固定座位为每个孩子固定了活动的空间。对所有的孩子,从怯生生的6岁学童到高中的学生,其总的活动日程安排都是一样的。”十年后,也就是1935年,他们返回米德尔敦时,“进步教育”也到了这里。到处都是谈论个人成长、个性发展以及创造性的自我表现:“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能让每个孩子成为一个有用的公民,尽最大可能发展他的个人能力,与此同时,使每个孩子从事一些有意义的类似生活一样的活动。”罗伯特和海伦·梅里尔·林德指出,对行政管理的日益重视伴随着新的讨论到来了,但教学或课堂组织的方式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他们的报告可以作为进步教育在大多数美国学校发展成就的一览表。把人看成是个体的教育已成为一种没有现实基础的陈词滥调。

108

显然,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与英国的小学革命有相似的地方,也都与中学不断变化的角色有一些联系,而且可以肯定,其中的许多言论使人回想起进步教育运动。英国的学校当然与好的进步运动的学校一样关注个人的发展。然而,两种运动之间还是有巨大差异的。尽管英国的学校强调合作,鼓励儿童相互传授知识,但是并没有放弃成人的权威,也不认为需要放弃成人的权威。给孩子各种活动选择的观点反映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而不是过多地对孩子如何学得更好作深思熟虑的判断。数学教学^{注1}说明了这些学校教儿童去思考的意图是多么强烈。他们没有任何特别的意向要使孩子成为社会的救世主,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准则以及诸如此类的艺术反叛者。正是这种教育的严肃



性,即把注意力放在课堂里学生的学习上才使得英国小学革命远远不同于美国的进步教育,而后者往往与教育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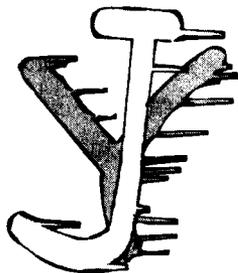
这种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它的意义可以通过非正规英国学校解决按能力对学生进行分班这样的问题的方式上看出来——英国人称之为“分成能力小组”,而美国人称之为“按成绩分组”。在这两个国家,通常的做法是人数多的学校按照学生的成绩将学生分班,这样就会根据假定的学生能力和智商的排序分成 A, B, C, 有时是 D, E 班(而且在一个班里也分成慢的、普通的和快的阅读小组)。总的来看,英国和美国的教师都赞同这样的做法,也不难看出其原由。当你在对某个作为整体的班级进行教学时,当学习是按照小组的形式进行的时候,如果每个学习小组的成员能力基本相同,教师教起来就不那么费劲。而且在常规教学的范围内,按成绩分班能使孩子们更加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学习。无论是按成绩分组,还是分成能力小组,现在在英国和美国都是一个热门话题。非正规教学方法的传播对这种方式的效用提出了质疑。明显赞同“不按能力分班”做法的普洛登报告引述了一项调查(是我在自己报告中提到的同一个调查,讨论的是正规学校和非正规学校之间的经过实验的差别)认为,在可测量的成绩方面,分班的学校的学生只比那些在非正规学校的学生稍微好一点儿,但不是很多。而在这些非正规学校里,按成绩分班的做法早已被取消。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贬低按照成绩分班的做法是有理由的——事实是,正规学校训练学生参加成绩测验,而非正规的学校教给学生的是更重要的东西,且有证据表明,随着儿童年龄的增大,测验分数的差异会减少。

109

被归为愚蠢之类

英国和美国一样,人们对按成绩或按能力分班的实用方法趋之若鹜,其原因有很多。在小学实行分班,把孩子从小就归为差生之列,会对他们产生深刻而灾难性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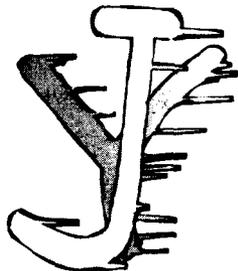
“我永远不会忘记被分在差班的孩子们的面部表情。”一所东伦敦小学的校长对我说。他的学校已成功废除了这种做法,但是,他仍不能



忘记孩子们的表情：“当我的那些在现代中学差班上学的孩子们回来访问的时候，我仍然还可以看到这种表情。”按成绩分班对教师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做法诱使教师认为，一种单一的教学模式可以用于整个的班级，而且，它只会增加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教师会更多地依照抽象的分类，智商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来对待孩子。和美国一样，在英国，某所学校的尖子班逐渐成为中产阶级子女的天地，这种状况更加使得学校成为强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当然，在美国一个被认为兼收黑人和白人学生的学校里，按成绩分班成了维持种族隔离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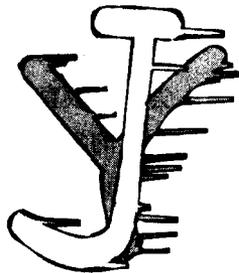
在考察了英国的班级后，另一个反对按成绩分班的观点呈现在你面前，即这种做法忽视了学生之间相互学习的可能范围，反应慢的学生可以向反应快的聪明的学生学习；反过来，从教师那里学到的东西他们也一定会用在那些反应慢的学生身上。这一点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采用了家庭或纵向分组办法的学校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些学校里既没有按照能力对学生进行分组，也没有按照年龄分组，每个班级都是由年龄稍大的和年龄稍小的学生组成的。然而，尽管这种情况是真实的，但是，除非我们可以给教师提供一些代替现在正规课堂教学方法的选择方案，否则，谴责按成绩分班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这就是英国小学教育革命的感染力使人印象深刻之所在。当一所英国的学校停止分班后，它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的做法，而是给教师和学生的角色重新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建立了某种新的课堂氛围，训练孩子独立学习的能力。在普洛登报告的鼓励下，采用分班做法的幼儿学校越来越少，而且，小学在头两年，甚至某些情况下在第三年，放弃分班的做法也越来越普遍。这种趋势能走多远取决于小学革命对中学产生的影响。普洛登报告中的一项调查表明，那些过去完全支持分班作为小学基本政策的英国教师，现在也慢慢赞同不分班了。原因很明显，因为他们开始看到有可行的替代办法了。

按成绩分班在美国被看作是必要的“恶魔”，就如同智商、标准化成绩测试、正规班级教学、规定的课程教材、特定的课程学时等等一样。教师和管理者意识到，儿童的智力和情感发展如同他们的身体发育一样是千差万别的，然而，他们却很少感到可以照着自己的理解去区别对



待每个孩子。好的英国学校对这些弊端在实际中是否必要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在美国,如同在英国一样,人们对教育提出越来越多的但在总体上是合理的疑问:人们质疑通常的做法,他们对学校在多大程度上能为社会其他成员担待责任的期望变得越来越现实。没有一个英国教师会说他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最深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问题,但是,只要教育可以在许多社区工作中发挥作用,那么,和我一样,认为英国学校为个人学习提供可行模式的做法是美国教育所需要的那些人,其想法一定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可以给美国学校带来类似变化的力量是很少的。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最好的课程项目——如教育发展中心——正把学校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优秀的开放式的教材本身常常是某种对教师重新培训的课程。在英国的学校里,那些可以帮助他们在试用非正规方法时更自信的教材绝对没有被抛弃,但是,教师们却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些教材。很明显,任何教材的使用必须能够给教师和学生以各种方式的自由,而且,最好的教材经常是新方法的指导手册和使用说明书,而不是某些固定的教学单元。教材在学校高年级中的重要性更大。学校委员会的杰弗里·卡斯腾担心,在一些幼儿学校,“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生自己的活动组成的,事实证明,幼儿学校的成功做法在被能力不一的教师广泛应用在年龄稍大的儿童身上时是不成功的。这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我考察了一些小学校,那里幼儿学校的自由做法被验证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我也考察了另外一些学校,那里却是死气沉沉的,他们本来可以利用好优秀教材的激励作用的。那种认为只要可以找到督促普通教师创造教材的方法,课程设计在美国就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美国人应该从英国人认为的课程改革中最宝贵和最持久的东西是创造和思考的过程这一观点中获益。除非你让教师了解这一点,否则,学到的东西很有可能是无用的。美国的课程设计和一些学校的体制可能有助于建立某些与英国好的地方政府设置的咨询中心相同的机制、相同的师资队伍以及其他相同的人员队伍,其职责是与课堂里的教师一道在同一领域工作并传播新思想。杰罗尔德·扎卡利亚斯曾建议成立展示中心,作为对新思想和技能感兴趣的教师的超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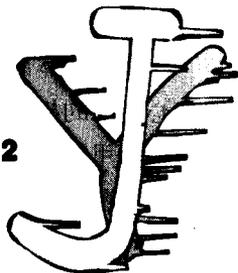
市场(在英国,顾问的作用之一就是替教师代课而使教师能够参加课程学习和观摩)。

变革的前景

在开发新的测试中,可以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智商测试和标准化成绩测试并非一出现就是鬼怪——我有一种感觉,学校用测试作为拒绝尝试新事物的借口。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对学校管理者和家长心理的控制被解脱了,那改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反映写作能力或数学推理能力的测试将会有极大的帮助,问题是要说服人们考虑标准的相关性而非现在用的标准,显而易见的是,单凭新的测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技术,尤其是外行设计的,是永远不够的。只有在学校里变革才会到来,然而,前景却是暗淡的。过去曾推崇进步教育的私立学校现在他们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正规化了。许多学校测试肆虐,只满足家长想看到的实实在在的 evidence,即一个二年级孩子的成绩预示他(她)将能去哈佛上学,为此,他们招来了约翰·霍尔特的嘲讽:“一个思想保守的人就是一个信奉十足的极端主义的人。”有一些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对他们与家长的关系很自信,这样的学校可以按照个别学习的思路逐步开展实践活动,谨慎推进。那些能够接受测试分数可能稍低一些学生的好的郊区学校还是有的,但是好像这样的学校越来越少。好的幼儿早期教育计划可以影响这些学校,使其早期的教学更具弹性。有一种可能是,幼儿早期教育计划可以督促一些教育已到了危机关头的城市开办一些更为自由的示范班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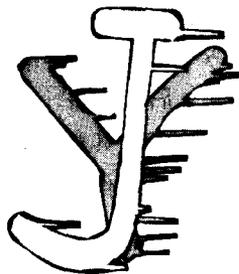
关键问题是,我们缺乏的是那种人们可以看到的、教师可以在里面工作的真实的课堂,缺乏那种可以运作的、向公众和教育工作者展示我在本系列文章中所描述的那种学习方式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必须是可以发展和成长相当时间的公共机构,而不仅仅是一些示范班(纽约市已尝试过教育历史上每一个好的想法,只有一次成功)。要想产生影响,这样的学校必须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个人实验有所不同,那时的实验意识形态是混乱不清的,对公立教育是麻木不仁的。美国需要很多



这样的学校,确实需要。然而,是一小部分幼儿学校开启了英国学校改革的先河,而且可能是,小规模精心工作是开始改革的一种方法,无论我们雄心勃勃的教育改革家能说些什么,这样的改革都是值得的。最后,我们总是又要把注意力放在坐满孩子的教室里的教师身上。这才是小学里发生变革的关键所在。

注释

注1 费瑟斯通的论著《儿童学习的学校》(1971)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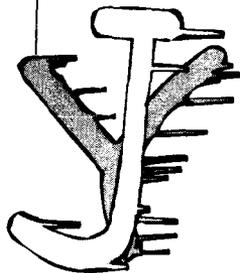
学习的实验

1968年12月14日

113

去年在这个栏目里,我报道了在英国所有较好的幼儿学校里流行的某些课堂实践活动、教学以及学习方法。接下来是一篇不同的报道,是一系列对在英国的小学校里为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实行这种教育方式的反思(幼儿学校招收5到7岁的儿童,首先给他们教授的是初级阅读和数学;小学校招收7到11岁的儿童)。我较早谈到的做法并没有在小学校广泛铺开,一小部分学校只是对那些为年龄较小的孩子设计的自由题目进行了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改良,但是,能达到幼儿学校质量的小学校还是屈指可数的。何以如此的确值得我们研究,我希望我能给出一些有意义的答案。下面的报告一方面要谈一下个别学校的做法,另一方面将讲述普通教师为追求某种共同理念所作的努力,即良好的教学该是怎样的,尽管他们的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

在这篇报告中,我想着重讲述一下鼓励孩子自由写作的小学校的做法。幼儿学校的各种写作方法许多小学校是不能比的。从一个出色的幼儿学校来到一个水平一般、儿童对自己的能力感到焦虑、在大量的练习和枯燥的死记硬背的重压下几乎崩溃的小学校是一件非常沮丧的事情。但是,越来越多的小学校开始鼓励学生自由写作。他们尝试做的事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能力强的教师总是安排孩子们进行写作练习,孤陋寡闻的美国教师,此刻更是毫无疑问地关上教室的门,然后告诉孩子们一直写到没什么可写为止。而在英国小学校里所发生的事情其意义仅仅在于,许多普通的教师开始相信,让小学的孩子写自由命题作文是十分重要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做法并没有能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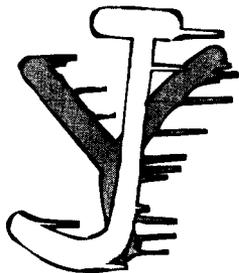


他们走得很远,但是我认为,它提出了一套教育儿童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这与美国和英国的不少地方普遍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一切要从幼儿层次开始。我们所说的阅读课,大部分内容是写作和谈话。在孩子们能够阅读之前,他们向教师口述标题和故事,然后开始学习把它们写下来,并与他们的阅读词汇一道组成一套写作词汇。这样做有很多优点:即使识字课本和初级教材让孩子们很厌烦,他们也会很容易对其不得不说的内容发生兴趣;孩子个人的材料不存在什么阶级或种族偏见,而且词汇也是适中的,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词汇。开始写作是孩子们取得良好读音法基础的绝佳方式——读音法非常重要,这一点已越来越清楚——大多数小作家也准备一套可视性的工作词汇。优秀的幼儿教师认为,大量的阅读和谈话是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有限的范围内,我所走访的学校都鼓励孩子们相互之间进行交谈,而且,教室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而不仅仅是教科书。

我在讲到5至8岁的孩子写的作文时,并没有谈到伟大的文学作品。一些孩子所写的一连串简单句子也没有什么文学色彩,每句话都是以单词“并且”开头,就像中世纪初的通俗写作一样。另一些孩子很早就会使用从属句、生动的比喻以及相当复杂的结构。约翰·布莱基曾在英国的学校里做过大量提高写作能力的工作,在他的论著《走进小学》(1971)中收集到一些范文。由于这些范文都已正式出版且可以买到,因此,我想引用一些作为我所看到的普通幼儿功课的典型,这里引用的范文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让我们来看看一个6岁男孩写的东西:“我们今天下午要去看一场电影。它的故事发生在印度一个叫男孩小镇的地方。我们都带了一些钱去看电影。我给了刘易斯一便士……”(“We are going to see a film this afternoon. It is about Boys town in India. We have brought some money to see it. I gave Lewis a penny..”)还有一个7岁的孩子写的:“从前,有一个女孩叫朱迪,她渴望在圣诞节那天得到一个有长头发的洋娃娃她醒来后看到了正是她想要的有长头发的洋娃娃她和洋娃娃玩了一天然后到晚上她把它放在一个鞋盒子里而忘记早上把它带到楼上去……”(“Once upon a time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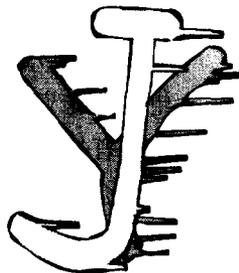
there was a little girl Judy who longed for a doll with long hair at Christmas she wolk up and saw a doll just as she wanted with long hair She played with it all day then at night she put it in a shoe box and forgot to take it upstairs with her in the morning...”）读者会注意到文章里面严重的拼写错误非常少。好的幼儿学校里，学生作文的突出特点是真诚和可爱。读者能够体会到作者真正想说的东西。^①

在小学和在幼儿学校一样，随着孩子们开始动笔，许多早期的作文都是在一天里完成的，或者，甚至是在一个学时里完成的（小学更有可能把一天分成若干个学时）。渐渐地，可以将写作的时间延长。并且，孩子们也可以选择是写个人经历过的小记叙文，还是写故事。小记叙文的内容包括孩子们在科学和数学课上所做的事情，而故事则常常是以孩子们从电视和探险故事中挑选出来的主题和英雄为题材，但他们很少从神话故事里选材。9—11岁的孩子更易于在他们的作文中表现出文学方面的影响，如使用他们碰巧读到的一个作家的写作技巧，像雇佣文人那样用标准格式来写。有鉴于此，对写作要求严格的教师努力让孩子们避开写诸如“从前”之类的故事，至少一开始不要这样写。

115

要求作文需有某种主题的学校倾向于那些有模仿性的和人为性质的作文。普洛登的报告《儿童和他们的学校》不赞同那些通过让孩子写世俗主题的作文来强迫他们“积累短语和写一些虚假的东西。这些世俗主题包括一便士的自传，一片面包或者一棵树等，最终往往会写出这样的作文：‘作为一张桌子我感到很开心，但是我过去做一棵树时最开心。’”

关心质量的教师努力确保写作课不要成为一件让学生讨厌的事情，因此，他们不太愿意逼着学生写，除非学生们的确感兴趣。许多人建议，如果要孩子们自由地去写，重要的是要让他们选择可以大声朗读的东西，或者只供教师和朋友看的東西，或者那些隐秘的只属于作者财产的东西。



^① 因原文作文为学生所写，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译文必须反映出来，故附原文。——译者注

当孩子们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更加自信时,教师应鼓励他们写“书”,几张折叠的纸和稍稍硬一点的封面就可以。一些班级配有一个很大的展览架子来展示这样的书,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浏览和阅读它们。书的内容有相当多是个人的随笔,还有诗歌(通常是不押韵的)、故事、数学和科学项目报告,以及孩子们所选择的这样或那样的题目——从穴居人到个人爱好。一些命题作文是根据教室里摆放的资料书写成的——这些书的内容包括鸟类、古代不列颠人等。不鼓励孩子们去抄,他们就不会去抄。如果鼓励孩子们去抄,他们就会去抄的。

约克郡西区的教育主管 A·B·克莱格先生在他管辖的学校里收集了一些学生的作文,并将它们汇集成一本很好的作文集叫做《写作实验》。由于希望美国的学校能认真仔细地看看这本集子,我这里选了几篇代表作。下面是一个 10 岁男孩写的片段:

我记得我走上汹涌的大海边的沙滩上那一刻。海浪重重落下来,我能感到海浪对我的震撼力。它就像旧房子被推倒时砖块瓦砾轰然落下发出的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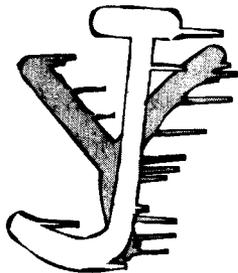
一个 11 岁女孩写的片段:

妈妈和我出发了,我们要进城去。我很兴奋,因为我将有一双新鞋了,这是上学穿的。我们到了城里,走进一家鞋店。我看了几双鞋,可我并不喜欢,这时女售货员又拿出一双棕色的很丑的鞋。妈妈很喜欢这双鞋。我吃惊地看着她,根本说不出话来,想必她不会买的。但是,买卖成交了,她买了这双鞋。我捏了自己一把,以便弄明白这是不是在做梦,不幸的是,对我来说,这不是梦……

116

这是一个 10 岁孩子写的关于蜡烛的片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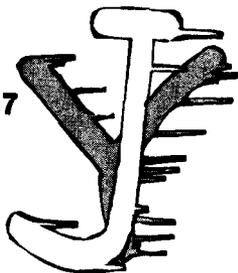
白色的光面;如同酸牛奶,
纤细的手指裹着一层棉被,



星星变得越来越大，大得在黑暗中闪烁，
上帝啊，一个谦恭的人低下了头。
金色的水晶，黑色的眼睛，
牛奶慢慢地涌出，奔流不止，
希望闪着微弱的光芒，努力使自己变大，
黑色烧焦的馅饼；一切美丽都逃亡。

毫无疑问，教师所得到的这些写作片段反映了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可以像乐团的主持人那样，竭力兜售儿童写作所取得的杰出成绩——他们的所作所为会激起你某种自以为是的提醒他们的渴望，即写作是帮助儿童成长的，而不是推销一个作家（正如克莱格先生明智地指出，学校里写的东西充其量是一种副产品，重要的是儿童自身的发展）。有一些琼·布罗迪小姐式的人们鼓励孩子们从事奇妙的童话故事、诗歌、幻想小说以及各种“创造性”文体的写作，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在他们眼皮底下正在进行的准确而优美的数学和科学报告的写作。写作如同我们做其他的事情一样，很难夸大各地区的学校作为上流社会文化和其阶级偏见的承载者的功能。而且，在当地教育管理部门和校长鼓励自由写作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教师确实实地学会了尊重孩子们所写的内容，且没有对其中一些无关紧要的错误表现出震惊、非难或讥讽等，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有些开放的教师所教的孩子写出了关于性和生活方面粗浅认识的文章，其中一些是有道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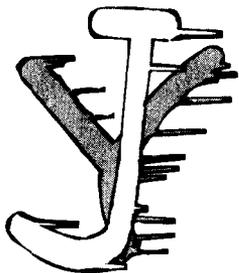
写作是把你所说的内容清楚地表达出来。我所参观的一些最好班级的教师试图纠正学生在语法和拼写方面的错误，以及成为交流障碍的句法结构混乱的问题。批改作文对于一个有40多人的班级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有所需了解内容的基础，那么就很容易帮助孩子纠正语言方面的问题。另外，你还可以从作文中获得判断的原始材料。如果课堂日程已安排好，那么你还可以跟着听课、观察，至少偶尔能和孩子谈话，你会发现更多的东西。许多教师试图在几节课上纠正孩子们的所有错误。在孩子们的文字上到处涂上红记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约翰·布莱基举了一个9岁孩子写的题为“我的父亲”的作文，讲



述的是他去世的亲人。教师对这篇作文的惟一评语是：“时态问题。你老是把过去时和现在时混淆。”

没有什么能比批改作业的过程更让人明白，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指那些按照一般方式永远不可能交往的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交流。最好的分析永远不可能登陆网络，很难（到网上）找到一个纯粹的好的教学例子，他们充其量只会传送一些友谊和爱情的范例。人们总是无奈地接受某些诸如请多保重之类的建议，这些建议总是难免流于平庸。而对于有价值的东西，好的教师所注重的是作文（或绘画或其他任何东西）的内容和主题。教师和孩子对此均有兴趣。孩子们似乎对于意思是否表达清楚以及读者会有什么感受更感兴趣，而且，许多人非常愿意接受批评。如果是一篇未完成的作文，教师会问结尾将是怎样的，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他会尽力周到地去谈具体的细节问题，询问故事发生的时间、方式以及原因。有时教师想了解孩子们对自己的作文是否满意，并且如果他回答的是不满意，教师可能想知道他们是否有可使作文写得更好一些的想法。所有经验法则都会在这样的规则面前即刻消失，即最糟糕的事是阻止了未来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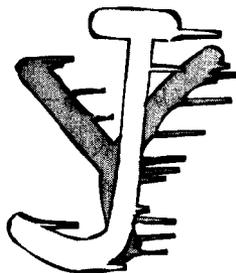
教学工作永远都做不完。教师试图请一些孩子帮助批改作业——不少教师让全班学生指出教室里展示的“书”或其他作品中的错误，然后会给作者看，而作者随后就能自己改正过来。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一些好的初级学校的做法开始逐渐与英国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即使在非常自由的初级学校里，来访者有时也会发现，由于孩子们要应付考试，出色的作品减少了。在英国，考大学的竞争很激烈，因此，孩子们的命运仍然取决于能否进入好的中学。这还不是全部，我会在后面再谈这个问题。我现在想强调的是，教学的方法越来越像美国学校里的标准方式。当然也有很多例外——这足以使我怀疑应付考试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学校都在那些自由方法占主导理论地位的教育主管部门的管辖范围内。然而，人们还是沮丧地看到，好的学校居然也屈从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英语是单独的一门课。于是他们给孩子发单词拼写表、练习册和句法练习簿，好像过去的人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学到很多东西似的。在孩子的写作课得到很好指导的学校，根本就没有



单独的句法和拼写课程。如果一个孩子可以把别人造的句子拆开,并给每个部分贴上标签,他就能自己造出更好的句子吗?这样想是很荒唐的。写作正确率源于在正确的指导下对语言的使用以及听别人怎么用。人们是通过写然后学会了正确地写作,而不是通过做大量的练习册获得的。

没有一个基本模式能够适合所有鼓励良好写作的学校。当克莱格先生说他们尊重孩子,他们更关心孩子们是怎样学的而不是学了什么,他便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鼓励自由写作的态度导致他们停止了按照能力分班的做法(在美国称之为按成绩分班,在英国称之为按能力分班)。我们知道,有亲身经历才会带来好的作品,而在大多数的英国学校里,至少一天中的部分时间是让孩子自己选择该干什么。

这一切都是含糊其辞的。那些负责管理最好班级的教师所说的一切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都说孩子们只为他们信任的人写作,说孩子们要等到有信心讲话时才能自由写作。除了某些天生会讲故事的人的作品外,大多数优秀的作文都是源于他们的亲身体验。我曾想问他们对那些微小问题的看法,但是后来认定这些自明之理实际上还是对的。如果我们需要一种孩子们可以自由写作的学校——这种自由写作并非是一种单独的课程,而只是一种可以代表整个教学方式的标志——我们最好明白,世界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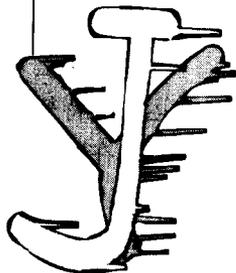
开放学校 II:给时尚降温

1971年9月25日

来自英国学校的信息传到我们这里,正是我们的文化和政治方面骚动的时候。美国所追求的英国式的改革潮流必须被看成是一场复杂而又多方参与的运动中的一个因素。在学校范围内,几乎出现了教育的真空现象。很少有改革者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方案,而屈尊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身上的改革者就更少。英国改革从基层开始的性质和对良好教学重要性的重视,极大地吸引了那些受到学校改革者和管理者伤害的人们。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对新的方式感兴趣,仅仅是因为他们抵制学校目前的一切运作方式。一些最好的社区管理机构,如东哈莱姆街区学校,一直在提倡非正规的方法,一些家长管理的幼儿早期教育计划也在这么做。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及其以上的家长也赞同“开放”式的和“非正规”式的教育,即使他们对这些术语的教育含义并不是很清楚。

查尔斯·西尔伯曼(Silberman, C.)的《课堂里的危机》(1970)一书中最具说服力的章节,是号召美国的教育工作者认真考虑英国的例子。西尔伯曼的书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方面的文献,还是作为一项自身权利的声明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记录了人们在观念方面的重要转折。西尔伯曼认为,有太多的美国学校对于孩子和教师来说是一个严厉的、没有快乐的地方。过去只是一小撮偏激评论家讲过的话现在几乎快成为官方的共识。还应该指出的是,西尔伯曼与许多有关学校教育的评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普通的课堂教师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对教师在创造一个良好学习环境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有清楚的认识。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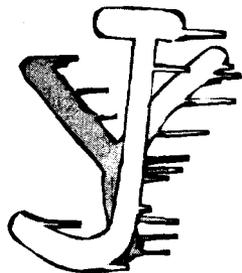
迄今,我考察了不少按照非正规方式组织教学的美国课堂。其中最好的课堂和我在英国见到的没有什么两样,最差的则混乱不堪。人们正缓缓行进在看上去最有希望的努力中,他们懂得,制定进一步长期发展的改进方式比单一的“创新”重要得多(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整个学校环境按照非正规思路管理经营的还是太少了)。

120

理解了缓慢发展的需求以及教师和学生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之后,那些与我交谈过的许多非正规方法的实践者们对目前追求“开放”学校潮流的方方面面感到很担忧。人们有理由产生这样的忧虑。从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似乎一浪又一浪的教育改革充其量是在为那些实际工作并没有任何改变的学校给予理智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肯定。这样的视角无疑是病态的,让人太灰心。从最坏处看,人们所怀疑的是,过去的改革运动,无论其言行如何,仅仅是强化了学校在提倡社会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单纯依赖学校教育难以挽救社会秩序这一事实,促使一些人对获得良好教育产生绝望。而这种意识本应该一直是清楚的。

除了这些发人深省的反思外,人们对过去十年“创新”的结果产生了新的失望。因为,我们所完成的十年忙忙碌碌的教育改革到头来却没有什么成果可展示。课堂没有任何变化,教师还是一言堂,或者多少强迫性地进行一些课堂讨论;课堂纪律仍然是让人困扰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课程改革的努力在一些情况下提供了很好的教材——这些教材迄今为止仍是好的非正规课堂的基本教材——但是,他们却把学校现有的环境认为是想当然的事。或许,许多改革者都是外行,他们没能鼓励教师继续进行思考和创新,结果导致教师用老办法来讲授新教材。由于大多数改革者来自大学,他们对教育学中的课堂和儿童的概念不了解,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内容上——强调按照标准的研究生院的专业课程形式组织教学内容,忽视了儿童及儿童学习方式的本质。儿童经常被看作是优秀教材的被动接受者,而教师则是被动的传声筒。改革者缺乏某种一致的将学校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观念。而这场运动的特征就是忽视了艺术以及儿童的表现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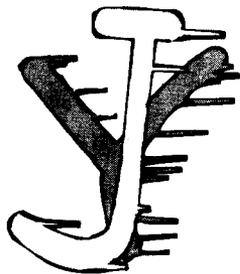
在有关课程设计理论之争的嘈杂声中,强调精确性的支持者在辩论中占据优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目标用精确的、可测量的以及经常



是行为方式的术语加以说明。有一段时间,这种虚假的精确性带来了虚假的安全感。并且,有一阵行为主义者和教育技术的生意人成了同盟者:他们设想,新的教育硬件的时代即将来临,未来的利润将和先进的国防和航天航空业齐平。现在这个泡沫破了,而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似乎很明显的是,这个奇特的同盟从过去到现在所谈论的一直是培训,而不是教育。培训是指传授技能,它是教育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我举一个阅读的例子:如果我教你读音法技巧,我们就是在从事一种培训。除非你接着用这些技巧来培养读书的兴趣,否则,你就不是在接受教育。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事实上却不是。我们的技术人员根据培训航空观察员辨别飞机轮廓程序的方式认为,阅读是一个培训问题。如果一个犹太人(黑人)居住区学校六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平低于同年级水平以下两个年级(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问题就可能完全不是阅读技能的问题了。一个四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平经常代表着掌握了必要的技能。问题的部分原因肯定是,这个六年级的学生没有读什么书,而且对读书也不感兴趣。

一些实践者对“开放”教育持怀疑态度的另一个原因,反映了人们对狂热的美国式的教育改革模式更深的疑虑。这种改革模式追求的是绝对事物,而理论方面却显得很单薄。我们的进步教育运动常常忽视教育学——忽视课堂生活的现实状况——相反却把注意力集中在玄虚的抽象概念上。积极倡导今天的良好实践活动,从而放弃意识形态的争论将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来自英国的榜样现在是整个多元美国文化氛围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来自英国的范例已经被用来对准了一场意识形态辩论中的某一方。美国的社会背景集中表现为文化的和政治的两极,这种情况决定着我们对非正规教学报告的反应。这些反应逐渐陷于嬉皮士、被解放的中上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文化冷战等几种固定类别中。它是一种阶级和文化的冲突,是在那些认为生活基本上是一种短缺状况的人——从而极力维护短缺社会的美德,如节俭、守序和勤劳——与那些认为生活基本上是富裕的人——从而竭力倡导新的美德,如开放、知性和激情——之间的斗争形式。嬉皮士式的人喜欢开放课堂的思想,因为,他们似乎可以给孩子以自由;传统观念的人则担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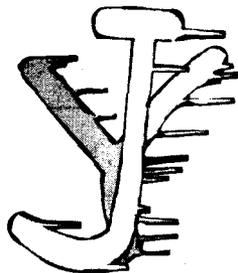
心出现可能的秩序、纪律以及成年人权威方面的真空。

如果说,我是用高度抽象的术语来描述这一冲突的,那是因为,在我看来,该冲突似乎远远脱离了那些实际上在非正规环境下已从事教学活动的优秀的美、英实践者们所关注的事情。以自由的话题为例,让孩子们讲话并到处走动有助于建立起教师能够更多地了解学生的氛围,有助于孩子学会用自己的判断行事,养成独立制定目标的习惯。但是,这种自由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作为一个目标,自由是空洞且毫无意义的——正如 E·E·卡明斯曾经说过的,是“一顿早餐”而已。

总是有一些人认为,自由是消极的,应从中解脱出来。另一些人则认为,自由是积极的。从权力主义者如柏拉图,到自由论者如坎特和杜威都认为,第二种观点把自由和知识联系在一起——强调自由地运用有知识的理性或智慧(有时是行动)。无论在这场精彩永恒的辩论中,各家观点的优势是什么,作为面对年轻一代的教育者,认同关于自由的第二个观点肯定是更合适一些,不应把自由看成是瞬间的事情,而是纪律和学习过程的结果。如果非正规教育没有带来智力激励,那它就是毫无意义的。在我们“自由”学校里的许多孩子并不开心,一些人推测,是因为孩子们对于他们缓慢的智力进步状况厌倦了。正如威廉·赫尔在一篇有关当前追求“开放”教育的评论文章中尖锐指出的:“在那些他们认识到自己不会取得多大成就的学校里,孩子们是不会长久开心的。”

122

或者,再拿权威问题为例。权威在一些学校成为争议点这一事实反映了深刻的文化方面的混乱,它是一把衡量美国不断滥用合法权力的尺子。不管那些好的实践者们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照例认为,教师有责任创造适合学习的环境,应该为那些和孩子一起活动的成人权威打下一个可以称之为自然、合法的基础。乔治·丹尼森(George Dennison, G., 1969)在他的著名小册子《孩子们的生活》一书中概述了这种合法权威的几个方面:“它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成人年长一些,经验更丰富一些,单词掌握得要多一些,并且,和自己达成了预先的协定。当所有这些表现出的是积极正面的而非仅仅是消极负面的特征时,孩子们就会把成人看成是保护者以及肯定、赞同、新奇和技能的源泉。由于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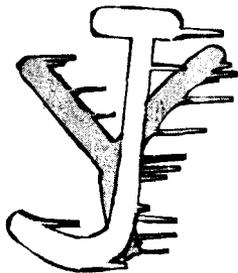
已与自己达成了预先的协定这一事实,孩子们就会凭直觉了解他们周围生活中的严肃性和关系网。这种氛围有点神秘,还有点令人敬畏,有着某种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孩子们能非常正确地将其看作是世界运动的方式,而且他们也不是对它所带来的好处和提出的要求无动于衷……(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成年人是他的同盟军,他的榜样——也是他的障碍(因为也会产生自然的)冲突,必须给他们自己应有的权益。”

美国学校里的纪律问题以及权威结构的其他问题,都是与合法权威的实施相抵触的。因此,在回应学校改革的过程中,反对教育运动的人愚蠢地认为,所有成年人的指导都是对儿童自由的侵犯。实际上,在合适的正规环境中,正如约翰·杜威所指出的那样,成年人应该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基于个人经验的教育可能意味着成年人和非成年人之间的联系比传统学校所拥有的更多样化、更密切,结果学生受到教师的指导反而是更多了,而不是减少了。”

如果你解除了一群特定孩子的成人权威意识,你并不一定是在给他们自由。相反,正如戴维·里斯曼和他的同事在《孤独的人群》(1950)一书中评论“进步”教育所指出的那样,你会经常把他们投入到其同伴的专制暴行之中。不被承认的成人权威可以用巧妙的左右别人的方法在不知不觉中得以恢复,但是,这些方法比起正规的做法要武断得多。

有关开放教育辩论中的另一个荒谬问题,就是辩论者所说的关于是否建立以儿童为中心或是以成年人为指导的课堂这样一个传统得令人厌烦的问题。可以肯定,在某些方面,最好的非正规教学实践也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毕竟,学习的基本概念所反映的是皮亚杰心目中的儿童发明家的形象,儿童从自身与经验的各种接触中形成了宇宙的有秩序的模式。儿童的经验是所有好的非正规教学的起点。但是,被动教学在良好的非正规教学环境下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这就如同被动学习的儿童。主动教学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方式对有经验的教师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是它改变了教师的作用。教师从以往讲授别人制定的课程教学内容转到对儿童的学习作出自己的反应,教师承担了创建学习环境的责任。

123



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形势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那就是认为改变学校的压抑氛围并使之自由化——从本身来说也是值得做的——必然会促进智力的发展。这是做不到的。我们需要更人性化的学校,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对智力进步和技能学习给予经常性的关注。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循序发展,并且,我们将永远无法建立起实际的标准,并以此来判断工作的好与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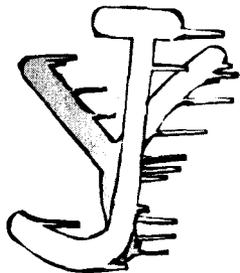
一些美国实践者质疑使用诸如“开放学校”或“非正规教育”的口号。这些术语受到质疑,是由于它们都已成了陈词滥调;它们没有表达出这种教学背后所具有的必要价值,它们所表明的只是一揽子大吹大擂推销商品的手段;还由于它们把教学人员分成了做开放教学的人——“我们”和不做开放教学的人——“他们”。一些人模仿哲学家查尔斯·桑得斯·皮尔斯——他把自己的“实用主义”改成了比较难听的“实效主义”,据他说,目的在于防止自己的思想被劫持者劫持了。他们都喜欢一种拗口的、适度中性的,如“不太正规的”这样一些措辞,一些胆子大的人较为愿意聚集在“体面学校”的大旗下。

对上述口号的这种怀疑可能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但是,这种回避的核心蕴藏着一个重要观点,即教育儿童或与教师一起学习是一个绝对的过程。好的非正规教学环境不应当被认为是一种“模式”或一个“实验”,而是某种支持教育成长,朝着已证明是合理的方向发展的环境。

124

一些观察者担心,我们学校实施改革的方式破坏了教师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校长向教师提出进行“开放教育”的要求)。还有一种极度的——我认为是完全合理的——对传统的那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的不信任:先有教育政治家发表宣言,接着听到的是阵阵仪式鼓声,最后传来的是企业家摇动摇钱树的哗哗声。大多数兢兢业业的美国非正规教学实践者在改革方向上自觉地以本地学校情况为基础。他们将自己置身于佛蒙特州、费城、纽约市、北达科他州或其他地方,从基层做起。他们认为,要办成好学校就要花很长时间,而且,他们认为大人物的演讲或白宫的教育会议不能够取代与课堂里的教师和学生的直接接触。

目前,美国非正规教学的实践者们开展的变革还不大,但是,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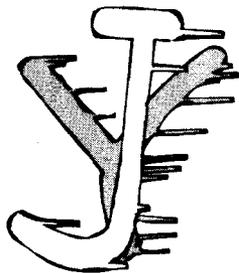
变革的意义是巨大的。所有的教师,无论他们怎么教,都会受到学校教育氛围的影响,并且,每一次严肃的教育改革开始后不久,人们都会发现它还要牵扯到快餐店、卫生间使用卡^①以及学校的整个内部管理机构;牵扯到与家长的关系、与督导人员的关系、设备订购的方式以及整个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联系;最后,还要牵扯到所有有关政治、权力和资金的问题。

随着学校朝着非正规教学方向的发展,人们将对我们的培训体制、合格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这里,除了几个著名的学校如福祿培尔学院外,从英国人那儿还没有可以效仿的例子:英国的师范学院在改进,但是,英国师范教育仍然落后于这个国家最好的幼儿学校和小学校)。管理人员的培训也会受到批评,并且,在一些地方,为管理人员单独开设的培训课程将被取消。尽管对于如何改进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清楚,师资培训的不足也将越发明显,我们所知道的是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没有扎实的儿童发展理论,我们的许多非正规教学将没有多大作为;而且,如果没有课堂里实实在在的健全的基础,理论也将是无意义的。

美国教育局面的纷繁多样很难用一般的说法将之叙述清楚。在某些地方,愿意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课堂实践上的教育学院可以与愿意朝着非正规教学方向发展的现行学校主管部门结合起来。在另外一些地方,在那些难以改变其保守方式的教育学院,现行学校主管部门必须承担更多的培训和使教师合格的责任。无论是哪一种模式,成功课程的主要特点就是在良好的非正规教学环境下,将教学活动分成学时。这样,任何培训计划的先决条件是要有好学校和良好的可以进行活动的课堂。因此,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革学校和课堂,因为,好的非正规的课堂能为最好的教师提供培训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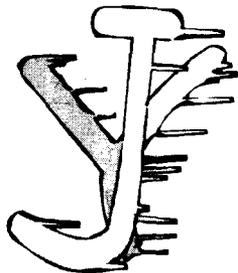
当前,对非正规教学的兴趣是否能带来渐进的变化将取决于许多条件。有两个条件值得强调:一是是否有足够的人能够理解这一根本

^① 在美国许多学校,学生需要老师发给一张卫生间使用卡才能在校期间的厕所,教师随时可以要求学生出示该卡。——译者注



不同的观点,即关于儿童的智力发展必须基于良好的非正规教学;二是我们的学校是否可以重新组合,并给教师的持续在岗培训以支持。某种程度上,我对第一个条件是乐观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些观念,并且,不少教师自己已经开始质疑传统课堂背后的假设。第二个条件则很难给出满意的答案。在一些地方,学校进行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另一些地方,如果进行改革,改革也将是缓慢而痛苦的;在还有些地方,改革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那些倡导非正规教学的人应该小心翼翼地向那些在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职业发展的教育环境里工作的教师们提出这些好的做法,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有的障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人们称之为体系的东西。目前,这种体系——在我们最糟糕的学校体系里——似乎不可能允许教师去教,学生去学。但是,这种局面也只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英国教育部门管辖下才会发生。

最后,再对我们教育所关注的时尚问题说一句。新思想的出现,比如,要求建立开放的非正规学校,并没有根除旧的思想。“开放教育”将是一场骗局,除非那些支持“开放教育”的人们也着手去解决重复出现的根本性的问题,如我们社会中的根本不平等问题和种族主义问题。美国教育困境中最紧迫的问题,不是课堂里缺乏非正规的教学活动,而是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多元种族社会。像社会融合以及社区管理的问题还没有消失,而诸如开放教育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的日程越来越拥挤。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形势恶劣的情况下保持一种为所有明智的家长所需要的、是其孩子所期望的充满活力的教育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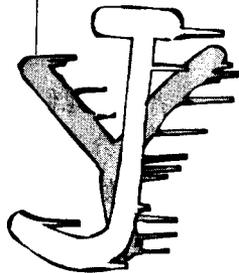


穷人孩子的课堂

1967年12月

《36个孩子》一书是对科尔先生在哈莱姆居住区一所学校里与一个六年级班级相处的经历的叙述,文字简洁而直率。这是我所读过的由教师撰写的最好的一本书。该书以坦诚的和启发式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教师是怎样工作的,探讨了在他与学生开始有所沟通,并且准备鼓起勇气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时,他必须经历的变化过程。例如,他透露了在纪律问题上自己内心所掀起的复杂斗争。这个班是该校六年级最好的班级,可是班上36个孩子中只有五六个孩子能读懂六年级的书,而超过一半的孩子的阅读能力只有四年级的水平。作为一名有经验的教师,他坚持用规定的课本,并努力维持严格的日程安排,不同的科目有单独的课时。回顾自己的经历,他认为,这种在时间和教材上的严格要求,与一学年学生应学的知识量或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范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实际情况是,孩子们在完成了五年的学习之后所学到的东西很少。他承认,这是由于他本人担心班级失去管理造成的。在他的信心逐渐建立起来后,他对纪律的要求作了调整,同样,他的学生也相应地作了调整。他开始让学生在课间休息十分钟,并规定什么时候可以弹钢琴、什么时候可以读书、什么时候可以下象棋和跳棋等。在第二天的课间休息结束时,全班都不想回教室上课,但他坚持不同意。他相信,此时如果不坚持,后果会是灾难性的,因为孩子们过去曾讨价还价过,而且一旦成功,就会坚持不变(或许重要的是他知道全班可能会维持这种讨价还价的结果)。

事情的结果尚令人满意,虽然过程很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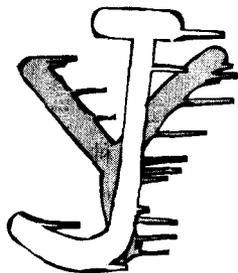
记得从学校回家的那几天,我对自己很不满意,对自己在教室里的行为感到不解:要么拿腔拿调地讲话;要么对孩子们吹毛求疵,不让他们自己呆一会儿。我不停地说,“那不是我,那不是我”。过了几天,当我学着去上课时,我发现教室里的我是一个外来的充满敌意的怪物。

他克服了自己原先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某个孩子一旦失控,全班都会仿效,结果就会产生混乱: **127**

我对一次冒犯没有在意,结果发现班上的其他孩子却没有跟着冒犯;当拉尔夫在走廊里晃来晃去回到教室时,或阿尔文拒绝做算术作业时,我都试图学会了沉默。孩子们并不想搞对抗,冒犯别人,或无所事事;他们害怕混乱的心情不亚于我。

他并未完全解决纪律问题。他也从没有能力让每个孩子三点钟准时集合排队。他在报告中提到,很遗憾的是,一个他没能顾及到的男孩离开了这个班。这位教师和其他孩子学会了相互容忍,这样做与解决纪律问题的效果几乎是一样的。

《36个孩子》一书所开展的教学活动有许多需要进行深刻反思的地方,但是,只要把科尔对问题复杂性的认识稍微作一几乎是枝节上的说明就足够了。这关系到教师对个人自由的需求——一种课堂外不受任何干扰的需求,有时甚至是需要离开教学岗位一两年。有一段时间,《36个孩子》一书中这位教师开始让孩子们放学后到自己的宿舍来(对于一些教师和管理者来说,这等同于逃离战壕到一个无人烟的地方与敌人建立友谊)。这些走访是成功的,但是,他最终发现,他必须每周至少有一天要对学生重新严格起来。当他告诉孩子们他们需要自己的生活时,孩子们都很不高兴。我遇到过一些根本不理解这种做法的教师,或者即使他们理解了,也对此无能为力。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分开,他们需要的是把一切都献给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你会感到,教师们在这种漫长的教学过程中正在逐步被掏空。最终,他们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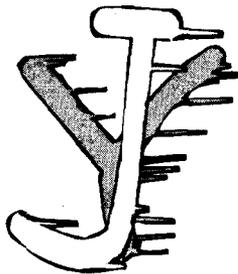


的是从孩子身上获得生活的共鸣,而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关于科尔书中谈到的复杂性问题就谈到这儿。《36个孩子》一书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讲述了一名教师是怎样放弃通常的上课方法,建立起一种非正规的课堂教学模式的。在这种课堂里,孩子们可以自由活动,教师向他们提供可选择的各种活动,而且,孩子们自己制定了大量的课程内容,包括额外的自由写作的机会。该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记述了所有这些活动,并提供了某种特定的对理解非常必要的细节情况,同时也没有脱离对教学过程的讨论。作者收集了大量的孩子们的作文,这样,在某种程度上,《36个孩子》一书就成了见证哈莱姆学生创造力的无可争议的一部选集。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学生的诗歌、神话故事、俏皮的寓言、喜剧片段、个人自传、论文以及具有非凡创造力的科学幻想小说等等。

科尔先生的书和他的小册子《教不可教者》为美国的教师、家长和公众提供了一种他们极为缺乏的范例:具体的真正好的教学可能是怎么样。一个教师喜欢孩子的班级和一个鼓励孩子做一流功课的班级之间是有很大大区别的。《36个孩子》一书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某些解释。书中的经验适用于郊区学校以及犹太人(黑人)居住区学校。美国的其他各种学校很少会定期让孩子们自己选择写作的内容,对于孩子们的作文也很少有人带着尊重和认真的态度去阅读,而这样的态度正是孩子们在写作方面取得进步所需要的。科尔先生声明,自己的发现,即儿童可以写作,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创新。别的教师也早已发现了同样的情况。人们学习使用单词——想把词汇用好——试图向他们所希望接近并打动的观众表达他们想说的话。孩子们通过写作学习写作(但是正如科尔先生所说,事实是,如果孩子们害怕交谈,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去写)。科尔的例子与从小学一年级到研究生院的每个教育层面都有关联,然而,它带来冲击的最大原因是,他的班级是由黑人儿童和波多黎各儿童组成的。我们以前常听说,这些儿童的词汇量很少,难以理解抽象的概念,主要通过体力活动而非脑力活动来学习知识。事实上,科尔的学生喜欢写作,而且有很多话要说。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写作天赋——尽管一些孩子很明显具有这样的才能,但是,就像许多成年人一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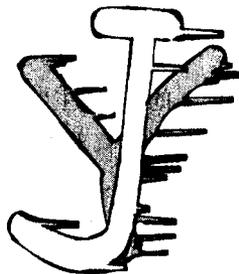
样,许多孩子只会讲述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故事,然后再把它写下来并加以修改——可是,“他们所有的人……通过写作似乎更加充满了活力”。

在从正规课堂向非正规课堂的转变过程中,科尔的动力不是源于某种好的教学理念,而是源于某种铤而走险的心态。他用了六七周的时间,想方设法使用规定的教材,但是,一切都令人失望。科尔本人厌倦了,孩子们也厌倦了。有几次,整个班级又恢复了活力:他们对特森—利斯顿之战做了复杂而详细的讨论,进行了一次有关“心灵”这个单词的对话。好奇的孩子们开始意识到语言和单词会随时空而变化,并且,语言和单词也是有历史的。“你是说单词会变吗?”“你是说哪天我们说话的方式——诸如 cool(酷),dig(走私货藏匿处)和 soul(激情)这些词——也会变吗?”他们对丘比特和普赛克的神话故事入了迷,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单词,听神话故事。教师扔掉枯燥乏味的社会课程教材(《我们怎样发展成为现代美国》),开始教孩子们他们感兴趣的单词、神话和历史片段。社会课成了一节自习课、一段长时间的课间休息,教师用书和活动让全班学生人人有事可做,并使孩子们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书籍方面包括有关建筑、希腊人、神学、美索不达米亚和早期人类的书;有战争爱好者喜欢的二次大战方面的书;有为喜欢绘画的男孩子准备的美术书;有博伯西双胞胎的故事;有多萝西·斯特林的小说《玛丽·简》;还有一个黑人女孩融入白人学校的故事等。

129

教师发现,一旦孩子们开始自己选择做事,他就可以从容地进行观察并倾听孩子们的朗读,了解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几个男孩对科学发生了兴趣,并告诉老师学校里有个地方藏着一批闲置的科学仪器。另一些孩子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电唱机。于是,教师拿来自己的唱片,而班级里的学生则会向他介绍莫姆斯·梅布利。到了十月底,孩子们开始给教师讲邻居的事情,然后着手写这方面的内容。交上来的作文不用批改,因为,没有一个孩子的作文是被强迫写的。他说,这可能是孩子们第一次用笔讲述与他们有关的事情:

我住在东第 120 大街 62 号我的邻居都很不错。街区的每个家庭都有孩子。许多孩子都是西班牙裔。他们当中一些人裸着身



体脏兮兮地到处乱跑。一些房子很脏,走进门你都会感到害怕。有时,醉鬼出来闹事……街区的许多人酗酒,他们没有时间关心他们的孩子。孩子们没有地方玩,他们有公园但家长不愿意带他们去。你现在知道了我们的街区是什么样子的。

教师发现自己现在管理着一个与他一开始所带的截然不同的班级。自由的社会课延长为自由的一天。每天早晨他把作业抄在黑板上,然后全班可以选择阅读、写作或者做黑板上的作业。写作是个人的事,除非作者自己要公开。教师鼓励孩子们坚持做一件事。也有一些孩子由于没有了惯常的规则可循而感到心烦意乱,并且怀念起按部就班的惬意时光。他们的教师也经常产生动摇,想着恢复正规的教学。耗费时日的结果带来了丰硕的自由写作的成果。

教师获准看到的第一本书是 11 岁的莫里斯写的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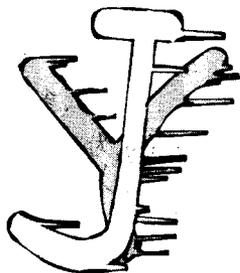
这是关于一个叫莫里斯的男孩以及他的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故事。莫里斯现在上六年级,但是,这个故事将告诉你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出生的时候,起初我是看不见的,但是和全家人一样,我父亲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我能看到的都是模模糊糊的。

罗伯特·杰克逊,一位小美术家,开始了他令人吃惊的文学创作,写了一本书,很明显受到他所阅读的希腊文献的影响。《野蛮人成了希腊武士》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探险故事,讲述的是一个瘦弱的人借助“幸运之力”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的故事:“在古代德国,一天,一个男孩长大了。他的名字叫帕索斯。他的名字取自一个拉丁词,因为他很敏感。在古代德国,罗马人拥有巨大的帝国……”

130

教师发现,不同的孩子对不同风格的作品会有不同的反应,他们会尝试新的表达方式和模式。听了伊索和瑟伯的寓言后,一些孩子写下了这样的寓言:

从前,有一头猪和一只猫。猫不停地对猪说猪又老又脏,只想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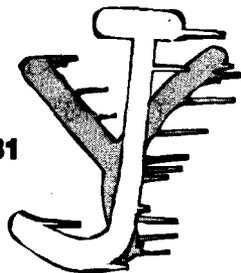
吃。猪回应说,自己死后是可以给人用的,而你这只猫死了只能是腐烂。猫过去一直以为自己比猪强,(现在知道了)猪死了可以用作人们的食物。而猫死后只能埋在土里。

寓意:活着时很脏,死后很干净。

一些孩子自己编神话故事,把库克罗普斯、宙斯、超人与奇妙的女人编在一起。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长篇的未完成的埃利克特神话片段,由小阿尔文·柯里编写,“令人敬畏”是他的教师用来形容这篇故事的非常合适的词。这个神话的开头是:“这个被称之为埃利克特的故事充满了最热烈的激情,以及埃利克特为父亲复仇的最深切的期望……”孩子们出版了一本杂志,称之为《和》(And)。这本杂志在《36个孩子》一书中收有两期。《和》杂志有许多好文章,包括罗伯特·杰克逊写的图文神话以及玛丽·福特的诗“瘾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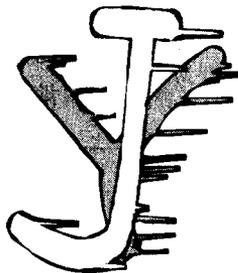
当他们在
大街上
相互间
擦肩而过
而当
他们遇见
警察就会
一动不动站着
被打一顿
很可怜
只想
哭泣。

在大多数事情上,放手让科尔先生自己做主的学校主管部门似乎认为,《和》杂志里的内容还有太多的恐怖和暴力,建议全班读一读一个五年级学生写的有关她和妈妈上街买东西的一首难懂的小



诗。助理校长对《和》杂志的惟一反应就是主动提出给主编人员上一堂校对方面的课。

科尔先生对纽约市的学校进行的日积月累的描述是令人震惊的，但是，这种描述的影响力是慢慢浮现的，是靠科尔先生公正、怜惜以及愤怒完成的。例如，“感受不到整体的混乱状况是很难的——你看到的是，在很多没有教师的班级里，孩子们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有时还冲走廊里嬉戏，干扰班级上课，互相恐吓等，而校方却是一味地讨好：‘请不要制造麻烦，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制造麻烦。’”四月份，科尔通过采取与学校完全对立的办法，即许多在犹太人（黑人）居住区学校工作的教师认为的非职业的做法，表达了他对该学校体制的看法（当然，如果教师真正是专业人士，他们就应当忠实于他们身边的学生，而不是他们的上司或学校体制）。他对自己的学生解释说，（在当时的纽约）他们必须要参加阅读和智商测试，因为这些决定着他们是否能上初中，因而也决定着他们的整个未来。他拿出他们的成绩册，告诉他们过去的分数。孩子们都感到非常生气和震惊，因为在他们就读的这些年里，还没有人如此坦率地告诉自己他们现在的水平有多低。在这个学校最好的六年级班里，只有两个孩子的智商成绩高于100分，大多数孩子的分数界于80分至90分之间。全班孩子问他该怎么办，科尔做了中产阶级孩子的教师经常做的、但贫民区孩子的教师从来不做的事情，即他教孩子们如何准备考试。[根据他的解释，犹太人（黑人）居住区学校的教师认为，如果客观考试能够证明孩子们是失败的，那么，他们在孩子那里的失败就是可以原谅的。]他拿来旧的考试卷，用听从指挥的巧妙艺术让全班做了几周的练习。孩子们反对这些枯燥的练习，但是，他让他们现实一些。他们六年级的功课无关紧要，如果他们的考试分数过不了关，他们哪个初中学校都进不去。他教给他们各种考试题，告诉他们不要在考试面前耍小聪明。有时候，孩子们对每道题只有一个答案难以理解，对让他们弄明白出题的人希望考什么以及哪个不像是合理答案感到很难。孩子们必须按照考试的水平进行思维训练，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水平那样做。正如他们的教师所说，“孩子们答应为了他们的未来愿意忍受枯燥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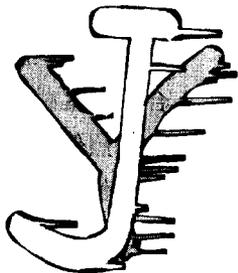
由于准备智商测试的时间太少,结果,班上只有 10 个学生的分数超过 100,其中有个女孩的分数达到 135。后来的阅读考试说明了辅导的作用。班上大多数人的阅读水平都跳了一到三年,少数达到五年级水准,12 名学生达到七年级水准,8 名学生达到了八——十二年级水准。

阅读考试勉强称得上是一次胜利。而这一年对科尔先生以及他的学生来说绝对是一个胜利。虽然他没有创设出他设想讲授的那种充满幻想的社会科课程,即教育孩子们“要有毅力和反叛精神去改革我们社会中的事物,但不要在过程中失去灵魂”,但是他的工作非常出色。孩子们学会了广泛阅读并喜欢上了阅读。他们发现自己会写作了——在他们与一位有天赋且热情的教师相处的方方面面,有一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有一些或许只是细节上的事。《36 个孩子》一书的第一个章节,也是最长的一个章节,是以非常自豪的笔调写成的。这好像是说事情就是这样完成的。这是一个成功教师的历程。

132

篇幅较短的第二章节使《36 个孩子》一书既是一本具悲剧色彩的书,又是一本成功的书。书中跟踪了 1963 年孩子们六年级毕业离开学校后几年的生活情况。尽管统计报告不是很全面,但是,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一个孩子痛心的评价:“科尔先生,您的那一年是不够的。”虽然孩子们非常希望尽早完成学业离开学校,而且,这种低微的愿望和梦想,在上学毫无意义这个现实摆在他们面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萦绕在他们心里,孩子们带着困惑回来找他们的这位六年级的老师,诉说他们的挫折和持续的沮丧。有个成功考入新英格兰一所预科学校的女孩在白人的世界里付出了沉重的心理代价。其他几个女孩坚持了下来,因为她们性格非常坚强。男生中的受挫情况让人惨不忍睹。那个叫罗伯特·杰克逊的学生,他的绘画和作文使《36 个孩子》一书增色不少,却在音乐和美术中学辍学了。(科尔先生前去了解究竟,见到了一位指导咨询员,她的办公室里挤满了黑人学生。“你知道我们对这里的……非常好”,她低声说,然后在—块记事板上写了“黑人”一词。)^①

① 轻蔑语。——译者注



迈克尔，一个曾经从事小说《弗兰肯斯坦遇见库克罗普斯和普赛克》创作的男孩，仍然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他想掌握写作技巧，但是，他就读的学校却与写作毫不相干，结果他靠卖报纸为生。另一个叫拉尔夫的男孩“开始像瘾君子天堂里的常客”。在他给老师所写的一系列信函和文章中，阿尔文·柯里记录了其知识下滑的经过。后来的教师把他看成是文盲，然而他在沮丧中仍然继续写作。下面是“受责难的建筑”一文中的节选：

有一个漏水的龙头，不停地滴着水，里面没有任何让人可以过得开心的娱乐活动，但还是有看的。涂料开始脱落的墙面，说出了人们可能处在不同的心境里，墙面就是这个状况，它们所展示的是不同的场景，或许，就像你逐渐离开童年走向成年一样的场景，而这时一个幻影从眼前掠过，你注意到窗户变得漆黑，让人很不舒服，它宣示着你将拥有一个自己的地狱，在那里你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你走到外面，然后问自己这幢建筑为什么要受到谴责，而人们可以在哪里找到自我。人们为什么要谴责这样一幢在里面人类可以弄明白自己现在是什么，将来是什么的建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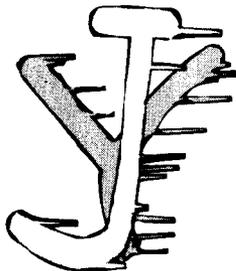
133

他们为什么要谴责生活呢？^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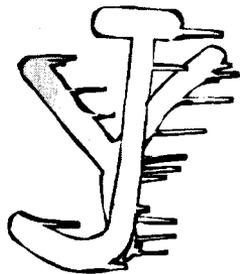
看着这些统计数字，他们的教师不禁要扪心自问，自己教他们去写作和思考是否是在帮助他们，创造一些学校无法承载的期望是否是件好事。科尔的答案令人忧虑。他不会再在现在的这所公立学校教书了，他希望能找到继续教孩子的办法。但是，很显然，他不能肯定下次他还能否救他们，至少，他今后所能够做的是为“缓解今日美国生活的负担”出把力。

《36个孩子》一书展示了笼罩着这个国家社会悲剧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不仅仅是一本传达着我们曾经听过的、并且经常被我们所忽视的

^① 原文有语言不规范的地方。——译者注



信息的书。每个孩子都在老师的记忆里留下了他特定的机智、他说话或写作,甚至是特别逞能的方式。这本书是悲剧性的,但是,书中的成功也表明了这些孩子坚强的个性,他们本身的智慧和承诺要比悄悄逼近他们的渺小而平庸的命运强大得多。在哈莱姆,设置的铁栅栏在等待着这些年轻的生命,但是,在他们的生命中有欢乐,也有彬彬有礼的举止,而这些也是《36个孩子》一书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理的一部分:既丰富,又有渐浓的苦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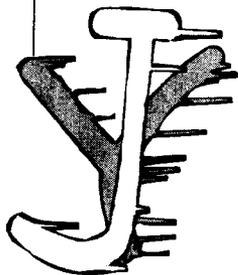
给教师上课：一份乌托邦式的课程说明

1968年12月

我是在一次偶尔的机会里发现了这样一个非常珍贵的课堂活动记录范例的。这是一位从事了一段时间非正规教学的教师所撰写的一份完整的、充满智慧的报告，非常的难得。 **134**

埃尔温·S·理查森的《在早期的世界里》一书(兰登书屋,1964)是一份关于作者在新西兰北部一个很小的乡村学校12年任教生涯的乌托邦式的报告。它可能是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有关教学方面的书。书设计得非常美,孩子们高质量的艺术创作图片贯穿于书中,有写作范文、木刻、漆刻、陶艺以及手工织品。全书结构紧凑,但是读懂并不容易。在不同的令人费解的段落中,理查森对自己的想法都是思考了再思考。读者好像同他坐在一起,跟随着他在手中翻着这本厚厚的孩子们的作品集,默默地倾听他叙述着在收集这些作品中所付出的艰辛,并试图去发掘该书编写过程中的意义。

向读者说明班级如何开展陶艺活动的长篇叙述意味着整个教学风格需要花些时间。学校周围的地里有各种等级的黏土,理查森和他的学生测试各种样土,以便搞清楚哪种黏土更适合陶艺活动。他们建起了一个制陶小窑,接着陶艺就成了学校的常规活动。通过起初的瞎搞乱弄,孩子们慢慢地认识到材料的局限性——湿的黏土不能砌得太高,否则会塌下来。他们喜欢给陶罐做过多的装饰,出来的是一堆抄袭前人的、平庸落伍的作品。当孩子们给他看自己早期的水平底下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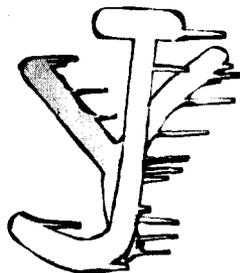


时,他的策略是找到一些细微之处加以表扬,挑出为数不多的好的作品作为样本。理查森后来回顾时慢慢发现,重要的是要有价值判断——即一些作品比另一些作品好;而孩子们要学会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他力图让孩子们去观察为什么这个陶罐好一些,但是,孩子们起初却满足于判定这个就是好的,应该把它放在特别展区,结果不久整个教室摆满了学生们鉴赏的作品。在讨论中,许多孩子为制定一套价值标准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后来,理查森说,他当时对这样的程序感到担心,但是,“这套标准是在我发现孩子们提出了不同的价值标准后才制定的”)。他们开始以批评的态度认真看待相互间的作品。这个陶壶太重,还没有你上次做的那个好;一个男孩告诉另一个男孩壶嘴收得不够,可是,勾几笔就好看了。作品的质量有了提高:“评判一开始,在从一大堆的作品里选择一些较好的作品的过程中,差的作品的的影响力感觉不再那么强了,而且,出现一种重新构思的需求。”回头来看,理查森感到,他的大量前期教学都没有什么成效,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来区别好的作品和差的作品(他一开始对陶艺也一窍不通),而且,他当时没有认识到学习鉴别的过程是整个项目的要点之一。

135

理查森发现,教这些年龄很小、自信心不强的孩子(这所学校招收5到15岁的孩子),必须要把事情安排得更仔细一些。把黏土压入陶艺作品的石膏模子很有用,因为这些模子可以让孩子很快做成像样的作品,而不需要先掌握用黏土筑成陶罐基座这样复杂的工艺。孩子们开始自己实验各种结构,把木头、树皮以及贝壳压入黏土形成设计作品。他们发现实际情况往往是,大胆的几笔会带来比过度装饰更好的效果,而且,渐渐地,他们使用线条、陶块和色彩表达抽象概念的信心更强了。十几个孩子成了真正的陶艺能手,他们的作品在书的插图中都有很好的展示。

陶艺是理查森工作的起点。然而,对他教学叙述最多的是关于儿童写作的几个内容详尽的章节。经过一段时间,陶艺方面的工作对其其他工作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工艺技巧方面,但对写作却没有什麼影响,因为,孩子们把写作看成是一种负担。偶尔给一幅画来一段合适的文字说明时,他们居然要用“诗歌”进行尝试,理查森对孩子们提出的想法



感到吃惊。孩子们对书面表达的整体概念是不全面的：他们所接触到的写作与他们的经历没有什么关系，并且与他们的谈话方式也格格不入。诗歌是优雅的创作，通常要有一定的格式，很难懂，或要有超自然的主题。还必须要押韵：“画眉鸟整天放声歌唱，却没有任何酬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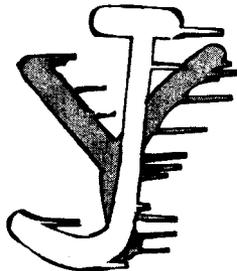
有了诗歌和工艺两个主题，师生间的对话很快就促进了陶艺活动的开展，但是，对写作却不见得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新的深入的活动内容可以开展。一件很小的漆刻作品就可以挑出来加以表扬，然而，理查森在孩子们最初吃力写成的文学作品中却找不到任何引人瞩目的地方。有几个孩子错误地以为教师对写作质量担心，于是写了几首感情奔放、华而不实的诗来取悦他。理查森开始从这些冗长的作品中挑选出一个好句子给予肯定，并鼓励他们写一些更短的作品。

他从孩子们的话或作文中收集生动的句子、甚至个别的比喻，把它们抄下来进行展览（年龄小的孩子有很多形象的比喻，譬如，他们看到水坑，就会发现“一个颠倒的世界”）。他为全班读翻译过来的日本俳句短诗，让他们写一些短的带有一点散文性质的作文，孩子们开始有了成就感。和陶艺活动一样，孩子们逐渐开始有了讨论作品质量的基础。一种完整的短诗风格发展起来，孩子们称之为“图画诗歌”——没有韵律的几句抒情的话，至多表达一两个主题。13岁的艾琳写道：“矗立的松树/伸着庞大的开裂熏黑的树枝/还有被截取的树干/在土中消失。”

这些短诗成为探讨更长的诗歌的起点，并且开始以各种形式重新出现。当全班读到——

在看不见的海水中
泡状手指般的海草
翩翩起舞在快活的水中

它们好像永远没有瞌睡
好像永远不会惊动水面
或跳着沉重的舞曲



太阳永远不会照在它们身上
 它们也永远不会惧怕一滴水珠
 因为海里到处都是水

在黝黑的岩石上
 帽贝吐出白沫紧紧附着岩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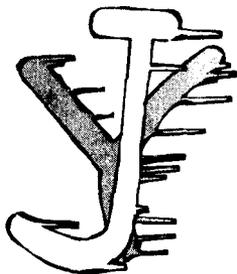
他们选了前两行诗作为他们自己能够表达的诗,排斥第三行诗,认为它单薄,缺乏力度(首先该行诗所谈的内容是诗人自己都不了解的东西),并且建议最后一行应单独而简要地陈述。

如果只考虑某篇完成的散文或某件陶艺的价值是不够的,孩子们边活动边评论帮助就会更大。“为什么没有叶子?”有人会问。“我不喜欢你的两个人物。他们没有你上次画的好,戴维。”“我喜欢你的故事,但是,我感到失望的是,对熄灯后你们几个人的谈话内容你讲述得太少了。”……“我非常喜欢它(一首有关毛毛虫的诗)。斯图尔特对毛毛虫知道得很多,他写起来就好像他自己是一个毛毛虫一样。”理查森对孩子们能够客观公平地评判自己的作品印象非常深刻。有时,其中一个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却不被他人认同,但是,通常“孩子们对那些在语言表达中鲜有出色表现的孩子还是很友善的,并且,他们认识到,一个人认为是‘好’的东西,另外一个人可能并不这样认为”。

137

有时候,理查森给全班布置一些写作的作业,如果这些作业是精心策划的,就会产生好的效果:如,描写流入下水道的水;把脸贴近小草,看看事物会是怎样的;描绘一个到学校参观的人或在十分钟内尽快地写下你心里想到的一切等(最后一种方法是为学生后面的写作提供原始的素材、想法和形象的比喻)。

随着各种写作——自然学科课程、故事、记叙文、诗歌、自传片段以及幻想小说——的发展,全班学生逐渐完善了一个体制。学生可以决定自己的哪个作品能够拿出来大声朗读和讨论。之后,大家选出最好的作品,收集起来编成学校系列杂志,每一期都有一个新的名字。理查森说,他很少让全班的学生对同一件事情发生兴趣;他的想法是让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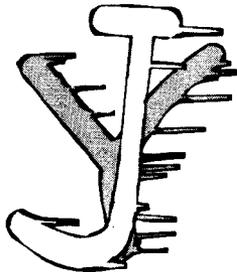
孩子对一件事产生兴趣,然后鼓励他继续探讨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的话题逐渐侵占了他正规课的课程,但是,当他感到有一些知识是孩子们都必须知道的时候,他就会坚持正规的课堂教学。有些时候,在他离开学校时,他会感到自己教的太多了;而在有些时候,他又会认为孩子们需要的指导远远超过自己过去所给予的(他把孩子们经常犯的错误记在本子上)。

孩子们的话题要比课程以及课程计划重要得多。他发现,故事和诗歌可以为绘画和雕刻提供思路——有时他会建议某个孩子把他在一个故事中没有说完的事画出来。对于很多孩子来说,特别是一些毛利的孩子,艺术发展会促进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有些孩子就是通过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主题上面而得到发展的,如某个孩子画的是黑暗,写的是黑夜;而另一个孩子则针对发现的一只死鸟在散文、雕刻以及绘画中反复进行创作。

《在早期的世界里》一书是一本特殊的儿童作文选集,但是,理查森所认真强调的是许多孩子写出有价值的东西所花去的时间。他说,只有几个人开创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多数人所失去的——他在全书中反复提到的这个观点——就是激励,即鼓励他们去写一些东西。最好的作品源于偶然的邂逅——几只椋鸟在学校附近筑巢,而这给孩子们带来了写作和绘画的大丰收;有一次,一个男孩的雕塑头像也引来孩子们一系列的对于头像和面具的创作,这点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理查森认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即使是在他的学校也还是极少的,因为,学校的作品很少能抓住生活中的真正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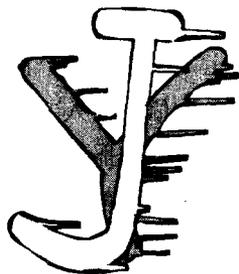
理查森的乡村学校从未开设过被称为平衡的课程——他对自然科学课程、工艺以及写作的痴迷显然占了上风,尽管书中有一些有趣的章节涉及数学和戏剧。但是,《在早期的世界里》一书是我所见到的对孩子们写作、思考和谈话进行有思想深度的认真描述的一本书,而不仅仅是完成某个被称之为教育的行为的一本书。书中那种让人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关于学校的种种观点的意识是很强的。然而,这种叙述是令人信服的。书中有限的几个观点都紧紧围绕着那些看上去充满活力的学生实际活动的范例进行的。最终,当理查森努力把事情写成文字并

138



以某些古老的、陈腐的以及被人们用烂的定式作为结尾的时候,你就会倾向于接受他的公开表白:

我明白我必须在机会到来的时候尽可能地教给孩子们一些东西,而这种教学方式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我可以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地去讲。如果我在这些时候不去传授知识,学生的活动就会变得苍白而毫无生气……学生一系列的发展也教育了我,那就是我必须充分利用环境去鼓励每个孩子表达看法,而不是要求整个班级一起表达。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对孩子个人和小组的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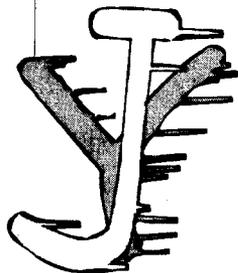
教书的真谛

1969年9月27日

139

弗朗西斯·波克曼·霍金斯是一位有天赋的教师，春季学期的每个星期四，她都和科罗拉多州一所公立学校里六位聋哑幼儿园的孩子在一起。这是一个特殊的课程，有各种安排和详细的目标，但是，校方很聪明，给了霍金斯夫人行动上很大的自由（他们一定是对她一车又一车地往学校里运的东西感到纳闷：有吹泡泡用的设备，有打气筒、塑料试管、一只仓鼠、食品色素、水盘、秤器以及几百个非正规教室待用的其他物品）。《行动的逻辑：教师的笔记本》是一本以连续记录每节课的形式编写的笔记，并配有照片和作者的反思：譬如，如何组织课堂教学，这些特殊孩子怎样打发时光，霍金斯夫人做了些什么（以及她克制自己不做什么）和她在教学时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等。每次笔记的开头都是介绍某个新的设备清单——所有的设备都附有有用的说明——然后记述了接下来一天的教学和学习情况。

任何描述在好的课堂里所发生的一切的企图几乎都失败了。每位读者，无论其知道多少，都将正视日志中提出的主要问题。虽然如此，霍金斯夫人对孩子们的个别描写是非常可爱的，她是一位极为敏锐的观察者。她渴望从个人的经历中偶尔提取某个抽象的原则，但是，笔记中的一些章节有些含糊不清，而这几乎总是好教师在将自己的教育艺术用文字和通俗的术语进行表达时所出现的特征，而且，惟有她拥有的大量常识以及对情节的细微描写，使她能够保持正直的一面。读者如同矗立在船的甲板上，上下摇摆不定，一会儿是从肥皂刷的笑料当中学习科学，一会儿又跳到有关教学和爱这样高深的话题上领略真理：“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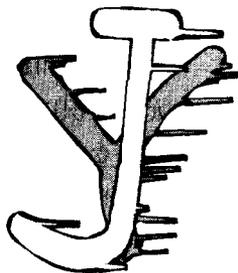
注是爱的亲密姊妹,我们不谈论什么教人学会爱,而是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

我们看到的,是对一个有经验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作思考进行的具有开创精神和引人入胜的描述。霍金斯夫人对它照管的聋哑孩子有不少启发性的建议。然而,无论是对于富人还是穷人,残疾人还是健全的人,这都是一本真正的教育所有儿童的书。有可能带着最大兴趣阅读这本书的人,是那些对开发替代正规教学的方法越来越产生兴趣的教师和家长们。他们会发现本书有一个优点,而这是那些关于自由学校和课堂的书籍鲜有的,即它真正是一本关于成年人应该为儿童学习做些什么的书。尽管霍金斯夫人与其他人一样,深信儿童自由独立地从事个人学习的环境重要,但是,她不相信这样的环境会偶然产生。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教师有责任创造某种氛围,选择好教材,并且安排好活动的舞台。随着孩子们自己展开学习,并开始作出选择,教师仍然可以进一步作出判断:什么时候介入,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以及什么时候给予什么样的帮助。这是一个难以捉摸而又复杂的过程。

例如,霍金斯夫人首先看到,或许是因为听不到,孩子们比她所见到的大多数的4岁儿童更喜欢遵循惯例;这些孩子使她想起了在一般学校里那些得到训练的大一点的孩子,他们逐渐减少了对自身经验的依赖。因此,她的策略包括有意地稍稍打断日常的程序,使他们摆脱日常的安排以适应新的事物:

无论我做什么都会立即被孩子们模仿,正如这种情况发生时人们所必须做的,我不得不尽可能快速地改变我先前做的一切,为孩子们提供一种以上的模仿活动,这样达成默契后,再引入各种各样的内容……当一个五人组一遍又一遍地学做一种纸饰品时,该是等待并点出孩子们这种“错误”的时候了——一种东西越难模仿,因而也就越易于犯更多的错误。

如霍金斯夫人所言,这个活动的意义在于,帮助孩子们“重新获得并开发这种探索和测试的能力,调动起他们沉睡的想象能力、控制能力



以及理解能力——总之,去学习,而不是去记忆”。通往可能产生这种学习方式的课堂的途径就是教师的兴趣。如果教师自己不断研究教材,而不仅仅是看着学生使用它,那么,让学生大脑活动起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正像霍金斯夫人所指出的那样,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是由成年人和4岁的孩子一起做的。霍金斯夫人喜欢看着塑料试管中的水泡“下沉再上升”的过程,并且认为,这种共同的兴趣对孩子来说比成年人对他们的发明仅仅给予某些赞扬的话要珍贵得多。她班级的情况说明,好的开放式的科学教材本身就拥有某些丰富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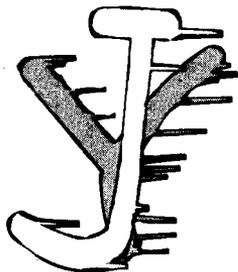
霍金斯夫人对自己作为一个舞台监督兼催化剂的角色总是能有清醒的认识。有时,这个角色是直率而又简单的,譬如,当帕蒂拿起积木离开大家自己去玩时,霍金斯夫人会说:“我会保护她自己在那里单独玩的权利。”有时,如在规划引进新的教材的时候,会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基于霍金斯夫人上述想法的两项长篇调查结果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下面是她对“人造食用色素”一课的看法:

141

从教学意义上讲,(这里的材料)对大多数孩子来说仍然是新的,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生动的。我以往的经验是,如果将介绍食用色素的使用方法“加以排列”,就会带来更多的乐趣和探索。在这个特别的早晨……我作出了另一个判断,即需要一段有教师参与的更为安静的活动时间。如果早晨这段时间另有安排,我就可能取消这些活动。例如,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发现,孩子们在度过了一个寒冷封闭的周末后,急需在远离成年人的情况下,对熟悉的道路进行自我辨认,我就立即把“排列食用色素课”的计划搁置起来。因为,这时的指导只会带来麻烦……

下面是霍金斯夫人对建立天平秤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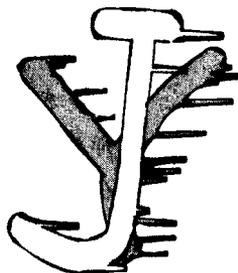
我想引进这些秤器,不是大张旗鼓地而是不经意地把它们与那些一定能达到目的的旧的东西一道引进,这样,孩子们就不会仅仅因为是新设备而立即冲向这些秤器。这种“安排”至少有两个好



处：一是让孩子们有足够的时间使用新设备，而不需要一同去或轮流使用。如果有时间连续做实验，这种有秤杆、秤砣的秤器，对孩子来说，其意义可能大得多。二是……（这种）方法为教师提供了充足的观察时间。在时间上，大多数孩子都能按照自己的方法达到某种认识，即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演示一遍。也许一些人从一开始就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不喜欢在实践中这样做。

霍金斯夫人并不想对其作用的意义加以总结，这一点或许是明智的，因为，这种作用的意义是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细小具体的问题上建立起来的：从确定要花很大力气去展示精致的醋酸盐胶体，即透明的彩色纸，给孩子们看，这样他们就会对它格外小心，到牢记尽早把卫生打扫干净，以便孩子们可以有时间休息一下。大多数读到这些笔记的人可能会说，所有上述这些仅仅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霍金斯夫人是一个出色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她所谈到的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好教师在教不同年龄的孩子时都会遇到的。对于一些教师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很自然的；而对另外一些教师来说，这些问题是通过经验才能体验到的。每个人肯定都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描述自己的工作方式。这仅仅是一个笔记本，里面的叙述会给你留下未完成的印象。尽管书中有很多好的建议，但是，它并不是刻意地去告诉教师该教些什么。该书仅仅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教学实践原则中的工作场景。通过它，我们可以感受到某种教育哲学在艰难地孕育之中。在缺乏更多的好的课堂以及第一手教师报告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什么信条或术语，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很现实地把它表达出来。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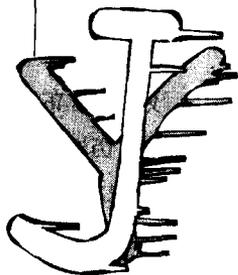
接触更多的生活

1980年6月8日

143

约瑟夫·拉希(Lash, J.)的《海伦和教师》一书是拉德克利夫学院编写的美国著名女性自传丛书中的一部。这本书从两个方面而言是有风险的。首先,海伦·凯勒和她的教师安妮·沙利文·梅西的一生早已被人传唱。海伦·凯勒著有《我的一生》和《安妮·沙利文·梅西老师》两本书,而内拉·布拉迪在20世纪30年代成功地撰写了《梅西小姐》的自传。威廉·吉布森则将该故事改编为他的精彩话剧——《神奇的工人》。第二个风险在于,任何一本像这样长达811页的书籍,难免会与那些我们近来所买到的厚厚的粗制滥造的自传为伍。然而,值得称颂的是,拉希先生成功地避免了上述这两个风险。这本书虽然没有拉希先生的《埃莉诺和富兰克林》一书写得那么华丽——该书被评为过去20年美国最佳自传体小说,但是,这本《海伦和教师》却以十分引人入胜的笔墨刻画了两个交织在一起的生命,如果将这两个生命分开来,则很难理解其中的意义。作者还收集了大量新的内容——该书增添了一些以前从未达到过的深度和神韵,也提到了一些不足。篇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很明显,有许多内容本来是可以删除的。但对于一次成功的环球旅行,我们并不需要所有的细节。没有海伦·凯勒为取悦达官显贵所说的至少一半的老到的赞美之辞也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埃莉诺和富兰克林》一书每一页上都有精彩的内容,而且,由所有细节而形成的效果是如此丰富、复杂和亲切,以至于使阅读这本书成为读者一生中难以忘怀的事情。

基本的故事情节是妇孺皆知的。海伦·凯勒1880年诞生于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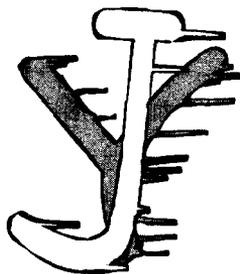


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塔斯坎姆比亚。生下来 19 个月后，一次突发的高烧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安妮·沙利文比海伦·凯勒早 14 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靠近斯普林菲尔德小镇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5 岁那年，她成了孤儿并患上了沙眼，双目处于半失明状态。她在图克斯伯里的贫民院里生活得非常悲惨——在那里，她的弟弟吉米，她惟一的亲人死于肺结核。后来，沙利文幸运地进入波士顿珀金斯学院学习，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的视力也有了很大恢复，尽管她后半生都在和失明抗争。21 岁时，安妮·沙利文受雇成了 7 岁的海伦的家庭教师。伴随着蜚声全球的成就，沙利文和海伦开始了长达近 50 年的爱和合作。这种爱和合作带着她们走访并激励着世界各地的残疾人，也让她们进入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与达官显贵建立友谊，著书立说并赢得世界声誉。

144

拜读这些基本的故事情节有许多方式。人们可以把这对非凡的妇女看作是一个文化之窗。读着拉希先生的书，人们不难发现安妮·沙利文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实践者，而非知识分子，但是，她对被冠以生活、成长和友谊这三种神圣和进步的情感的热爱，使她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和世俗做法。她把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复活的浪漫主义以及社会的改良主义融合在一起，反映了她那一代人的以及时代的特征。

海伦，与她的老师相比，其女权主义的思想更强，并且，作为一位最鲜明的中产阶级文化激进分子，她是以一位终生的激进分子的面目出现的。这些人把浪漫主义的思想与激进的政治融合在一起。例如，海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积极支持者，也是被称之为“世界产业工人组织会员”的激进劳工联盟的支持者。在某种意义上，拉希先生希望我们把她看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新共和》杂志创办初期，伟大的激进主义评论家伦道夫·伯恩的讲求理智的知音。伯恩斯和海伦都有着共同的虚幻的宗教生活，痴迷于人的成长与发展，笃信教育，期望把个人问题与政治方面的广泛问题融合在一起。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有着相似之处，即源于伤残经历的激进主义。伯恩斯的驼背以及扭曲的脸使他对外来者和受压迫的人持有同情心，而凯勒的双目失明和两耳失聪也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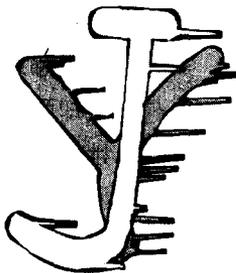
海伦·凯勒还喜欢那些对这个国家 20 世纪前半叶的发展趋势著书立说的名人。和马克·吐温、简·亚当斯——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与埃莉诺·罗斯福一样,她把自己创造成一个公众人物,反过来又被她的听众所塑造。她受到公众的关注,但是,她又竭力想过一种个人的生活,这种抗争是最为痛苦的,因为,她的确需要教师和许多其他人大量帮助。尽管要付出代价,这种帮助却总是如期而至,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拉希先生对凯勒所得到的帮助以及所付出的代价进行的广泛思考和描述是精巧而又复杂的。

这个故事的情节也有不开心的一面。海伦·凯勒扮演了一个欧文·戈夫曼(1959)称之为随遇而安的英雄的角色,一个没有辜负文化标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使别人确信某种固定游戏的公平性的这样一个残疾人的角色。作为公众人物,她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便让美国人认识到盲人和聋哑人的问题,但是,她也发现,自己在有关残疾人的情节剧中扮演着某个角色。这种情节剧既有文化的多愁善感,又时而带有某种恶意的性质。作为一个世俗的圣人,她使正常的人相信盲人是会给予回报的,他们是温柔的和友善的,他们经不起情感的伤害。

145

正当我们开始被环绕着这位文化女英雄上下翻腾的祥云惊得说不出话来时,拉希先生引入了布莱希特的物质至高无上的主题:为了钱,沙利文和海伦到主管部门登记注册了一个综艺表演团体,到美国各地巡游演出,以海伦·凯勒的故事让观众着迷,从而赚进了大把大把的美元。沙利文感到这是一种侮辱,对这样的演出恨之入骨。海伦却很喜欢这样的表演行当,喜欢到处旅行。这就像一个会说话的狗被拉出去展览一样,但是海伦对生活的极度向往淡化了这种体验。读者开始对二三十年代美国的这种广泛的既愚蠢又善意的多愁善感表示不解。

拉希先生的书也是对一个既被忽视又很迷人的话题进行权威性的探讨,即对师生关系的探讨。安妮·沙利文是一个天才,这不仅表现在她是一个实践者,而且,如拉希先生所说的,她是一位直率的教育理论家。同伟大的让·马克·伊塔德教育维克托,这个法国革命前阿弗里昂的著名野男孩一样,沙利文把她的大部分会面时间都给了她的惟一学生。她的教学方法是折中的。她从威廉·詹姆斯和其他人那里,包



括塞缪尔·格里德利·豪与劳拉·布里奇曼,汲取了他们的某些思想,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加工;她的方法的一个重要例子,就是她通过流淌的水在海伦手心中用手指拼写了“water”(水)这个单词,至此海伦开始明白还有语言这样的事物。然而,正如拉希先生所说,这一惊人的启发是以更为基本的活动为前提的:沙利文老师进入了海伦的内心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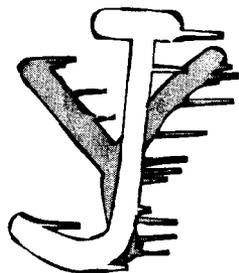
如拉希先生所指出的,海伦对自己的早期教育有不同的说法。一些说法是强调她自己潜在的能力;而另一些说法则强调:“我的老师来之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一回事,我生活在一个无知的世界里。”但是,她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倍受宠爱。在双目失明之前,她已经学会了蹒跚走路,学会了讲话、吃饭、爱与被爱。在她双目失明和两耳失聪后(但是在沙利文来之前),她也学会了用手势表达自己需要的东西——她曾经能够数到60以上。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的描述,包括教师的描述,都强调海伦惊人的生命力。

一些评论家认为,沙利文极力想使海伦尽可能地像一个正常的人,而不是开发她的非凡的潜力。对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海伦有些书生气;她的反应似乎经常是间接的,好像她的首要的现实世界是她从别人的话语中构建起来的单词世界。但是,总的来说,海伦、沙利文和世界之间的互动所开启的经历多于妨碍其发展的经历,而海伦的世界所包含的内容肯定比单词多得多。海伦还有一种很强的触摸感,而这种感觉是教师花了很大力气,通过让她去接触树皮、花瓣和动物皮毛等各种事物发展起来的。单词和触摸在她的生活中确实实地连接起来。她用手触摸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圣母玛利亚和耶稣”中耶稣的嘴,嘴巴里喃喃地说,“无罪的贪婪”。

146

海伦的心理发展也可以被用来研究作家的创造力和发展能力。的确,自从海伦所写的故事最终被证明是别人已发表东西的翻版起,她的创造力就一直受到争议。她的非凡记忆力也受到质疑。另外,许多读者感到困惑的是海伦对颜色或野鹿的轻微蹄声的描写。不过有些人却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感官上的傲慢”,单词和声音的联想的确对她意义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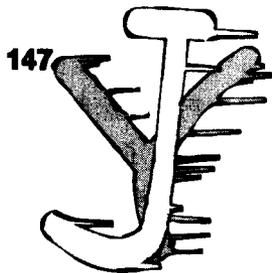
她写的内容有多少源于她个人的经历至今仍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



题。我个人的猜想是，答案在我们解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给海伦写的两封信之后才能明了：

显而易见，诸如此类的感觉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心理世界中相对较小的组成部分，而关系是心理世界最受人关注的内容，其涉及的整个范围、程度以及由实质内容组成的利害关系应按照类比的方法加以提示和探讨，其实际的作用在人和人之间一样都是很大的，对比的效果方面也是相似的……而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审美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魅力……你所生活的世界不同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这并不矛盾。我们所有人内心中所依靠的伟大世界就是我们信仰的世界。这是一个拥有永久性事物和巨大可能性的世界，而我们和它的关系大多是语言形式的……我们语言材料的内容以什么形式出现无关紧要。对某些人来说，它更多地是以视觉形式出现的；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则更多地是以运动形式出现的……对你而言，则是以运动和触觉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它的功效是和我们一样的，其关系的含义是靠代表事物之间所存在关系的语言来表示的。

围绕着沙利文和海伦的另一个有关联的问题是，人们指责沙利文在现实中是一个骗子，把海伦的成就实际上当成是她的成就。很显然，这样的指责是容易引起误会的，海伦的才能是她自己的。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考试很出色，而此时，沙利文被迫在教室外等候。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看，正如拉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海伦的成就基本上是合作的成果。她需要编辑的帮助，需要人们为她提供有关那个她被隔离的世界的信息。实际上，她的一些最好的作品是在相互交替中完成的，海伦先写，然后由老师和约翰·梅西，沙利文的丈夫，编辑和修改。持怀疑态度的人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一种骗局。我赞同拉希先生的观点，事情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正像我们大家都明白但很少承认的，创造力的条件首先是社会性质的。沙利文可能开启了海伦的灵魂，但是，前提是灵魂已先在那儿了。随着教师和梅西的离去，海伦的创作就不那么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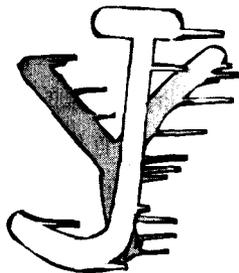


易了,也不如从前那么好了。

然而,最终,大多数人还是很想读《海伦和她的老师》一书,他们主要是把该书当作两个非凡女人之间终生关系的详细记录来拜读的。如果没有看过更多的像这样有着长时间友谊和亲密关系故事的书籍,我们将永远不会了解自己。这种友谊像一场婚姻,一段演绎着依赖与独立交互复杂的曲折过程的舞曲,它还先入为主地取代了其他的关系,如海伦父母的所有权以及安妮·沙利文个人婚姻的优先权等,最终导致了安妮·沙利文婚姻的破裂。它同样结束了可能是海伦与一个男人的惟一一次爱恋关系。在这个令人震惊的章节里,我们读到,海伦·凯勒的整个生活圈子,特别是她的母亲和她的教师阻止她——一个著名的作家,年方 36 岁——去和她所爱的、并且也爱着她的、各方面都非常合适的追求者结婚。

沙利文老师的内心充满了机智、疑虑和绝望。她嫉妒海伦,她是一个严酷的现实主义者,有时现实得失去了主题。例如,早些时候,她讲起话来从来不去抱怨海伦有障碍的感情生活。然而,在她的一生中,教师常常陷入爱尔兰式的怒气中,而只有海伦一个人才能让她解脱出来。她甚至向海伦隐瞒了她生活中的最大耻辱——在贫民院生活的经历。她在自己肩上带着一块标志着新英格兰人和富人的水晶饰物。当周围的世界围着海伦欢呼而忽视了她的存在时,她会感到非常愤怒。在某种程度上,她的嫉妒心使她不愿意看到海伦学着说话。她很残酷,偶尔也有暴力倾向,却又是一个非常专心致志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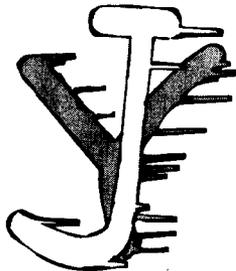
海伦在生活的活力和渴望方面超越了她的老师。她满脸兴高采烈的表情以及奇特的充满书生气讲话的样子,很像一个孩子;她读了很多的书,可是玩的时间却很少,尽管其玩耍的劲头仍然很大。海伦总是能向她的新朋友敞开心扉,对新的经历也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并且一向信任别人。一旦有机会接触更多的生活时,海伦绝不会错过,她总是尽情地感受着周围的人与物。挺立在狂风暴雨中的船甲板上才是她的性格写照。然而,多年来,海伦又是一个心怀怨恨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冷落了她的老师的人。海伦与沙利文都是浪漫主义者,但是,海伦是一个兼有浪漫主义正反两方面特性的人。好的一面是指,她有一种



永恒的好奇心和某种很深的斯维登堡神秘主义的特点；不好的一面是指，她喜欢生活在幻想之中，生活在由单词组成的世界里——毕竟，所有这些多愁善感的言辞都没有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个没有任何很深的情感生活的人。

她们两人之间的交替之舞仍然有很多神秘感。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理解别人的友谊和婚姻生活。读完这本书，我需要一次又一次地端详摄有海伦·凯勒音容笑貌的照片。如同许多人一样，我们被她深深地吸引，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勇气和魅力，更是因为她像我们一样，而又和我们不同。威廉·詹姆斯曾说过，人和人之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才是非常重要的。凝视着她，那么孤独而无助，我们开始体会到这个深奥真理的神秘之处。为了这本书以及世界上类似这样的书，我感谢约瑟夫。

148



生动的课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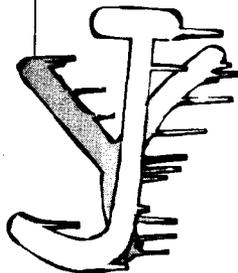
1997年4月

149

让我们从一个孩子的一幅画开始讲起。太阳带着吉祥的丝带,将巨大的糖浆一般的彩虹撒向地球上的小船、人和海洋生物。这幅画抓住了在我们这个美丽的蓝绿相间的地球上充满生机勃勃的那一刻——一次全球的聚会。真美啊!是那种有胆量把地球当成苹果一口吃掉的艺术想象力的气魄。接下来,让我们读一读由年幼的比利写的一本书中的一句话:“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认为,很多人都有很多痛苦——而这是真的。”比利的父亲刚刚死于癌症。

你有孩子吗?你希望别人的孩子都过得好吗?如果是这样,我认为你肯定愿意他们成为珍妮特·阿米登在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创办的一年级课堂中的一员。第101号教室是一个鼓励一年级的学生全力去说、去画和去写的地方,而且,是为了某些真正的目的去掌握和创造真实作品与技能的场所——这幅彩虹图以及比利写的恰如其分的小说《痛苦的故事》都是最好的例证。这些活动需要涉及很高的技巧,这些孩子们正在掌握其成长所需的进一步的条件。掌握这些条件有助于帮助创造一种复杂的课程,一种能够对他们亲自动手创造的世界进行深刻思考的课程。幸运的是,掌握这些条件——掌握这些思考的习惯——孩子们将终生受益。

《生动的课堂》一书讲述的是一名教师如何实现——突出——某种价值的。这种价值可以称之为爱或尊重。我惟一担心的是,这样的定义会把读者带入一种反理智的多愁善感的疑虑之中。这种反理智的疑虑是重新反思教育的障碍。让我们做得准确和明智一点吧。这本书记



录了启发孩子思考的方法,第101号教室的基本价值,事实上就是对学生思想的尊重。孩子们的作品是教师尊重他们思维的外在和看得见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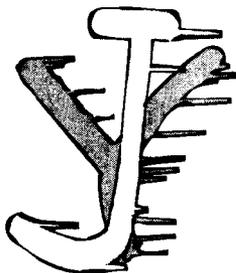
按照某个观察者的话来说,阿米登小姐关注孩子们所关注的事物。她完全彻底地、坚持不懈地关注着孩子们所关注的一切,并且,在这样一个组织有序的教室里——即在一天中度过最好时光的场所里——普通的一年级的学生会发现,他们的智力在许许多多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包括那些大多数学校和家长给予很高评价的方方面面,例如,对书面表达能力的掌握。

阿米登小姐通过给予热情的关注——通过寻找既可看到又能够提供帮助的方式——将人文讲求理智的价值作为教学的中心加以实现。她的生动范例通过具体案例显示出了可以称之为广泛文化的教学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教育儿童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传授具体技能的挑战,更是某种作为小的临时性班组致力于思想发展而结合在一起的全部过程。珍妮特·阿米登对教学的看法涉及师生共同致力于“思想活动以及对美和人类感情的接受程度”,而几年前,艾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将其包装成通往“文化”一词的惟一途径。

这是一个一年级的课堂,孩子们在里面学习手工制作、作业评改,还可以参与恢复人类智力文化的种种活动。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写成一篇文章,让这个陷入不稳定的、混乱的、且常常是琐碎的学校教育改革怪圈中的国家受益匪浅。《生动的课堂》一书的确能回答有关学校教育改革中最重要,通常也是没有回答的问题,即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该书通过演示而不仅仅是讲述回答了这个问题。能听到这样一位天才的实践者以及像戴维和罗斯玛丽·阿明顿^①之类的名人经过深思熟虑说出的想法是很难得的。

不过,这里的重点仍是珍妮特·阿米登以及她和孩子们一道做的工作。最吸引人的是珍妮特·阿米登的表演,每过几分钟她就跳上跳

^① 戴维·阿明顿和罗斯玛丽·阿明顿是美国的教育改革家和活动家。——译者注



下,表演各种滑稽的角色,如厨子,看门人和诗人。从为班级的表演准备服装,到对人类的命运怀有受伤的感情,然后再回到桌前拿起毡头笔去左右宇宙的平衡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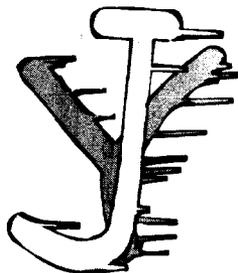
我再一次提到了笔,它们并非无足轻重。阿米登小姐在其演示中指出,毡头笔对一年级的学生而言,可以使写作和绘画变得更加容易一些。它使作品思路从指尖和手中慢慢地流出(一个关键词)。可以说,它是整个过程的良好标志。孩子们不单单是从经验中学习——这是一句老生常谈,是教育宣传的小标语。原始的经验经常除了带来混淆不清而外没有任何的教育意义。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孩子是依据对经验的反思来学习的,帮助他们进行反思应该是教学的基本任务。

达到最佳效果的方式混合着某种跷跷板式的做法,即先找机会做,接着可能是一阵摸索,再进行实验,然后进行反思。这些活动要么以谈话方式进行,要么写在纸上,要么使用其他的媒介。之后,再反过来获得更多的经验进行反思。不单是开展一种活动,要开展一种以上的活动,而且常常是将它们重新加以组合:原始的经验与反思以谈话、写作和陈述的形式相互交融撞击。重要的是要保持这种交融与循环——教师表演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并且要不间断地保持这种循环,这就是珍妮特·阿米登教学技巧的核心所在。这种循环的结果就是一种心理习惯,一种不断反思经验的自信能力。拥有这种能力要比拥有珍珠和红宝石有价值得多。对于一年级的学生和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而言,关键的循环——那种超越所有其他流动事物的循环——就是思想的流动。

151

笔只是一种手段,是对使第101号教室成为有益于学生心理的源源不断的反思的场地的比喻。这样的笔小孩子都可以得到,就像语音拼写本身一样,也可以使他们现有的能力超越语言持续输出各种思想和反思,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技能:写作。在这种情况下,艰辛脑力劳动就会容易一些。你甚至可以说思想在自然地涌出。这本图文并茂的书肯定是献给整个英语语言领域里毡头笔行业的最好礼物。

《生动的课堂》一书以如此美妙的形式所展示的孩子们的作品只是巨大冰山的一角。而你无法看到的那部分则是有关孩子的发展哲学及



其成长环境。在这个教室里,真正的英雄不是《痛苦的故事》,不是比利以及西莱斯特,而是成长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深思熟虑的引导下,带领着孩子走过刚刚受到的强烈的情感震撼(甚至像一个父亲的去世这样的事件)而进入到一个鉴赏阶段的生活。全书集中探讨了引导孩子 在现有的能力和新的学习之间不断建起一座桥梁的途径。阿米登小姐相信,孩子具有提出有趣思想和产生有价值艺术的能力。她向孩子 们传达的信息是,在她的帮助下,他们会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

孩子们的确做到了,甚至在思路很窄、故事情节令人困惑的时候也是如此。孩子们的作文和艺术作品揭示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偶然发现的深刻道理,正是这道理使他得出了更具争议性的结论:我们每个人都 是自己故事的诗人和艺术家。没有依据这样一个基本的人类事实的教学比起能够挖掘人们故事(无论是一年级的学生,还是研究生)的教学要逊色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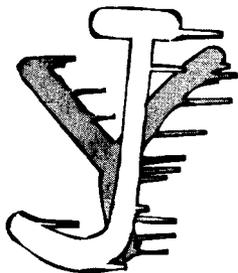
“教孩子去思考”如同“教是为了理解”一样,是今天最认真的学校改革者,特别是那些大学里的改革者制定的最认真的目标之一。珍妮特·阿米登在这里提醒他们的是,孩子们已经在思考了,非常感谢他们的努力。教师的工作正是挖掘这种巨大的可再生——具有无限潜力——的资源。

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还是个问题,而且,不可能有惟一的答案。这个问题的要点在于还没有一个最好的体制,而追求这种最好的体制是美国学校传统不健康心态的一部分。关键不是一项活动或事物,而是一种发展哲学,一种与孩子共同学习的途径,是那种通过实施弗朗西斯·霍金斯称之为的行动逻辑来尊重思想和感情的日常活动安排。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谈到诗歌时曾说过,诗歌基于的不是思想而是事物内在的东西——意思是指具体的事物使诗歌充满活力,而抽象的概念则削弱了诗歌的魅力,这一点对课堂教学来讲也一样。以对创造良好社区至关重要的抽象概念“尊重”为例,许多成年人对孩子是尊重的,但是,他们对如何使尊重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感到困惑,甚至对如何尊重孩子们的思想,并把它看作平常的事情更感困惑。

无形的尊重在课堂的上空徘徊,就如同未完成的浪漫或未寄出的

152



信函。与此同时,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有太多的学校——成年人以及儿童——一直是一个名声较差的地方。从阿米登小姐那儿我们可以吸取很多经验教训。当虹鳟死掉了,孩子们的反应是很快的,“我们需要开个会”。大家先是讨论,接着反思,后来就是行动。语言有直接的目的和具体的作用。威廉斯博士可能说,没有什么尊重可言,但是却有可以看得到的尊重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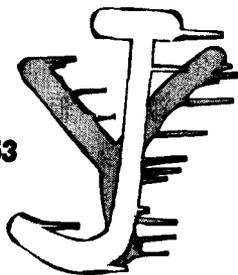
从教育学的角度看,阿米登小姐的工作代表着对有时被称为进步教育的古典传统的改良。我自己仍然在寻找着正确的标签。进步教育听起来过时了,但是,进步教育却一直像一出无目的的喜剧,被著名的《纽约人》杂志上的卡通描述为:“老师,我们今天还得再做一遍我们要做的事吗?”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开放教育成为重要教育思潮的时候——产生了大量非凡的创造性成果,迄今仍然是许多学校现行教育资本的组成部分——我试图让人们集合在我所称之为“体面学校”的大旗下。可我根本没那么幸运。

或许,事实是,如果你过于在乎叫什么,最终你会陷入到混乱不清的地步。无论贴什么样的标签,某些古典的思想是不变的,而且会重新焕发活力,就好像被重新开始一样,而这正是孩子们送给陈腐世界的源源不断的礼物。

一种观点是,孩子们是从经验中学习的,在这些经验中,教师可以有重要的参与和一些真正的利益。另一种观点是,许多高质量的学习——一种你可以以此为基础并深入到你骨髓里的学习——涉及真实的活动,即做一些真实的事情。例如,写作应该是说你想说的或需要说给某些听众听的一种手段。而当它作为学校的一种练习,其效果就不会很好,因为,颁发学习文凭的人要求你这样做。第三种观点是某些课程的内容——大量属于珍妮特·阿米登情况的课程内容——可能源于对孩子们持续不断的活动带来的经验所进行的连续整合。

还有一种观点是应用个人差异的重要性——不是仅仅接受比利难以管教的个性,而是利用这种个性,通过激发他的兴趣以及挖掘他的重要故事,促进他的智力和能力的发展——帮助比利得到这样的教育,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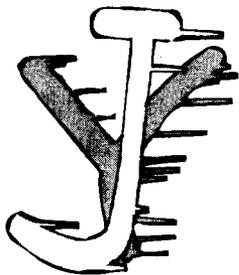


他自己的故事是以讲述有关这个世界的更广泛的故事为基础的。最后一种观点是共同学习的能力,是指儿童的能力在教师的指导下将他们共同的对话、领悟和活动转变为学习的社会媒介,这样课堂就不仅仅是个体的总和,孩子们是在持续不断的对话中相互学习,从而创造孕育思想的共同课堂文化的。

这些雄心勃勃的观点,实际上每一个都是对传统教育的猛烈批判。每一种观点都在某个时候和某个地点被普通教师——在正确的支持下——与所有孩子在课堂中实践着。像我、珍妮特·阿米登和本书作者都在推动着这些观点的实施,我们相对还是新手。按照这样的方法教书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实际上它是一种传统教育的翻版——至少可以追溯到公立教育的成立。教育的争论通常是每一轮的新教育——这一代的进步教育实践的翻版——与所谓的传统教育的较量。更为准确地说,从19世纪20年代起开展的各种进步教育实践活动是一种渐变的反传统的活动,是与在公立教育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因循守旧的作坊式方式相对立的。

这也是一种传统教育。大约从19世纪20年代起,在每一代人中,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善于思考的教师们都发现,与儿童一起活动比课堂上那种成批地处理和单调地组织更好。实际情况常常是,教师的工作是与家长对话的一部分,这些家长也已开始慢慢在儿童抚育中实施民主的做法,并且,使家庭生活更像是对话的一部分。这种对话实践和儿童主动学习的传统——我们称之为经验民主——没有失败,尽管已出版了很多关于它衰亡的报告。虽然这样做很难,并且对教师有很高的要求,但是,这种教学方式还是成功的,实际上,这种教学方式还对学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幼儿的教学。当然,它也对过去的几代人产生了影响。

迄今为止,这种尊重儿童思想的反传统观点已经积累了丰富的
发展记录,涉及几大洲各种各样的孩子。这种传统发展的趋势最适合
幼儿以及学校早期的孩子——珍妮特·阿米登的成就就是经典之作。事
实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践这种观念的最广泛的地方是在小学
(尽管历史上有一些优秀的中学和大学也做了这方面的实践,但是,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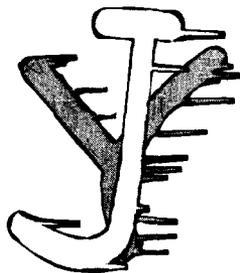


来都慢慢地被遗忘了)。从我们这些对儿童创造力感兴趣的人的观点来看,近来的改革运动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改革者已对小学产生了压力,使它们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曾经非常适合小孩子的环境现在变得同街上的中学一样死气沉沉、毫无生气。

这可能是我现在倾向于将“改革”一词注上引号的原因。如果学校的改革意味着孩子们没有更多的课间休息,那么,我就不是一个改革者。占统治地位的定量测试仍然在继续,甚至当支撑测试的科学基础在削弱的时候。有头脑的人正在探索评估的其他方法。一些“政策”组织几乎刚刚开始赶上一位叫琼斯小姐的毕生智慧,她是我几年前在英国遇到的学校校长。她曾让一个美国参观团深信,“孩子们不会因为被秤过一遍,体重就会增加”。

珍妮特·阿米登的思想,和阿明顿夫妇的思想一样,部分是开放教育和其早期英国教育的结果。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许多改革——受到教师和家长、联邦政府的继续计划(Follow Through program)和先前的幼儿早期教育计划的影响——反映了美国教育中重要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成果。他们的例子为今天真正的学校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据说阿米登小姐曾发表言论支持几代学校的元老们,而这些人一直在努力提倡将儿童想象力的观念带入我们这个儿童在国家所关注的问题中地位越来越不重要的时代。

当然,在开始推动将幼儿学习者与年纪稍大的学生课堂连接起来的过程中,总是会出现不少问题。当开放教育需要与学校的高年级课程进行必要的智力衔接时,开放教育经常会出现问题。不过,有足够的与学校高年级课程衔接成功的例子可以供我们借鉴。在一些地方,教师的成功是幸运的。真正的问题仍然是价值问题——即对儿童如何学习以达到最佳效果的基本看法的问题。戴维·阿明顿提到过在促进高年级学生主动学习方面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他指出了个很常见的观点:让小孩子通过游戏学习可能是对的,但是,认为所有的学生都需要有启发性的游戏的观点(这样的游戏是理智生活的实质)在一个反对理智的国度里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在这样的国家里,清教徒式的余孽仍然在作怪。在这种文化中对大孩子以及他们精力的担心是其最不显眼



的特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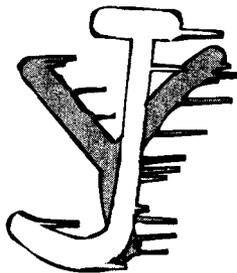
不过,我们当中许多人还是看到一些弱小的希望的前兆。近来,学校取得不少进展,人们开始对儿童思维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孩子们的写作一直在经历着某种再生的过程。珍妮特·阿米登的方法并不是和以前一样鲜见。购买相关的书就花去了不少学校本来就紧张的经费。那种认为数学应该是有关思维对话的观点受到了新的数学标准的极大激励,而这些新的数学标准本身就是对一些非常具有创造力的课堂实践的反映。今天的许多成就反映了对新一轮传统思想的反思:儿童可以构建智能的含义。

155

评价正在换上另一付面孔。有些人开始认识到,帕特·卡林尼长期争论的焦点在于“评价”的词根是“价值”。有关我们希望制定什么样的价值的问题是评价的中心问题。如果你想测试技能而非真正的阅读技能和真正的写作技能,那么,你所看重的就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而不是完整生动的整体。贫穷社区的家长和积极分子正在为此进行抗争,并且,许多人正在寻找可以替代的办法。许多中产阶级的家长构成了支持进步教育实践的潜在生力军。一些教育系统正忙着在管辖的公共框架内为学生提供可选择的余地,就像许多特权学校的做法一样。你可以听到新小提琴演奏旧曲子的声音。世界范围内长时间渴望用其他的办法替代因循守旧的教学方法的趋势,或许可以恢复美国学校裹足不前的发展状况。

我赞同戴维·阿明顿的观点,即僵硬的美国家学校教育的体系需要美国式的改革,尽管我非常担心近来呼吁的教育私有化,以及把公立学校交由自由市场来运作的做法。在自由市场中,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教育和卫生保健一样,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体制。我们是否能在一个被乔纳森·科佐称之为“野蛮的不平等”搞得四分五裂的国家里建立起这样一个体制的确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阿明顿明确地指出,在公共体制内所进行的家长选择实验是一个有希望的发展方向。

我把当今教育领域中许多令人振奋的事件与更广泛的反对葛雷硬先生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葛雷硬先生是查尔斯·狄更斯在19世纪创作的小说《艰难时代》中的人物,他把持这个国家的话筒迟迟不肯放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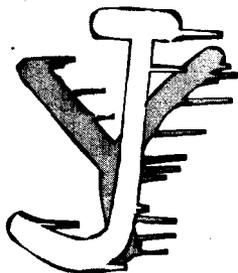
而且,他的身影现在在美国还栩栩如生,受到欢迎,他对人类的贪婪所倾注的心血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葛雷硬先生是所有政府或企业的主要统计专家。他怀疑人们对孩子想象力的兴趣;他不想让孩子们有自己的思想,不想让他们玩得开心。他会把珍妮特·阿米登的班级称之为马戏团和无政府状态。他希望消灭公共教育,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提倡私有企业和自由竞争的思想家,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他害怕强大的自由的思想。

在每一代人中,葛雷硬先生心目中最好的廉价获得的教育体制实际上都是昂贵的惨重的失败。而在珍妮特·阿米登的教学中所稳稳抓住的儿童发展中的思想——无论它们的难度有多大——都能很好地与儿童的天性保持一致。这些思想是复杂的,难以捉摸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们比葛雷硬先生那种多愁善感的管理幻想更为实用和现实。

如果在我们经常暗淡的视野中存在一线与一些有前途的教育发展相联系的希望,那就是,认为适合儿童天性的教育实际上是可行的课堂可以为——尤其是为——重要的经历提供理智反思的机会。儿童的思维——有关一切真正的智力活动的有启发性的游戏——是许多当前最好的教学活动以及学术理论所高喊的口号,尽管其效果在追赶一些实践者如珍妮特·阿米登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该是重新修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陈旧思想的时候了。

最后,在如潮水般的忧虑中我们还忘记了一点——成千上万的孩子对我们的学校已感到非常厌倦了。如果不是某种程度上的正常情况,那就很可能是一场危机。珍妮特·阿米登的孩子喜欢他们做的事情。那么,学习阅读,正如文章中有人所说,怎么会成了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事情?请把这句话贴在墙上:“兴趣似乎是事物的关键所在。”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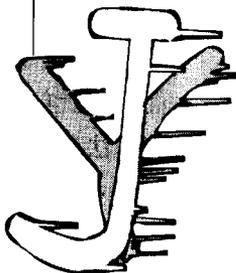
维维恩·佩利

2000年8月

维维恩·佩利在她自己的写作和教学中,用叙事体作为一种技巧记录课堂里的生活和发生的故事,并因此而出名。下面就来叙述这个故事:

157

我们的第四个孩子,米兰达,才3岁,非常善于表达。尽管我们已是很很有经验的父母——米兰达的姐姐一个11岁,另一个17岁——但是,我们都装着好像米兰达讲的话我们都能明白,她思维的方式和我们大多数情况下的想法是一致的。如果她说黄油刀需要黄油,我们会把它理解为一种比喻或说话的方式。我们明白某个语言错误,而不是一个稍有一点知识的人看到一把刀子来到餐桌旁,然后推测这把刀需要黄油,以便在某种意义上确定其作为黄油刀的身份。我妻子海伦买了一本书,名叫《莫利3岁了》,读完后,一个3岁孩子梦幻般的、奇妙的、充满欢乐和启发的心理世界使她茅塞顿开(正如我们那些日子经常说的那样)。它向我们展示了认真听的习惯和真正好奇的魅力及回报有多么重要;它对我们这些和孩子打交道、并认为自己理解孩子们在不断学习的人来说也是一个警示。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凯特林一直对本出色的书以及作者很感兴趣,她在11岁时见到了作者。在大学时,她给作者写信,询问她是否可以在寒假期间去作者的课堂里呆两个星期。佩利答应了她的要求,而凯特林真的这么做了——对她来说,这是一次极大地影响她性格形成的经历。从班克斯特里特学校毕业后,她现在是一名在曼哈顿工作的幼儿教师。在她个人的示范课上,她向我们展示了她及4岁孩子们的讲故事和表演方面的才能以及令人惊讶的复杂



而娴熟的活动——不少这样的活动都是以佩利向低年级的孩子传授戏剧和读写能力的方法为榜样的。为了使这张家庭快照更完美,我们的好朋友阿歧·佐久间(Sakuma, A.)将《莫利3岁了》一书译成了日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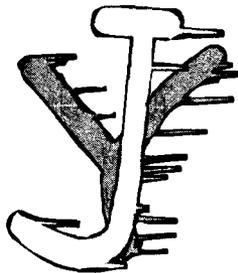
这样,我们全家福中的每个成员都被佩利的书改变了。我们学会了更认真地去听孩子们讲话,对他们思维的方式更加好奇——在教学实践中,努力去探索这种再生资源,更加认真地去看待思考,从而对孩子的智力、机智和想象力更加感兴趣。我们每个人从佩利那儿得到的启示是,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越多,发现的东西就越多,并且,看和听既是道德课程,也是智力课程。她向我们传授了一堂超越了教学和思想领域去和孩子们一道生活的实践课。她帮助我们不仅提高了教学实践的水平,而且改进了我们生活实践的能力。

158

我们只属于古老的日益壮大的佩利爱好者俱乐部的一小部分。佩利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获得麦克阿瑟助学金——即所谓的天才助学金——的教师之一。她前不久刚从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退休。佩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白人教师》一书而首次引人注目。该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它记述了儿童在一堂课上对种族关系的看法,以及白人教师在自我内心和归属的海洋里自我发现的历程。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从大学本科课程到研究生研讨会都被广泛传阅。如果我说“我们珍视什么,我们就讨论什么”这句名言时,许多人会感到这句源于《白人教师》一书中的、经过了人们极为深入和广泛讨论的话的分量。佩利的书成了人们教学和研究儿童思维的规范教材。

佩利是细心组织课堂提问的样板。她也是思考教学和课程的样板。她的文章提供了某些我所知道的、有关教学本身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提问过程以及儿童研究过程的最佳范例。佩利为恢复教师在教育争论和演讲中的发言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这种发言是极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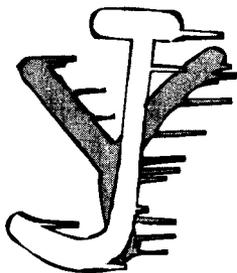
为了研究儿童和他们的思维,佩利将精心组织的课堂做成范例。而且,她也成了展示这些材料的模范。她业余时间的切中时弊的讲故事方法(她是简·奥斯丁的崇拜者,认为课堂生活是人类戏剧的中心)对学术研究几乎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而许多学术研究人员也没有



试图为她赢得广泛的听众。她和卡伦·加拉斯、迈克尔·阿姆斯特朗一道,向实践者研究发展增添了虽小但大有希望的动力。他们正朝着与课堂生活的现实和节奏密切相适应的研究方向前行,他们能够克服各种教师、家长和孩子们面临的问题,但对付不了大学课程专业的要求。尽管大学研究人员对课堂做了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在课堂内容领域,但他们的研究大多还是比较狭窄和枯燥的,缺乏对儿童思维真正的好奇心,也即缺乏生活。像埃莉诺·达克沃斯一样,佩利采用让·皮亚杰的基本技能——和孩子讲话的方法,并使之成为研究和实践的原则,她摆脱了皮亚杰的正统观念。佩利的研究使我们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和教师一起学习的方式上——这是一种心智影响心智的双向过程——而这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基本课题。在一个受到各种成功故事困扰的国家、在一个受到各种快速成果困扰的领域,佩利的研究反映了目前实践、失败、悲伤和失误以及成功相互胶着的困境。在一个日益被学术专业机构越来越狭隘的研究焦点曲解的领域里,她以自己的笔去呼唤更广泛的听众,而不仅仅是专家。

159

佩利提供了一个教师反思其教学和课程的例子。《白人教师》、《克瓦扎和我》以及《你不能说你不会玩》三本书都成了开设社会科课程的教材。她的论著探讨了连环画中的超级英雄、高年级男孩和女孩的游戏以及特定低年龄段孩子们的游戏,所有这些都为人们深入洞察儿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所做的努力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拿着棕色蜡笔的女孩》一书可以作为雄心勃勃进行早期文学创作的指导手册来读。这些书展示出一个教师通过微不足道的技巧来挽救孩子们的读写能力以及戏剧表演能力的过程——尽管论述好的技巧的文章很多——从而再现故事和书的意义——对生活的想象力和诠释。佩利以实用的方式表明教师该如何使文学与课文、激情和思想——与生活本身——进行人性化的接触。她的论述应该让中学和大学的教师看一看,尽管只有很少的人能找到相关的内容。她的实践揭示了德博拉·迈耶的著名格言的真谛:从一年级到大学的理想教育应该是将优秀的学前教育方法与我们最佳的研究生研讨会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这些是鼓励学生畅谈思想,追求个人爱好和兴趣的地方——这是任何优秀教育的两个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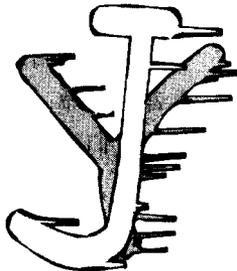


方面。各个层次的教师都有许多须向佩利学习的地方,只要他们愿意洗耳恭听。

对于师范教育课程,譬如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师范教育课程,佩利阐明了教学本身如何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提问过程——即当你在给学生传授知识时,你该如何研究他们。她指出,过去那种认为我们必须在传授知识和教育孩子之间进行选择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给进入大三的学生开设了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师范教育课程,该课程的内容之一是用一个学期的时间研究一个孩子。除了阅读儿童文学以及其他作品外,我们还阅读了《白人教师》和《拿着棕色蜡笔的女孩》这两本书作为提问教学的范例。在所有研究提问教学的教师中,佩利是大家最喜欢的一位,她是我的学生真正想成为的那种教师。当我的学生成为实习教师时——几乎在一年里全职跟着一位有经验的教师在课堂里实习——他们的提问课题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在许多情况下,儿童学习习惯的养成构成了学生心目中教学活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的学生领会了这个深奥的道理,即好奇心和认真去听是再生资源,受到关注的大多数孩子的反应是进步很快且很用功——即懂得了学习。

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即有太多的改革者试图通过撇开教师的改革来改变学校,太多的政治家和其他人士试图从学校以外来改变学校,试图(徒劳地)改变教师并限制他们对儿童的关注。在所有这些人中,佩利犹如一座理智的灯塔矗立在这些鼎沸的喧闹之中,她指出,学校如果没有教师的积极支持以及对教师更多的经费和时间的支持就不会有真正的变革。佩利提醒那些目前专注于通过高风险考试来管理课堂的改革者们进行不可预知的人性化接触。她指出,自由的对话是所有优秀教学的核心,而教学是一种不确定的艺术,并且永远会如此——同时,她也指出了教师怎样才能以自己的智慧、真正的权威以及远大的抱负来为她教的学生实施教育。佩利将教师引导学生的责任戏剧化并加以示范,为此,她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合法的成年人的权威。对于一个对课堂里和其他环境下合法的成人权威某种程度上还不是很清楚的文化来讲,这是一个真正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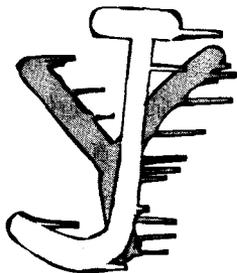
佩利对自己权威的描述包括如何解决那个时代的一些核心问题。



借用她最喜欢的比喻,课堂是上演小话剧的舞台,演绎了人类在某个特定时空的状态。《白人教师》一书是孩子们在后人权时代探索种族问题的窗口。《克瓦扎和我》和《拿着棕色蜡笔的女孩》两本书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希望,同时也阐述了教和学的问题。《男孩和女孩:玩偶一角中的超级英雄》一书表明了孩子们是怎样反映和理解男女之间变化着的关系的。佩利总是站在戏剧的角度倾听着——正如她所说,这样的地方正是孩子们进行最为复杂的思维的地方——并且告诉我们,孩子们总是在探索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而且成长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涉及政治。佩利明白,教育总是比课堂和学校教育的概念大。在写有关她的课堂的时候,佩利给我们谈了美国以及生活本身——她的课堂是我们这个时代各种戏剧的舞台,也是儿童时代的舞台。

佩利的论著将一位妇女教书的生涯戏剧化了——这些栩栩如生的故事将教师的声音恢复到教育辩论和交谈。她自己对作为犹太人成长的感受成了有关为什么一个教师关注《白人教师》一书里的非美国裔移民故事的一部分。佩利属于相对新传统思潮的一部分——一种文学运动——包括诸如埃尔温·S·理查森的《在早期的世界里》和赫伯特·科尔的《36个孩子》等经典之作。这一运动把活泼的孩子和充满活力的教师的戏剧和激情,以及教学实践活动带入了文学。莫利的机智和光芒四射的智慧使其成为过去30年伟大的文学人物之一。而拿着棕色蜡笔的女孩里妮也是如此。佩利也是如此,因为,佩利最好的创造之一就是她自己。这是她给我们的最大的帮助,引导新的一代人进入教学领域。对于学生来讲,在课程中,佩利是学生真正的英雄:她的书使教学人性和戏剧化,并且,她的书还告诫我们,教学是一项激情、眼泪和欢笑交织的事业。毫无生气地谈师范理论以及空洞的有关教育学的大学讲座,迫切需要佩利这种更为人性化的和一贯的声音,为公正对待教学的真实和戏剧化声援。例如,在《拿着棕色蜡笔的女孩》一书里,令人感动的是,佩利虽然马上就要退休了——但她还在思考着接下来的事。佩利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易犯错误的英雄。她也怀疑、反思以及担心下面该做什么——不像好莱坞电影里约翰·韦恩们扮演的教师,总是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她是一个直率的人,在喜剧般的日常安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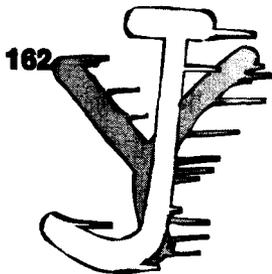
161



孩子们和生活经常剥夺了她管理和预测下一轮事件的能力。根据佩利自己的叙述,她对孩子们的个性及智慧感到吃惊。他们的创造力和经历使她发生了很大改变。在这场严肃的全国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看到佩利踩在自己剥的香蕉皮上滑倒摔跤该是多么振奋的事。当然,一切没有什么好笑的。认真的孩子们的真正痛苦和绝望(克拉拉和安杰洛的宿命论,他们知道他们总是要被拒绝的)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佩利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去帮助孩子和她自己鼓起勇气一道做事。最终,她的所有工作都是对在有头脑的教师领导下互助互教的孩子们非凡能力的庆贺。每个教室里沉睡的巨人就是这些孩子相互教育以及作为社区相互帮助成长的潜力。但是,如果没有教师的对话和好奇心,这个群体本身就不会成为真正的学习者。

我想称赞的最后一个特点不是很明显,因为佩利写得就很谦虚,并且,她看上去就像某个人最喜欢的祖母。这是她的极端主义,即既是一种智力上的特征,又是一种政治上的特征。佩利长久以来一直是教育领域里苏格拉底的笃信者,她坚持认为,别人尚不知道的东西你是不可能真正教会他的。这是苏格拉底怀疑主义自由精神的体现,而这在美国功利主义和对艺术不感兴趣的校园里越来越少见。因此,她的很多书,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是极端的——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教师如何能够为一个不同于我们现有的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的社会尽心工作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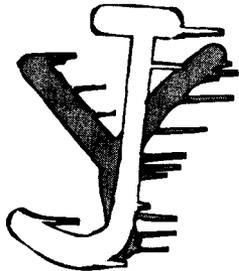
她以平静的和有创见的方式成为一位对学校在有关公平和公正方面表现出的傲慢最为强烈和最为有力的批判者之一。《你不能说你不会玩》一书是有关克拉拉和安杰洛往常在我们学校学习成本的预言。在听了科伦芭茵和许多其他人的告诫后,该是倾听佩利的忠告的时候了。她认为,我们的学校应该起来反抗由老板和不胜任工作的人在这个领域的统治。在这些重要的章节里,她最终决定要实施“你不能说你不会玩”的规则,以此佩利向我们表明,在学校和课堂这样的范围里,教师应该如何尽其所能地投身到反对侵蚀美国式生活,以及威胁到我们渴望真正民主的社会严重不公平的运动中去。“所谓幼儿园,”她写道,“是指一个组织开始出现,并且,不久将被镌刻在石头上。某些孩子将



有权力不容忍同班同学的社会经历。从此,统治阶级将会告知别人他们的忍受程度,并且,外来者将学会预防被拒绝的痛苦。在打人和骂人被判为不合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更严重的伤害现象得以生根蔓延”。她指出,也可能有另一种方式,它的精髓可能源于《圣经》中的《利未记》: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维维恩·佩利已给我的学生传授了教学的浪漫的真谛。在某个官僚机构庞大的大学所开设的师范教育课程上,她以人性化的语言倾诉了与儿童终生相处的亲密关系。当一个时代的教师和孩子们接受着照本宣科的课程和高风险的测试,以及学校狭隘的敌视艺术和功利主义观念的时候,是她证明了教师具有帮助开发儿童大脑和激活其想象力的能力。除了所有新生代的教师代表外,佩利还向我们所有的人表明,有关儿童智力和想象力开发的议程和为儿童争取社会公正的议程是紧密相连的——并且,一切源于尊重和好奇心。即使是布什政府劫持了这句名言,但“不让一个孩子落后”仍是非常有意义的。佩利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可以使这句名言成为可能的教学。这也是我们从另一位祖母般的教师德博拉·迈耶那里传来的信息。站在那种忽视教师和儿童天性,且毫无成效的学校教育改革理念的对立面,这两位女士(意义在于她们是妇女)是更加平等和民主的美国教育的预言家。她们告诉我们,当我们学会对莫利表现出更强烈的好奇心的时候,教学才会成功;对儿童心智的强烈好奇心是表现真正尊重的最丰富和最实际的方法。她们说,没有什么能比对教师和儿童给予尊重更重要的问题了。



致青年教师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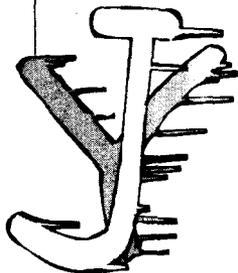
1995年1月

亲爱的乔西：

163

你让我提一些有关初任教师的建议，而我脑子里首先闪现的是我祖母的形象。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是，她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她做过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煤矿学校的初级小学校长。这所学校规模不大，在校学生大多数是移民子弟。她的教书经历已随她而去，就如其他许多教师的教书经历一样。她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曾参加过她那个时代的进步教育运动和政治运动。据我所知，她对儿童的学习抱有很高的要求。这些移民矿工的孩子，其家庭经常处于失业状态，却要读水平很高的文学和诗歌——当时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的作品是我祖母的弱项。她每天都要检查，以确信每个孩子天天都刷牙。她是当地政府和州政府中有影响的人物，她为劳工的权利而抗争，倡导妇女的权利并领导禁用童工的运动。她是第一位被选为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委员会成员的妇女。我认为，她看到了政治和她的教育活动之间的直接联系。两者都把普通老百姓的总体发展作为目标。她站在百姓的一边，努力创造一种广泛的民主教育概念，而这种教育所基于的国家理念则是为每个人服务，而不仅仅是为富人服务。

对我而言，这似乎是我们大家在这混乱不清的政治年代真正值得牢记的一种观点——一种传统的观念。现在把事情放在政治的框架内加以考虑的教师越来越少，尽管在我看来，今天，在美国教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会与政治承诺牵扯在一起。像我祖母那样，我会认为，人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站在百姓一边的一员，努力去建设尚不存在的、但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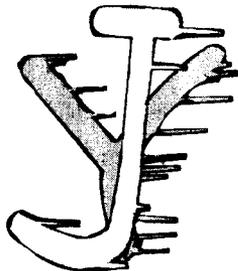
于美国梦想的一部分的民主。我的祖母肯定会指出,课堂内外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并且,学校的事务有时囿于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之中。我可以肯定,我的祖母会说,今天的每个教师都在国家的卫生保健体系中拥有重要作用,因为,她总是看到儿童的学习和良好的身体之间有关系。刷牙和读布朗宁的诗是不可分割的。

想到我的祖母就会提醒我,社会和学校是两个战场,不同的各方都在为不同的美国理念及其可能发生的事战斗。她会认为,教育真正的基本原理来源于我们想让孩子们在长大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她支持真正的民主国家,而不是纸上的民主国家。她认为,教师在帮助人们变得更强大方面有发挥自己作用的天地。

新教师常常无法认识到可以选择不同的立场,因而他们总是被动地去选择。旧的观点认为,教育高于政治,这只能说对了一半——这一半有助于使学校不被政治化。但是,它掩盖了我们为孩子们所做选择的基本的政治性质。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所教的孩子已经成了全球经济的廉价劳动力或失业的储备大军呢?倘若如此,我们干吗还要为他们的身心发展雄心勃勃地大干一场呢?作为一种选择,我们可以制定自己基本的目标:我们来为所有人的孩子创造一流的教育吧,这样,等孩子们长大后,由他们来创造真正的民主国家。我的祖母和她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会说,学校应该为孩子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参与民主社会和文化的知识——即所有人的孩子能够完全参加工作、参与文化并且拥有自由所应具备的复合知识和技能。

很明显,这是一个在世界历史上几乎难以达到的远大目标,更不用说美国了。单靠学校本身是永远难以完成这一目标的。而且,我们对教育目的的认识也是很重要的,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许多学校并不认同为全体人民提供教育。古希腊人说,一些人生来就是地位高的人,而另外一些人则生来就地位低下,学校的教育也是量体裁衣。奴隶或妇女是得不到自由人的教育的。在这个世界上,多少世纪以来,很多人都赞同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制定不同的教育。伐木工人和打水的人是不会在高级英语水平的班上读到简·奥斯丁的著作的。然而,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人民应该当家做主。正如古训所说,他们也是国王。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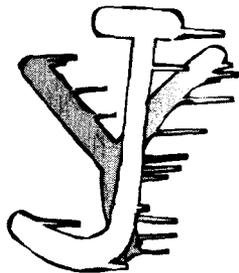
164



此,人民需要一种与他们潜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能力相匹配的教育。给普通人的孩子那种过去曾是为上层社会孩子提供的教育——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样做——是许多像贺拉斯·曼、我的祖母以及成千上万个在成功、奋斗和困惑中死亡的美国教育建设者的梦想。在这场历史斗争中,你是一个新兵。这场斗争的一些场面你只要睁大眼睛看就可以了解不少。你可能知道,美国一直是一个有缺陷的民主国家,而教育也总是反映了这种社会体制的不平等。从没有任何一个时候美国的教育是恰当地满足了所有孩子的需求的。这个社会仍然对富人和穷人的孩子有着巨大的不同的期望。这种差异似乎还在扩大,而不是缩小。我们是实行教育双轨制的国家。你可能去参观过为穷人孩子开设的学校,也可能在那儿教过书,这些学校看上去常常像是一个极度贫穷国家的学校,而不是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学校。在那里,教材很陈旧,校舍漏雨,连教学用纸都缺。有色人、妇女和移民为了能享受教育的圣餐不得不努力奋斗,但是,他们仍然还是被困在许多学校的边沿。然而,你也必须知道,在每一代人当中,像我祖母这样的坚强教师一直在与父母和社区一道,努力实现民主国家的梦想。她的目标正在默默地向你招手。

165

在认为学校有独特的责任使人民的文化得以进步方面,我的祖母并不孤单。她站在更大的、充满雄心壮志的以及具有广泛代表性——民主——的角度来看待教育目标,反对这种把孩子培养成为这个国家巨大的经济机器中一些微小齿轮的最低标准的观点。她反对人类最古老的迷信,即认为不平等是固有的。她也强烈抨击人类的第二个最古老的迷信——因为永远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分配,因此,人类必须忍受现存的不公平。我祖父母那一辈对能为每个人带来工作的政策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错误地认为生活的一切是由经济学家的公式或银行家和投资者的规则控制的。经济应该为人类生活及其需要服务,而不是相反。正如一些进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所主张的那样,除了生活没有其他真正的财富可言。谋生应该是寻求更为广泛目标的手段:创造生活。事实上,那些受教育以便适应狭隘经济领域的学生——也是管理阶层认为的那种满足成为当今劳动力大军一员的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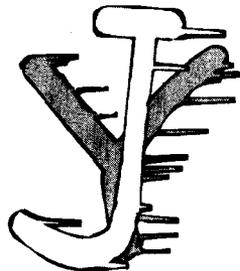


点——将永远都不具备参与改革社会以及建设民主经济体的辩论和运动。在这样的民主经济体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块天地和基本的安全感。

参与工作、政治以及时代思想潮流的能力最终是真正的文化发展问题。人们成功的关键所在将是他们个性和思想的品质——即他们文化的品质。正是这种牢牢把握住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才使得我祖母那一代进步教育思想拥护者的话今天值得一听。如果这些符号、思想和理解曾影响过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孩子们的生活,那么,它们应该成为他们这些人的财产。符号、思想、言语和文化不是工作或政治权力的替代品,但是,如果没有它们,人们就很容易迷失方向。我祖母那个时代的很多人钦佩尤金·德布斯,他曾经说过,他不会引导人们走向梦想之士,因为如果他这样做了,别的领袖们会劝说这些人离开。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需要受教育从而使自己变得强大,能够讲述自己的历史,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一起行动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利。可以说,文化概括了人们以及他们的想象力和归属感成长的所有方式——我们该如何构建这个世界,并使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感到无拘无束,然后重新将之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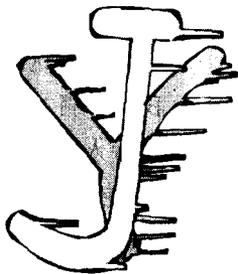
我祖母那个时代的学校教师对“成长”一词几乎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这一点你可以判断出来,尽管他们都很严厉,但是,他们骨子里都是浪漫主义者(我姨妈玛丽上四年级时是由我祖母教的,她说祖母非常严厉)。在困难的时候,教师要做各种繁重的工作,每个班级都人数众多,而且,学生来自各个民族,讲各种语言,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让民主教育思想本身如传奇一般充满活力。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不适合我们现在的怀疑情绪和现状。它具有某种奢侈的和多愁善感的味道——是一种可能性的特殊表达方式,一种民主的希望。传统的进步教育思想的拥护者相信真正的浪漫主义的思想。不管你相信与否,一些人从政治中获得这些思想,一些人从宗教中获得,还有一些人从诗歌中获得。我祖母将她的诗歌和政治融会成一种浓浓的佳酿。她最喜欢的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主张,以浪漫主义和民主的观点看待文化:现在,人类犹如这边的低矮的灌木丛,那边的参天大树;从充满想象力的经验中



去编制一个犹如蜘蛛网的“空中城堡”，“给空中戴上了一个美丽的花环”，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人；在合适的教育和文化氛围之中，每个人都可以完美地成长，人类“不是去做这边的荆棘丛林，那边的高耸的松柏或橡树，而是犹如广袤森林的民主”。

一片橡树林：这种以民主和浪漫主义的方式看待人类文化的观点——这是19世纪由诗人们，如济慈、沃尔特·惠特曼和梦想家如玛格丽特·富勒、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玛格丽特·黑利、简·亚当斯、W·E·B·杜波依斯，尤金·德布斯以及约翰·杜威所提出的观点——坚持认为，我们所奋斗的目标是一种民主文化，而在这种文化中，每个人都可以完美地成长，去接受各种思想、阅读各种论著、欣赏音乐以及参加工作和政治活动。对于像我祖母这样执着的教师，这是一种真正的浪漫主义思想——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一个孩子是靠支离破碎的知识和怀着毫无把握的期望成长的。如果你教育孩子的仅仅是最低标准的东西——例如，单纯的技能——他们就永远不会去实践并创造出真正的东西，即文化本身。他们获得的是动物的一块一块的肉体，而不是完整的活生生的动物。他们所失去的正是埃米利·迪金森称为带有翅膀的东西——希望。在今天这个被严酷的实用主义统治的艰难时代，坚持美是人类的基本需求，犹如水、食物、爱和工作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乘法口诀表必须要记住，法语动词也要记住。并不是所有的学习都是有趣的。我祖母和她的丈夫对刻苦学习的品德以及必要性知道得很清楚。但是，那种没有雅趣、诗歌和笑声的学习观点是永远不会在孩子们的心灵中扎根的。这就是作为真正浪漫主义的传统教育背后的现实主义。孩子们最终需要的不是能够买卖的东西，而是能维持一生的东西。他们要的是面包，而我们太多的学校给他们的却是石头。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我祖母那个时代的学校文化可能是太儒雅了一些——一个白人女教师的文化经常忽视或蔑视移民、妇女和有色人种的经历。这是一种单色的文化，包含了太多的儒雅的弱点。但是，今天，这种观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对民主渴望的程度，即认为每个人都会带着希望的翅膀飞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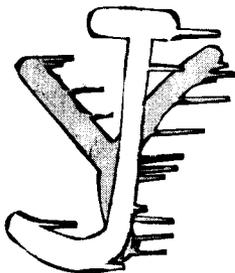
和今天一样，过去美国人争论的是应该传授哪一种文化。针对于



现今(最近的)有关文学和历史方面清规戒律的拉锯式的争论成为惠特曼所称之为的各民族的必要组成部分。我相信——尽管我的祖母可能不会赞同——这样的拉锯战是文化充满活力的标志,是惠特曼所描述的“犹如雪花一样无拘无束”的民主变革过程的一部分。有关该传授什么样的文化的争论将可能一直争论下去,直到共和制关门大吉。民主政体通过争论该给下一代传授什么而使自己得以完善。但是,当成年群体为每代人的自尊、认同、继承和包容的协调性而努力奋斗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让孩子们自己去创造并使用文化、参与文化的生动含义和标志的制定是多么重要。开发学校课程使之接触世界上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是朝着成为各民族一员迈出的必要一步,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创造一种教育,让孩子们不但成为自己国家的好公民,而且,成为世界的好公民。但是,如果用一种全新的多文化的和多种族的正统观点来代替旧的文化正统观点是得不偿失的。如果孩子们某个时候并没有开始阅读真正有意义的书,任何人的清规戒律都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孩子们有机会创造文化的含义,而不是被动地去吸收它,否则,一切都不会有生气。任何人的自己的文化都可以被间接传授和消亡。真正的挑战是帮助孩子们使当前的和现有的文化含义能够充满活力,让他们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批判者,拥有各种技能和专业知识——正如爱默生所说——将形式和权力结合在一起。而适宜于孩子的东西肯定也适宜于教师。

最终,从教师角度来说,对人类潜力的浪漫主义的和民主的看法可能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犹如镭元素那么真实,并且更为珍贵。因为,毕竟,教学更像是信教或参加政治运动——所有的过程取决于传统的神学家所称之为的希望的品质。失去它,比之枪炮和毒品,意味着要扼杀更多的孩子。教育管理者所使用的专家治国论者的晦涩语言以及当今教育学院的枯燥乏味对于这个最终需要真正浪漫主义的职业不起任何作用,而这种浪漫主义是启迪人的灵魂的法宝。如果知道教学的惟一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业能力测试,还有谁愿意在寒冷昏暗的早晨起来离家去教书呢?民主的观点是帮助人们不但要重新思考教学的目的(例如,在选择课程的时候),而且,要挨过二月份暖气片噼里啪啦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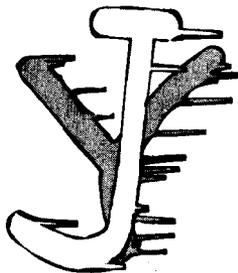
作响的日子。教书就好像是在漆黑的夜晚探索幽灵。自由钟穿越时空告诫人们,没有远见的人是注定要消亡的。这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由呆板的专家、有偏见的经济学家和惊恐的政治家主导的时代的人是一个警告。如果你只是倾听那些当今的美国远见,那你永远不能完成教师的生涯。

教师和我们需要开始重新将一种广泛的民主教育设想为真正的浪漫主义——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虚伪的和逃避生活的浪漫主义(媒体给我们已灌输了太多的谎言),而是某种认识到心脏是人类最坚实肌肉的真正的浪漫主义,一种尊重人类以及有才能的孩子们意愿的浪漫主义。

要确定这种真正的浪漫主义,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民主的古典文学和人文学科。在大学阶段,如同在中小学一样,较为传统的“人文学科”和“古典文学”以及经典的科学和数学常常是为特权阶层保留的,此外,还有一些涉及人类不平等的迷信及其实践活动。但是,人类的后代都需要获得最好的教育。为了后代,我们应该挽救上述这类学科和传统价值。文化需要民主化,而不是遗弃民主。人人都有权获得自己的遗产,有权拥有从前的有闲阶级给予特权者的东西。穷人的孩子亦应该获得富人的孩子所受到的那种教育。

因而,学校日常工作所包含的主要任务是创造一种民主文化,而这一任务可能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当然,一个民族真正的文化,当它出现时,将与在极权政权下由政治委员所炮制的经过粉饰的“人类的文化”是大相径庭的。要开展这样的工作,教师需要能够从几个方面来理解“文化”的含义,即什么是过去称之为的“高级”文化;传统学术学习的标志是什么;伟大的作品是什么;艺术和音乐的作品是什么;清规戒律对于新来者意味着什么;以及源于学生和社区生活的当地的文化含义和传统的网络是什么等等。今天,我们想探求传统的“高级”文化的含义以及这种文化接纳什么样的人 and 摒弃什么样的人。但是最终,我们还是希望孩子们走进地下宝库,增添新的宝藏。

我们不应该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单独的“高级”经验的王国,一种高档商品,而是应该向我们的孩子表明,人类的经验是一个共同的延续的过程,这一过程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从各个时代伟大的艺术作品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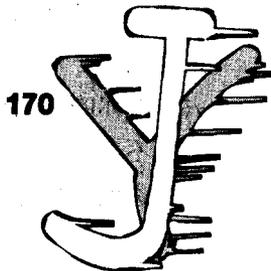
到孩子们的谈话以及现在的想象力；我们还想帮助孩子们在他们自己的体验和蕴涵在诗歌、艺术品以及教材之中的经历之间来回沟通。技巧是重要的，但是，技巧需要与一种观念结合在一起。不同于我祖母那个时代，我们需要学校提供的文化是那种彩虹般的桥梁，可以让孩子们每天在两个方向来回穿梭——一边是家庭和社区文化，一边是更广阔的文化天地。

我祖母心目中的教师是那种可以把文化带给人们的教师。我们能为当今世界所做的也许是，在真正的才能的交流中，人们及其孩子们所能给予别人的是什么样的意向。今天，我们可能更有理由发现，学校产生文化的过程必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学校所包含的文化思想也必须能够伸展出去拥抱学生及其家庭。

代表人类的教师需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充满关爱的细心学生，能够照料这个小的临时的人类社区，因为，这样的社区是人们一起学习、创造文化含义，实践并创建人类文化的地方。这就是约翰·杜威称学校为“民主的摇篮”的原因，也是一些老的改革者称学校为“小联邦”的原因。课堂集体需要几个因素：学习讲话，学习恭敬地倾听，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集体中学习创造和评判知识，学会给予与获取，寻找一个好的班集体所提供的知识和情感支持的结合点，以及当说话者、作者和艺术家从观众、听众和读者那里得到反馈时，形成评价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和技能。纪律的维持来自参与者，而这就是自由的纪律。

那么，在实践中，帮助人们在文化诸方面得以发展就意味着正在创造临时的社区形式。在好的学校里，学生们不仅要学习技能，还要学会如何使用这些技能去创造文化——那种我们可以与知识、艺术、科学和民主社区相联系的广泛而强大的以及有目的的意义——去形成他们在学校创造的文化与他们社区文化相联系的那种文化。在学校的课程中，他们学到了构成文化世界的更小世界，读写能力、数学、科学和艺术的语言以及继续创造、重新创造人生和评判各种社区所需要的行动逻辑等。

我的祖母具有工会的背景，因而她会告诉你团结一致作为教育理想的必要性。那些管理今天学校的精英们希望你各自为战，把教育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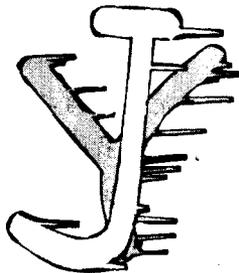


政治主要看成是个别人之间相互竞争的事情。而我的祖母则会告诉你不同的情况：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应该相互学习，我们必须在这个困惑缠身和受到威胁的地球上创造共同的命运。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孤军奋战，那么，葛雷硬之流就会盛行一时。看一看他们利用种族问题在 20 世纪分裂美国民主力量的情况就可以明白了。

尽管个别的学生可以创造文化的意义，但是，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参加文化活动本身总是意味着参与某种社区活动。即使你是一个人单独演奏吉他，你也是某个音乐社区的一部分。数学的技能和想法作为其目的参与了那些创造数学和“做”数学的人的社区。古希腊人强调数学的集体参与的一面，他们把数学称之为表演艺术——令我们今天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把数学与诸如戏剧和舞蹈等集体艺术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听到我们让孩子们单独学数学，而不是作为一个集体来共同演绎推理，他们会感到惊讶的。

在这里，我强调集体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轻视个人的力量——一切教育必须把握好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而是强调，我们非常珍视的是学生的个性，是他们通过与他人、家庭、同伴以及教师的接触学到知识的方式。但是，没有学会去倾听的学生不会有太多的机会找到他们自己的声音；而那些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谈过对他们真正重要的话题，或在他们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关头，从来没有做过某些重要选择的学生，也不会有太多的机会找到他们自己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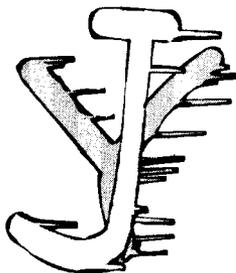
我祖母那个时代的人都钟爱成长这个观点。不难看出，成长对于学生的重要性，但是，对你又该是如何呢？当你开始教书的时候，你的知识是不够的，而且，你的文化修养也还不足以做学生的榜样。如果你出生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多少“高级”文化的家庭，这可能尤其如此。即使你有不少“文化”，这些文化是不是真正属于你呢？或者这些文化是否只是一个装着间接经历的和无法解释的观点的破麻袋呢？你怎样去帮助你的学生建起可以来回穿梭的彩虹桥呢？如果你自己书读得不多且不喜欢读书，那么，你又怎么能给学生传授读写能力呢？作为一名教师你的身份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怎么能为民主而奋斗呢？你可能喜



欢那种教师走出校门接触社会的场景,你能真正为他们提供什么呢?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然而,如果你决定成为一名教师,你肩上就要承担巨大的责任。你怎样从事一项成为一名脚踏实地的知识分子,帮助人们在文化上取得进步的终生事业呢?

你个人的文化发展问题可能最终将成为你作为教师未来发展的大问题。我想,只要稍加注意,你就可以发现,民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是一个怎样的基本问题,而教育则是如何反映一个更广泛的世界范围内为民主而斗争的问题。或许,人们很难看清民主文化的挑战;很难看清二年级时有关“青蛙和蟾蜍”的热烈讨论是朝着人类文化迈出的一步。梦想是有益的,但是,这种梦想需要在你的教学实践中天天保持活力。你怎样才能开始成为一个能够把文化传授给孩子,并接受孩子们天赋回馈的脚踏实地的知识分子呢?这一切绝不会那么容易。但是,不要绝望,你还没有走到尽头。还有很多的方法可以扩充你自己的文化占有量,从寻根到发展自己的学问,以及通过你在众多领域接触各种思想、传统和标志的机会等,都可以扩充你的文化占有量。我的祖母以她关于团结一致的思想告诫你不要单独行动,而是要和其他教师一道走进你所在的社区的人们中间。如果你自己能养成习惯去帮助创造课堂外的名副其实的學習社会,那么,以你自己的能力在课堂里培育一个学习的社会,这种状况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你希望自己的学生所获得的东西——技能、文化、兴趣、归属感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就是你作为教师所需要的一切。和孩子们共享一两个真正的兴趣才是货真价实的做法。找一两个能将你的教学与更广泛的争取民主的斗争结合起来的方法将向你展示工作的意义。请读一下赫伯特·科尔在他的文集《我们该烧死巴伯吗?》^①中的文章“过去的好时光……”你就会开始理解历史和民主传统是教学工作中可以利用的资源。了解一点你自己的历史,因为,这会给你摆正自己与文化创造之间的关系。

^① 巴伯是法国作家 De B. Runhof 笔下著名儿童系列读物中的一头大象。美国作家和教育家赫伯特·科尔写的文集就是以《我们该烧死巴伯吗?》命名的。该文集批驳了巴伯鼓吹的欧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价值观。——译者注



文化像(还有一个名字称之为)成长和发展以及教育本身。如同历史一样,文化是没有终点的。多少代富有思想的教师投入到这场长期为民主而奋斗的斗争中。幸运的是,现在,该轮到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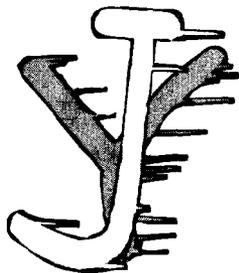
约瑟夫·费萨斯通

另外:我称你为“乔西”,是借用了杜波依斯在他的《黑人兄弟的灵魂》一书中,称呼他的一个在美国南部农村做教师的学生的名字,他在自我描述中使用了这个名字。乔西代表着人们所拥有的全部的生命和活力,以及渴望一种他从来没有得到但却过早失去的正规教育。杜波依斯正是这样一位走出去和人民见面的年轻教师,而乔西正是见到这位教师的人。他们俩有可以相互交换的东西。对杜波依斯而言,其结果蕴藏在《黑人兄弟的灵魂》^{注1}一书中复杂的教育议事日程里:学习学校学习和古典名著所代表的广义文化的方式和力量,而且,还有守护好自己的灵魂以及了解自己的根的学习。杜波依斯是人权运动的精神鼻祖——当1963年的华盛顿三月大游行发生时,他却在流亡中去世了——但是,他的民主文化的梦想等着我们加倍努力去实现。我知道,虽然年轻的乔西们可怕的过早收获过程尚未停止,然而,我愿意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进入教师行列,就像你一样。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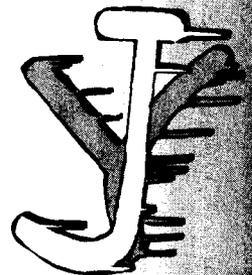
注释

注1 这一章节被具有浪漫主义思想的约翰·杜威在他的《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做了很重要的引用。在该书中,他提出了自己非常重要的观点,即获得艺术和文化的民主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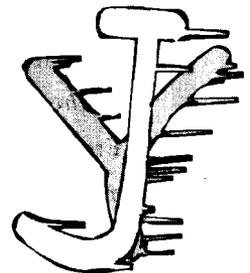


// Refer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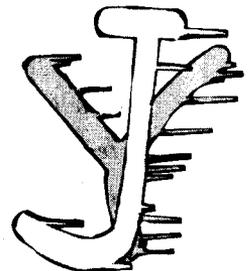
- Aries, Philippe(1962). *Centuries of childhood* , New York: Vintage.
- Blackie, John (1971). *Inside the primary school* ,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Bourne, Randolph(1916). *The Gary schools*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Bourne, Randolph(September 1917). "Conscience and intelligence in war," *The Dial*.
- Bourne, Randolph (October 1917). "Twilight of idols," *Seven Arts*.
- Boyer, Ernest, and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1983). *High school: A report on secondary education in America* , New York: Harper & Row.
- Buber, Martin(1949). *Paths in Utopia* ,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 Chase, Richard (1957). *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 , New York: Doubleday.
- Coleman, James S. (1961). *The adolescent society: The social life of the teenager and its impact on education* ,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Coleman, James S. ,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ohn W. C. Johns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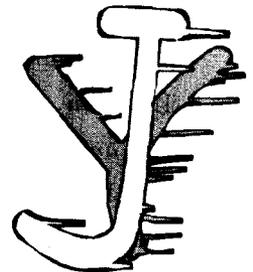
- and Kurt Jonassohn(1966).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Dennison, George(1969). *The lives of childre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Dewey, John(1902). *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 and the school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wey, John(1907). *The school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wey, John(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 Dewey, John (1925). *Experience and nature*, Chicago: Open Court Publishing.
- Dewey, John (1933). *Art as experience*, New York: Minton, Balch.
- Dickens, Charles(1854). *Hard times*, New York: T. L. McElrath.
- Du Bois, W. E. B. (190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Essays and sketches*, Chicago: A. C. McClurg.
- Featherstone, Joseph(2000). *Brace's cove*, Kalamazoo, MI: New Issues.
- Goffman, Erving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Press.
- Goodlad, John(1984). *A place called school: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 Goodman, Paul(1960). *Growing up absurd: Problems of youth in the organized syst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 Goodman, Paul and Percival(1947). *Communitas: Means of livelihood and ways of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odwin, Richard(January 4, 1969). "Sources of public unhappiness," *The New York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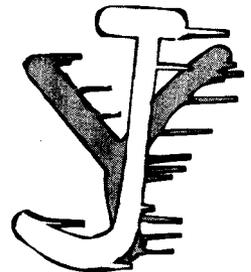
- Glazer, Nathan(July 1969). "Student politics and the university,"
The Atlantic Monthly.
- Hawkins, David(1974). *The informed vision ; Essays on learning
and human nature* , New York: Agathon Press.
- Hebrews, 13:14. New Testament.
- Hirsch, E. D. (1987). *Cultural literacy :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Hofstadter, Richard (1963).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 New York: Knopf.
- James, Henry(1886). *The Bostonians* , New York: Macmillan.
- James, William(1977). *A pluralistic universe*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9)
- Jencks, Christopher (1972). *Inequality: A re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of family and schooling in America* , New York: Basic
Books.
- Keniston, Kenneth, and Carnegie Council on Children(1978). *All
our children : The American family under pressure*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Kessen, William(1965). *The child* , New York: Wiley.
- Keynes, John Maynard(1924). *Monetary reform*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Kundera, Milan(1980). *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
New York: A. A. Knopf.
- Lasch, Christopher(1977).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 The fam-
ily besieged* ,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wrence-Lightfoot, Sara(1983). *The good high school : Portraits
of character and culture* ,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zerson, Marvin(1985). *An education of value : The purposes
and practices of school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ynd, Robert S. , and Lynd, Helen Merrell(1929). *Middletown: A study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Meier, Deborah(1995). *The power of their ideas: Lessons for America from a small school in Harlem*, Boston: Beacon Press.
- Moynihán, Daniel Patrick(1965).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 and Research.
- Moynihán, Daniel Patrick(1969). *Maximum feasible misunderstanding: Community action in the war on poverty*, New York: Macmillan.
- Mumford, Lewis(1926). *The golden day: A study in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culture*,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 O'Neill, Eugene(1956).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Orwell, George(1940). "Inside the whale," from *Inside the whale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 Perrone, Vito(1998). *Teacher with a heart: Reflections on Leonard Covello and community*,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Péguy, Charles(1958). Alexander Dru, trans. , Pierre Manent, foreword, *Temporal and eternal*, Liberty Fund. (The "mysticism" quote is from the 1910 essay *Notre jeunesse*, which appears in this volume in an edited and abbreviated form.)
- Ravitch, Diane(2000). *Left back: A century of failed school reform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iesman, David, with Reuel Denney and Nathan Glazer(1950).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usseau, Jean-Jacques(1933). *Emile*. New York: E. P. Dutton.



-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762)
- Sen, Amartya(2001).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lberman, Charles E. (1970). *Crisis in the classroom : The remaking of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 Sizer, Theodore(1984). *Horace's compromise : The dilemma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Thernstrom, Stephan(1964). *Poverty & progress : Social mobility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wain, Mark(1883).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Boston: J. R. Osgood.
- Twain, Mark (1889). *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New York: Charles L. Webster.
- Tyack, David(1974). *The one best system : A history of American urban edu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 and Research (1981).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Veblen, Thorstein(1914).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 New York: Macmillan.
- White, Morton (1947). *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 : The revolt against formalism*, Boston: Beacon.
- White, Morton (1972). *Science and senti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man, Walt(1881). "Calamus," from *Leaves of Grass*, Boston: J. R. Osgoo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860)
- Wordsworth, William(1888). "My Heart Leaps Up," from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London: Macmill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8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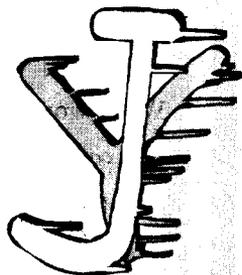


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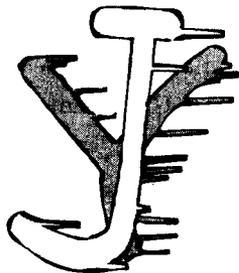
索

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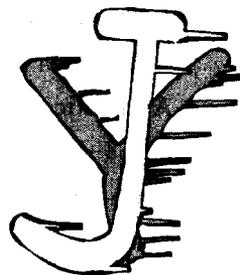
- Achievement test, 110, 111 成就测验, 成绩测验
- Adams, Henry, 73 亨利, 亚当斯
- Addams, Jane, 82—83, 144, 166 简, 亚当斯
- African Americans 非洲裔美国人
- black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51 黑人社会意识
- busing and, 56, 61—67 用公共汽车接送(尤指美国学校为平衡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比例用车接送外区儿童上学)
-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21, 26, 59, 60, 86 人权运动以及
- compensatory education and, 54, 64 (在美国对贫苦儿童等进行的)补偿教育以及
- desegregation of schools and, 54, 56—57 废除学校种族隔离以及
- ghetto schools and, 119, 126—133 犹太人(黑人)居住区学校以及
- Moynihan Report and, 23, 27 莫伊尼汉报告以及
- Ocean Hill-Brownsville protests (New York City), 43, 45—47 奥圣山-布朗斯维尔区的抗议活动(纽约市)
- As Political leaders, 56, 60, 61 作为政治领袖
- Power and, 53 权力以及
- Slavery and, 56 奴隶制以及
- Age of Reason, 15 理性时代
- Alternative schools, 91, 139—142 非传统学校
- Americanization, 107 美国化
- Amidon, Jeannette, 93,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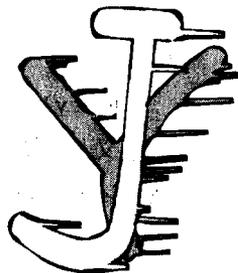
- 156 珍妮特·阿米登
- Anti-intellectualism, 79, 91,
149 反理智主义
- Antiwar movement, 21 反战运
动
- Aries, Philippe, 9, 11 菲利
彼·埃里斯
- Aristotle, xviii 亚里士多德
- Armington, David, 150, 154,
155 戴维·阿明顿
- Armington, Rosemary, 150,
154 罗斯玛丽·阿明顿
- Armstrong, Michael, 158 迈
克尔·阿姆斯特朗
- Arnold, Matthew, 73 马修·
阿诺德
- Art as Experience* (Dewey),
72—77, 172 n. 1 艺术即经
验
- Artwork, 134—138, 149, 169
艺术品
- Askew, Reubin, 62 鲁宾·艾
斯丘
- Augustine, St., 11, 14 圣·
奥古斯丁
- Austen, Jane, xviii, 158, 164
简·奥斯丁
- Authentic performance, 152,
154—155 真实的活动
- Authority, in education, 38,
53, 122—123, 160. See also
Discipline 教育主管部门;亦
见课程
- Barbarian Becomes a Greek
Warrior*, A (Jackson), 129—
130 《野蛮人成了希腊武士》
- Barrie, J. M., 17 J·M·巴里
- Bentham, Jeremy, 16, 83 n 15
杰里米·本瑟姆
- Big Science, 77—78 大科学
- Blackie, John, 114, 117 约
翰·布莱基
- Blind students, Helen Keller
education, 143—148 盲人学
生/失去视力的学生, 海伦·凯
勒教育
- Bloom, Harold, 16 哈罗德·
布卢姆
-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
ting, The* (Kundera), 31
《笑忘录》(米兰·昆德拉)
- Boston, busing in, 56, 61—67
波士顿, 市区用校车接送学生,
学童接送
- Bourne, Randolph, 71—72, 144
伦道夫·伯恩
- Boys and Girls* (Paley), 160
《男孩和女孩: 玩偶一角中的超
级英雄》(佩利)
- Braddy, Nella, 143 内拉·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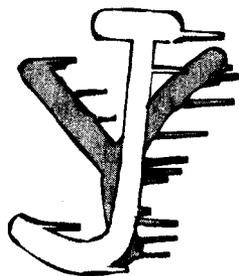
- 拉迪
- Bridgman, Laura, 145 劳拉·布里奇曼
- Brown, Linda, 57 琳达·布朗
- Browning, Robert, 163 罗伯特·布朗宁
- Buber, Martin, 18 马丁·布贝尔
- Bureaucracy, 50, 80—81 官僚机构
- Busing, 56, 61—67 用校车接送学生, 学童接送
- Capitalism, 69 资本主义
- Carini, Pat, 155 帕特·卡林尼
- Casten, Geoffrey, 110 杰弗里·卡斯腾
- Central Park East Schools (New York City), 44, 84—88 东中央公园中学
-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ries), 9(1962) 《童年世纪》(菲利普·埃里斯)
- Charter schools, 91 特许学校
- Chase, Richard, 17 理查德·蔡斯
- Child care, 39 儿童关爱
- Child-centered approach, 79, 90, 106, 123, *See also* Progressive education 儿童中心的教学方法; 亦见进步教育
- Childhood 童年
- Aries on, 9, 11 埃里斯论童年
- Familism and, 19—30 家庭主义
- Locke on, 10—13 洛克论童年
- As at risk, 39 处于岌岌可危的童年
- Rousseau on, 9—18 卢梭论童年
- Child-rearing, 19—30 儿童抚育
- Children and Their Primary Schools* (Plowden Report), 101—102, 103, 105, 108, 109—110, 115 《儿童和他们的学校》(普洛登报告)
- Civil liberties, 72 民众自由
- Civil rights movement, 21, 26, 59, 60, 86 民权运动
- Civil War, 90 南北战争
- Clark, Kenneth, 64 肯尼斯·克拉克
- Classroom communities, 169—170 教室社区
- Classroom inquiry, 157—162 课堂提问
- Clegg, A. B., 115—118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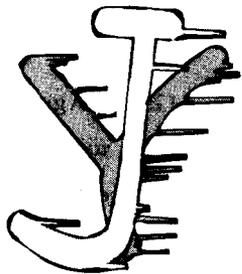
- B·克莱格
Coalition-building, 26, 28 协会建立
- Coalition of Essential Schools, 87—88 重点学校协会
- Cohen, David K., 55, 55 n (注释2)戴维·科恩
- Coleman, James S., 22 詹克斯·科尔曼
- Coleridge, Samuel, 73 塞缪尔·科尔里奇
- Collectivism, 70 集体主义
- Commonwealth School, 1—2, 36 康芒韦尔思学校
- Communitas*(Goodman & Goodman), 50 共同相处的社会(保罗和珀西瓦尔·古德曼)
- Community control of schooling, in New York City, 48—55, 59—60, 119 教学社区管理/控制
- Compensatory education, 54, 64 补偿教育
-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 A (Twain), 35 《亚瑟王宫里的美国人》(吐温)
- Counter-modernism, 24 反现代主义
- Covello, Leonard, 39 伦纳德·科维洛
- Coveney, Peter, 16 彼得·科维尼
- Creativity, 34—35, 41, 116, 146—147 创造力
- Crisis in the Classroom* (Silberman), 119 《课堂里的危机》(查尔斯·西尔伯曼)
-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5 真正女人的崇拜偶像
- Culture, 166—171 文化
“high”, 168—169 “高级”文化
nature of, 166 文化的本质
people's cultures, 168—169 民众文化
cummings, e. e., 121 E·卡明斯的“一顿早餐”
- Curriculum material, 110—111, 120, 152, 167 课程教材
- Curry, Alvin, Jr., 130, 132—133 小阿尔文·柯里
- Daedalus, 81 代达罗斯
- Darwin, Charles, 68 查尔斯·达尔文
- Deaf students 聋哑学生
Alternatives to formal schooling for, 139—142 为聋哑学生选择代替正规教育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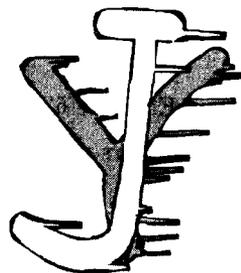
- Helen Keller education, 143—148 海伦·凯勒
- Debs, Eugene, 165, 166 尤金·德布斯
- Decentralization, in New York City, 48—55, 59—60, 119 纽约市的权利下放
- De facto* segregation, 57 事实上的种族隔离
- De jure* segregation, 57 合法的种族隔离
-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37, 43, 165—171 民主与教育
- Central Park East schools, 44, 84—88 东中央公园中学
- Classroom communities and, 169—170 课堂社区
- Democratizing child-rearing, 153 在儿童抚育中实施民主
- Dewey and, 70—71, 75 杜威以及
- Utilitarian versions of education and, 89—92 极权式的教育
-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Dewey), 70—71, 75 《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
- Dennison, George, 122 乔治·丹尼森
- Descartes, Rene, 8, 10, 13 勒内·笛卡儿
- Desegregation of schools, 54, 56—67 学校废除种族隔离
- Busing and, 56, 61—67 废除种族隔离
- Discriminatory placement and, 58—59, 65 歧视性的分班以及
- Failure of, 59 废除种族隔离的失败
- Impact of, 63—64 废除种族隔离的影响
- Northern-style segregation and, 57—58, 60—63 北方式的种族隔离
- Racial balance and, 59 种族平衡
- Resegregation and, 65—66 重新种族隔离
- Tracking and, 109 按成绩分班等
- Dewey, John, x, xi, 1, 13, 18, 38, 43, 68—83, 88, 89, 90, 92, 106, 107, 122, 166, 169, 172 n. (注释1)约翰·杜威
- Dickens, Charles, 16, 17, 24—27, 93—94, 155 查尔斯·狄更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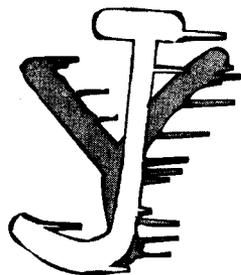
- Dickinson, Emily, 166 埃米利·迪金森
- Discipline, 101, 104, 122, 126—127 课程
- Divorce rate, 20 离婚率
- Drawing, 149 绘画
- Dreiser, Theodore, 83 n. (注释 13)西奥多·德莱塞
- Du Bois, W. E. B., xviii-xix, 88, 166, 171—172 杜波依斯
- Duckworth, Eleanor, 85, 158 埃莉诺·达克沃斯
- East Harlem Block Schools (New York City), 119 东哈莱姆街区学校(纽约市)
- Education 教育
- Big ideas of, 37—41, 152—153 教育的重要思想
- As disciplining of imagination, 32 想象力的训练
- Twain on, 33—36 吐温论教育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enter, 110 教育发展中心
- Eliot, T. S., 73 T·S·艾略特
- Elitism, 62—63, 74 精英主义
- Emerson, Ralph Waldo, 72, 75, 82, 167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 Emile*(Rousseau), 8, 10, 13—15, 17—18 《爱弥儿》(卢梭)
- Enlightenment, 8, 14, 18 启蒙, 启发
- Environmentalism, 13—14 环境主义
- Ethics, 69, 70 伦理学
- Ethnic pride, 63 种族自豪感
- Excitement of Writing, The* (Clegg), 115—116 写作的兴奋(克莱格)
- Experience and Nature* (Dewey), 72, 75, 81—82 《经验与自然》(杜威)
- Factory system, 38 工厂体制模式
- Familism, 19—30 家庭主义
- Family groupings, 98—99, 109 家庭组合
- Featherstone, Joseph, xi 杰伊·费瑟斯通
- Fitzgerald, F. Scott, xv-xvi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 Follow Through program, 154 联邦的继续计划(幼儿早期教育计划的延续)
- Ford, Gerald, 61 杰拉尔德·福特
- Ford, Marie, 130 玛丽·福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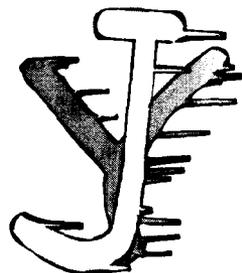
- Formal Schooling, 100, 101—102, 103 正规学校教育
See also informal education
 亦见非正规教育
 Alternatives to, 139—142
 代替的方法
- Free days, 98, 102, 129 自由的一天
- Free writing, 100, 104—105, 116 自由写作
- Freud, Sigmund, 13, 18, 15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 Froebel, Friedrich, 18 弗利德里希·福禄培尔
- Froebel Institute(London), 124
 福禄培尔学院(伦敦)
- Fuller, Margaret, 166 玛格丽特·富勒
- Gallas, Karen, 158 卡伦·加拉斯
- Garrity, Judge, 63 加里蒂法官
- Gary Plan, 71 加里计划
- Ghetto schools, 119, 126—133
 犹太人(黑人)居住区学校
- Gibson, William, 143 威廉·吉布森
- Gilded Age, 35 富有时代
- Girl with the Brown Crayon, The*(Paley), 159, 160, 161
 《拿着棕色蜡笔的女孩》(佩利)
- Glazer, Nathan, 49 内森·格莱泽
- Goffman, Erving, 144 欧文·戈夫曼
- Goodman, Paul, 49—50 保罗·古德曼
- Goodman, Percival, 49—50 珀西瓦尔·古德曼
- Goodwin, Richard, 50 理查德·古德温
- Gradgrindism, 16, 24—27, 28, 93—94, 155, 170 葛雷硬主义
- Great Britain 英国
 Infant schools, 95—114 幼儿学校
 Junior schools, 95, 101, 113—118 初级小学
- Growth, 151, 166 成长
- Haley, Margaret, 166 玛格丽特·黑利
- Hard Times* (Dickens), 16, 24—27 《艰难时世》(狄更斯)
-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 哈佛教育评论
- Hawkins, David, 77—78 戴维·霍金斯
- Hawkins, Frances Pockman, 93, 139—142 弗朗西斯·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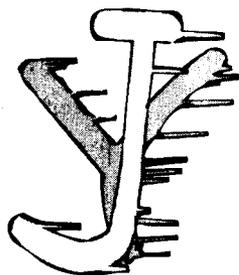
- 金斯
Head Start, 54, 111, 119, 154
 幼儿早期教育计划
- Hegel, G. W. F., 68—69 黑格尔
- Hegelianism, 68—69 黑格尔主义
- Helen and Teacher* (Lash), 93, 143—148 《海伦与教师》(拉希)
- High School II* (film), 87—88
 《中学第二部》(电影)
- Hirsch, E. D., 90 赫希
- Hofstadter, Richard, 75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 Holmes, Oliver Wendell, 75, 83 n. 12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 Holt, John, 111 约翰·霍尔特
- House, Edward M., 72, 82 n. 4
 爱德华·M·毫斯
- Howe, Samuel Gridley, 145
 塞缪尔·格里德利·豪
- Hull, William, 122 威廉·赫尔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8, 106, 107, 152—153 个别差异
- Industrialization, 70 工业化
- Infant schools (Great Britain), 95—114 幼儿学校
- Children teaching children and, 98—99 儿童教育儿童以及
- Curriculum materials in, 110—111 课程教材
- Family grouping in, 98—99, 109 家庭组合
- Formal schooling versus, 100, 101—102, 104 正规学校教育对应
- Free days, 98, 102 自由活动日
- Informality of, 96—99, 100—102 非正规性
- Primary school revolution and, 103—104, 108—110 小学革命以及
- Reading materials in, 99—100 阅读材料
- Streaming/tracking and, 108—111 能力分班/成绩分班
- Informal education 非正规教育
- Infant schools (Great Britain), 95—114 幼儿学校
- Junior schools (Great Britain), 95, 101, 113—118 初级小学
- Open schools (United States), 119—125 开放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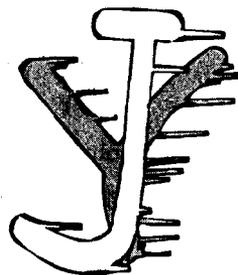
- Teacher training for, 124—125, 134—138 教师培训
- Informed Vision, The* (Hawkins), 77 《已知的观念》(霍金斯)
- Ingraham v. Wright*, 22 英格拉哈姆对赖特
- Inside the Primary School* (Blackie), 114 《走进小学》(布莱基)
- Institution-building, 26 学校建设
- Instrumentalism, 68, 72 工具主义
- Integration, *See* Desegregation of schools 融合, 参见学校废除种族隔离
- Intellectual progressives, 91—92 理智进步教育思想的拥护者
- In the Early World* (Richardson), 134—138, 160 《在早期的世界里》(理查森)
- IQ tests, 110, 111 智商测试
- Itard, Jean-Marc, 145 让·马克·伊塔德
- Jackson, Robert, 129—130, 132 罗伯特·杰克逊
- Jacob, Jane, 49, 55 n. 1 简·雅各布
- James, Henry, 72, 73 亨利·詹姆斯
- James, William, 27, 29, 69, 75, 145, 146 威廉·詹姆斯
- Jencks, Christopher, 22 克里斯托弗·詹克斯
- Jim Crow, 57 吉姆·克罗
- Johnson, Lyndon, 22—24, 27—28 林顿·约翰逊
- Junior schools (Great Britain), 95, 101, 113—118 初级小学(英国)
- Streaming/tracking and, 118 按能力/成绩分班
- Writing skills and, 115—118 写作技巧
- Kallet, Tony, 104 托尼·卡莱特
- Keats, John, 166 约翰·济慈
- Keller, Helen, 93, 143—148 海伦·凯勒
- Keniston, Kenneth, 25, 27 肯尼思·凯尼森
- Kennedy, Edward, 56 爱德华·肯尼迪
- Kennedy, John F., 22, 23, 24, 56 约翰·F·肯尼迪
- Kennedy, Robert, 49—50 罗伯特·肯尼迪
- Keynes, Lord, 70 凯恩斯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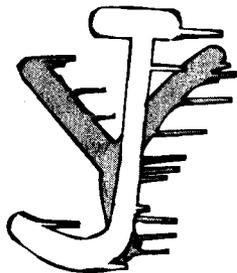
- Kohl, Herbert, ix-xi, xvii, 93, 104—105, 126—133, 160, 171 赫伯特·科尔
- Kozol, Jonathan, 155 乔纳森·科佐
- Kundera, Milan, 31 米兰·昆德拉
- Kwanzaa and Me* (Paley), 159, 160 《克瓦扎和我》(佩利)
- Lasch, Christopher, 23, 25, 27 克里斯托弗·拉希
- Lash, Joseph, 93, 143—148 约瑟夫·拉希
- Leavis, Francis Raymond, 73, 82 n. 5 弗朗西斯·雷蒙德·利维斯
- Leavis, Guenie Dorothy, 73, 82 n. 5 奎尼·多萝西·利维斯
- Left Back* (Ravitch), 90—92 《左翼的支持》(拉维齐)
- Life and Death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Jacobs), 55 n. 1 《美国伟大城市的生与死》(雅各布)
-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Twain), 33—36 《在密西西比河上》(吐温)
- Lincoln, Abraham, xix, 89, 90 亚伯拉罕·林肯
- Lives of Children, The* (Dennison), 122 《孩子们的生活》(丹尼森)
- Living Classroom, The* (Amidon), 94, 149—150 《生动的课堂》(阿米登)
- Locke, John, 8—14 约翰·洛克
- Logic of Action, The* (Hawkins), 139—142 《行动的逻辑:教师的笔记本》(霍金斯)
- Lonely Crowd, The* (Riesman), 123 《孤独的人群》(里斯曼)
-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O'Neill), 30 《漫漫长夜路迢迢》(奥尼尔)
- Long Revolution, 14—15 长期革命
- Lost Community, 14 迷惘的社会
- Lynd, Helen Merrell, 107—108 海伦·梅里尔·林德
- Lynd, Robert, 107—108 罗伯特·林德
- Macy, Anne Sullivan, 93, 143—148 安妮·沙利文·梅西
- Macy, John, 146—147 约翰·梅西
- Mann, Horace, 9, 74, 82 n. 11, 164 贺拉斯·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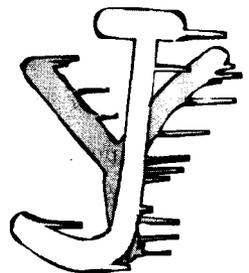
- Marriage, 20 婚姻
- Marx, Karl, 68 卡尔·马克思
- Marxism, 68—69 马克思主义
- Mathematics skills 数学技能
- Authentic learning and, 154—155 真实学习法与
- In British infant schools, 105, 108 在英国幼儿学校
- Classroom communities and, 170 课堂社区
- Maturationalism, 13 成熟阶段主义
- McCarthy, Eugene, 49—50 尤金·麦卡锡
- Me, 32, 34 我
- Meier, Deborah, xvii, 44, 84—88, 91, 159, 162 德博拉·迈耶
- Memory, 33—36 记忆
- Michelangelo, 146 米开朗琪罗
- “Middletown”(Lynd & Lynd), 107—108 “米德尔敦”(罗伯特和海伦·梅里尔·林德)
- Mill, John Stuart, 81, 83 n. 14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
- Miller, Henry, 82 亨利·米勒
- Modernism, 9—11 现代主义
- Countermodernism, 24 反现代主义
- Education and, 10—11 教育
- 与
- Romanticism versus, 22—23 浪漫主义与之相对的
- Molly is Three* (Paley), 157 《莫利3岁了》(佩利)
- Mondale, Walter, 62 沃尔特·蒙代尔
- Montaigne, 38 蒙田
- Morris, William, 73, 82 n. 7 威廉·莫里斯
- Moynihan, Daniel P., 23, 27, 51—52 丹尼尔·莫伊尼汉
- Moynihan Report 23, 27 莫伊尼汉报告
- Mumford, Lewis, 70—71 刘易斯·芒福德
- Nationalism, 63 民族主义
- Natural learning, 11, 37—38, 98—99, 109 自然学习法
- New Child, 10 新儿童
- New Education, 10—11, 14, 15, 79—80, 153 新教育
- New liberalism, 24—25 新自由主义
- New Man, 10 新男性
- New Republic, The*, xi, xv, xvii, 43, 71—72, 93, 144 《新共和》
- New Woman, 10 新女性
- New York City, 111—112 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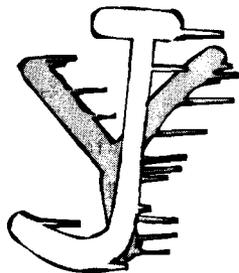
- 约市
- Central Park East High School, 44, 84—88 东中央公园中学
- Decentralization controversy in, 48—55, 59—60, 119 权力下放的争议
- East Harlem Block Schools, 119 东哈莱姆街区学校(纽约市)
- Gary Plan in, 71 加里计划
- Ghetto schools, 119, 126—133 犹太人(黑人)居住区学校
- Ocean Hill-Brownsville protests, 43, 45—47 奥圣山—布朗斯维尔区的抗议活动
- Progressive education in, 62, 91 进步教育
- New Zealand, informal education in, 134—138 新西兰的非正规教育
- Nixon, Richard M., 58, 61 理查德·尼克松
- Not Me, 32, 34 非我
- Ocean Hill-Brownsville protests, 43, 45—47 奥圣山—布朗斯维尔区的抗议活动
- Oedipus myth, 13 俄狄浦斯情结的神话
- One Best System(Tyack), xvi 一个最好的制度(泰亚克)
- O'Neill, Eugene, 30 尤金·奥尼尔
- Open schools, 119—125, 152, 154, 167 开放学校
- Active teaching in, 123—125 主动教学
- Authority in, 122—123 管理部门
- Concerns for, 120—122 关注
- Teacher training for, 124—125 教师培训
- Orpheus, 33—35 奥菲士
- Orwell, George, 82 乔治·奥威尔
- Painting, 137 绘画
- Paley, Vivian, xvii, xviii, 157—162 维维安·佩利
- Paul, St., 53, 66 圣·保罗
- Peguy, Charles, 60 查尔斯·佩古
- Pelagians, 11 贝拉基的信徒
- Pelagius, 16 贝拉基
- Perrone, Vito, 39 维托·佩龙尼
- Phonics skills, 99, 114, 121, 151 读音法技能
- Piaget, Jean, 13, 123, 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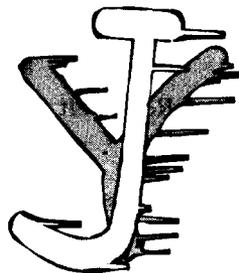
- 让·皮亚杰
Pierce, Charles saunders, 123
查尔斯·桑得斯·皮尔斯
Plowden Report (Great Britain), 101—102, 103, 105, 108, 109—110, 115 普洛登报告(英国)
Pluralism, 74 多元论
Poetry, 169 诗歌
Pottery, 135, 136 陶艺
Poverty program, 24, 51—52
消除贫穷计划
Power 权力
African Americans and, 53
非洲裔美国人以及
Of growth, 151 成长的
Power of Their Ideas, The (Meiser), 84—85 《他们思想的力量》(迈耶)
Practitioner research, 157—162
实践者研究
Praxis, 68—69 实践
Professionalism, 60—61 职业化
Progressive education, 1, 85—86, 105—106, 152. *See also*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进步教育, 亦见民主主义与教育
Dewey and, 68—83 杜威以及
Of Helen Keller, 143—148
海伦·凯勒的
In private versus public schools, 106, 107, 111 在私立和公立学校之间
Progressive era, 62, 105—106
进步运动
Prometheus, 35 普罗米修斯
Protestantism, 68—69 新教
Racism 74, 91 种族主义
Ravitch, Diane, xviii, 90—92
黛安娜·拉维齐
Reading skills, 103 阅读技巧
In ghetto schools, 131—132
犹太人(黑人)居住区学校的阅读技巧
Infant schools (Great Britain) and, 98—102, 114 幼儿学校(英国)以及
Open schools and, 121 开放学校以及
Test-taking skills and, 131—132 考试技巧
Reagan, Ronald, 31—32, 35
罗纳德·里根
Real Me, 32, 34 真我
Resegregation of schools, 65—66 学校的重新种族隔离
Richardson, Elwyn S., xvii, 134—138, 160 埃尔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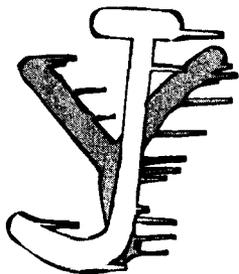
- 查森
- Riesman, David, 11—12, 64—65, 67 n. 1, 123 戴维·里斯曼
- ROAR, 61
-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
- American, 32—36, 72—73, 76—77 美国式的
- Cult of child-centeredness, 90, 144 坚信以儿童为中心
- Ideas of childhood and, 8, 13—18 有关童年的观点以及
- Low versus high, 76 低级的浪漫主义对高级的浪漫主义
- Modernism versus, 22—23 现代主义对浪漫主义
- 60s and, 22—24, 91, 120 60年代的浪漫主义
- of Anne Sullivan, 144 安妮·沙利文的浪漫主义
- of teaching, 162, 166 教学的浪漫主义
- Roosevelt, Eleanor, 144 埃莉诺·罗斯福
- Roosevelt, Franklin D., 4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 Roosevelt, Theodore, 69 西奥多·罗斯福
- Rousseau, Jean-Jacques, 8, 9—18, 37 让·雅克·卢梭
- Ruskin, John, 73, 82 n. 6 约翰·拉斯金
- Sakuma, Aki, 157 阿歧·佐久间
- Santayana, George, 73, 82 n. 10 乔治·桑塔亚那
- Scaffolding, 40 脚手架式教学
- Science, 106 科学
- Scientific management, 71, 107 科学管理
- Scientism, 32, 34, 73, 77—78, 80 唯科学主义
- Self-respect, 63 自尊
- Sen, Amartya, 37 阿马泰亚·森
- Should We Burn Babar (Kohl), 171 我们该烧死巴伯吗?(科尔)
- Silberman, Charles, 119 查尔斯·西尔伯曼
- Sizer, Theodore, 87—88, 90, 91 西奥多·赛泽
- Skinner, B. F., 32 斯金纳
- Slavery, 56 奴隶制
- Social capital, 27 社会资本
- Social engineering, 66 社会工程
- Socratic approach, 161 苏格拉底的方法



- Souls of Balck Folk, The* (Du Bois), xviii-xix, 171—172
《黑人兄弟的灵魂》(杜波依斯)
- Stanton, Elizabeth Cady, 166
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 Story of My Life, The* (Keller), 143 《我生活的故事》(海伦·凯勒)
- Sullivan, Anne, 93, 143—148
安妮·沙利文·梅西
- Tanner, Tony, 16 托尼·坦纳
- Tawney, Richard H., 73, 82
n. 8 理查德·托尼
- Taylor, Frederick, 107 弗雷德里克·泰勒
- Teacher: Anne Sullivan Macy* (Keller), 143 《老师:安妮·沙利文·梅西》(凯勒)
-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91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 Teaching 教学
Alternative approach for deaf Students, 139—142 对聋哑学生教学的选择性方法
In British infant schools, 98—102 英国幼儿学校的教学
Letter to a young teacher, 163—172 致青年教师的信
Listening to children in, 157—162 教学中倾听儿童讲话
Romantiscim of, 162, 166 教学的浪漫主义
Training for informal education, 124—125, 134—138 进行非正规教育训练
Teaching the Unteachable (Kohl), 128 《教不可教者》
Temperament, 81 性格
Tests, 110, 111, 131—132, 154, 155, 160 测试
Test-taking skills, 131—132 考试技巧
Thernstrom, Stephan, 61 斯蒂芬·塞斯特罗姆
Thinking skills, 103—112 思维技能
36 Children (Kohl), xi, 104—105, 126, 133, 160 《36个孩子》(科尔)
Token minorities, 64—65 象征性少数派
Tolstoy, Leo, xvii, 37 利奥·托尔斯泰
Tracking, 62, 108—111, 118 按成绩分班
Tribalism, 63 宗族主义
Twain, Mark, 2, 33—36, 144



- 马克·吐温
 Tyack, David, xvi, 80 戴维·泰亚克
 Unemployment rates, 31—32 失业率
 Utilitarianism, 89—92 功利主义
 Utopianism, 70, 72—73, 79 乌托邦主义
 Vicious intellectualism (James), 27, 69 充满恶意的理智主义 (詹姆斯)
 Victor, Wild Boy of Aveyron, 145 维克托, 法国革命前阿弗里昂的著名野男孩
 Virture of hope, 168 希望的品质
 Voltaire, 16 伏尔泰
 Wallace, George, 49—50, 56—57 乔治·华莱士
War and Peace (Tolstoy), 37 《战争与和平》
 War as weapon, 71—72 战争作为武器
War on poverty, 24, 51—52 《对贫穷宣战》
 Warranted assertability (Dewey), 77 获得保证的主张 (杜威)
 Weber, Lillian, 86 莉莲·韦伯
 White, Morton, 72 莫顿·怀特
 Whitehead, Alfred North, 150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
White Teacher (Paley), 158, 159, 160 《白人教师》
 Whitman, Walt, 32, 36, 60—61, 89, 166, 167 沃尔特·惠特曼
 Williams, Raymond, 73, 82 n. 9 雷蒙德·威廉斯
 Williams, William Carlos, 151—152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Wilson, Woodrow, 72, 82 n. (注释4) 伍德罗·威尔逊
 Winfrey, Oprah, xviii 奥普拉·温弗里
 Wiseman, Frederick, 87—88 弗雷德里克·怀斯曼
 Woolf, Virginia, xv 弗吉尼亚·伍尔夫
 Wordsworth, William, ix, 17 威廉斯·华兹华斯
 World War II, x, 3—7, 21 第二次世界大战
 Writing skills, 103 写作技能
 Authentic performance and, 152 真实的活动



Free writing, 100, 104—105,

116 自由写作

In ghetto schools, 128—130,

132 在犹太人(黑人)居住
区学校

Infant schools (Great Britain)

and, 99—100, 114 幼儿
学校

In informal education, 134—

138 在非正规教育中

Junior schools (Great Brit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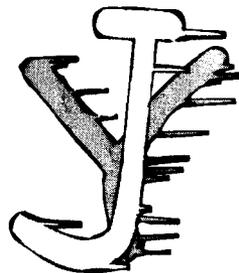
and, 115—118 初级小学,
小学(英国)

You can't Say You Can't Play

(Paley), 159, 161—162 《你
不能说你不会玩》(佩利)

Zacharias, Jerrold, 111 杰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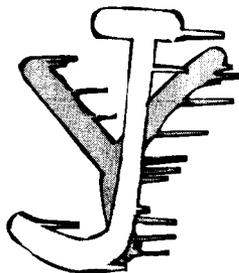
尔德·扎卡赖亚斯



《教育周刊》把杰伊·费瑟斯通列为上个世纪对美国教育有影响的一百位名人之一。他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备受赞扬的师范教育课程的创建者和主讲教师之一。他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出任过波士顿康芒韦尔思学校的校长,并多年任《新共和》杂志的编辑,撰写了不少有关教育、政治和文学方面的文章。他出版了两本有关教育和学校改革方面的专著(《学校:儿童学习的地方》,利夫莱特,1971;《学校能做什么》,利夫莱特,1976)以及一本诗歌集《布雷斯的海湾》(新版,2000)。

凯特林·费瑟斯通是纽约市3—4岁的幼儿教师,是班克斯特里特学院的教育学硕士。

莉莎·费瑟斯通是一位作家、记者和评论家,现生活在纽约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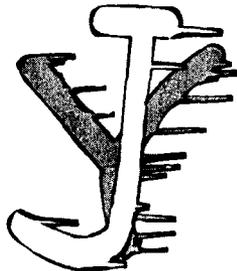


译者后记

教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富有内涵的和生动的话题,而教育民主化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所有与教育问题有关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二战以后,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教育民主化更是成为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可以说,“教育‘民主化’现已成为几乎所有教育革新和教育改革的一项固有的目标。教育‘民主化’是目前全球教育系统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① 因此,这个论题在无数关于教育的言论和出版物中可以反复见到,它也的确值得人们不断地、一代接一代地大书特书。

本书作者约瑟夫·费瑟斯通是美国当代教育实践家,也是一位有着丰富内涵的教育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从事过多种不同的职业,做过记者、教育史研究者、师范教育工作者、政治行动主义者和诗人。教育周刊把杰伊·费瑟斯通列为上个世纪对美国教育有影响的一百位名人之一,被称为“教育家的教育家”。他是密歇根州立大学备受赞扬的师范教育课程的创建者和主讲教师之一。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出任过波士顿康芒韦尔思学校的校长,并任《新共和》杂志的编辑多年。他撰写了不少有关教育、政治和文学方面的文章,散见于《大西洋月刊》,《哈佛教育评论》,《纽约时报》,《犁铧》(Ploughshares)以及《哈佛评论》等著名杂志上。他出版了两本有关教育和学校改革方面的专

^① 查尔斯·赫梅尔,《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王静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 年版,第 6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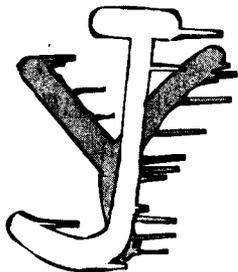


著:《学校:儿童学习的地方》(1971)和《学校能做什么》(1976)以及一本诗歌集《布雷斯的海湾》(2000)。目前他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担任该校师范教育专业的教授和教研负责人(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师范教育专业在美国通常名列第一)。

本书是作者在196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先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的汇编,是一本有关美国民主教育的论文集,集中体现了美国在追求教育民主思想的历程中所进行的各项实践活动和学校教育的改革。其中有几篇文章是作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任《新共和》杂志的编辑时所写的,而近期的文章则反映了作者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从事师范教育工作时的情况。书中还有一些文章谈到了有关杜威和卢梭的教育思想、美国的城市学校、民权以及作者所仰慕的教师们的工作情况等。

作为一名教育学家和历史学家,费瑟斯通在工作中已跨越了知识和文化的历史以及教育的历史。他汲取了以传统为基础的约翰·杜威的进步教育以及美国和英国等其他教育家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将学习看作是一个严肃而又充满欢乐的事业的课堂教学思想,推崇“儿童是成人之父”的观点,其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从历史的和社会的角度关注儿童和家庭。费瑟斯通有关民主教育的思想集中反映在《见证》一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描述了进步教育思想的拥护者和民主主义教育者之间的激烈争论,指出,他们之间的争论实际上也是传统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他希望告诫美国的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的是,“当我们为新千年的孩子们创造新的、更加美好的课堂和学校教育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传统上还有很多丰富的、并且证明是对我们有益的民主思想和实践活动可资借鉴与挖掘”。^① 尽管费瑟斯通的文章内容大多是有关学校教育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仍深深扎根于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中。他认识到,没有经济的和政治民主的学校改革是不可能实现预期目标的。书中所有的篇章都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良好的教育制度才能帮助所有儿童,特别是贫穷的儿童,使他

^① 费瑟斯通《见证民主教育的成功与失败》一书的中文版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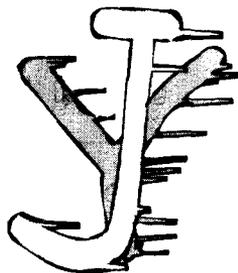


们能够无拘无束地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他也非常强烈地感到,这种良好的教育制度可以给每个教师以帮助,使教育者们努力在严格要求与人文关怀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从而使得各类孩子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教育应该是为儿童成为民主社会的公民而做的准备。在不牺牲某些规定标准的前提下,教育应该是孩子们的某种自由见习期。费瑟斯通坚持认为,当前的学校教育最紧迫的不是课堂缺乏宽松友好的气氛,而是人们是否能够建立更为平等的和多民族的社会。读完费瑟斯通的这部教育著作,相信应当对我国的教育和教育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翻译本书的过程是艰难的、枯燥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感到绝望的。为了理解某个术语或某个英文句子,往往需要长时间地冥思苦想、审词酌句、反复推敲,真可谓是绞尽脑汁、费尽心力。翻译中不仅要克服语言障碍,还要深刻领会语言背后的深邃思想。常常为自己中文表达能力的欠缺及专业知识的匮乏而深感惭愧和沮丧。“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时,才真正深刻地理解了我的大学英语老师的一句话,“假如要惩罚一个人,最好的办法不是别的,而是让他去翻译,尤其是翻译学术著作”。

当然,翻译的过程也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字斟句酌、仔细推敲,提高了两种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同时,翻译也是与作者交流、对话的极好的交往形式。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曾多次发电子邮件向杰伊·费瑟斯通先生请教,他都在第一时间给予回复(即使是人在外地),不厌其烦地逐一解答。他对学术认真、严谨的态度及回复问题的快捷使我们深受感动,也鞭策着我们尽力准确地传达作者在本书中的所思、所想。

本书序言和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由王晓宇翻译,第三部分由周常明翻译,全书最后由王晓宇统稿。我们对本书的翻译经过了艰苦的“历练”,也得到了关心本书翻译的人们的帮助与支持。首先要感谢金勇先生和黄忠敬博士对我们的信任,才使我们有机会翻译本书,并且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给予支持和帮助。感谢杰伊·费瑟斯通先生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中文版作序,写下了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殷切期望。感谢导



师单中惠教授及室友宋玮同学,他们的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为本书的翻译润色不少。由于时间仓促,更由于我们的学识和能力的局限,翻译中难免存在一定的错误与不足,敬请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

译者

2004年12月

